

## 出版者的話

哈里·杜魯門于1945年1月任美国副总统，同年罗斯福逝世后继任美国总统。本书是杜魯門自1945年4月12日就任总统至1953年1月卸任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主要記述当时重大国际和国内事件以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活动。作者以較大的篇幅叙述了他本人在分裂德国，占领日本，干涉中国内政、扶植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提出并实行“杜魯門主义”、“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的叙述是片面的、虚伪的、反动的，但是也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企图窃取各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果实、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一些情况。为了帮助讀者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动本质及其重要措施，我們將本书翻譯出版，以供参考。

本书分两卷，第一卷《决定性的一年》，叙述的时间从1945年4月到1945年底；第二卷《考驗和希望的年代》，叙述的时间从1946年到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止。

中譯本根据英国霍德与斯托頓公司1956年版本譯出。英国版第一卷删除了原紐約版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关于叙述杜魯門就任总统前的经历部分。为了节省篇幅，我們还删除了英国版的第一章《罗斯福总统的逝世》和第十六章《波茨坦之行》，以及作者同家人的来往信件和有关生活瑣事的叙述部分。

1964年4月

## 謝 詞

在写作本回忆录和叙述这一困难时期的历史时，我曾經得到許多人的极其宝贵的帮助和建議。为了竭力提供一幅真实和正确的写照，有必要对我个人的記錄和文件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我非常感謝杜魯門夫人，我时常同她商量并請她作出判断。

我願向我政府中的許多工作人員特別致謝，因为他們花費時間和我一起重新研究了往事当中与他們有关的各个方面。他們是：迪安·艾奇逊、陸軍五星上將乔治·馬歇尔、塞繆尔·罗森曼、約翰·斯奈德、海軍少將悉尼·索尔斯、海軍少將罗伯特·丹尼逊、阿弗里尔·哈里曼、陸軍五星上將奧馬尔·布莱德雷、查尔斯·布兰南、查尔斯·索耶、菲利普·珀尔曼、托馬斯·墨萊、斯坦萊·伍德华、約翰·斯蒂尔曼、查尔斯·墨菲、罗伯特·兰德里少將，以及奧斯卡·查普曼、戈登·迪安、霍华德·麦格腊、克拉克·克利福德、埃德溫·保萊和卡斯基·柯勒特法官。

迪安·艾奇逊和塞繆尔·罗森曼不辞辛苦地閱讀了我的原稿，并提出了批評意見，我謹向他們致以格外的謝意。

在过去的两年里，戴維·諾伊斯和威廉·希耳曼經常在我的身边，帮助我收集材料和編写这部著作。由于他們的合作，本书才得以写成，我謹向他們表示深切的謝意。

对于堪薩斯大学的弗朗西斯·海勒教授，对于他所給予我的宝贵的帮助，謹致以真摯的謝意。还有摩頓·罗伊斯教授，他也曾在某些时候同其他人一道，协助我进行历史方面的研究。

在写作和修改本回忆录时，我的随用人员承担了繁重的任务，我愿对尤金·贝利先生、罗斯·康威小姐和弗朗塞斯·迈尔斯小姐所做的工作表示谢意。

我曾采用了威廉·希耳曼所著的《总统先生》一书（法拉尔、斯特劳斯和杨格公司出版）中的某些段落，作为史实记录的一部分收集在本回忆录中。

## 序 言

在閱讀我国历史时，我常常想，由于我国只有少数几位总统曾經談到他們自己的事迹，我們不知受到多么大的損失。更多地了解他們的思想活动和什么东西驅使他們去做他們所做过的事情，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担負美国总统职位的个人責任之重是无与伦比的。授权代替总统发言的人寥寥无几。沒有人能代替他来作出决定。当他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候，沒有人能知道他在整个过程和各个阶段的想法。即使是和他最接近的人，即使是他的家庭成員，也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做某些事情，和怎样得出某些結論的全部原因。担任美国的总统必須孤單地进行工作，而在作出重大决定时，更是如此。

不幸的是，我們有些总统，由于在任职期間即行逝世，以致未能將他們执政的全部事实告訴大家。有些总统在离开白宫的时候，身体已經衰弱，即使他們願意从事写作，也已无能为力。而有些总统的經歷則并不如意，因此也不願叙述这些往事而重添煩惱。

至于我自己，趁時間还不迟，我願把我在白宫期間的事迹尽我所能談到的一一記錄下来。我希望按照我的理解写入本书的事件，在向某些人介紹情况和使另外一些人弄清事实真相方面能有所幫助。

在接連不断的世界危机中担任七年半以上的美国总统，不可能記住过去一切事情的每个細節。在最近的两年半的時間里，我根据个人的記錄、备忘录和函件，并且同那些亲自參加作出某些決議的人一道，作了一番回忆，希望能重溫并正确地記錄下我执政期間的重大事件。



我竭力不采取事后聰明汉的态度来記載这些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其事后聰明都要比一个最偉大的政治家的事前推测更为圓滿。本书所記載的一切，都是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实际情况，以及当时我作出决定的想法，而并非根据后来事态发展的結果。

我将把这部两卷集回忆录中未能包括进去的那一部分原稿轉送到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图书馆，供学者和历史研究者参考。

为了国家的安全并考虑到某些人仍然健在，我刪除了某些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有許多是在若干年甚至多少代里都不可能公开的。

在我担任总统的年代里，尽管存在着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动荡和压力，主宰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唯一目的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一个事件成为籠罩在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头上的暗影，它被不正确地称为“冷战”。

事实上，我們一直生活在国家、社会和經濟关系緊張的时期里。造成这种緊張局面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国家企图恢复战时遭到的破坏，以及許多地方的人民日益認識到自己的自由权利。許多世紀以来，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一直处于外国統治和經濟奴役的状态。而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現在才开始遍及全世界。

这是事态的自然发展，美国竭尽一切努力帮助并鼓舞各个国家和各族人民，恢复其建設事业并取得独立。

不幸的是，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企图利用这个世界的局势。为了这个原因，也仅仅为了这个原因，我們才不得不确保我們的軍事力量。我們不是一个軍国主义国家，但我們必須对付我們所面临的世界局势。

我們知道，只要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仍然在原始条件下生活，蒙受饥餓和疾病的痛苦，享受不到現代科学和工业的好处，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条件过幸福生活，并且和自己的邻居和平相处。

我相信，正如 1953 年 1 月 15 日在我离开白宫前最后一次向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我们已把第三次世界大战推迟到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成功地创造了条件，使战争在人类所能瞻望的将来不致爆发。”

哈里·杜鲁门

## 目 录

第 一 章	在白宫的第一天	1
第 二 章	开始同丘吉尔和斯大林通信	19
第 三 章	对国会的第一篇咨文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30
第 四 章	中国和德国的問題	36
第 五 章	莫洛托夫訪問华盛顿	46
第 六 章	希姆萊的建議	65
第 七 章	丘吉尔向斯大林呼吁	85
第 八 章	德国投降	97
第 九 章	租借法案的終止	120
第 十 章	我們和戴高乐与铁托的糾葛	136
第 十 一 章	霍浦金斯赴莫斯科的使命	164
第 十 二 章	联合国的产生	181
第 十 三 章	德国的占領	207
第 十 四 章	斯大林的对华和对日政策	226
第 十 五 章	波茨坦會議開幕	239
第 十 六 章	波茨坦：賠償与波兰边界問題	252
第 十 七 章	波茨坦：附庸国家	269
第 十 八 章	波茨坦會議的結束	295
第 十 九 章	原子彈；俄国参加对日作战	314
第 二 十 章	日本的投降	328
第 二 十 一 章	中国發生的問題	339
第 二 十 二 章	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受降仪式	353

第二十三章	向飢餓的世界供給糧食·····	365
第二十四章	“公平施政”·····	386
第二十五章	罷工與煤荒·····	403
第二十六章	復員·····	416
第二十七章	日益增長的東西方分歧·····	427
第二十八章	英國和美國關於原子能的協議·····	442
第二十九章	貝爾納斯和華萊士的辭職·····	462

## 第一章

### 在白宫的第一天

我宣誓就职的典礼<sup>①</sup>几乎只进行了分把钟，可是跟着拍摄那不可少的正式照片时却耽擱了不少功夫。大多数参加典礼的人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多半一言不发地同我握手，杜魯門夫人和瑪格丽特也离开后，留下来的只是內閣人員了。

我們圍着桌子坐下，只是邮政部长瓦克的座位空着，因为他病了。當我們就座时，秘书厄尔利走了进来。他說，报界希望知道，有关联合国的旧金山會議是否按原訂计划在4月25日召开。

我一秒钟也沒有迟疑，就告訴厄尔利，會議將照罗斯福總統的指示举行。我认为毫無疑問，會議必須举行。建立一个机构来协助維持未来的世界和平是絕頂重要的事。这是我以總統身份作出的第一件決定。

厄尔利走后，我就对內閣講話。我簡單地对他們說，像我已經對他們中一些人个别地說过的，如果他們全都留任，我将感到很高兴。我說，我的意图是繼續罗斯福政府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但是，我說得很清楚，我是自己當總統，对于需要作的決定，我将全盤負責。我对他們說，我希望他們不猶豫地向我提建議——我会很乐意听取的。我叫他們在必要时可以毫無顧慮地不同意我的意見，但是一切政策的最后決定將取決于我。我又補充說，一旦做出这种決定以后，我盼望他們支持我。當政府有變動时，內閣必然也要

---

<sup>①</sup> 1945年4月12日美国總統罗斯福逝世，当时副總統哈里·杜魯門于同一天晚上繼任美国总统。——譯者

有所变动。可是我明白，在我有机会和他們一起工作之前，对所有的內閣閣員推誠相見，对我是何等必要。他們同罗斯福总统相处的經驗和他們的知識，在这个紧要关头对于我是必需的。

对于所有联邦机构的首腦，我也打算保持同样的态度。可是对于某些临时性的战时机构的首腦，我心里却有一些保留。

內閣第一次會議開的時間不長，散會以後，閣員們都站起來，悄悄地走出房去——只剩下史汀生部長。

史汀生說要同我談一件極其重要的事。他告訴我，他想通知我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巨大計劃——一個預期將發展成一種具有新的、令人難以相信的毀滅力量的爆炸物的計劃。這就是當時他認為可以告訴我的一切，他的話使我很難捉摸。這是我第一次獲悉關於原子彈的一點消息；可是他沒有對我詳細說明白。直到第二天，我才又聽到一些，足以使我多少理解那正在進行的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以及我們可能很快就要擁有的那驚人的威力。

這樣一樁大事，居然能成功地對國會議員都保持秘密，真是一件奇蹟。我已經知道，也許別人也知道，某種非常重要的東西正在我國的軍事工廠里製造。幾個月以前，作為我擔任國防計劃調查委員會主席的工作的一部分，我曾派人到全國的軍事工廠進行調查，我甚至曾派調查人員到田納西州和華盛頓州，指令他們查出某些巨大的建築物到底是什麼，它們的目的何在。

在派出那些調查人員以後，史汀生部長曾打電話給我，說要和我私人談一次話。我對他說我可以立刻去他的辦公處，可是他說還是他來找我好。

他來到後，我馬上知道，他心里想談的事同我派遣委員會代表去田納西和華盛頓去調查的巨大建築物有關。

“參議員，”史汀生部長在我辦公桌旁坐下來時對我說，“我不能告訴你那是什麼東西，可是那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計劃。這

是最机密的事。連很多实际上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不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要是你們不到那些厂里去，我們明白底細的人会感謝你的。”

我早就知道哈里·史汀生是一个偉大的美国爱国者和政治家。

“我相信你的話，”我对他說，“我一定下令取消对这些厂的調查。”

我立刻下了命令，而关于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直到史汀生部长在第一次內閣會議后告訴我为止，我始終毫无所知。第二天，前不久担任罗斯福总统的战时动員顧問的杰米·貝尔納斯<sup>①</sup>来看我，他也郑重其事地告訴我一些細节，他說，我們正在完成一种威力足以毀灭整个世界的爆炸物。后来，当科学研究和发展局局长范尼伐尔·布希来到白宮时，我才听到科学家对原子彈的說明。

当布希博士对我讲这件惊人的事情时，海軍上将李海正和我在一起。

“这是我們干过的最大的蠢事，”他用他那种倔强而生硬的态度評論道。“这个炸彈永远不会爆炸，我是以爆炸专家的身份这样說的。”

不过在我担任总统的第一个晚上，我最关心的还是旧金山會議。在內閣會議之后，斯退丁紐斯、厄尔利和丹尼尔斯建議，需要再采取措施，使盟国和全世界确信旧金山會議將按原定計劃举行。我們到橢圓形的总统办公室里去討論这个問題。

我是全力拥护作为联合国基础的理想，并曾在国会里以各种方式支持它。我要消灭国内外以为既定計劃将会有所改变的任何謠傳和疑慮。心里既这样打算，于是便决定立即发表声明，重新

---

<sup>①</sup> 詹姆斯·貝尔納斯的爱称。——譯者

向盟国保证我拥护行将召开的会议。

这时，在白宮的記者們要求举行一次記者招待会，因为在我宣誓就职时他們不在場。

我要斯蒂夫·厄尔利通知他們，“我暂时不想举行記者招待会。我将尽力按照我相信罗斯福总统会做的那样做下去，为此，我已經要求內閣留任。”

在那最初的几小时内，尽管我由于我們遭受沉痛損失而难过，但我心里也一直在想着我所继承下来的任务，想着我們国家在这历史上的紧要关头所面临的艰巨責任。从我讀过的美国历史中我知道，一个继任总统对于前任总统的施政綱領尤其是最近一位偉大的总统第四次当选的施政綱領，負有什么义务，是沒有現成答案可以遵循的。

幸运的是，这个施政綱領对我說来并不成为問題。这个施政綱領所依据的，不仅是由我在芝加哥代表大会协助起草的、并使我当选为副总统的那个竞选綱領，而且我也坚决地毫无保留地相信它。它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与盟国在軍事和經濟行动上的配合来爭取战争胜利；按照战时已拟定的方針、同我們的盟国及其它爱好和平的国家密切合作，来贏得有組織的和平；在国内依据全体人民的利益来治理国事。

不論在我作为一个参議員的时候，还是在我当副总统的时候，我对政府的基本原理，或我对政府同人民关系的信念，都沒有发生过任何意識到的变化。我把自己列为現代的杰斐逊式的民主党人。我把他的原則应用于今天的形势。我們常常听到关于杰斐逊对于联邦政府权力和州政府权力的态度。我們听到許多关于如果他还活着，他会怎样做的讲话。在我看来，他大概会正視他所面临的条件，而不会背棄他的根本信念。如果他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相信他会使他自己适应这一工业时代，而并不放棄他的原則。



我曾以我終身追求的政策为基础竞选参議員，这政策就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管理国家。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当我碰到要花費巨額公款的包工时，总是实行公开投标并把全部价目公布出来，承包的是要价最低的投标者。我推翻了前任把工程交給那些他特別喜欢的承包者的做法，而按照人民和納稅者的利益来开标。我所理解的簡單真理，就像我那时理解的一样，是国家应根据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只是根据有內綫的一批特殊人物的利益来办事。我相信，誰也不会怀疑，这正是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的基本思想和实践。

我一向是全力拥护罗斯福的国内外施政綱領的，但是我知道，行政上存在某些严重的弱点。罗斯福总统常說他不是行政人材。他是一位有眼光有理想的人，他宁願把行政事务委托給別人，有时还委托給一些不尽适合实现他的理想的人。我深深感觉到这一点，甚至在第一天，我就明白，無論在內閣还是在政府政策方面，我終要作些更动。

.....

我的第一件公务是同国务卿小爱德华·斯退丁紐斯办的，他向我报告当前外交事务，并同我討論了为即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會議拟定的某些計劃。

斯退丁紐斯告訴我，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国务院每天都为总统准备一份重要外交发展的双頁摘要，同时把最近的报告<sup>①</sup>交給我。他問我，是否希望这份每日摘要繼續下去，又告訴我，正在为我准备一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要点的最新参考书。

我对斯退丁紐斯說，我将很欢迎每日摘要和参考书，但是我請他当天就能給我一份关于美国政府在同其它国家关系上所面临的

---

① 这是国务卿向总统作的口头报告的补充材料。

主要問題的背景及現狀的綱要。這些書面報告，連同其它各部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送來的材料一起，從那時起就都按時送給我，對於填補我所掌握的情報中的空白方面大有幫助。實際上，它們在許多問題的处理上是不可缺少的幫助，而我最初起就極其仔細地閱讀它們。每晚我都仔細閱讀它們，直到我完全理解它們所包含的情報時才去睡覺。

我向斯退丁紐斯要的報告當天下午送給了我。我一直沒功夫看，直到晚上在家不受打擾時我才閱讀了它。下面就是這份報告：

## 国务院呈

### 總統專用情報

聯合王國：丘吉爾先生的政策主要是建立在同美國合作的基礎上的。其次是建立在維持三強的團結上面，但是英國政府對於俄國和俄國的意圖的疑慮顯然日益加深。我國政府對於有關東歐和解放地區的雅爾塔協定的解釋，丘吉爾完全同意。不過，在細節方面，他却有用我們認為不必要的強硬態度迫使俄國接受這一主張的傾向。英國人渴望安全，但他們深深意識到自己已從領導地位一降而為三強中的次要伙伴，因此，急於通過對西歐各國的領導權，並通過更緊密地團結英聯邦內部的方式來加強他們對美國和俄國的地位。

法國：美國最大的利益是要求政府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都竭盡一切努力來協助法國恢復其實力和作用。

我們認為，由於1940年的軍事失敗，以及隨後全國被敵人占領，使法國臨時政府和法國人民目前在有關國家威望的問題上都過分固執。因而他們不時提出一些與他們目前實力完全不相稱的要求，在某些問題上，特別在有關印度支那的問題上，對美國的目

的和动机表现出毫无理由的怀疑。我们相信美国充分估计到法国人心目中的这一心理因素，在各方面都根据法国的潜在力量与作用而不是根据它当前的实力来对待它，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在重建法国方面的积极贡献包括下列各点：法国军队目前和将来的重新武装；支持法国参加欧洲諮詢委员会、对德国的管制与占领、赔偿委员会及其它一些组织；以及缔结一个租借协定。戴高乐最近宣称，他认识到法国同美国必需实行最密切的合作。

苏联：自雅尔塔会议以来，差不多在对我国关系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问题，苏联政府都采取了强硬的、毫不妥协的立场。这些问题中较重大的有波兰问题、关于在解放地区应用克里米亚决议、交换获释的战俘和平民的协定，以及旧金山会议。在苏联管制下的解放地区，苏联政府大都片面行动，而不同意已经出现的事态发展证明应当应用克里米亚协定。以苏联的标准衡量，虽然一般说来，我们的战俘得到良好的合理待遇，但是让我们的联络小组进入波兰去协助撤退获释的战俘的请求却遭到了拒绝。看来苏联政府愿意举行旧金山会议，却不愿意派它的外交部长出席。他们要求一笔巨额的战后贷款，而在这件事未获决定以前，至今不愿就有步骤地清偿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一事签订协定。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在同苏联当局合作方面也碰到同样的困难。

波兰：波兰当前的情况，是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的，苏联当局一贯破坏哈里曼大使为加速克里米亚决议的实施在莫斯科委员会所作的努力。直接向斯大林元帅提出的请求，还不曾产生任何效果。苏联政府还指使和支持华沙的波兰临时政府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如旧金山会议、赔偿与领土问题——代表波兰发言，来使问题复杂化。由于这在我国对苏联和其它联盟国的关系上，以及在我国舆论上所发生的影响，波兰及其政府的将来地位问题仍是我国国内外最复杂、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巴尔干地区：我国政府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同为执行对各该国的停战而设立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履行职责有关。问题的实质在于同苏联政府的关系。苏联政府是执行军事管制的国家，也是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占优势的因素；它利用它的地位对各该国家进行片面的政治干涉。这是同我国政府根据雅尔塔协定就解放后的欧洲所承担的明确责任相冲突的。我们曾为罗马尼亚（把一个少数派政府凭借威胁强加在该国身上）和保加利亚的事件（预料会有不公正的选举）提出应实行这一协定。苏联政府拒绝了第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又提出了一次，对第二个要求苏联政府还未作答复。

在南斯拉夫方面，没有什么紧迫的问题，虽然在那里我们或许也将被迫援引雅尔塔协定，除非该国政府对国内的民主人士表现更温和的态度，而这些民主人士在政府里尚无代表。

德国：美国对德国的政策已概述在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3月23日批准的备忘录中。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摧毁国社党的组织和影响，惩办战争罪犯，解散德国军事机构，建立军政府，在政治上力求地方分权，以现有的财富和将来的生产作赔偿，禁止制造武器，并毁灭为生产武器而设的一切专门设备，以及对德国经济实行管制以保证达到上述诸目标。

关于无条件投降书的全文、对德国实行管制的机构以及占领区的问题，已同联合王国和苏联达成协议。法国已批准前两项协议。陆军部现在正研究原定划给美国的区域，以便按照克里米亚计划转让一部分给法国。

关于在军政府期间处理德国问题，没有达成任何三国协定或四国协定。但是我国政府已将3月23日的备忘录提供正在伦敦开会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协商。我国政府已准备了一份赔偿计划，预备提交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会议。

奥地利： 四大盟国已经宣布准备把奥地利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它恢复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欧洲諮詢委员会本周正在积极讨论四国军队在奥地利的占领区的划分计划，并讨论在一个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恢复起来之前，成立一个盟国间的奥地利军政府的问题。

意大利： 虽然意大利自 1943 年 10 月以来就是一个共同作战的国家，但它仍然处于停战协定所规定的体制之下，受到盟国委员会相当严格的管制。主要由于我们的努力，意大利情况已有所改进，但是由于英国想保持意大利处于附属状态的政策，它的改进还未达到我们所理想的程度。我们一直未能结束意大利的不正常的双重地位：既是一个积极的共同作战的国家，又是一个战败国。我们国内有些集团正在施加强大压力，要使意大利成为联盟国的一员，实质上这是符合我国政策的步骤，但不符合某些盟国政府的政策。

除去该国的经济困难之外，我们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阻止南斯拉夫占领意大利东北部的重要部分，用片面行动来阻挠这一领土争端获得最后的公平解决；并在意大利国内引起严重的骚乱。在这一地区维持盟国（英国和美国）军政府，可能要遭遇一些困难。对被解放地区的供应： 对于从敌人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供应，是美国的一个具有极重要意义的问题。在这些被解放的国家里，由于饥饿、失业和通货膨胀而可能造成的混乱与崩溃状态，主要只能靠对人民日用必需品的有效供应才能避免。政治上的稳定，以及对于足以抵御极端主义者集团压力的民主政府的维持，有赖于恢复最低限度的经济稳定。要尽我们的本份，我们就必须仔细地分析所有提出要求的国家的需要和储备情况，不管它们是军用的或是民用的，是国内的还是外国的，并且要坚持它们只限于绝对必需品。这就包括既要重新审查美国的军事需要和供应的手续，又要重新审查美国的平民消费。英国内閣大臣正在华盛顿，同

美国和加拿大討論粮食及其它供应的迫切問題，他們有权达成協議。我們赶紧把自己組織起来以对付这个問題，是必要的。国务院已准备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1945年4月13日

这一天，朋友和熟人不断來訪，我尽可能接見了他們。当然，这一天并不是安排好的。公务繁多，但沒有安排日程，而且有許多打岔的事。

国务卿斯退丁紐斯离去才一会儿，我就同軍事領袖作首次会見。那时是十一点钟，參謀总长乔治·馬歇尔將軍、海軍作战部长欧內斯特·金海軍上将、巴尼·杰尔斯空軍中将、总统參謀长威廉·李海海軍上将随着陸軍部长史汀生和海軍部长福莱斯特尔一道进来了。所有这些人都是我所認識并且一向尊敬的，我有这些有卓越才能的主将来作顧問，是令人欣慰的。

他們对我作的报告，簡明而中肯。他們对我說，至少在六个月内，德国还不会被彻底打敗。日本在一年半内也不会被战敗。他們的扼要叙述包括了我們的广泛的作战行动，但对于我們各地的詳細考察則很少。看起来，我国的軍隊以及我們盟国的軍隊到处都打得不錯。

他們沒有用多少時間就对我讲了最近的軍事进展情况和前景，等他們讲完后，我就告訴他們，我认为亟需就我国的武装力量可以从我这里期待些什么，对这些部队說一些話。不过，我又补充說，我想，在我这样做之前，我必須先对国会講話。作为新的行政首长，我需要政府的立法权力的支持，因为我希望向我国人民、我国武装部队以及我們的盟国保证，我們將毫不退縮地繼續我們的努力。

軍事領袖們都表示同意，当他們告辞时，我請李海海軍上将留

下来。

在罗斯福总统下面，李海在白宫占有特殊地位。他是一个經驗丰富的人，一向以談吐坦率和独具見解著称。他的率直态度和梗直言辞，典型地代表了海軍的精神，罗斯福曾任命他为总司令的參謀长，他就以这个获得高度信任的职位执行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国政府中沒有这一职位，但在李海的任内，很快就证明这一职位是极其有用处的。

当別人出去以后，我告訴他，我希望他繼續在我手下担任同样的职务。

“您确信您需要我嗎，总统先生？”他問。“我向来是心里有什么就說什么的。”

“我需要真理，”我对他說，“在任何时候我都需要事实。我希望你留任，并且能經常把你心里所想的告訴我。你也許不会老是同意我的决定，但是我知道，你会忠实地执行它的。”

我感到，有李海海軍上将在白宫里，所有有关战事的情报和消息都会很快地傳送給我，不管它們是好是坏。此外，我深信，他会使我所获知的事实都沒有經過任何方面的隱匿或审查。

李海海軍上将眼里閃耀出热情的光芒，他看着我。

“我向您保证，”他对我說。“您尽可放心。”

李海走后，我拿起电话筒，又找勒斯·比弗尔。在我任參議員期間，我一直和比弗尔密切合作。他对于立法方面的事总是消息異常灵通的，他并且是一位熟习国会重要人物的动向和意見的議會法学专家。我前一次和他通电话时，曾請他今天中午在他办公处里安排一个午餐会，以便和国会領袖見面。我迫切想会見两党决定政策的首脑，以便告訴他們，我恳切地希望和需要政府的立法机关和行政各部門之間的充分合作。

.....

可以預料得到，这天各报都是用通栏标题。全国的报纸大都丢开了它们一贯的党派之见。对于我将采取的方针，诸多推测，甚至有一些疑虑，特别是在罗斯福总统的纲领方面。有些报纸刊载了含糊其辞的报道，说前线部队担忧总统的逝世对和平的实现可能产生影响，还有些外国电讯暗示说，全世界各国人民及其领袖都在提出这同一问题。

有些议员对于我是否继续罗斯福的外交政策表示怀疑。有几位参议员想知道，我对于建议中的国际组织，是否打算予以积极支持，但同时，又有一些老孤立主义者甚至设想我会比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做得更过火些。后一种看法，我猜想，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曾带头和参议员鲍尔、伯顿、哈奇、希尔一道，力图使一项鼓励政府努力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提案获得通过。

不过，当时我真正关心的，一方面是战争形势，另一方面是即将来临的和平问题。我们的胜利已迫在眉睫了，但是继胜利而来的形势究竟如何，则还不清楚。对于这一复杂领域中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我已经开始更充分地获悉，因为我一直在阅读呈送给我的许多文件和外交报告。我可以看到更多的困难横在我们面前。我们同苏联政府已经在建立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波兰政府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而在其他地区也有麻烦的事。许多这类事情似乎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我知道，以后的几个月，对于我们在获得一个使和平有合理保障的有秩序的世界很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当詹姆斯·贝尔纳斯听到罗斯福逝世的广播消息时，正在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达堡他的家里。那天晚上，福莱斯特尔部长打电话告诉他，已派出一架飞机去接他。他立刻来了，我得知他已到达华盛顿，就邀请他上白宫来。他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二时半。

我认识贝尔纳斯已多年，我想从他那里得到关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以及更早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情况的第一



手材料。因为两次会议他都参加了，我听说他对所参加的一切秘密会议都亲自做了速记记录。当他进来后，我像老朋友似地接待他，我们就他所能回忆起的各种事情谈了将近半小时，没有提到他的记录。随后我要求他把他的速记记录替我译出来，特别是因为他曾经指出，雅尔塔会议没有记录或正式的抄本。直到十天以后，我才接到他一本皮面装订的打字记录，题名是：《克里米亚会议，开会记录，詹姆斯·贝尔纳斯整理》。

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我曾告诉贝尔纳斯说，我正在考虑在旧金山会议后请他出任国务卿。在考虑由贝尔纳斯担任这一最重要的内阁职务时，有许多因素影响我。在这些因素中，首先是总统职位的继承问题。根据法律，就目前情况来说，继承我的下一个人是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但是小斯退丁纽斯从来没有当过任何由选举产生的职位的候选人，而我感到任何步上总统职位的人，至少应该担任过某些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职位。我心里早有一个想法，要就总统和副总统都在任内逝世时的继任人顺序问题，向国会提出修正案。

我觉得，众议院议长是他本选区人民选出的代表，同时又是全国人民选出的代表以多数推选出来的代表，在我国政府的形式下，是继副总统之后接任总统职位的适当人选。当然，这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因而需要时间。在法律未改变前，我觉得我有责任毫不迟延地选拔一位在必要时具有适当资格继承总统职位的国务卿。这时我认为贝尔纳斯是最适当的人选。他曾数度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任职，并曾担任过一些重要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履历如此出人头地，罗斯福总统曾任命他为美国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后来罗斯福又请他担任一项特殊的任务，要他搬进白宫，充当负责战时动员的总统助理。贝尔纳斯同意了，但这样做，就不得不退出了最高法院，牺牲了一个声望极高的终身职位。

我以为，貝尔納斯具有这样令人景仰的履历，如果被任命为国务卿，可以作出更重大贡献。但还不止此。其中还有一层值得考虑，虽然那主要是私人間的事。

貝尔納斯根据自己为党为国服务的优秀资历，在1944年的选举中，以为自己应是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共同竞选人的当然人选。实际上，在那次民主党代表大会前，他曾要我提名他和支持他。

但结果是，罗斯福和代表大会却另有主张。无疑地，貝尔納斯大为失望和痛心。我想，我这时找他，也许能帮助弥补这一缺陷。

当天下午三点半，貝尔納斯走后不久，国务卿斯退丁紐斯第二次来訪。他是由查尔斯·波倫陪同前来的，波倫曾在罗斯福同斯大林的历次会晤中担任翻译，是国务院的俄国问题专家。我们三个人把精力都倾注于扰人的波兰问题以及由于这一问题在我们同苏联领袖之间所引起的波折。

当副总统时，我只熟悉波兰问题的基本因素。不过，现在整幅图画对我显得更清楚了，因为我已经阅读了秘密文件，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之间的信件。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同英国希望波兰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全民的政府。不幸的事情是，虽然我们同俄国是盟国，但俄国竟不允许我们派遣观察员进入波兰。当时俄国对波兰是全盘军事占领，并完全支持一个俄国自己制造的傀儡政权——所谓卢布林政府。

英国和美国都把自己的观点表示得很清楚，可是，不管我们为努力调停此事而提出什么建议，俄国总是拒绝让步。它甚至不顾它在雅尔塔所签订的协定，坚持自己的立场。结果，事情已经很显然，由于反共的波兰人在波兰国内外的活动，我们在波兰实际上所面临的已不仅是一种政治形势，而是一种严重的具有内战危险的形势。现在我才得知，这一点甚至当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

尔塔会谈时就已經很清楚了。事实上,在那次会议上,为波兰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問題比任何其他問題花去更多的時間。

貝尔納斯、斯退丁紐斯和波倫現在向我提出的报告,以及我对秘密信件和电报的研究,显示出进行雅尔塔談判的人所面临的三个选择。第一,有一个在战争初期就在倫敦建立的波兰流亡政府。这个政府是由真正的波兰爱国者組成的,但是它同英国的关系已趋于冷淡。另一方面,它同波兰国内異常活跃的地下抵抗运动保持密切联系,这一运动是坚决反对俄国撑腰的卢布林政府的,它也反对遍布波兰的紅軍。

虽然这个流亡政府早就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承认,但很显然,不能把組成这个政府的那些人作为一个集团硬要俄国人接受,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沒有打算这么做。

第二个选择,是斯大林所扶植的那个。斯大林过去和現在一直坚持說,卢布林集团(或者像現在称作的华沙政府)是一个全面行使职权的事实上的政府,应当繼續存在下去。他宣称尽管我們的情报与此相反,华沙政府的淵源和政策都是純粹波兰的,并說它受到絕大多数居民的拥护。斯大林偏爱这一集团的真正理由,当然,是因为它是順从苏联政府的。

經過很多討論,在雅尔塔会议上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无论是波兰流亡政府或是华沙临时政府,是无法使三国都接受的。因此,討論轉到了第三个选择。这就是把当时在波兰行使职权的华沙临时政府加以扩大,吸收某些仍在波兰的民主領袖和当时还居住在国外的另一些人。这个新政府将保证尽早举行基于普选权和秘密投票的自由而不受束縛的选举。此外,在上述的这一选举中,应有代表波兰一切民主的和反納粹的政党的候选人。

这就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最后都同意的妥协性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如果妥善地付諸实施,可能很好地解决這個問題。

可是，現在我們却碰到俄國人拒絕執行這一協定。

這就是我感到我現在必須立即有所行動的事。事實上，當我答謝丘吉爾的唁電時，我已對他說，我即將把我對波蘭問題的观点和建議電告；隨後在4月13日下午，第二個電報就發出了。

丘吉爾曾經建議，由美國和英國政府就我們同俄國人之間的棘手問題發表一個聯合聲明，他並曾讓我知道，他不得不在下院就這一問題發言。我以為，同俄國的軍事和政治合作仍舊極其重要，就這一困難而仍未解決的波蘭問題發表公開聲明的時機尚未成熟。但是，採取某些積極步驟確實是必要的，因此我這時就向丘吉爾建議，由英美聯合致電斯大林，向他提出具體建議，並毫不含糊地說出來。我甚至把致斯大林的電稿也通知他，征求他的意見和建議，供他贊同這一計劃時作參考。

丘吉爾認為——現在我也這樣看——形勢是，俄國人（如果他們能夠加以阻撓的話）根本不希望看到建立起一個根據雅爾塔所商定的方針組織起來的全國統一的新臨時政府。俄國人抱這種態度的原由是他們充分了解，像那樣的一個政府，就意味着盧布林集團在波蘭的共產主義統治的終結。

如果俄國人真正擔心我們企圖強使他們接受一個新的不友好的波蘭政府的話，那麼，在我看來，我在致丘吉爾電報中所提出的建議可以消除這些疑慮，或者至少可以提供一個進一步討論的明確基礎。

我的電報開始說：“斯大林給您和羅斯福總統的答復，使我們下一步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雖然除少數幾點之外，他使人很難感到樂觀，但我仍深深感到我們應對他再進行一下試探。”

隨後我對丘吉爾所提出的幾個論點表示同意。但我力爭，任何宣布談判破裂的公開聲明將會使波蘭人民大失所望，並可能對我們同蘇聯的政治、軍事合作產生不利影響。最後我附上預備向

斯大林发出的电文草稿。这封电文指出，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曾力求采取积极而公平的态度。电文还力求纠正俄国人假装前几次信件使他們产生的某些錯誤印象。最后，电文概述了四点意見。

第一点，提出了到莫斯科商談的波兰人名单，其中从倫敦的波兰人中挑选三名，从华沙挑选四名，还给华沙的波兰人留了一名空額，由俄国人提名。第二点建議是，从华沙来的一批，“如果願意的話”，可获准最先到达莫斯科。第三点，被邀請商談的波兰領袖还可以建議提名其他的人，使得波兰所有重要的集团都有代表參加討論。第四点，我們將表明，英国和美国决不願事先接受决定新的民族統一政府的任何方案。

波兰問題还不是同俄国关系中发生的唯一难题。在着手召开即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會議方面，严重的阻碍之一就是斯大林不願派遣他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出席，而要派遣一名較低級的使节这一問題上。事实上，国务卿斯退丁紐斯这时已带来哈里曼大使的一封电报，說他恰好在这一天的一次会見中同斯大林討論了这个问题。电报說，斯大林对罗斯福总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表示願意像同罗斯福共事那样，同我共事。哈里曼抓着这开头的几句话，就建議說，向美国以及全世界保证苏联願意繼續合作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派莫洛托夫赴美，首先訪向我，然后出席旧金山會議。哈里曼补充說，他是表达他个人意見，但是他确信我会同意的。

斯大林回答道，哈里曼如果能获得美国总统的贊同，授权他重新提出他剛剛表达过的願望，那就可以安排让莫洛托夫去訪問华盛顿和旧金山两地。

斯退丁紐斯和我都感到这是一点进展，我就指示他起草一个复电。随后，当写給丘吉尔的有关波兰的电文也批好后，我就轉而

研究国务卿送呈的一份长长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請示給予出席  
即将在旧金山举行會議的美国代表团以指示。

.....

## 第二章

### 开始同丘吉尔和斯大林通信

.....

在罗斯福执政的整个时期，霍浦金斯同他十分亲近。他曾經完成許多机密任务，并且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执行了几次秘密的使命。他是罗斯福绝对相信和异常倚重的人。他是一个献身于事业的人，从来不追求功劳和名望，却甘愿承担责难，不管这些责难是不是公正。他是华盛顿官場中一个少见的人物，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也是绝对信任他的，如果不是他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我倒希望他能同我一起工作，继续发挥他在我前任手中所起的同样作用。

在我进参议院以前，也就是当我还在杰克逊县作审判长和霍浦金斯担任公共事业振兴署署长的时候，我曾經同他在密苏里州的公共事业振兴署中共过事。在我初次出任参議員的期間，我要求他探听白宫对于我所代表的州的事务作出的决定。1944年，在我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之后不久，他又一次证明对我大有帮助。那时我想从他那里了解总统处理公务的内情，以及他对于某些人的估价。这样，1944年7月末，刚好在我同总统在白宫草坪上共进午餐之前，我們两人作了一次私人长谈。他非常詳細地把罗斯福总统对国内问题的态度和他对立法和行政方面领导人物的看法告诉我。他还对我讲述总统对某些国际问题的见解，以及他对外国领导人物和首脑的评价。此后，他供给我的情况好多次都证明是正确的。

他說，罗斯福对丘吉尔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丘吉尔对罗斯福也是这样。他給我讲过他們相处的情形。他說：“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国际事务上彼此相互都有强烈的影响。”

我現在需要从霍浦金斯那里知道的，是我要打交道的那个国家的領袖們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有关斯大林的材料。同时，我还要同霍浦金斯一道来检查一下关于俄国、波兰和联合国的整个局势。

哈里·霍浦金斯看起来总是臉色蒼白，形同枯木，而这次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显得比以前更加衰弱。他是真的病了，罗斯福的死深深地刺激了他。我如果不是早已了解他那种高貴的爱国心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像这样让他劳神，我就不免要大費躊躇了。

“哈里，你觉得怎么样？”在我們握手的时候，我問道。

“很不好”，他回答道，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在这个时候請你来”，我接着說。“因为我需要知道你能告訴我的关于我們同俄国的关系的每一件事情——你所知道的关于斯大林和丘吉尔，以及开罗會議、卡薩布兰卡會議、德黑兰會議和雅尔塔會議的一切情况。”

他回答說，“我高兴来到这里，并且願意尽力协助的一个理由，是由于我深信你将繼續奉行弗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而且，我明白你是知道怎样实行这些政策的。”

我們談了两个多钟头，甚至沒有抽出時間去吃午飯。我只是向白宮的厨房要了两份两个人吃的飯。由于我們想着別的事，只是在我的写字台上稍微吃了一點。

霍浦金斯是一个資料庫，一个字或一件事都絕少遺漏。而且，他常常能够把他見过的許多重要人物的特征描述出来。自然，他对于苏联的領導人是很熟悉的。

“斯大林是一个坦率、粗魯、固执的俄国人”，他对我說。“他是



一个彻头彻尾的俄国利益维护者，他最先想到的永远是俄国。但是，可以跟他坦白地谈话。”

他向我保证，他愿尽力做他所能作的一切事情。但是，在告辞的时候，他突然问我：“您知道我已打定主意从5月12日起离开政府退休吗？”

我跟他說，他的退休的打算我一点都不知道，而且，假如健康允许的话，我希望他继续任职。他没有给我任何肯定的答复就走了，但是他答应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

下午两点十五分，李海上将由贝尔纳斯法官陪同，带着丘吉尔的两份电报来了。我们的部队和俄国的部队正迅速地从东西两方互相接近，先头部队在东德或捷克斯洛伐克会师现在似乎是指日可待了。考虑到这一点，丘吉尔的第一个电报建议我们发表一个三强首脑声明来预告这个历史事件。

他的电报说，“苏联军队和英美军队在德国的会师很快就要到来。”他认为假如我、斯大林元帅和他本人能够作一次简短的广播宣布这件事，我们全体的人们都将受到鼓舞。他要求我答复他是否同意他的建议。他说，他正在向斯大林元帅发出同样的电报。

我回答说，“我完全赞同您在电报中提出的建议，如果斯大林同意，我将很高兴收到您的文告草稿，并予以考虑。”

首相的第二个电报谈到对德国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最后总攻的问题。他认为，这次打击的目的是要摧毁经过我们全力轰炸后残存的德国战争工业。

这样作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有情报说，德国人准备死守最后一道防线，而我们的参谋部认为，这可能使战争再延长六个月。

罗斯福曾经在3月29日把参谋部草拟的一个计划的细节通知丘吉尔。这个计划要用无人驾驶的旧轰炸机轰炸德国的巨大工

业目标。这些轰炸机，带着大量炸药，用远程控制的方法指挥，依靠定时炸弹爆炸。丘吉尔对这个计划深感不安，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复电拖延了两个星期。使他烦恼的，当然是害怕德国人可能因此对伦敦进行报复。

在他给我的电报中（实际上，这是对罗斯福去电的答复），丘吉尔强调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英国人民已经遭受到德国轰炸的重大损失，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他们将会遭到更大的损失。但是，他要我们来作出决定，并且用他特有的措词结束了这份电报。

首相的电报说，他收到罗斯福总统3月29日的电报。他感到遗憾的是，对这份电报的答复拖延了。因为，他认为他有责任让英国参谋部知道这件事。丘吉尔说，假如美国军事当局认为有必要实行这个计划来结束对德战争，英国也不反对。

不过，他首先说，战争的形势已经变得对我们十分有利，大规模轰炸德国城市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了。他又说，假如德国人还有一批在战时使用过度的轰炸机，伦敦就显然而且一定是唯一的目標。但是，即使伦敦只挨几次大爆炸，人民的士气也一定会低落的，因为现在他们抱着一种希望，认为他们所经受的长期折磨已成过去了。

关于这一点，丘吉尔又说，从已经进行的调查可以看出，大伦敦区的每一百三十一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在敌人的攻击中死亡的，其中包括在军队中服役的伦敦市民和三万名在空袭中死亡的平民。丘吉尔说，一百三十一比一这个数字，表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方面任何一个同类地区所遭受的最大损失。

他在结束时说：“我已把事实摆在您的面前，我完全留待您的军事顾问作出决定。而且，即使灾难因此而落到我们头上，我们也不抱怨。”

我同参谋部重新检查了丘吉尔提到的那个计划。在检查结束

以后，我回复一个电报。

我在电报中说，“在详细考虑了一切因素以后，我以为这个关于使用满载炸药的战时使用过度的飞机的计划，目前在欧洲可不予实行。我已将此項决定通知我的参谋部。”

过了一会，在贝尔纳斯回到我的办公室，同我一起审阅我准备星期一对国会演说的草稿时，收到了丘吉尔的另一个电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已经从伦敦启程来旧金山开会。我已同意接见他。想起这件事，我立刻阅读丘吉尔这一份最近发来专谈波兰问题的电报。

丘吉尔的电报说，他刚读过我建议由我们两人发给斯大林的一个联名信的草稿。丘吉尔说，他原则上完全同意联名提出的条件，“但是，有一个要点艾登将向你当面陈述，因而你和他可以共同讨论信的内容，信中任何一点我相信都可以得到调整”。他说，他准备在星期一内阁会议上研究这封信，如果他那时能得到信的定稿的话。同时，他希望就在那天我们联名发出这份信，因为，我非常赞同我的看法；我们有关这个问题的答复是非常紧急的。

丘吉尔继续说：“对于莫斯科和华沙所发生的事，艾登无疑会同您讨论我们的看法的。我以为，卢布林政府具有强烈的波兰民族情感，因此，它纵然对俄国人没有敌意，也迫切地要求独立，对这个波兰临时政府感到不满的看法正在增加，这个政府主要是苏联的傀儡。因此，他们正在与苏联步调一致的方针下，努力组成一个基础比目前政府更加广泛的政府，办法就是增加他们能够控制但又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波兰人（维托斯多半会包括在内）。这是一个走上正道的步骤，不过，这样作将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或雅尔塔协定。”

太平洋的战争局势像欧洲战争一样的紧张，这需要我立刻加

以注意。日本人最近占領了印度支那，丘吉尔和罗斯福曾經就整个东南亚問題交換过函电。东南亚盟軍司令蒙巴頓海軍上将正准备实行軍事反攻。同时，正規部队进军前所要求的“占領前的”活动計劃已經拟定出来。所謂“占領前的”活动实际上就是秘密作战，包括在日本人表面上占領（如果不是实际上占領）的土地上进行游击战。

我們在蒙巴頓上将指揮下的一些部队，在緬甸进行这种战斗已經有一些时候了。法国人的抵抗运动早已在印度支那展开。由于中国战区的部队不久也将在同一地区展开战斗，情况愈趋复杂了。

丘吉尔曾經在4月11日把这些情况告知罗斯福。他說，蒙巴頓曾經同中国战区司令蔣介石委員長当时的軍事顧問魏德迈將軍进行过商談。他还报告說，他們两人对今后的行动已經达成圓滿的協議，这样，由于战区指揮权所引起的困难就解决了。不过，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議訓令蒙巴頓上将和魏德迈將軍在一切行动、計劃和情报方面彼此保持密切联系。但是，蒙巴頓有权进行任何为他的正規部队前进所需要的占領前的活动。

当我注意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魏德迈將軍关于他同蒙巴頓上将之間協議的报告稍有不同。魏德迈以为，蒙巴頓在印度支那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一定会通知他，同时，在委員長批准之前将不采取任何行动。他还以为，假如东南亚盟軍总部的行动不能同中国战区的計劃互相配合，蒙巴頓就不会实行。按照我們參謀部的意見，魏德迈將軍所提出的这个部署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是处理跨越毗邻战区战役的适当方法。在这种事情上，战区司令官們总是很敏感的，委員長也不例外。

在我看来，魏德迈所报告的这个方案是解决东南亚盟軍总部的部队在委員長战区作战問題的令人滿意的办法，于是我就在4

月 14 日將我的看法通知了丘吉爾。

.....

我的工作日程排得這樣緊迫，以至我在從海德公園參加羅斯福葬禮回來的路途中，不得不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準備我第二天就要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的演說。我和同在火車上的立法部門的領袖們商討了演說中的幾個要點。同時，我又和羅斯福政府的閣員們討論了另外幾點。

總統的咨文差不多每一篇都是一件複雜的事情。為了保持政策的完全協調，許多人和許多政府部門參加了起草工作。專家和研究人員被指定來作核對和編輯材料的工作，因為沒有一個總統能夠或者應該完全依靠他自己的記憶。必須對總統演說的每一部分進行審慎的考慮，因為它也許會對全國或全世界發生影響。

總統的演說是把政府的政策的內容告知公眾的一種主要方式。因為這個緣故，總統的咨文要反復寫好幾遍。

所有總統的咨文都必須由總統本人動手。他必須決定他打算說些什麼以及怎樣說。往往擬就許多草稿，這一事實使得人們說，總統的演說是“別人代筆的”。不論怎樣，演說的最后定稿總是總統本人的最后定論，它表明總統自己的信念和他的政策。他不能把這些話委托別人來說，如果他重視總統的權力的話。

.....

1945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我起得很早。我將向國會發表我作總統的第一篇演說。我希望一切都順利。我看了一遍講稿，並且用鉛筆作了一些改動。然後，我閱讀報紙和那些有關波蘭局勢最近發展的文件，因為我要在當日上午十點鐘接見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和英國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勳爵。要做的事情很多，甚至在我坐下來吃早飯之前，我已辦了一大堆事。我在八點鐘到達白宮的辦公室，國務卿是我的頭一個來訪者，接着來的是李海海

軍上將。他們兩人帶給我許多緊急公文。其中一件是來自丘吉爾，他引用了斯大林給他的電報。

斯大林的電報說，“我同意您的意見，由您、總統和我自己向軍隊發表一個關於我們的部隊即將會師的簡短聲明是一件很好的事，如果杜魯門總統不反對的話。當然，關於聲明發表的日期，我們應該達成協議。”

國務卿隨後遞交給我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概述了哈里曼就斯大林以前在波蘭問題上給羅斯福和丘吉爾的答复提出的報告。

“哈里曼認為斯大林關於波蘭問題給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的答复，對於打開目前的僵局在實質上是有少許的貢獻的”。這個摘要有一部分說，“很可能，斯大林就米柯拉契克<sup>①</sup>所作的唯一讓步也許會促成其他的讓步而使圓滿解決問題獲得共同的基础。哈里曼對斯大林關於波蘭委員會工作的一些見解進行了駁斥。

“他建議說，我們應該堅持對克里米亞決議的解釋，根據克里米亞決議目前在波蘭行使職權的臨時政府應該在廣泛的民主的基礎上進行改組，臨時政府的成員應該在新政府中占重要地位。哈里曼指出，斯大林實質上是要我們同意建立稍加裝飾的華沙政權；並建議說，我們應繼續堅持，不接受粉飾的華沙政權。關於觀察員的問題，哈里曼相信，蘇聯不願意接受觀察員的真正理由是害怕觀察員們會發現華沙政府實際上所得到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

其他的報告和電報不斷送來，直到十點鐘為止，這時國務卿斯退丁紐斯陪着艾登先生和哈里法克斯勳爵來到我的辦公室。

艾登轉達了丘吉爾對我的祝賀並帶來丘吉爾給我的信，以及首相對我們將給斯大林的那封關於波蘭問題的聯名信的意見。英

---

<sup>①</sup> 波蘭的一名領袖，大不列顛和美國曾建議他參加期望舉行的莫斯科會議。

国外交大臣和我一道研究了我們各自的草稿，得出了一份最后定稿。

我們討論了莫洛托夫出席旧金山會議的重要性。我告訴英国外交大臣斯大林已經通过哈里曼表示莫洛托夫将出席會議。最后，我們同意在他离开这里去开会以前再見一次面。

在艾登和哈里法克斯告辞以后，我給莫斯科哈里曼大使发出下列电报：

“現在訓令你同英国大使（他将接到同样的訓令）立刻安排同斯大林会見，把下列首相同我的联名信的原件交給他。如果你在启程以前不能見到斯大林，你和英国大使必須經過适当途徑把信轉交給斯大林元帅。

“（如果哈里曼大使和克拉克·克尔大使已經启程，代办和他的英国同僚必須联名写信給斯大林元帅轉交总统和首相的信件。）

“总统和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我們这封联名信是答复您4月7日关于波兰問題談判的来信的，目的是使这件事更加明确，并且也是为了使我們对这个問題的态度不致被誤解。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十分誠摯地力求把問題处理得公正和具有建設性，并且今后仍将这样处理。但是，在向您叙述具体的建設性建議之前（这种叙述正是发这封信的目的），我們认为有必要糾正您的心目中显然已經形成了的对英美政府的立場的那种完全錯誤的印象，这个立場我們的大使已經按照直接的指示在談判中說明过了。

“您說目前在华沙行使职权的政府在这次談判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忽視，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不論我們的意图或者态度，都从来不是这样的。您應該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我們在莫斯科的大使无条件地同意华沙波兰政府的三个領袖應該包括在被邀赴莫斯

科同波兰委员会商谈的波兰人的名单中。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在组成新的民族统一临时政府的第三批人中间，目前华沙政府的代表无庸置辩地将起重要的作用。所谓大使要求邀请数目无限制的波兰人的权利这种说法，也是不公正的。委员会建议和同意从国外和从波兰邀请个别的波兰代表来莫斯科商谈的权利，是不能够作如此解释的。的确，罗斯福总统在4月1日的信中特别声明：“为了便于达成协议，委员会可以首先挑选一批为数不多的，但是有代表性的波兰领袖，由他们来提出其他人选供委员会考虑。”实际上，我们争执的问题是在于：华沙政府是否有权对参加商谈的个别人选行使否决权。按照我们的意见，在克里米亚决议中是找不到这种解释的。我们觉得，您是回到苏联代表团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所持的原有立场上去了，这个立场后来在协议中已经改变了。让我们清楚地记住：我们现在所说的只是应该被邀请去莫斯科商谈的那些波兰人。

“您提出最好邀请八位波兰人（其中五位来自波兰，三位来自伦敦）来参加这些初步的商谈，您在给首相的信里还指出，米柯拉契克只要声明支持克里米亚决议，他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我们向您提出下列建议，以便防止我们解决波兰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和避免一切不可估计的后果。我们希望您将十分密切而慎重地来考虑这些建议。

“（一）责成我们在委员会里的代表立即发出邀请书，请下列的波兰活动家来莫斯科商谈：貝魯特、奧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罗略·齐美尔斯基、薩彼哈主教；与目前华沙政府无联系的一位在波兰有代表性的政党的领袖（如果您认为下面几个人中的任何一人是可以接受的话，我们也将认为他是可以接受的：維托斯、茹拉夫斯基、哈春斯基、雅秀科維奇），从伦敦方面邀请米柯拉契克、葛拉勃斯基和斯坦奇克。



“(二)在委员会一发出参加协商的邀请书以后，华沙政府的代表就可以首先前来，如果这样做是合适的話。

“(三)事先同意，这些被召来商谈的波兰活动家可以向委员会推荐一定数量的其他波兰活动家，在波兰和国外的都可以，这些人可以作为会议的成員，以便使波兰所有的主要党派都有代表参加討論。

“(四)我們并不认为，在同波兰活动家商谈之前我們就可以同意确定新的民族統一政府的成員的任何方案，我們絕對不会认为南斯拉夫的先例是可以适用于波兰的。

“我們請您再仔細讀一下4月1日美国和英国的去信，因为在那两封信里提出了一些較大的理由，現在我們还是坚持这些理由，而且我們也应当坚持。”

.....

### 第三章

## 对国会的第一篇咨文和 第一次記者招待会

.....

在搬进布莱尔大厦的那天晚上，我研究了国务卿递交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介绍了世界粮食的紧张情况。当时不只是某些主要粮食严重缺乏，就是棉花、羊毛、煤也很缺乏。在上一年冬天遭灾的某些解放了的地区，情况特别严重。我看到的这份报告说：“战争的结束会加深已经紧张的粮食情况。由于被解放国家的内部混乱，在旧金山达成的任何计划，即使不致失败，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考虑到这种情况，国务卿建议我通知军事当局，检查并缩减他们的粮食和物资需求的计划，以便增加对这些地区的供应。

国务卿的报告继续说，“在美国国内需求方面由于没有进一步得到您的指示，某些民政机构似乎不愿再实行罗斯福早已提出的‘勒紧裤带’的办法，……我还建议您训令适当的民政机构，特别是战时粮食管理局在尽可能缩减美国国内消费方面做些努力。”

根据我在国会的经验，对于这些困难是很清楚的，我觉得国务卿的警告是正确的。因此，我把这个问题当作我必须解决的一个最迫切的难题。

4月17日星期二早上，我第一次接见了出席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他们是由国务卿引见的。代表团由国务卿任团长，团员有参议员康纳利和范登堡，众议员布卢姆和伊顿，州长史塔生（他

是刚从太平洋回到华盛顿的一个海军司令官)和佛吉尼亚·吉耳德斯利夫博士。科德尔·赫尔因病没有来,他也是代表团的团员。这个代表团是罗斯福总统任命的,是一个卓越的有代表性的代表团。

代表团的成员们知道,人民和政府希望他们在旧金山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对他们说,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我强调说,我要求他们写出参议院能够通过的文件,不要引起像伍德罗·威尔逊所遭到的反对。

在会见以后,我签署了修正通过的租借法案,把这个最有用的法案延长一年。租借法案是我们战争武器库中的一部分。我对于这个问题是熟悉的,因为通过我在杜鲁门委员会中的工作,我非常清楚战时动员对平时经济的影响。我也知道,在租借法案基金的使用上使参议院头疼的是什麼。这和孤立主义集团的任何想法完全无关。他们打算在我们获得作战的直接利益之后,便准备立刻与世界隔绝。一个月以前,我以副总统的身份在参议院投了起决定作用的一票,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

我们国内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当然,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对着一当条件具备就转入平时生产的重大问题。对于我们那些在战争中损失严重的盟国来说,这种需要就更加紧迫了。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以满足复兴工作中的需要。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租借法案继续生效的原因。我知道,如果我们为了重建目的而动用租借法案的任何款项,我们一定会招致国会的批评。然而,我们的盟国所面临的紧迫的恢复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不能不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欧洲的重建与我们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否则就要损害我们本国的利益。我认为,通过进出口银行,或者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国际银行来做这件事是适当的。

欧洲战争结束的临近,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战时生产计划迅速

作出决定。沒有理由认为这样作会妨碍太平洋供应的增加。我們目前的工业能力已經有了巨大的发展，以致国家已經碰到战时生产設備过剩的問題。因此，一旦欧洲战争結束，甚至在我們开始縮减我国总生产的时候，对太平洋的供应也是能够增加的。

总统和新聞界的关系是极端重要的。他通过新聞界和人民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当1945年4月17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我举行第一次記者与广播招待会的时候，感到特別有兴趣。

記者們提出来的問題对于总统判断人民想些什么常常是有帮助的。优秀的記者永远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所需要知道的事情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記者和总編輯或发行人，我总是明确地加以区分的。我和新聞記者始終相处得很好。他們力图公正地报道事实。但是，他們的許多老板——总編輯和发行人——却有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替这些利益服务，新聞常常被歪曲，不幸的是这种做法是和公众的整体利益相違背的。

尽管我認識到白宫記者招待会的重要性，我还是不得不宣布把記者招待会减少到每周一次。这样做我才能把我的大部分時間放在我必須处理的繁重公務上。我需要時間来应付国内国外千变万化的局面。我还决定維持我的前任的慣例，不准記者直接引用我的答复和評論，只准間接引用。記者招待会的用意在于探索总统对悬而未决的事情的想法。但是，显而易见，他对每一个問題的談話是不能直接引用的。因为，这往往把总统的答复从个人意見变成最后的决定。这样作并没有什么好处。为了避免在悬而未决的問題上妄作决定，总统往往不願回答問題，甚至不願提出一点可以捉摸出他的思想脉絡的暗示。

我的第一次記者招待会是在我作总统还不到五天的时候举行的。这是新聞記者和駐白宫記者第一次有机会向我提問題。

“我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宣布記者招待会的規則”，我对他們

說。

“總統記者招待会上所发布的新聞仍將按你們已經知道的类别加以区分，罗斯福總統記者招待会的慣例照旧保持。

“新聞的类别是：首先，机密的宣告，这种宣告是不准记录的，出席招待会的記者必須保守报告的秘密，不得向外界泄漏。

“可能在招待会上分发的有指导作用的背景材料（即不指明来源的材料），不能公布或泄漏它的来源。換句話說，不能說这些話是總統說的。

“總統在会上发布的新聞材料，可以指名是總統說的，但是不能直接引用。

“總統的发言不能直接引用，除非得到他的特許。”

.....

在最近几天內，俄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菲律宾總統奧斯敏納和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要到白宮来进行特別会談。

我剛收到哈里曼大使的电报，他报告說，莫洛托夫已經在当天从莫斯科动身，經苏联航綫橫越太平洋前来美国。这样，他将比沿大西洋航綫飞行迟两天到达华盛顿。哈里曼本人采取較短的路綫，第二天就可以带来他最近同斯大林談話的报告以及同莫洛托夫的代理人維辛斯基談話的报告。

哈里曼的电报报告說，維辛斯基曾經告訴他，苏波互助条約的簽訂已成為“广大群众的需要”，現在，这个条約正在准备中。哈里曼在他的答复中严正地警告維辛斯基說，在波兰新政府成立以前，外界也許会把这个条約的簽訂看作是俄国不願意实行雅尔塔协定的表示。維辛斯基以典型的俄国方式为这个条約的必要性辯护，坚持說克里米亚协定并不排斥这样的談判。

这件事使我感到不安。这是俄国人企图在波兰为所欲为的一

种策略。我决定同莫洛托夫当面談判这件事。同时，我指示国务院向莫斯科提出抗議。

国务院随后通知我已指示我国駐莫斯科大使館通知維辛斯基：美国政府对苏联政府准备同当时在波兰行使职权的当局締結互助条約一事深感不安。大使館还接到指示，要求維辛斯基在莫洛托夫訪問美国同我討論这个問題以前不要采取行动。随后，国务院又报告說，英国政府已經把同样的指示发給英国駐莫斯科大使館。

俄国在波兰独断独行，在保加利亚也是独断独行。国务卿报告我說，美国为了保证保加利亚人民能够根据雅尔塔协定进行民主选举而提出的三国监督选举的建議已遭俄国拒絕。苏联政府宣称，举行这些选举无需“外国干涉”。俄国人辯解說，芬兰最近的选举就沒有这样的“干涉”，所以，保加利亚不應該比芬兰受到更多的不信任。

在我的第一次記者招待会举行之后几个钟头，我头一次踏进絕密的白宮地图室。白宮的官員中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够接近这个防范严密的房間，而且几乎沒有人談起它。我最先知道这个地图室的存在是在我当副总统以后。当罗斯福总统启程前往雅尔塔时，曾把下面这个备忘录送給我。

“最密件

“致副总统备忘录

“如果你有什么紧急信件要通知我的话，我建議你通过白宮地图室发出。但是，只有絕对紧急的消息才能經過地图室发送。我要求你的电文尽可能簡短，以免妨碍通訊工作。如果你的电报过长，地图室的官員就不得不考虑用无綫电发送或是由邮包发送。

“罗斯福

“1945年1月28日”

地图室是罗斯福总统设计的，位于白宫的底层，正对门厅电梯的对面。罗斯福每天都要从他的卧室乘电梯到这个保卫严密的地图室。

地图室里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和比例尺很大的欧洲地图和亚洲地图。地图上标明了世界上一切主要军事力量分布的位置。详细的地图上标出了每一条战线。在这间房子的中心，一眼就能看到整个的军事形势。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没有这样的机构。这次大战是头一次全球性的战争，战线遍布每一个大洋和每一个大陆。

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战地司令官的情报送到的时候立刻就标在地图室的地图上。情报日夜不断地收到，所以我们的军事地图永远是正确而及时的。我常常在这个房间里会见我国高级军事领袖，并且同他们讨论各个战线的详细情况。

汇集到这里来的情报是这样的准确和全面，使得地图室成了指挥这个全球性战争所需要的一切军事情报的神经中枢。它在协调盟军的作战决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帮助我很快地摸清了世界形势，了解基本的军事战略。

经由地图室中的特别通讯系统和特别装置，丘吉尔和我能够十分安全地通话。这些谈话都记录下来，作为未来参考的外交档案的一部分。

.....

## 第四章

### 中国和德国的問題

我觉得在我做总统的头五天中就好像过了五辈子一样。我开始体会到我国的缔造者预先为一个突然变成总统的人所作的准备是多么不够。当一个人事先毫无准备就被迫由副总统一跃而为总统，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目前的制度下，副总统不能仅仅因为他在职位上仅次于总统就能具有作总统的准备。在他当选副总统时，在思想上，应该有作总统的准备。选举人不应该把副总统候选人看作总统的从属，而应该把他当作总统的候补人来挑选他。因此，他应该完全知道总统处理过的一切事情。

我曾花了很多时间阅读过去政府的历史资料，因此，当我做副总统时，我对于这个职务的不相称和不适当早有自知之明了。

约翰·泰勒是在总统死后继任总统职位的第一位副总统。泰勒的兄弟是我的曾祖母的父亲，而整个泰勒家族又混合了我父亲的家族的血统。虽然泰勒把得克萨斯州并入了联邦，但我从来不推崇他。副总统继任为总统的先例就是他创下的。他变成实际上的总统，而不仅仅是代理总统。

现在我可以体会到泰勒在突然跃登全国最高职位时的感觉了。一个人要使他自已胜任一个高于一切的责任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对我来说，差不多直到五个月以后，于9月6日我把第一个政策咨文送交国会时，我才认识到我承担总统的全部责任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我在这个咨文中提出了战后恢复和调整的二十一条



綱領。

由于我国总统职位的性质，副总统在继任总统时是无法有充分准备的。总统是决定每一项国内重要政策的人，也是制定对外政策和签署条约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的第二位人物——副总统——要完全得到总统的信赖是很困难的。总统有必要组织他自己的幕僚，而副总统只能留在门外，不管他们两人是多么友好。这种情形有许多理由可说，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总统和副总统双方都是，或者说应该是机灵的政治家，谁也不能完全信赖对方。

作为参议院议长，副总统经常和那些国内最精明的政治家往来，对众议院议长的关系也是一样。必须成为政治家，才能当选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总统不可能在参议院的休息室中讨论他的机密事情。白宫向众议员和参议员走漏的事情常常是报纸头条新闻的材料，这就迫使总统在和国会议员谈话时必须永远保持警惕。这也是总统为什么非常难于完全信任副总统的一个原因。

这种走漏消息的情况，每一个总统都认识到不一定是副总统有意識的行動的結果。但是，一个无意的走漏也会像有意識的泄漏一样造成損失。不难理解这是会打乱总统正在进行的整个计划的。这种事情也许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在对总统和副总统的关系进行任何分析的时候都应该估计进去。

这种关系，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像古代罗马执政官之間的那种关系。古罗马有两个权力相等的执政官，他們的意見常常是不一致的。汉尼拔<sup>①</sup>征討罗马的胜利大部分是由于执政官之間互相敌对的结果。在我们的制度下，总统和副总统之間是沒有敌对关系的。

---

<sup>①</sup> 汉尼拔(公元前247—183年)是古代非洲迦太基的名将，屡敗罗马軍。——譯者

但是，很少数的几个副总统完全同意与他们共事的总统的政策。情况是这样：总统和副总统都是被提名选举出来的，因而形成了一种表面的关系，不论他们之间的真实情况如何。1917—1918年，伍德罗·威尔逊曾和副总统马歇尔闹翻过。在哈定的政府中，柯立芝是副总统。我相信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温暖的感情的。当柯立芝当选为总统的时候，他的副总统是查尔斯·道斯，他们两人是不亲密的。在胡佛当选为总统以后，他和副总统柯蒂斯并不是十分情投意合的。

弗兰克林·罗斯福改变了办法，让副总统和他一起参加内阁。约翰·南斯·加纳尔出席了所有的内阁会议。但是加纳尔的政治观和罗斯福处理经济恐慌的纲领是不一致的。罗斯福在做了两任总统以后，决定另外找一个副总统候选人作他的竞选伙伴。他选择了亨利·华莱士。华莱士从就任的时候起就和总统一起参加内阁会议，但是总统对于这样作的结果并不满意，他的许多朋友也劝他下一任不要再挑选华莱士。

副总统出席内阁会议当然是一种非正式的安排。实际上，他出席内阁会议仅只是出于总统的邀请。在我作副总统的八十二天中，很少举行内阁会议，因为总统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或在温泉。内阁开会的时候，我都参加，但是我很快就知道这种会议是很少讨论真正重要事情的。因为弗兰克林·罗斯福通常在会前会后和内阁的个别阁员进行会谈，因而细节的讨论通常都在这时进行。

我的办法不同。我让内阁的每一个成员都把重要问题在全体内阁会议上摊出来，同时让每一个出席会议的人有机会讨论已考虑中的事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在罗斯福任内，内阁会议只是例行公事。在我出席过的很少几次会议中，没有用圆桌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对于那些悬而未决的事件也没有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我很少发言，仅仅在总统就立法问题需要我帮助而问我的时候我

才发言。內閣成員在开会以前謁見過總統或在会后与他交談，已經成了習慣。在這種場合下，通常總有三、四個人等着談話。當然，總統由于身體上的缺陷只能守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他們告辭。我覺得他們似乎在利用總統的身體不便。

我認為羅斯福在聽到閣員們互相詰辯時，是十分高興的。我留心過他的這種表現。當伊克斯駁斥霍浦金斯，或霍浦金斯抨擊伊克斯的時候，他總是微笑着。當摩根索誇大國務卿處理事情的惡劣後果時，他有時似乎感到高興。羅斯福常常玩這種把戲，但是他永遠沒有忘掉贏得戰爭勝利的目的。他擬出了切实可行的和平計劃。

羅斯福在作總統時，得到了許多樂趣。他本人不善于周旋應付，這就鼓勵他去看別人斗智。

作為副總統的我，也去白宮參加總統召集的所謂“四巨頭”會議。這種會議通常在星期一舉行，但次數很少。所謂“四巨頭”是我們對於由副總統、眾議院議長、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所組成的集體的稱呼。在和總統舉行的這些會議上，我們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國內國外的各種問題都提出來討論。總統會告訴我們他對哪一種立法感到興趣。我覺得這種會議有價值；在我就職總統期間，我繼續了這種會議，並在形式上略加擴大。

羅斯福喜歡單獨到地圖室去听取“簡短的匯報”。而我總是讓參謀部人員對內閣閣員和“四巨頭”概述隨時都在變化的軍事形勢。這樣，我就讓每一個閣員隨時都知道當前的情況。每次和四巨頭會晤的時候，他們都簡略地告訴我急待解決的問題，並提出適當的解決辦法，以便提交國會處理。

當我在參議院擔任國防計劃調查委員會主席的時候，我已經習慣於一周至少訪晤總統一次和他談委員會里的事，在他認為必要時，會晤次數則多一些。這些會晤多數是沒有記錄的，我和馬歇

尔將軍、陸軍部長史汀生和其他領袖会晤时，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方式下，我逐渐深入了解这些卓越人物。至于我和罗斯福的关系，我把自己当作是他的朋友。

我同总统的关系亲密、热誠而有趣，我出任副总统以后，这种关系并没有改变。我是在1934年以号召拥护总统及其政策的竞选政綱而当选为参議員的。我始終沒有違背自己的諾言。我相信这是罗斯福决定在芝加哥黑石飯店向民主党領袖提出1944年的声明的原因之一，結果我作了副总统。

亨利·华莱士在1940年和我在1944年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都是罗斯福的主意。加納尔的被提名，是出于罗斯福的主張，也是真的。我很明白，巴克萊在1948年被提名是由于他是我所贊成的两个人中的一个。

总统和副总统之間的关系是复杂的。同时，由于副总统处于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机构之間，而归根結底又不对任何一方負責这个事实，这就使这种关系更加复杂化。副总统不可能完全熟习总统的政策，而参議員从他們的角度出发，只是把副总统看作一个主持會議的官員，处于参議院俱乐部的范围之外。

参議院很少就立法問題向副总统进行认真的諮詢，除非他碰巧具有技术上的或专门知識。他差不多肯定会发现，議會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領袖对他总是客气而又友好的。但是在参議院的眼中，他只是个备而不用的脚色。如果参議院喜欢他，他就可以推行总统的政策。因为参議員們会听他的話，在表决票数双方相等而相持不下时，他就有发言权了，<sup>①</sup>但是这种情形并不多見，一届任期中或許只有一次，很少会超过一次。

另一方面，副总统作为一个党员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他被看

---

<sup>①</sup> 按美国宪法規定，副总统是参議院議長，但不得参加議案的討論，只有在表决票数相等时，才能投票决定議案。——譯者

作黨組織中的第二位人物，這就可以——或者不——使他在參議院中發生影響。這要看人而定。如果參議員歡迎他，他就可以發生重大作用。加納爾和巴克萊就是這樣，他們兩個都是出色的副總統。如果他不受歡迎，或者不熟悉政治或參議院處理事務的方式，他就會遭到冷落。例如華萊士就是副總統中由於這些原因在參議院很少發生作用的人。巴克萊作副總統是獨具一格的。他獲得總統和參議院雙方的充分信任。在參議院的歷史中，他做參議院多數派領袖的時期，比任何其他參議員為長。他和我過從甚密，而他又完全同意1948年民主黨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政策和綱領。

.....

由於看到歐洲勝利日的日益臨近，我們<sup>①</sup>討論了1946年預算上的一些變動，同時我指令預算局準備好變動了的預算表冊，以便及早送交國會預算委員會審查。我又向史密斯建議，與陸軍部長，海軍部長以及馬歇爾將軍討論一下這些經過修改的預算。在史密斯告退的時候，我在上午的時間都排滿了，但在十一點十五分，我接見了國務卿斯退丁紐斯、陸軍部長史汀生和海軍部長福萊斯泰爾。

首先，我指示他們讲讲對各戰區的政治和軍事問題發生影響的一切問題；然後，他們交給我一份關於敘述解放地區托管問題的備忘錄。他們在備忘錄中建議我就這個問題給參加舊金山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團長發個訓令。訓令的條文已經同代表團成員討論過，並且得到他們的贊同。現在留下來的是發布關於這個問題的必要指示。由於訓令的內容符合於美國鼓勵各有關地區人民的社会、經濟和政治權益發展的政策，於是批准了那個訓令。訓令全文如下：

“關於擬議中的托管政策的聲明”

---

① 指杜魯門同預算局局長史密斯。——譯者

“旧金山會議不准备决定把任何特定地区置于托管制度之下。旧金山會議将要討論的只是这种制度可能成立的机构。

“美国政府认为設立一种只适用于下列范围的領土的托管制度是完全切实可行的，这些地区按托管的安排，置于这种托管制度之下：（一）現在委任統治下的領土；（二）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果从敌国割离的領土；（三）对所在地負有行政管理責任的国家自願置于托管制度之下的領土。在上列范疇中哪些特定領土应置于管制制度之下，以及应規定怎样的托管条款，則将在以后协商解决。

“这个制度应協議規定：（一）保持美国的軍事和战略权利；（二）为确保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普遍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控制；（三）促进从屬領地居民的社会、經濟和政治权益的发展。”

在結束这件事和部长們走了以后，我又签署了《墨西哥水源条約》。按照这个条約，为双方的共同利益，美国和墨西哥共同进行一項建設性的和商业性的計劃，以分配和发展我們共有河流的水源。

这个法案是在我担任參議院議長时进行辯論的。实际上，这是我以副總統身份在參議院中所参与的最后一件事。我很高兴签署这个法案，这是我們繼續执行睦邻政策的证明。

斯蒂夫·厄尔利、比尔·哈塞特、乔納桑·丹尼尔斯和罗森曼法官提出願意繼續留任，帮助我处理公务，这使我感到高兴。我很需要他們处理連篇累牘的文书业务的經驗。我也曾請查理斯·罗斯到我这里来，他是我从前的同班同学、現任《圣路易信使报》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这时他正好被引进来。我請他担任新聞秘书。就他的个性和經驗來說，这个位置都是很适当的。我知道他对这个工作感到兴趣，但是他要求給他一点考虑時間，他要和信使报的发行人商談一下。

中国在同美国、英国和俄国关系上所遭到的困难日益增加。那天下午我收到一份国务院的备忘录。

“呈总统备忘录

“题目：赫尔利大使的来电

“我现在呈上赫尔利大使的两份电报，一份发自德黑兰，一份发自莫斯科。他报告了他同丘吉尔和艾登，以及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谈话。他遵照罗斯福总统给他的训令同英国和苏联政府首脑讨论我国的对华政策。

“丘吉尔和艾登同意支持美国为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抗日部队和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国政府所作的努力。但是，丘吉尔把美国对中国的长远政策污辱为‘伟大的美国幻想’，他不赞成美国为了稳定它自己在中国的军事地位而从缅甸和印度撤出物资。在提到香港时，他宣称英帝国不准备放弃任何东西，而且认为英国不受大西洋宪章条款的约束。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说，他们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更亲近更和谐，他们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嘉许蒋介石，并且说，他们会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

“小斯退丁纽斯

“1945年4月18日”

随备忘录附来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两份电报。赫尔利现在所提出报告的使命是罗斯福总统私人委托他的。鉴于总统的逝世，我指令赫尔利在回重庆任所以前继续执行他的使命。

随着战局以空前的速度进展，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几个主要盟国占领地区的问题。关于这件事，丘吉尔首相在一份电报中提出

了几个問題。这份电报現在正摆在我的桌面上。

“貴国军队和我国军队很快就要同苏联军队会师，”丘吉尔的电报說。“联合參謀部應該尽快指示盟軍总司令怎样行动。”

丘吉尔說，在他看来，有两种地区：

(一) 战术地区：在这种地区，除非已达成为了攻击敌人的繼續抵抗必須进行战术上撤离的協議以外，我們的部队應該坚守他們已經达到的战綫。这應該由最高司令官通过駐莫斯科的軍事代表团，或者，如果方便的話，越过战綫进行安排。联合參謀部已經着手准备发出包括这种形势的訓令。

(二) 占領区：关于这种地区，丘吉尔說，他和罗斯福总统已就联合參謀部的意見获致協議。在他看来，这种地区應該从欧洲胜利日开始在一定时期以內加以占領。“不管胜利日是哪一天宣布，我們都應該庄严地从盟軍以他們的大胆和勇敢所占領的广大地区中撤出。

“我已充分准备坚持占領区。但是，我不希望我們盟軍部队或貴国军队会由于某个地方的俄国將領的粗鹵要求而从某一点上被迫退回。”丘吉尔說，这一問題必須由两国政府达成一項協議而加以防止，以便給艾森豪威尔以适当的机会“用他自己的漂亮方式”来就地加以解决。

丘吉尔說，占領区的輪廓，“1944年9月的魁北克會議曾相当草率地勾画了出来，因为当时沒有預料到艾森豪威尔將軍的部队会这样猛烈地插入德国”。他又說，占領区是不能改变的，除非同俄国人获致協議。但是，他建議我們應該力图在欧洲胜利日到来的时候在柏林建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并且要坚持在东德和西德之間公平分配德国的粮食生产。实际的情况是，俄国占領区的人口比例最小，而粮食生产的比例則最大。因此，丘吉尔补充說，“美国供給被征服地区居民粮食的比例并不太令人滿意。而我們



不幸的英国人却接管了全部被毁的鲁尔区和大的工业区，这些地区就像我们英国的一样，在平时也要大量输入粮食。我提议，这个麻烦问题应该在我們从现在所到达的战术地区移动以前，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上加以解决。俄国人企图从德国产粮区运走大量粮食去供给自己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主张供应德国居民的问题必须统一处理，而且，现有的粮食必须在各个占领部队之间公平分配。

“如果你能让我知道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将十分感谢。从我所得到的各种情报看来，这些问题影响最大，而且是最迫切的。”

在我没有作进一步研究，和得到参谋部的意见以前我不愿作出答复。

.....

## 第五章

### 莫洛托夫訪問華盛頓

.....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sup>①</sup>，我與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聚談半小時，檢查了歐洲戰綫迅速進展的情況。我與他討論了一件擬在英、美、俄三國軍隊在德會師後發表的文告草稿；在研究好以後，我就把它拍給英國首相，恰好他的與此問題有關的電報也來到了。

我致丘吉爾的電報原文如下：“下面所引的文件是我準備在英、美、蘇三國軍隊在德國會師後發表的文告的初稿，發表的日期和時間由我們三國共同商定。

“我很願意收到您所作的任何評語與建議。

“引文：在艾森豪威爾將軍指揮下的英美軍隊在預定的地點——納粹德國的中心和蘇聯軍隊會師了。敵人被切為兩段。這雖不是在歐洲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刻，但是那個時刻——全體美國人民、全體英國人民和全體蘇聯人民長期以來為之辛勞和祈求的時刻臨近了。我們的軍隊在德國中心的會師，有着全世界都不會忽略的世界性意義。這些意義是，第一，希特勒及其匪幫政府的最后一絲黯淡的希望被撲滅了。在這次反對暴政、反對非人道的戰爭中結成同盟的各大國的共同戰綫和共同事業，現在已經用事實來表現，正如它們早已用決心來表現的一樣。沒有任何東西能分

---

<sup>①</sup> 日期是1945年4月19日。——譯者

裂或削弱我們老練的軍隊的共同意志；貫徹他們勝利的目的，直到盟國在德國獲得最後勝利。第二，我們的軍隊此時的會師向我們自己和向全世界表明，我們各國為和平與自由的事業而進行的合作是有效的合作，它能夠克服軍事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役中最大的困難而取得勝利。不顧像我們已經克服了的諸如距離、語言和交通等方面的障礙而能共同策劃、並肩作戰的各國，是能在共同締造世界和平的事業中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的。最後，盟國軍事上和戰略上的這一偉大勝利，乃是对弗兰克林·罗斯福的果敢和决心的一种无法形容的祭礼，而这是依靠同盟国家陆海軍战士們的頑強和勇敢才能完成的。但是，在把歐洲和太平洋的敵人最後戰勝以前，在後方支援我們英勇的陸海軍战士們的努力決不能放鬆，因為我們大家知道，前綫的戰鬥是決不停頓的。引文完。”

.....

現在已經是中午了，正是接待菲律賓總統塞季奧·奧斯敏納的時候。歡迎奧斯敏納總統是一件愉快的事，參加的還有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和史汀生、福萊斯泰爾、伊克斯等幾位部長，我確信他們也同樣感到愉快。太平洋的戰事進展得很順利，雖然菲律賓由於日本的侵入，遭到了可怕的損害，但我們的武裝部隊現在已回到了菲律賓群島，其中大多數島嶼都已收復。然而，奧斯敏納所關懷的是戰後的階段。他提出了菲律賓人民重建慘遭戰爭破壞的國家的緊迫需要；他希望知道，他們究竟可以指望美國給予什麼樣的援助。我告訴他，美國一定不使他們失望。我們已經允許給予菲律賓自由和獨立。我向奧斯敏納總統保證，我會要求國會給予慷慨的援助，幫助菲律賓重新建設。

奧斯敏納總統辭別以後，國務卿、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仍和我在一起。我隨即接見了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他通知我，在舊金山會議以後他將去莫斯科，與俄國締結貿易互助條約。

我表示我的希望說：願中国和俄国能达成一項两国都感到滿意的协定。我告訴中国的外交部长，美国希望看到中国能从这次大战中站起来，日趨繁荣富强，变成一个亚洲的領導国家。因此，我敦促他尽快去莫斯科，为建立世界和平，把中俄关系树立在一个更巩固的基础上。

宋子文說，他另外还有一些事要談。他說，中国希望得到我們更多的帮助。我們已經給予蔣介石很大的帮助了，而宋子文現在請求增运黄金。我知道，通貨膨脹是中国其他問題以外的又一項困难。我告訴宋子文，我将尽我的力量去做。

还有一位客人。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在法国大使亨利·包內的陪同下，被引了进来。皮杜尔是前往参加旧金山會議的，中途来华盛顿作短期拜会以表示敬意，轉达戴高乐將軍的問候，并表示法国人民对罗斯福总统逝世消息的哀悼。

我告訴皮杜尔，我感謝他所傳达的厚意，并表示美国人民和我自己对法兰西共和国的高度尊敬。他們作了这次外交礼节的拜会以后，就离去了。已經是进午餐的时候。

.....

4月20日上午，財政部长摩根索向我报告关于战費开支以及財政部經办的其他許多工作的目前情况。他告訴我，本財政年度的开支預計是九百九十亿美元，其中八百八十亿美元列为战争开支。但另一方面，我們的預算收入只有四百六十亿美元，或者說还不到总支出的一半。

这位部长也报告了財政部要在全國範圍內展开一个反漏稅、反黑市活动运动的計劃。他向我詳細叙述了財政部在这方面計劃得如何周密。

我知道美国財源非常窘迫，这不仅是因为直接的战費，也由于其他国家向我們提出的要求。財政部长又就其中最重要的若干項

作了报告。

摩根索說，中国由于严重的通貨膨脹，要求“大大增加黄金的輸运”。

英国要求在欧洲胜利日后立即派遣一个財政使团到美国来，討論对于联合王国財政援助的整个問題。这位部长告訴我，英国对于自己的战后国际地位几乎比对其他任何問題都更为忧虑。

法国正在派遣財政部长来商討他們建設問題中的財政問題。

墨西哥的財政部长要求我們保证，繼續履行他們据以进行工作的穩定协定。

古巴希望知道，我們是否願意将出售黄金的协定再延长四年。

印度政府會要求我們根据租借法案，額外供給二亿一千万盎斯白銀，可是我們的財政部长指出，他們是否需要这么多的白銀来制止通貨膨脹，其中是有問題的。

財政部长在結束他的报告时，談到敌产在美国和在中立国家的一般情况，以及租借法案的未来。

.....

快到中午的时候，美国犹太复国运动非常事务委员会主席斯提文·瓦伊斯博士来到我的办公室，同我商談关于遭受納粹迫害的犹太人問題和如何重新安置那些逃亡者的严重問題。后一个問題自然牵涉到要对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犹太民族家园的建議进行商討。

在我的手边有罗斯福总统关于巴勒斯坦問題的記錄和声明。两天前国务卿會送来一份特別报告，就巴勒斯坦問題表明了国务院的态度和意見。

报告写道：“某些犹太复国运动領袖很可能将极力促使您尽早发出关于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綱領的諾言。該綱領强烈要求犹太人无限制地移居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您知道，美

国政府和人民非常同情在欧洲受到迫害的犹太人，并且竭尽一切努力来解除他們的痛苦。但是，巴勒斯坦問題是一个異常复杂的问题，它所牵涉的許多問題远远超出了欧洲犹太人处境困难问题的范围。”

报告最后說：“近东局势继续处于紧张状态，这主要是由巴勒斯坦問題所造成的結果。由于我們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对美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們认为，整个問題必須非常慎重地并且从我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来加以处理。”

由于我同意罗斯福政府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所表明的政策，我对拉比<sup>①</sup>瓦伊斯說，我将竭尽一切可能来执行这一政策。我曾經仔細地閱讀过貝尔福宣言<sup>②</sup>，在这个宣言里英国表示贊成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民族家园。我了解了一下这个犹太民族家园問題的历史以及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立場。当我翻閱了直到最近为止的全部有关材料以后，我对国务院的那些“穿条紋褲的小伙子”所持的見解和态度表示怀疑。我认为，他們似乎沒有太关心那些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人們的困难处境。在我看来，在注意到我国的长远利益的同时，帮助那些不幸受到迫害的逃亡者找到自己的家园是可能的。我相信，在拉比瓦伊斯离开以前，我已經清楚地向他說明了这一点。

.....

我觉得有必要打一个电报給丘吉尔首相，通知他，我实际上不可能广播我們所拟定的“会师文告”。我告訴他，“所以我提議把这件文告当作一項声明在共同商定的時間由我向新聞界和广播无綫电台发表。由于我在这个問題上同斯大林元帅沒有联系过，所以

① 拉比(Rabbi)，为犹太人的尊称，老师或先生之意。——譯者

② 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貝尔福为英国外交大臣，他在1917年11月2日致书欧洲大銀行家犹太人洛希尔，說明英政府对于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国家的政策，这一文件被称为貝尔福宣言。——譯者

請您将这个消息轉告他。”

由于机械上的复杂关系，不可能把莫斯科、倫敦和華盛頓同时連結在一个总广播綫上，因而不得不取消同一時間的广播，我乘此建議，由我們各自发表一个声明来代替广播。

在那天繁忙的早晨，我接到丘吉尔首相答复我六天前去电的一封信。我在那封电报里建議东南亚盟軍最高司令蒙巴頓海軍上将与中国战区統帅蒋介石委員長进行紧密合作。

丘吉尔的电文說，“对于您好意提出来的安排办法，我們願意进行全面而公平的尝试。如果发生困难，我深信您是願意我向您提出的。与这封电文相符的命令已向蒙巴頓海軍上将发出。”

与此同时，我接到首相的另一封电报，他同意我所草拟的預备在英、俄、美三国軍队在德国会师时发表的三国文告的原文。

他在电报中說，“謝謝您所拟的会师文告的草稿。我想不到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軍队听到这件文告是有好处的。”

中午，我召集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會議，討論我們与苏联的关系。哈里曼大使刚从莫斯科任所回来，也随同国务卿斯退丁紐斯、副国务卿約瑟夫·格魯和国务院的俄国問題专家查尔斯·波倫，参加了在我办公室里举行的會議。

哈里曼完成了劝使莫洛托夫参加旧金山會議的重大任务，为此，我向他表示了謝意。我說在旧金山會議閉幕以后，希望他回莫斯科，繼續他的卓越的工作。接着我請他告訴我們，在对苏联的关系上什么是最迫切的問題。

哈里曼回答說，苏联有两个政策，他們认为他們能够同时胜利地执行这两个政策。一个是与美国和英国合作的政策，另一个是以独立的行动对邻国扩展苏联的控制的政策。他說，圍繞斯大林左右的某些分子誤解了我們的寬大和我們的合作願望，以为这是軟弱的表示，因此苏联政府能够干它所願意干的事，而不致冒引起

美国挑战的風險。

哈里曼认为，苏联政府并不希望和美国鬧翻，因为他們在重建計劃上需要我們的帮助。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在重要問題上，我們可以坚持，而不致碰到严重的危險。哈里曼概述了一些他在莫斯科任上所遭遇到的具体困难，指出自雅尔塔會議以来，苏联的态度已經恶化。

这时我打断了哈里曼的話說道，我不怕俄国人，我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当然，我会公平合理，不管怎么說，俄国人需要我們总比我們需要他們的地方多。

哈里曼答道，莫斯科有些方面相信，增加我們对俄国的輸出，对美国的商业來說，是一个生与死的問題。他明确地指出，他知道这是不真实的，然而許多俄国官員却相信这一点。我宣称，俄国人的这种想法是可笑的，并且我重复道，我們准备对俄国人采取坚定态度，在美国的原則和傳統上决不作任何让步以获得他們的好感。我說，俄国和我們之間的健全关系只有建立在有來有往的基础上。

哈里曼大使繼續說，据他的判断，我們面临“欧洲遭到野蛮的侵襲”的局面。他深信，苏联对任何一个外国的控制不仅仅意味着他們的势力在那个国家的外交关系上是至上的，而且也意味着必然要在那个国家里实行秘密警察和消灭言論自由的苏維埃制度。他认为，在这些不愉快的事实面前，我們必須决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他又說，他并不悲观，因为他感到有可能同俄国人建立一个行得通的打交道的基礎。他相信，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重新考虑我們的政策，放棄任何幻想，不要以为苏联政府可能很快就按照世界其他各国在国际事务上所遵守的原則來办事。哈里曼說，很显然，在任何国际談判中妥协和双方让步总是有的。

我同意他的話，并說我明白这一点，我并不指望我們所計劃的



东西能百分之百地成功。但是，我觉得，我們应该能得到百分之八十五的成功。

随后哈里曼概述了在波兰問題上所引起的爭执。他相信，斯大林已經发觉，誠实地执行克里米亚決議就意味着苏联所支持的卢布林政权在波兰的結束。他看到了这一点，因而感到，万一丘吉尔和我联名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所提的建議遭到斯大林拒絕，同时如果莫洛托夫在华盛顿协商中的态度頑固不化，我們应当考虑一下我們究竟应该怎么办，这对我們是很重要的。

接着哈里曼問我，据我看，波兰問題对旧金山會議以及对我們参加拟議中的联合国組織的关系，究竟有多么重要。

我着重回答說，經我一再斟酌，我认为，除非波兰問題遵照克里米亚決議获得解决，否則美国参加世界組織的条約是不会被參議院通过的。我說，我打算就这样痛痛快快地告訴莫洛托夫。

国务卿斯退丁紐斯問道，如果莫洛托夫来华盛顿的时间太晚，以致英、俄、美三国外交部长沒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全面討論，我是否希望旧金山會議繼續談判波兰問題。我說，我希望這一問題不致影响旧金山會議的工作，但是我同意繼續談判。

接着哈里曼問道，要是俄国退出不干了，我們是否准备繼續进行世界組織的計劃。

我回答道，問題的实质是，沒有俄国，就不成其为一个世界組織了。

在談話結束以前，我說，我正努力了解我們外交事务上的一切錯綜复杂的关系；我当然要依靠国务院和大使們提供消息和給予帮助。

在結束談話时我說，“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中，我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并請哈里曼和斯退丁紐斯在我会晤莫洛托夫以前再来見我。

哈里曼在辭別以前把我請到一邊，接着說，“老實說，我匆匆忙忙趕回華盛頓的理由之一，就是我怕您不了解斯大林正在破壞協定，我知道羅斯福是了解這一點的。您不可能有時間閱讀最近發來的全部電報；我的憂慮正是從這個事實引起的。但是，我必須說，我發現您把所有的電報都看過了，而且我們對形勢的看法完全一致，這使我放心多了。”

我說：“我很高興，你將幫助我們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團的工作。繼續給我拍長電報吧。”

.....

第二天早上，4月21日，我直接去地圖室，按每天的慣例听取戰爭形勢的匯報。德軍在各個戰綫上的抵抗都在崩潰。來自瑞士的謠言說，希特勒已經離開柏林。毫無疑問，歐洲戰事的結束已指日可待了。

上午，我召見了國務卿斯退丁紐斯，交他一件携往舊金山的訓令。我們以前曾經討論過這件事，並決定，如果他持有我發給的書面訓令，是有幫助的，在必要時，他可以公開利用這件訓令。

訓令的开始写道：“亲爱的斯退丁紐斯先生，正如你所了解的，在克里米亞會議上，羅斯福總統代表美國政府，同意在舊金山會議中支持蘇聯的建議：承認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擬議中的國際組織中創始會員國的資格。

“你會向我說明，在同意支持蘇聯政府關於這個問題的建議時，羅斯福總統感到，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各蘇維埃共和國中的重要性，它們對戰爭進程的貢獻，以及它們的人民為聯合國家的事業所遭受的不可言喻的蹂躪與犧牲，它們有權受到特別重視。

“當然，允許這兩個共和國作為創始會員國加入擬議中的國際組織，要由大會本身去決定。為了在大會上忠實地履行羅斯福總

統代表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所承擔的義務，我指示你代表美國投票贊成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為國際組織的創始會員國。”

在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告辭以後，我召見了參議員卡爾·哈奇，又相繼接見了哈里曼大使和戰爭動員局局長弗雷德·文森。下一批約定接見的人是白宮的各部門負責人和助手們。

雖然今天是星期六，而且我已經見過國務卿斯退丁紐斯一次，但他在下午又親自送來一份備忘錄。

備忘錄說，“莫洛托夫將於今晚到達蒙大拿州的大瀑布城，並在該城留宿，明天上午的動身時間還沒有確定，但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天氣許可，他將於星期日傍晚抵達華盛頓。莫洛托夫到達後，我將立即用電話通知康納利先生，以便他可以从您那里得到指示，您願意什麼時候接見莫洛托夫。”

我交給斯退丁紐斯一封電報，叫他發給斯大林：

“關於宣布我們的軍隊在德國會師的安排問題，我務必使艾森豪威爾將軍得到指示，要他將三國政府首腦可以宣布蘇、英、美軍隊在德國會師的日期尽早通知蘇聯、英國和美國政府。

“為了在三國首都同時宣布，艾森豪威爾建議的時間為華盛頓時間中午十二時。我希望您同意這個建議。”

.....

4月22日星期日，我邀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哈里曼大使、助理國務卿詹姆斯·鄧恩和波倫到布萊爾大廈，準備我於當晚接見莫洛托夫的事。國務卿告訴我，在機場迎接莫洛托夫的儀式已經布置就緒。沒有儀仗隊，在宴會後我就接見莫洛托夫，由哈里曼大使引見，波倫任翻譯。

儘管我們建議延期舉行蘇波條約的談判，莫斯科和盧布林政府竟締結了一項條約。因此，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問我，我是否有意

在莫洛托夫拜会时提及此事。我回答说，最好还是不由我来提，但是如果莫洛托夫提到这一点，我将很坦率地告诉他，那是无助于波兰问题的进一步解决的。

在我们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来了。他也提到了苏波条约这个问题，于是我就把我告诉国务卿的话重述了一遍。艾登先生问我是否可能在夏季中的任何一个时期访问伦敦，与丘吉尔首相会晤。我说，我希望能够这样做，但是由于国内问题的紧迫，目前无法给予明确的答复。我向他保证，我愿意很快会晤丘吉尔；他向我说，如果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我不可能访问欧洲，首相要是能够脱身，将准备来华盛顿一行。我说，如果旧金山会议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那也许是首相到这里来的好时机。

斯退丁纽斯和艾登两人都说，英美两国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良好和亲近，而且是建立在彻底坦率的基础上。我宣称，我愿意竭尽一切能力保持这种友好的关系。

那天晚上八点三十分，我在布莱尔大厦接见了莫洛托夫。随我在座的有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哈里曼大使和波伦先生，随同莫洛托夫先生前来的是翻译官巴甫洛夫先生。

我欢迎苏联外交部长来到美国，并问候他长途飞行的情况。我向他郑重宣称，我钦佩斯大林元帅和苏联在战争中的功绩，并希望保持罗斯福总统在两国间所建立的关系。

莫洛托夫说，他带来了斯大林对我的祝贺，并表示能亲自听到我愿意继续友好的政策的话而感到愉快。

这样的谈话使我有机会告诉莫洛托夫，我丝毫不苟地承担了我們故去的伟大总统所订立的一切义务和协定，并将竭力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莫洛托夫答称，苏联的政府和人民也抱有同样的希望，他确信他们能顺利地解决横在道路上的任何困难。我同意我们必须解决

这些困难。

俄国外交部长表示他相信敦巴頓橡树园會議和克里米亚決議已为协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回答說，我坚决拥护这些決議并准备貫徹这些決議。我說，在这一点上我願指出在有关克里米亚的決議上，最困难的問题是波兰事件。波兰問题的适当解决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影响美国的輿論。

莫洛托夫表示，他了解这一点，但爭辯說，这件事对于苏联更为重要。他說，波兰离美国很远，但与苏联接壤。因此，波兰問题对于他們是极其重要的。他又說，他认为克里米亚決議提供了解决的适宜基础。

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我指出，从大的方面來說，波兰問题对我国人民已成了我們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象征。我說，我希望有許多小的事件，他能同艾登和斯退丁紐斯在华盛顿解决。莫洛托夫回答說，他认为只要考虑苏联的意見，在这些事件上达成協議是不困难的。他說，苏联政府认为旧金山會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由于最近数周的軍事发展，政治問题已更加重要。我同意他的說法，并指示这正是我要与他會談的理由之一。

莫洛托夫断言，三国首腦間的談判一向收获良多，并已导致良好的協議。他問，雅尔塔會議就远东局势所达成的協議是否仍然有效。我回答說，仍然有效，在这里我再次申述，我准备履行罗斯福总统所締結的一切协定。我表示希望說，我願在不久的将来与斯大林元帅会晤；莫洛托夫答道，他知道，斯大林元帅极願与我晤面。

然后莫洛托夫与斯退丁紐斯一道辞出，前往国务院与艾登會談。

4月23日星期一上午，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与国会各議員的談話上，其中包括众議院的密苏里州代表团。我也接待了四十位民主党參議員，他們是我往日的同僚，他們重申对我的支持。随后联

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于十一時三十分晉見，以後又有郵政部長弗蘭克·瓦克，繼瓦克之後的是首都華盛頓行政區的各位官員，最後是退伍軍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弗蘭克·海恩斯准將。

下午二時，我與我的主要外交顧問和軍事顧問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商討與莫洛托夫拜會有關的問題。出席的有國務卿斯退丁紐斯、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福萊斯泰爾、李海海軍上將、馬歇爾將軍、金海軍上將、助理國務卿鄧恩、哈里曼大使、迪恩將軍和波倫先生。

我們討論了俄國和波蘭問題。斯退丁紐斯報告說，莫洛托夫在星期日抵達華盛頓時情緒很好，甚至在布萊爾大廈與我會談以後還保持那種良好的情緒，可是過了一夜，氣氛就變了。在國務院與艾登聚談的晚會上，對於波蘭問題就產生了很大的困難。此外，今天早晨繼續舉行的外長會議也沒有任何改進。事實是，在波蘭實施雅爾塔協定問題已完全陷入僵局。

國務卿再度指出，盧布林或華沙政府不是波蘭人民的代表，現在的情況很清楚，俄國人打算強迫美國和英國承認這個傀儡政府。他又說，我們已向莫洛托夫明白表示，美國如何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以及克里米亞決議的無法實現將怎樣嚴重地動搖公眾的信任。

我說，現在事情已經很明顯，我們與蘇聯的協定，迄今為止，只是一種單行道，這種現象不能再繼續下去。我告訴我的顧問們，我們打算繼續進行舊金山會議的計劃，如果俄國人不自願和我們同路，那就太壞了。接着我一一請與會的人陳述自己的意見。

史汀生部長說，他對於在波蘭問題上與俄國人發生的困難是完全生疏的，他感到重要的是找出俄國人的目的究竟何在。他告訴我們，在重大軍事問題上，蘇聯政府是守信用的，美國的軍事當局在這一點上已經慣於信賴他們了。事實上，他說，他們所作的往

往比他們所保證的還好。因此，他覺得重要的是：在有關這些接壤的國家的問題上應該找出他們的動機是什麼，以及在他們認為對蘇聯極其重要的地區內他們的獨立和民主的觀念是什麼。

史汀生先生說，俄國人在小的軍事問題上會造成許多麻煩，有時在這種情況下，還必須教訓他們的態度。然而在這個較重大的問題上，他認為，如果不充分了解俄國人對待這個波蘭問題是多麼認真，我們可能有陷入深淵的巨大危險。他還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波蘭的絕大部分受俄國的控制，這一事實無疑地影響了他們的觀點。

福萊斯泰爾部長表示意見說，因波蘭問題產生的困難不能當作一項孤立的事件來對待，有許多事例證明，蘇聯企圖統治鄰近的國家，而忽視盟國的願望。他認為，俄國人有一段時期以為，即使他們占領東歐全部，我們也不會反對。他說他深深地相信，如果俄國人的態度還是頑固不化，我們最好就和他們攤牌，而且與其將來攤牌，不如現在就攤牌。

哈里曼大使在回答史汀生先生關於爭執點和動機的問題時說，他感到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雅爾塔會議之後回到莫斯科時，他們獲悉了更多關於波蘭局勢的情況，並認識到臨時政府是多麼的不穩固。因此他們認識到，引進任何一位像米柯拉契克這樣的真正的波蘭領袖，也許就意味着蘇聯一手栽培的領袖的垮台。因此，他相信，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要做蘇聯統治波蘭計劃的伙伴。他說，很顯然，我們面臨與俄國人決裂的危險，但是他覺得，只要處理得當，決裂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在這一點上我解釋道，我無意向莫洛托夫發出最後通牒，我的目的只是表明我們政府的態度。

接着史汀生先生說，他願意知道俄國對於在波蘭問題上的強硬態度究竟會採取多麼強烈的反應。他說，他認為俄國人對於自

己的安全也許比我們更現實。

李海海軍上將在回答我的一個問題時說，他離開雅爾塔時有這樣一個印象：俄國人根本不準備讓一個自由政府在波蘭執政，如果蘇聯政府的舉動有任何兩樣，他倒會覺得奇怪的。他認為雅爾塔協定容許作兩種解釋。他又說，他感到與俄國決裂是一個嚴重事件，但是他相信，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我們支持一個自由和獨立的波蘭。

接着斯退丁紐斯宣讀了關於組織新政府和舉行自由選舉的雅爾塔決議的那一部分，並說，他認為這只能作一種解釋。

馬歇爾將軍說，他不熟悉波蘭問題的政治面貌。他說，從軍事觀點來看，歐洲局勢是穩定的，但是我們希望蘇聯在有利於我們的時候參加對日本作戰。俄國人有权拖延參加遠東戰爭的時間，直到我們干完了一切不愉快的工作以後再參加。他同意史汀生的說法，與俄國決裂的危險是很嚴重的問題。

史汀生說，他同意馬歇爾將軍，他認為俄國人在波蘭問題上不會讓步。他說，我們必須了解，在美國以外，除了英國，只有極少數國家懂得自由選舉；掌權的黨派總是操縱選舉的，正如他通過在尼加拉瓜的經驗所熟習的那樣。

金海軍上將問，爭執的問題是不是邀請盧布林政府參加舊金山會議的問題。

我回答說，那是已確定的事，而不是爭執的問題。爭執的問題是我國政府和蘇聯之間所訂立的協定如何執行。我說，我打算告訴莫洛托夫先生，我們希望俄國能像我們準備盡到我們這一方面的責任一樣，來履行雅爾塔決議。

哈里曼大使隨後說，蘇聯遵守了軍事上的重大協議，決議中所規定的它都作到了，這是真的，但是在其它軍事上就不能說他們已經實現了他們的諾言。比如一年多以前，他們曾經同意在遠東戰



爭中开始合作的准备，可是絲毫未見实行。

迪恩將軍說，他认为不管在其他戰場上发生了什么，只要能够做到，苏联一定会尽快地加入太平洋战争。他认为俄国人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能让他们的疲惫的人民更久地拖下去。他說，根据他在莫斯科的經驗，他深信，如果我们怕俄国人，我们会一无所获；他认为，只要我们正确，我们就应该坚持。

我向軍事領袖們表示了謝意，并說，已牢牢記住他們的观点。随后我請斯退丁紐斯、哈里曼、邓恩和波倫留下来，准备下一次我与莫洛托夫会談的題材，这次会晤訂于下午五点三十分举行。

当莫洛托夫来到的时候，国务卿斯退丁紐斯、哈里曼大使、波倫先生和李海海軍上将随同我在办公室里。莫洛托夫由葛罗米柯大使和翻譯巴甫洛夫陪同前来。

不像昨晚那样，今天可没有什么外交客套，我对俄国外交部长和他的同伴問好以后，就直截了当地談到問題。我說，我获悉在解决波兰問題上沒有进展，我感到遺憾。

莫洛托夫先生答道，他也为此感到遺憾。

我告訴他，我和丘吉尔的联名信中的建議是完全公平合理的，这封信已于4月16日发往莫斯科。我們已經竭尽一切可能以求符合4月7日斯大林元帅的信中所表示的苏联政府的建議。我指出，美国政府不同意参与組織一个不代表所有波兰民主人士的波兰政府。我坦率地說，苏联政府未与华沙政权官員以外的波兰政府代表协商，我深为失望。

我告訴莫洛托夫說，美国决定与其他联盟国一起，按照世界組織的計劃前进，不管在其他事項上发生什么困难或分歧意見。我指出，承担战争重任的三个主要盟国不能履行关于波兰問題的克里米亚決議，在战后合作的一致目标上将埋下严重的疑慮。

我向莫洛托夫解釋道，在4月1日罗斯福致斯大林元帅的最

后一封信中，已故总统說得很清楚，美国的任何政策，不管是外交的还是内政的，必须获得公众的信赖和支持，否则就不能成功。我指出，这一点也适用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我说，在我国，对国外的任何经济措施必须通过立法机关的拨款程序，同时，除非公众支持这些经济措施，我就没有使这类措施获得国会通过的希望。我希望苏联政府在考虑接受英美联合建议这一要求时，记住这些因素，并希望苏联政府授权莫洛托夫先生在这一基础上在旧金山继续进行商谈。

接着我交给他一个照会，请他立即转交斯大林元帅。

这个照会写道：“在雅尔塔会议上曾协议（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了这次会议）改组目前在华沙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以便通过华沙临时政府的代表和波兰国内外的其他波兰民主领袖的事先协商，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全国统一政府。

“美国政府认为，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只有在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一批波兰民主领袖被邀请到莫斯科来商谈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波兰领袖们的任何方式的商谈不能导致成立一个真正代表波兰人民的民主成分的新的全国统一临时政府，那么，美国政府是不能参与其事的。美国和英国政府在4月18日递交斯大林元帅的联名信中已尽其所能来迁就形势和实现克里米亚决议的意图。

“美国政府诚挚地请苏联政府接受总统和首相致斯大林元帅的联名信中提出的建议，并要求莫洛托夫先生继续在那个基础上同国务卿及艾登先生在旧金山举行商谈。

“苏联政府应该认识到，目前如不能执行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就会严重地动摇对三国政府团结一致的信心以及它们在将来像过去一样继续合作的决心。”

莫洛托夫問道，他是否可以表示一些意見，他說，他希望表达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願意像以往一样与美国和英国合作。

我回答說，这是我所同意的，否則我們剛才所进行的談話就沒有意义了。

莫洛托夫接着說，他已受权陈述苏联政府的下列观点：

(一) 合作的基础已經建立，虽然产生过不可避免的困难，但三国政府还是能找到共同的語言，并在这一基础上解决彼此間的分歧。

(二) 三国政府曾以平等的关系来往，一国或两国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第三国身上的事例並沒有发生过，这正是苏联政府所能接受的唯一的合作基础。

我告訴他，我們只是要求苏联政府履行有关波兰問題的克里米亚決議。

莫洛托夫先生答称，苏联政府是以克里米亚決議的創議者的身份来拥护这一決議的，并把拥护这一決議当作他們的荣誉。苏联政府认为，所存在的良好基础是以往努力的結果，它为将来提供更光明的前景。他又說，苏联政府深信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严厉地回答說，在波兰問題上已經获致了一項协定，現在只要做一桩事，那就是斯大林元帅按照他的諾言履行协定的決議。

莫洛托夫說，斯大林元帅在4月7日的信中已就协定表达了自己的意見；又說，他个人不明白，三国政府既能在組成南斯拉夫政府的問題上达成協議，为什么同样方式就不能应用在波兰問題上。

我又严厉地回答道，在波兰問題上已經获致協議，現在只是等苏联政府履行罢了。

莫洛托夫先生重复說，他的政府拥护克里米亚決議，但是他不能同意把其他国家对这一決議的背棄看成是苏联政府破坏決議的

行为。他又說，波兰問題当然对于苏联政府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它牵涉到的是一个邻国問題。

由于莫洛托夫竭力避免触及主要的爭持点，于是我就将已說过的話重复一遍：美国政府准备忠实地履行雅尔塔會議所达成的一切协定，只要求苏联政府也同样履行。我再度表示美国願与俄国友好，但是我要他清楚地了解，这种友好只有在互相遵守协定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一种单行道的基础上才能达到。

莫洛托夫說，“有生以来还没有人对我这样談过話。”

我对他說，“履行你們的協議，就沒有人对你这样談話了。”

## 第六章

### 希姆萊的建議

当我軍最后推进到德国境内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問題，需要英国、俄国和美国彼此交換意見。这就是在德国的占領区的問題，关于这个問題，1945年1月欧洲諮詢委员会在倫敦举行的會議上三国之間曾經取得協議。

当我軍进入德境后，不可能使他們剛好在原来划定的界綫上会师，因为我們的許多部队已經越过了界綫。因此，我們必須和英国、俄国取得協議，給軍方以新的指示，这样，我們的軍隊才能按照占領計劃重新部署。

这个問題是丘吉尔在4月18日給我的电报里提出来的。我跟我的軍事顧問商量以后，就給丘吉尔发出一封建議性的电报，这封电报將由我們两人发給斯大林。电报說：“德国的抵抗即将停止，因此，美国、英国和苏联对它們的部队将来在德国和奧地利的占領地区問題有必要决定一种有秩序的步驟。”因此，我建議，第一，我們在德国和奧地利的軍隊“一俟軍事情况許可”即撤到各自的地区。第二，我建議，为了避免混乱，每一个司令官当他认为他已准备好去占領他应占領的地区的任何部分、而該地区仍为其他盟国的軍隊所占領时，即应通知他本国的政府，說明他已准备进行占領該区。第三，我建議，該有关国政府应征得其他两国的同意，以便发出必要的指令，立即撤出該地区，由指定占領国的軍隊去占領。我說：“当然，我們有必要立即就我們占領奧地利的地区达成協議。”

由于波兰問題十分重要，我也把我交給莫洛托夫請他轉遞斯大林的一封信的副本發給丘吉爾。4月24日，我和莫洛托夫會談的第二天，接到丘吉爾首相這樣的答复：

“我仔細考慮了您請莫洛托夫轉交斯大林元帥的信，并把這封信提交戰時內閣；內閣授權我告訴您，他們完全同意您所採取的方針。因此，我將立即給斯大林元帥一封電報，電報內容如下：

“‘我已經讀過總統交莫洛托夫先生轉給您的關於波蘭問題的信，鑒於它的特殊重要性，我已經同戰時內閣商談過。現在我有責任通知您，我們完全同意上述總統的那封信的內容。我懇切地希望找到解決這些嚴重困難的辦法；否則這些困難的繼續存在，會使勝利的時刻蒙上陰影。’”

有權力的眾議院籌措委員會主席眾議院議員羅伯特·道頓到我這兒來談預算和賦稅問題。拜倫·普賴斯先生來談報紙在處理軍事新聞方面的任務。利歐·克勞利來談租借法案及其前途。

國務卿給我一份報告，其中談到喬治·凱南關於赫爾利大使會見斯大林的意見。這些意見曾在他給哈里曼大使的私人信中談過；國務卿的報告扼要地介紹了凱南的信的內容，其中有這樣一段：

“凱南評論了赫爾利大使所說的斯大林的聲明，大意是，斯大林無條件地同意我們的對華政策，說俄國將支持這個政策，並說他將立即支持為使中國軍隊在蔣介石的指揮下統一起來行動。凱南並不懷疑所引述的斯大林的話是正確的，但是他提起注意一個事實，即這些話對俄國人來說有着不同的意義。斯大林準備接受統一中國軍隊和統一中國的原則，因為他知道這些條件只有在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接受的情況下才能實行。斯大林也準備同意建立一個自由和民主的中國的主張，因為對他來說，一個自由的中國，意味着除俄國的影響外其他國家的影響要降到最低限度。凱南深

信，俄国政策的目的仍然是尽最少的责任而取得最大的权益，并将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施用压力。他建議我們以极其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俄国在远东的目标的实质和意义，并且认为，如果我們迫切地期待着俄国在远东支持我們，以致不适当地依靠俄国的帮助，其后果将是很可悲的。”

我十分清楚地理解这封信的含义，以及其他有关报告的含义。俄国所采取的态度一直使我感到烦恼。这一天，我接到陆军部长史汀生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总统先生，我认为很有必要赶快跟您谈一件极其秘密的事。这件事，在您履行总统职务之后不久，我曾經跟您谈过，但是，由于当时考虑到您很忙，我没有过多打扰您。不过，这件事对于我們目前的外交关系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对于我在这方面的整个思想又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您应该馬上知道这件事情。”

我知道他指的是我們正在秘密进行的原子计划，于是我命令我的日程秘书馬特·康納利通知陆军部长在第二天4月25日，星期三来见我。

我刚到白宫不久所接到的最富有启发性和最令人不安的函电之一就是4月24日晚斯大林元帅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我和丘吉尔在和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将会遭到斯大林的固执的和蓄意的抵抗。

下面就是斯大林的来信：

“您和丘吉尔首相先生4月18日的联名信及由維·米·莫洛托夫在4月24日轉来的信件，都已經收到了。

“(一)从来信里可以看出，您继续认为波兰临时政府不是将来的波兰民族統一政府的核心，而只不过是一个和任何其他波兰人

的团体相同的团体而已。这样来了解波兰临时政府的地位并且对它抱这样的态度，是很难同克里米亚會議关于波兰的決議相符合的。在克里米亚會議上，我們三个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內，都认为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并且获得波兰大多数人民信任和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应该成为改組以后的、新的全国統一政府的核心，即主要部分。

“看来，您是不同意这样来理解問題的。您拒絕把南斯拉夫的先例作为波兰的榜样，这就证实您认为波兰临时政府不可能被看作是将来的全国統一政府的基础和核心。

“(二)同时还應該注意到一个情况，即波兰同苏联是接壤的，但它同英国或美国却并不接壤。

“波兰問題对于苏联的安全的意义，正如比利时和希腊問題对于英国的安全意义一样。

“看来，您并不同意苏联有权利使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府，但是苏联政府不能同意波兰有一个敌視苏联的政府。为了解放波兰，苏联人在波兰的土地上血流成河，姑且抛开其它一切情况不談，仅仅这件事就要求达到上述一点。我不知道希腊是否成立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比利时的政府是否真正是一个民主政府。苏联对于該两国政府的成立并未加以过問。苏联政府不曾要求干預这些事，因为它理解到比利时和希腊对于英国的安全是有着巨大意义的。

“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討論波兰問題的时候，有人不願意从苏联的安全的观点来考虑苏联的利益。

“(三)美、英两国政府事前就波兰問題达成了協議(而苏联对波兰要比其它国家更加关心得多)，然后企图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苏联，使苏联的代表們处于无法容忍的境地，这种情况应该认为是不正常的。



“应当說，这种情况是不能有助于就波兰問題取得一致同意的决定的。

“(四)我准备答应您的要求并尽我的力量来达成一致的決定。但是您对我要求得太多了。简单地說，您要求我拋棄苏联安全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馳。

“我认为，目前情况只有一条出路，即承认南斯拉夫的先例是波兰的榜样。我相信，这样可以使我們取得一致同意的決定。”

斯大林在外交細节方面絲毫无意掩飾他的作用，他在給丘吉尔和我的信中，第一次使用了“我是大人物”的口气。

斯大林的令人不安的信到达之后，这天上午大部分時間花在同参議員和众議員开会上，他們繼續表示了善意与合作。他們更加密切地跟总統合作的願望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任参議員和副总统的时候，就已經注意到国会与总統之間逐漸扩大的裂痕。在我們的相互制約和均衡的制度下，这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門間的爭执，往往跨越政党之間的界限，重要的立法由于国会认为有必要維護自己的权力而經過某些让步后方得通过，有时甚至不能通过。

由于战争及其后果对于国内方面的影响已达到頂点，我想尽最大的努力来促进国会与一切行政部門之間的合作和交換情报。因此，我欢迎两院議員的这类訪問，并且作了些安排，尽可能多多接見他們，尽管我每天的工作很忙。那一天我会見了参議員麦克拉，班克赫德，斯科特·卢卡斯，休·密契尔，詹姆斯·湯內耳，利斯特·希耳以及众議員布埃尔·斯奈德，哈頓·薩姆納斯和伊曼紐尔·塞勒等。

中午我接見了陸軍部长史汀生，这次接見是关于他写給我的那封紧急的信的事情。

史汀生是負責制定原子彈計劃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他密切地注意這個計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他說他今天想專門談談原子彈對我們未來的外交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

他解釋說，他覺得有必要跟我談談他的想法，關於原子彈在戰爭中造成的革命性的變化，以及這種武器對於我們的文明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我注意地聽着，因為史汀生是一個很明智的有遠見的人。他相當詳細地描述了这个在設計中的武器的性質和威力。他告訴我，如果預期的結果得以實現，原子彈對於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一定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且，一旦使用這種炸彈，完全有可能縮短戰爭。

貝爾納斯早就告訴过我，這種武器威力極大，有可能毀滅整個城市，殺傷力達到空前的規模。他還說，他相信這種炸彈有可能使我們在戰爭結束時處於發號施令的地位。看來，史汀生對於原子彈決定歷史的作用和它縮短戰爭的能力至少是同樣關心的。當然，那時還沒有人能夠肯定當時所進行的巨大努力能否成功。然而，陸軍部長似乎滿懷信心，並且告訴我在今後幾個月內很可能獲得成功。他還建議我任命一個委員會來研究這種新力量的意義並向我提出建議。

我感謝他對於這種可怕的武器的說明給我的啟發。當我送他走到門口時，我為我國有這樣聰明能干的人為它服務而慶幸。

從我最初坐上總統的座位時起，我就感到自己是一個龐大行政機構的一部分。總統雖有所更換，但這個機構仍像往常一樣地運轉着，並且也應當如此。若想它不是這樣，那將是十分荒謬的。

俄國偉大的但不是善良的凱瑟琳女皇，她在行動上，像現代的任何繼承者一樣獨裁，關於她有一個故事。故事好像是這樣的，有一條湍急的河流過波羅的海沿岸的城市里加，在凱瑟琳時代這條

河上架了一座桥。据说，这座桥现在还存在，上面嵌着一块铜牌，牌上用俄文写着：“河水啊，不要再流吧。这是女皇的命令。”

根据我在参议院的经验，我知道要想使惯常的行政方法作一些稍微大一点的改变就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根据我在委员会的经验，我知道私人工业、甚至有关战争的紧急措施也是如此。不过，我个人对于战时政府的某些细节有一些想法，而且希望有关总统的程序作一些改变。

从我作总统的时候起，在同军人的关系上就曾明白表示，我对于具体的行政细节以及较大的目标同样关心。我对于马歇尔绝对信任，但是我坚持这样的立场，即作为总司令的总统应当知道正在进行的每一件事情。根据我的经验，我很明白，你一旦不小心，军人就会在你周围筑起篱笆来。

陆海军的高级将领“接管”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以及两院的军事委员会的事情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过去我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时候就知道这种情况。此外，我也充分了解，甚至当我是这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时，他们也曾企图包围我。

我应当讲明白，这些很能干的军官在重大的政策上倒无意绕过总统。三军参谋长一向和总统合作得很好。但是对于行政事务，这些军人总想包办，特别是在对于支出大量金钱的购置管理方面。

举例来说，我素来知道陆海军的职业军人很少懂得钱的价值。他们似乎对花费多少漠不关心，因此我的第一个举动是要求对他们的全部支出预算作全面的检查。结果，陆军和海军中就自动地开始调整。

接见的任务仍然极其繁重，我必须在接见来访者时抽空阅读紧急电报。魏南特大使从伦敦通知我，丘吉尔想通过远洋电话和我谈话。德国盖世太保的头子亨利希·希姆莱已通过瑞典政府提

出西綫的德軍投降的建議。

這是我同丘吉爾第一次在電話中談話。通話時有李海海軍上將、馬歇爾將軍、金海軍上將、赫爾將軍和帕克上校在場。我把談話記錄原文照抄如下：

“丘吉爾：您是總統先生嗎？”

“杜魯門：首相先生，我是總統。”

“丘吉爾：我很高興聽到您的聲音。”

“杜魯門：謝謝您，我也很高興聽到您的聲音。”

“丘吉爾：我曾經跟弗蘭克林<sup>①</sup>談過幾次話，不過……您接到您的大使從斯德哥爾摩來的報告嗎？”

“杜魯門：是的，我接到了。”

“丘吉爾：關於那個建議嗎？”

“杜魯門：是的，我剛接到一封簡短的电報，說有這樣一個建議。

“丘吉爾：是的，那是當然……我們認為這個建議很好。”

“杜魯門：他準備怎樣投降呢？”

“丘吉爾：我召集了戰時內閣會議，他們反對我打電報告訴斯大林，也反對把我們的消息經過正常的途徑告訴您。”

“杜魯門：他要怎樣投降呢：是指所有的挪威、丹麥、意大利和荷蘭？”

“丘吉爾：他們說到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我們說全部，包括丹麥和挪威。是西綫的各個地方，但是他沒有建議在東綫投降。因此，我們認為也許把這件事告訴斯大林是必要的；當然是說，我們認為投降應該在各地同時同意我們的條件下投降。”

“杜魯門：我認為應該強迫他向三國的政府投降，俄國，你們和

---

① 指美國總統羅斯福。——譯者

美国。零星的投降，我认为根本不應該加以考虑。

“丘吉尔：是，是，是。对希姆莱这样的人物，我們决不让他一点一点的投降。希姆莱将代表德国讲话。所以，我們认为，他應該与三国的政府談判。

“杜魯門：那很对，这样做我完全同意。

“丘吉尔：当然，我明白，那是在前綫上的局部投降，在希姆莱的联盟战綫上的局部投降。那时如果艾森豪威尔仍有全权接受投降，那末，他就願意投降。

“杜魯門：是的，当然是这样。

“丘吉尔：您懂了嗎？

“杜魯門：我懂得。若是他代表整个德国政府讲话，那就應該是全部投降，而且應該同时向三个国家的政府投降。

“丘吉尔：那是当然。我們的答复正是說，除非同时无条件地向三大国投降，否則英王陛下的政府决不考虑。

“杜魯門：很好。我同意。

“丘吉尔：您跟俄国人談过什么嗎？

“杜魯門：沒有，我不會談过什么。我在等待您的消息。我沒有接到斯德哥尔摩的电报。您現在告訴我的这个消息，是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消息，除此以外，我只是听說您的談話是根据从斯德哥尔摩来的一封电报。

“丘吉尔：是的。

“杜魯門：除了您現在告訴我的这个消息，我沒有接到別的消息。

“丘吉尔：我懂了。我可以把我們駐斯德哥尔摩的大使給我的电报轉告您。您想了解这封电报的内容嗎？

“杜魯門：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将非常感謝。

“丘吉尔：好吧，不过有点长。如果您听不清楚，請告訴我。

“‘瑞典的外交部长邀请我和我的美国同僚在4月25日夜十一时去见他。……瑞典红十字会的伯纳道特也在场。伯纳道特今夜刚经过丹麦自德国回来。希姆莱在东部战线，请求他从普林斯堡到……去见他，……伯纳道特请求在……今天4月24日上午十时举行会谈。在会见的时候，希姆莱虽然很疲倦，并且承认德国已经完了，但语调仍很坚强而有条理。希姆莱说，希特勒病的很厉害，他也许已经死了，无论如何两天之内总会死的。’

“您听得清楚吗？”

“杜鲁门：是的，听得清楚。”

“丘吉尔：‘希姆莱参谋部的法因尼斯伯格将军告诉伯纳道特说，希特勒害的是脑溢血。’

“‘〔希姆莱〕声明：当希特勒还活着的时候，他不能够采取他现在所建议采取的步骤，但希特勒先生已经完了，他现在有全权来行动。然后，他请伯纳道特向瑞典政府转达他的愿望，希望他们从中斡旋，设法使他同艾森豪威尔会见，以便在西线投降。伯纳道特说，这样一次会见’（伯纳道特是瑞典人，是瑞典红十字会员）‘是不必要的，因为希姆莱可以直接命令他的军队投降。那份声明请他把希姆莱的请求转致瑞典政府，而且这个投降也包括挪威和丹麦。假如这是真的，会见就有一些理由，因为，如果德国人在这两个国家中放下武器，就必须同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作特别的技术上的安排。然后，他回答说，他准备命令在丹麦和挪威的军队向英国、美国或瑞典的军队投降。在声明中他希望至少暂时在东线继续抵抗。关于这一点，伯纳道特告诉他，这恐怕不可能，事实上盟国不会接受。例如希姆莱提议，他希望西方盟国而不是俄国人首先采取这一步骤，以便拯救和平居民。’

“‘然后，他说，希姆莱的参谋斯汀斯伯格先生迫切地等候答复；并且将把任何希望转达的答复直接交给希姆莱。伯纳道特

說……如果盟国完全沒有反应，那将意味着大量生命的无謂牺牲和損失。但是，瑞典外交部长……解釋說，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因此他應該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訴我的美国同僚和我’（即英国大使）。你认为可以这样做嗎？

“‘我写道，我的美国同僚和我认为，鉴于軸心国不願在东綫投降，这看来像是在西方盟国与俄国之間散布不和的最后一次尝试。显然，納粹必須向一切盟国同时投降。’

“杜魯門：很对。这正是我的看法。他應該立刻向一切盟国投降。

“丘吉尔：‘瑞典外交部长和政府一方面承认这个动机可能存在，一方面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納粹首領們命令在整个西綫以及在挪威和丹麦的全部军队投降，对于所有盟国包括俄国在内都是很有利的，而且事实上将会导致全部投降的早日实现。’（这些都是瑞典人說的）‘他們說，无论如何外交部长希望澄清这个問題。他說，把这个消息轉达英国和美国政府，就瑞典政府而論，它們完全有自由把这个消息轉致苏联政府。瑞典政府决不会，也絕无意成为一个工具，来促进在盟国之間散布不和的任何意图。沒有通知苏联政府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希姆萊曾經說过，这个消息只告訴西方盟国。’（他說，如果美国同僚发电报的話，請这样說。）当然，我們决不受这个限制，我认为，我們應該把这件事告訴斯大林。

“杜魯門：我也认为这样。您通知斯大林了嗎？

“丘吉尔：我把这件事压了大約两小时，我发給您一个电报，希望得到您的回答，不过，我現在已經念了这封电报。这就是我发給您的那封电报。

“杜魯門：很好，那么您就通知斯大林，我也立刻把我們之間的談話告訴斯大林。

“丘吉尔：好。这就是我向斯大林讲的話和我在給您的电报里

讲的话。下面是我刚刚从英国驻瑞典大使那里收到的一封电报。

“‘美国总统也接到了这个消息，’我以为您已经接到了这个消息。您的电报在途中耽搁了。

“杜鲁门：是的，我还没接到电报。

“丘吉尔：‘就英王陛下的政府来说，除非他们准备同时向三大国无条件投降，我们是绝不加以考虑的。’

“杜鲁门：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丘吉尔：‘我们认为应当告诉希姆莱，德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部队，都应该在当地向盟国的军队或代表投降。在投降之前，盟国将在凡是遇到继续抵抗的各个方面和各个战场上实行全面的攻击！

“‘上述电报不应影响我们发表演说<sup>①</sup>（？）’我在几分钟前把这个电报发出去了，而且我正把下面电报发给您，就是我读给您的那个电报。我立即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他们同意了我刚才向您读的那个电报。

“杜鲁门：我也同意。

“丘吉尔：我给斯大林的那封。

“杜鲁门：我同意您给斯大林的那封电报，我将立即给斯大林发出同样的电报。

“丘吉尔：谢谢您。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们本来希望，您会认为可以给斯大林元帅和给我们同样意思的电报。

“杜鲁门：首相先生，您可以把给斯大林的电报重念一遍吗？请慢些念，我要记下来。

“丘吉尔：我已经在一个半小时以前交给美国大使馆了，您马上就可以收到。您愿意我把今天从斯德哥尔摩来的电报也发给您

---

① 指盟军会师的演说。——译者



嗎？

“杜魯門：我很願意看到這封電報。

“丘吉爾：好。您馬上就會收到。您會收到我剛剛發給您的那封電報。

“杜魯門：我希望您把那封給斯大林的電報重念一遍，這樣，我好打給他一封大致相似的電報。

“丘吉爾：好，可以。

“杜魯門：請慢些念好嗎，首相先生？

“丘吉爾：下面就是那封電報，很長。

“杜魯門：非常感謝。

“丘吉爾：‘我剛剛從英國駐瑞典大使那里收到這個消息。美國總統也收到了這個消息’（我原以為已經收到了）。‘就英王陛下政府說，除同時向三大國無條件投降外，其他決不予以考慮。我們認為應當這樣告訴希姆萊：德國人，無論是個人或是部隊，都應該在各該地區向盟國的軍隊或代表投降。在投降之前，盟國將在凡是遇到繼續抵抗的各个方面和各個戰場上實行全面的攻擊。上述電報不應影響我們發表演說（？）’（原電如此）這就是我在一小時半以前發出的電報。

“杜魯門：十分感謝。我將立刻打一個電報給他，我非常感激您告訴我電報的內容。

“丘吉爾：我很高興。我相信，我們的意見會完全一致，我希望斯大林的回電這樣說：‘我也同意’。那麼，我們就可以授權我們的代表在斯德哥爾摩告訴伯納道特把這個消息轉告希姆萊。因為，在我們三人都同意之前，這件事是不能辦的。

“杜魯門：很好。

“丘吉爾：十分感謝您。

“杜魯門：謝謝您。

“丘吉尔：您还记得那个我们将要发表的关于欧洲会师的演说吗？”

“杜鲁门：我听不清您最后一句话，首相先生。”

“丘吉尔：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那个演说，那个已经写好的声明。喂，我想无论如何当会师实现时，那个声明就应立刻原样发表。”

“杜鲁门：我想，您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的。我同意这样做。”

“丘吉尔：任何做法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打败我们的敌人。”

“杜鲁门：我同意。”

“丘吉尔：好。我很高兴，我们的第一次会谈将在6月1日，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杜鲁门：我希望不久就能见到您。”

“丘吉尔：我也在准备着。关于这件事，我很快就会给您电报。我完全同意您关于波兰局势问题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愿我们携手前进。”

“杜鲁门：好，我希望我们继续携手前进。”

“丘吉尔：事实上，我是跟着您走，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您的任何行动。”

“杜鲁门：谢谢您，晚安。”

我马上给斯大林元帅发出电报。

我给斯大林的电报是这样说的：“美国驻瑞典公使通知我，在希特勒据说因病不能视事期间，希姆莱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向瑞典政府提出在包括挪威、丹麦和荷兰在内的西部战线的全部德军投降的建议。”

“按照我国与英国和苏联政府的协议，美国政府认为唯一的可以接受的投降条件是在所有战场上向苏联、英国和美国无条件投降。”

“如果德国接受上述第二段的条件，他们就应立即在所有战场上向战地司令官投降。

“如果您同意上述第二段和第三段，我就指示我的驻瑞典公使照此通知希姆莱的代表。

“我给丘吉尔首相发出内容相同的电报。”

就在这天晚上八时，我在白宫用无线电广播向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代表讲话。

我开头说：“在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会议比你们今天在旧金山开幕的这次会议更为重要，更有必要。

“我代表美国人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然后，我谈到罗斯福总统所任命的美国的代表团，并表示我完全信任他们。我谈到罗斯福本人，谈到他的崇高理想、他的远见和决心。我也谈到他以及其他许多人为了自由事业所作的巨大牺牲。

我继续说，“大会的成员们，你们是美好世界的建筑师。我们的未来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由于你们在这次会上的努力，我们将知道在苦难中的人类可能得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我警告他们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日益增大，以及战争可能最后毁灭整个文明的危险。

我继续说，“这次会议的目的并不是像过去所理解的那样起草一个和约。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来解决领土、疆界、国籍和赔偿等专门性的问题。

“这次会议将集中全力来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建立起一个必要的机构来保持和平。你们将制定根本性的宪章。

“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的实质是成立一个明智的机构来解决国际争端。

我最后說，“我們必須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美滿得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永恒的尊严受到尊重。

“由于我們即将担負起重大責任，我們祈禱万能的上帝指引我們，为使这个时机到来而牺牲了他們生命的人們建立起一座永恒的紀念碑。

“願上帝指引我們走上他自己的正义的和平道路。”

4月26日，星期四，我同預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举行第二次會議。由于前綫上的进展，有必要对国内外的政策和担負从速进行重新审查和重新估計。先前我曾指令史密斯为各种战时机构，如：战时人力委员会、战时情报局、战时生产局、民防署和海运委员会等拟定新的預算。我想，如果我們縮小其中某些机构，或者大大精簡甚至取消一些机构，那将是不錯的。战时增設了許多机构，以致政府机构臃肿龐大，运轉不灵。我向史密斯指出人力方面的情况作为一个例子。

在这方面有許多組織，以致政府的常設部門——劳工部，实质上已經无事可办了。有鉴于此，我請史密斯起草一个总统命令，把分散于各个战时机构的关于人力的职权集中在劳工部，由劳工部长統一管理。

我秘密地告訴史密斯，鉴于这次劳工部的基本改組，很可能有必要委任一位新的部长。由于战时工資和物价管制，劳資关系已經很緊張并带有爆炸性了，未来一个时期的劳工部應該有这样一个人，他非但受到劳工的充分支持，而且要有必要的經驗和威望，善于同国会打交道。我向史密斯建議，他同劳工部的會議延期举行，等我找到一个人来代替佩金斯女士时再說。

佩金斯女士早就表示要辭掉这个职务，她說，“我在这个职位上已經沒有什么用处了”。我对她頗为欽佩，尽管她的很多职权被

一些临时机构夺去，我仍相信她的工作做得很好。她了解劳工问题，并且在发展劳资关系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她深信战后时期换一个的部长，将有利于一个新的开始，并将受到国会更大的支持。

.....

从劳工问题我又转到住宅问题，并请求史密斯对住宅问题以及政府在这方面正在做的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检查。老实说，我觉得住宅的情况是一团糟。战争期间，政府在这方面的参与活动并没有进行适当的管理。而且，住宅问题在我们的和平经济计划当中将占重要地位。

我请史密斯注意，在计划和平的时候，我们不当忽视一项事实，那就是，即使欧洲取得了胜利，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政府各部门和各战时机构中，过早地使士气涣散，那是很有害的。所以，在削减这些战争机构的预算时，我们必须考虑这样做会使大批人员被解职，因而损害那些仍有工作要做的机构的效能。

我说，我们的办法应该是逐步缩减，并且适当地预先通知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史密斯同意我的意见，并且答应在向我提出缩减预算之前先同各部和各机构的负责人商量。

我最感到关切的是像物价管制局、战时汽油管理局和对外经济管理局等这些机关不应该有所更动，因为它们对稳定经济有很重要的作用。史密斯建议削减海运委员会四十亿美元的合同拨款和三十亿美元的现金。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同意这样削减，我还向他说明，现在是取消民防署，减少新闻检查局和国防运输署预算的最好时机了。

另一方面，失业补偿金和老年补助金是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问题。当我们的战时生产转变为和平时期的时候，这些款

項将要增加。事实上，許多年紀較大的人早就退出劳动市場了，我們必須注意这方面对于民生和經濟的后果。

史密斯交給我一份备忘录，建議撥給紅十字会一笔款項。他告訴我，罗斯福总统以前曾經两次拒絕这个建議，只是在最近才改变主意，提出把这笔款項列入預算。然而，他說他本人仍然反对这个建議，我同意他的意見。我相信，如果我們給紅十字会撥款，那我們就不得不对其他許多私人团体撥款。而且这类性质的撥款有可能縮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計劃。我想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利曼全面地談談对外国救济的問題。我請求史密斯向我提供关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各国进行救济的全部資料。

其次，我們又談到史密斯拟定的租借法案的撥款。关于这一点，我曾經同对外經濟管理局局长利欧·克劳利談过。史密斯建議的款額較上年度稍少一些，理由之一是国会中反对租借法案的人越来越多了。鼓吹反对租借法案的是孤立主义集团，由于欧洲的勝利已經临近，这派人的反对越来越明目張胆了。孤立主义的宣傳采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弥漫全国，我們很多人担心这种孤立主义的精神会重新成为一种重大的政治因素。

租借法案原来是要供給盟国以武器和必要的物資，以补充它們战时生产之不足。然而，由于对物資包括什么东西有着广泛的解釋，某些供应物資变成了民用品，或用于恢复工业的东西，因此，这便成了批評者的目标之一。

原来的租借法案是在1941年1月10日提交众議院和參議院的。两院議員在听取了关于这个法案的意見和經過辯論之后，予以通过，并于1941年3月11日由罗斯福总统签署。此后該法案經過两次延长期限，并于4月17日我作总统后的第四天，我签署了第三次延长期限书，这个法案曾經提交參議院，当时我仍以副总统的資格担任參議院的議長。

史密斯回忆說，共和党提出的一項修正案，有可能阻止总统訂立利用租借法案計劃作为善后救济（恢复和重建工作）的合同，該修正案在投票时是三十九票对三十九票，我作为副总统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才否决了这项修正案。后来，租借法案于4月10日在参議院由口头投票一致通过。

我明白，如果我們把租借法案的款項用于战后恢复工作，那将在参議院遭遇到許多困难。利欧·克劳利也承认这个事实，于是建議，处理恢复問題的較好的办法是扩大进出口銀行，以便得到資金进行恢复工作，并鼓励多多利用国际銀行。我把克劳利的建議讲給史密斯听，然后跟他討論給外国以单独借款的問題。这种借款当然会遭到国内的反对，也可能使盟国怀疑我們的动机。这种借款甚至可能給俄国一个借口（假如他們需要找借口的話）来进行他們的单独貸款。因此，我反对任何方面的单独行动，然而，給某些国家以貸款对于它們的生存实在太重要了，即使这些貸款冒着不能完全偿还的危險，我也觉得是必要的。

史密斯从前曾交給罗斯福总统一份預算局关于政府中情报組織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我也讀到过。他在备忘录中指出，联邦調查局、战略情报局、陆海軍情报局和国务院这些机构之間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还說，最近預算局与陆軍參謀总部密切协作，陆軍參謀总部已对陆軍中的情报工作进行了改組；現在他告訴我，預算局本身也有一些有經驗有才干的人員，他們已成为情报組織問題的专家。

我认为，我国有一个健全的、組織良好的情报系統，無論在現在还是将来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情报工作的正常发展將要求具有新的概念和最有訓練和最能干的人員。史密斯建議他局里在这方面受过特別訓練的专家应当立即开始研究這個問題，我同意这个意見。这方面的計劃应当制定，但重要的是我們不要草率从事，

以免在各情报机构中引起有害的和不必要的紛爭。我告訴史密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国絕不要用任何伪装或任何理由來搞“盖世太保”。

我跟預算局长作了長時間的會談，在結束的時候，我再一次提醒他注意租借法案，強調進一步精確估計預算的重要性。這是我做總統的第一次預算，我希望對預算的各個細節都能作出合理的解釋。

.....

第二天，我接到斯大林元帥這樣一封電報，

“您4月26日的來電已經收到。感謝您告訴我希姆萊想在西戰場投降的消息。我認為，您打算向希姆萊提出的要求在所有的戰場上——其中包括蘇聯戰場——無條件投降的答复是完全正確的。請按您的建議的精神行動，至於我們俄國人，我們保證繼續向德國人進攻。

“我並且告訴您，我已經給丘吉爾首相送去了同樣的答复。因為他也曾問過我同樣的問題。”

我立刻回電斯大林。

“我今天已將下述的電報發給斯德哥爾摩的約翰遜公使，

“關於您4月25日晨三時的電報，請通知希特勒的代表，唯一可以接受的德國投降條件是在所有戰場上向蘇聯政府、英國和美國實行無條件投降。

“如接受上述投降條件，德國軍隊應立即在所有戰場上向戰地司令官投降。

“在各個戰場上，只要繼續抵抗，盟軍的猛烈攻擊將進行到完全勝利為止。”



## 第七章

### 丘吉尔向斯大林呼吁

4月26日晚，我带着许多报告和电信回到布莱尔大厦，其中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在战斗结束时占领德国的一份备忘录。

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前大约三星期（即3月23日），他曾经为我国部队在进占指定地区之后如何对待德国问题发布了一个训令。罗斯福发出的训令说到还在准备一个更详尽的指示。为了这一目的，已经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对外经济管理局的代表组成，并已在委员会的主席助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主持下开始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要求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麦克洛伊就整个问题写一份备忘录给我，现在这份备忘录已在我手中。我研究了这份备忘录，准备明天上午和委员会在一起开会。

麦克洛伊的备忘录告诉我，委员会的工作即将完成。他继续说，罗斯福总统曾想委派一位文官出任驻德高级专员，但同意让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将在我国管制下的德国地区的军政府长官，兼任德国管制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至少在初期将不委派一位文官任专员。在第一阶段，占领无疑地主要是军事行动。绥靖工作有必要掌握在军人手里。当时认为给德国人的最初影响应该完全是军事性的。德国人会更好地明白这一点。

备忘录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常常表现出显著的政治敏感，能够正确地处理这类事情。另外，鲁西斯·克莱将军已被选定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他已在欧洲着手物色所需要的工作人员。

麦克洛伊的报告指出，德国迫切需要粮食、燃料和运输工具。城镇和各种设备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流离失所的人形成严重的问题；社会和其他各种设施的瓦解是惊人的。“欧洲中部正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总崩溃的过程中，其波及范围之广除罗马帝国的崩溃外，在历史上是无与比拟的，甚至罗马帝国时代也没有这样剧烈的经济变动。

备忘录接着说，“在这种动荡与崩溃、残酷与混乱的气氛中，我们必须同俄国人搞出一套确实可行的关系。这需要极大的才能、容忍和智慧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显然，需要有第一流的人材。也许需要总统的支持，从政府机构和民间抽调所需要的有才能、有声望和有魄力的人。”

麦克洛伊汇报了他同戴高乐将军的会谈，戴高乐说，他不赞成对德国实行焦土政策，但认为应实行某种经济管制，特别是对鲁尔区的国际管制。戴高乐希望把从科隆到瑞士边境的莱茵河左岸地区置于法国的政治管制之下。

然后我又翻开国务院关于中国的一份报告。报告扼要地叙述了截至当时为止，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我们对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共同对日本作战；从长远观点来看，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作为远东所必需的主要稳定因素。

**“政治方面** 为了击败日本这一当前目标以及为了和平与安全的长远目标，我们力求促进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政府的成立，这个政府将导致国内统一，包括协调国共之间的分歧，并且有效地履行它的国内和国际义务。

“我们一方面不偏袒任何政治派系，一方面继续支持现在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认为它仍然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中央政权，仍然是统一和避免中国抗战工作陷于混乱的最大希望。然而，考

考虑到我們的长远目标并准备現政府的权威万一崩潰，我們还力求做到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同任何較有可能实现統一和促进东亚和平与安全的中国其他领导合作。同时，我們帮助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各大国之間取得公认的平等地位。

“我們力求苏联、英国的合作，认为这是成功地实现这些政策的必要条件。为了这一目的，我們致力于促进中苏和中英之間的友好和互相信任的关系。对于特殊的領土問題和其他問題，我們欢迎并在适宜于这样做的时候协助取得友好的妥善安排，例如：給予苏联通过滿洲进行的貿易以便利，可能时由中国指定一个自由港；香港归还中国，并由中国宣布香港为永久自由港；調整中国对边远領土如西藏和外蒙古的要求，以照顾苏联和英国的有关利益以及这些領土上人民要求地方自治的願望。

“为了进一步奠定和平与稳定的基础，我們贊成中国同朝鮮、緬甸、泰国、印度支那及其他邻近地区建立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而不由中国称霸这些地区。

**“經濟方面** 我們的短期政策是，致力于加强中国作战的經濟基础，办法是：扩大通往中国的供应路綫和服务工作；尽运输设备的最大限度按租借法案供应物资；中美两国联合采取措施加强中国的战时生产，增加中国消費品的供应，改进国内运输系統，制止严重的通貨膨脹。

“我們的长远政策着重于完整和均衡的中国經濟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間充分的貿易交流。为了这些目的，我們力求在机会均等、尊重国家主权和自由貿易政策的基础上，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間进行充分的經濟合作。我們希望，在中国这方面，将制定合理的政策，鼓励合法的貿易和企业从而促进这种对中国的农业和經濟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合作。

“估計到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并估計到那些影响美国同

中国进行的以及美国在中国进行贸易的实际情况，我们自己这方面准备给予中国一切切实可行的经济、财政和技术的援助，以满足中国发展完整和均衡的经济的需要。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中美之间的互利的贸易，并立即与中国进行谈判，订立一项广泛的、现代的通商条约。

**“军事方面**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国的既定军事政策仅限于这样的当前目标：通过对中国的直接军事援助，促进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协助动员中国的全部人力和物力，以便有效地联合对日作战。我们一方面如上面所说的力求加强中国进行战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一方面着手改组、训练和装备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军队，使其成为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能够在驱逐日本人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也致力于把共产党军队同国民政府军队溶合起来，实现极其必要的中国军事上的统一。

“我们的长远政治目标既然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能有助于和平与安全，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在战后理所当然地要帮助中国发展现代的、有效的军事组织。然而，鉴于目前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内战的可能性，以及与苏俄的复杂关系，我们不准向现在的中国政府承担给予这种援助的义务，除非我们已经确信这个政府在实现统一和取得中国人民的积极的支持方面有了进展。”

这个备忘录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我对中国最初的想法。

.....

4月25日召开的旧金山会议，现正处于开始讨论的阶段。我们的代表团关于大会进展的第一次报告于4月27日送达我的办公室。报告内容谈到组织上的细节问题和斯退丁纽斯、宋子文、莫洛托夫和艾登的发言。

斯退丁纽斯强调两点：第一，我们认为联合国宪章将来有必要

根据經驗和情况的变化加以修正；第二，联合国組織必須以承担主要責任的各大国間的团結，以及所有大小国家間的主权平等为基础。

宋子文代表中国說，所有国家必須准备牺牲主权以实现集体安全。

莫洛托夫說，苏联坚决支持一个强大而有效的国际組織，在創立和維持这样一个組織方面苏联將給予充分的合作，而且他相信这一工作一定成功。

艾登強調，各大国由于自己在軍事力量和資源上的优势，应当实行自制。

在同一天上午我会見了緬因州的参議員欧文·布魯斯特和威斯康星州的参議員罗伯特·拉福萊特。众議院議長薩姆·雷朋來談悬而未決的立法。

雷朋走后，以助理国务卿克萊頓为首的委员会來談德国占領問題。跟他同来的有代理国务卿格魯、对外經濟管理局局长克勞利、陸軍部长助理約翰·麥克洛伊和海軍部副部长拉尔弗·巴德。財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也参加了會議。麥克洛伊曾負特別任务赴德，最近剛回来，送給了我一份詳細的报告。

麥克洛伊指出，艾森豪威尔將軍作为盟軍最高司令官目前正指揮整个西綫，盟軍在这里占領了德国的43%的領土，但在胜利日之后他将很快失掉这种地位。那时他将只是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四个成員之一，并且仅仅是德国美軍占領区的軍事司令官。

麥克洛伊明确地指出，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德国的混乱状态和有限的糧食儲存將要造成大規模的飢饉。“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前大批被奴役的人們將要到处流浪，以及那些由于战争的破坏而无家可归的德国人。”

麥克洛伊說他去德国是为了把罗斯福總統关于管理德国的最

后的意見，特别是把总统3月23日的訓令的精神，传达給艾森豪威尔將軍。此外，他去德国是为了使大西洋两岸的美国負責当局的見解一致。

他解釋說，克萊將軍将是艾森豪威尔軍事司令官的代表，在艾森豪威尔不在时，代表艾森豪威尔出席盟国管制委員會。

这些任命都是在罗斯福总统生前决定的，我告訴委員會說，我衷心贊成。然后我要求委員會完成那个将要发出的指令的起草工作，并交我作最后审核和批准。德国的情况在迅速发展，我催促他們尽快地完成他們的工作。

會議結束之后，我接見了英国的生产大臣奧利佛·利特耳頓，他相当詳細地告訴我英国粮食和供应的严重状况。現時英国最好的粮食供应是小麦。脂肪、油类、食糖、肉类和大多数奶制品以及煤、运输和紡織品都非常缺乏。供应物資迫切需要很快送到，我建議利特耳頓与美国政府負責援助盟国的各个机关协商。我向他保证，我也要亲自参預这事。事实上，在他走后不久，我会見了农业部长威卡德和商务部长华莱士，并且告訴他們，我同利特耳頓交談的事情，指示他們在可能範圍內帮助我們的英国盟友。

.....

消息傳來，期待中的美、英、俄三国軍队的会师終於在德国境內實現了。在科尔特內·霍季斯將軍指揮下的英美軍隊和伊凡·科涅夫元帥的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在易北河会师了。德国被切成两段。

事情发展得很快，我代表美国，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时发表了我早就准备好的声明。我們三人現在向新聞界和广播界发布的声明全文是事先用电报取得彼此同意的。但是，尽管事前有了充分准备，到了最后一刻，在发表这些声明的时间还是发生了一些混乱，因而使丘吉尔首相必須在黎明之前从倫敦打电话給我。

两点钟我会见了馬歇尔將軍、李海海軍上將和一些高級將領，討論最近的軍事情況，以及希姆萊企圖通過瑞典準備德國向西方國家投降的事情。正如我以前告訴斯大林的，我們堅決反對片面行動。馬歇尔將軍交給我一份艾森豪威爾將軍打來的電報，電報說：

“获悉您給駐斯德哥爾摩的約翰遜公使的電報，我極為滿意。兩夜之前，當首相剛剛接到從瑞典來的電報就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着重地向他建議採取您的（總統的）電報中所表示的態度。他完全同意，希姆萊的建議看來像是最後的絕望掙扎，企圖在我們和俄國人之間製造分裂。這些天來，我們的每一行動都尽可能謹慎地注意到這個問題。”

將領們離開之後，我暫時批閱了一些文件，四點半鐘的時候，埃德溫·保萊和伊薩多·路賓來了。我告訴保萊，我已任命他為大使和總統的私人代表，負責處理賠償問題。我又說，路賓作他的助手，並授以公使銜。他們兩人都將成為盟國賠償委員會中的美國代表，並將與英國人和俄國人談判，訂立一項關於德國賠償問題的協定。

他們走後，我像往常一樣拿起一包文件回布萊爾大廈去。

4月28日，星期六上午，我用了一部分時間會見一些參議員和眾議員。

最近兩天來，有謠言說，德國已經無條件投降，這些謠言的主要根據是希姆萊在最後關頭與瑞典連絡，建議向西方盟國投降，企圖避免向俄國人投降。我們對這些謠言不加注意。不過，由於我們在舊金山的代表團團員參議員康納利的談話，這些謠言越來越盛了。康納利向美聯社說，美國時刻在期待德國的無條件投降。國務卿斯退丁紐斯打電話來，要我證實這個消息。我指示李海打電話給艾森豪威爾將軍核對這個消息，艾森豪威爾告訴李海，這個報

道毫无根据。那天晚上刚过九点半钟，我召集白宫记者到我的办公室，告诉他们我刚刚同欧洲最高司令部核对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是不真实的。

.....

那天上午，我在布莱尔大厦收到几份电报。其中之一是丘吉尔给我的一份很长的电报，把当天他致斯大林的关于波兰问题的电报通知我。

在这个爆炸性的波兰问题上，我们同斯大林的磋商很少进展。几天前斯大林给我的电报使我非常忧虑；虽然在我同莫洛托夫会见时，我曾催促他同在旧金山的英美代表团设法拟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斯大林给丘吉尔和我的复电使这个问题早日获得解决的希望更渺茫了。

现在，丘吉尔以私人名义给俄国的首脑一封热情的电报。他的电报摆在我的面前，他对于克里米亚有关波兰问题的协定所产生的误解表示遗憾。丘吉尔说，他到雅尔塔去时，满怀希望，以为伦敦和卢布林的波兰政府都可以取消，而成立一个由善良的波兰人组成的新政府，在这个政府中，贝鲁特的政府（即卢布林政府）人员将占主要地位。但是斯大林不喜欢丘吉尔向他提出的这个计划；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同意不取消贝鲁特政府，而主张这个政府应该在更加广泛的民主基础上改组，把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都包括进去，而成为一个“新”政府。英国首相指出，俄国人坚持波兰援引南斯拉夫的例子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他说，铁托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宣称他首先忠于苏维埃俄国；贝尔格莱德对流亡政府所作的让步只不过是六个名额，而铁托自己提名的有二十五人。

丘吉尔说，保证波兰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使它拥有充分代表波兰一切民主人士的政府，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光荣和



义务。他继续说，“总之，过去我们会同意您的要求，1944年主要在我的倡议下，才宣布了您所希望的俄波边界，即把里沃夫划归俄国的寇松线。我们认为，对于您同我们一起宣布的同一政策的另一半，即只要波兰对俄国友好，它应该成为主权、独立和自由的国家一点，您应该接近我们的意见。”

丘吉尔给斯大林的电报的特点是他描绘了如果世界分成两个阵营，那会出现怎样一幅图画。他说，“如果在将来您和您所统治的国家，加上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站在一边，而那些团结在英语国家周围的国家以及他们的同盟者或自治领站在另一边，这样一种前景，不能使人感到安适。很明显，如果双方一旦发生争吵，将把世界撕得四分五裂，而所有我们这些各方的领导人，要是同这种争吵有任何瓜葛，将会在历史上遭到耻笑。甚至会开始长时期的猜疑，进行对骂，以及奉行敌对政策，这将成为阻碍使人民群众在世界繁荣上获得巨大进展的一种灾难，而繁荣昌盛只有在我們三国团结一致时才能取得。我希望我这样推心置腹的谈话不致无意间使您感到不愉快。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但是，我的朋友斯大林，请您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些正在开始产生的分歧，您也许认为这些事情对我们是一些小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却象征着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对人生的看法……”

我衷心支持英国首相关于建立一个自由的波兰和避免世界分裂的呼吁。但是我担心这很难改变斯大林的态度。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旧金山的代表团报告说，波兰问题的讨论已经搁浅。

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到旧金山时，本想在会议的过程中进一步讨论波兰问题。现在我所收到的报告，由于莫洛托夫坚持在波兰问题上援用对南斯拉夫政府的公式，讨论已经陷于僵局。我感到有必要再一次直接给斯大林写信。

.....

接着，塞繆爾·羅森曼法官來了<sup>①</sup>，我請他繼續與我們的盟友談判處理戰犯的問題。他在我這裡只有幾分鐘，我交給他一封信，派他作我的個人代表，出席這些談判，原信如下：

“親愛的羅森曼法官：

“我希望你作為我的個人代表，繼續同聯合王國、蘇聯和法國臨時政府的代表談判，以便在審訊這次戰爭的罪犯的方法、程序和法庭問題上達成協議。

“我知道，你在倫敦的預備會談中（故總統曾委派你參加這些談判），英國代表曾宣稱他們的政府的政策是不經任何審訊，就給予最高級納粹和法西斯分子以政治上的處理。

“美國政府反對這種政策。

“因此，我請你堅持建立一個公正的審訊方式，但這種審訊應儘可能簡短迅速。那些自1933年一直到今天曾犯下震撼世界的罪行的人，應當迅速審訊和判刑，但他們的罪行必須根據四大國所通過的審判程序，在法律上予以確定，審判程序的建立不容有任何遲延和迴避。

“你的忠實的哈里·杜魯門

“1945年4月30日”

上午十點半鐘我會見前任駐俄國大使約瑟夫·戴維斯，我曾經請他來見我，在這之前也曾請霍浦金斯來見我。我向他說明，我希望他到倫敦去見丘吉爾。我還說，霍浦金斯將去莫斯科見斯大林，我認為這兩項使命都很重要；因為我迫切需要知道羅斯福死後斯大林和丘吉爾的態度是否發生了重大變化。

我希望有判斷力和有經驗的人親自從當地給我報告，因為除

---

<sup>①</sup> 時間是1945年4月30日上午。——譯者

开我能够从信件、电报甚至电话中所获知的以外，我还需要知道更多一些。我向戴維斯說，我派他去倫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曾經作过駐莫斯科的大使和熟悉俄国的情况。因此，他能够順利地同丘吉尔交談我們同俄国之間的日益增长的困难。此外，丘吉尔已經建議他和我与斯大林会晤，我想知道如果我同意会晤，将遇到什么問題。我特別需要更詳尽地了解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个人态度，并且觉得戴維斯和霍浦金斯会充分而坦率地向我报告。自然，还有其他許多問題我需要得到解答，我希望知道这两位領袖在解决我們当前的一些問題上准备怎样办。

戴維斯身体很坏。事实上当我看到他的臉色不好时，我也曾犹豫是否应向他提出这样重大的要求。但是他絲毫沒有考虑他的健康情况，同意到倫敦去。

戴維斯走后，我接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威廉·格林。我告訴他，我打算任命法官施魏倫巴赫出任劳工部长，并且进一步按照商务部的方針改組劳工部。

我說，我认为商务部已經成为工商业与白宮联系的桥梁；像美国商会和全国制造商协会这样的組織都通过商务部与政府密切合作，关系十分协调。当它們的問題提到华盛頓的时候，它們在組織上的敌对关系都和解了。

我很遺憾劳工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劳工被分裂成若干强大的組織，並沒有利用劳工部作为合作的基础。我表示，希望改組后的劳工部能够誘导劳工有效地利用它，正如商业有效地利用商务部一样。我还說，劳工每四年运用一次自己的政治力量是不够的，并且分成对立的集团，各自为自己講話。这种分裂对于劳工和国家都是不利的。我向格林說，我也想会見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菲耳·黑莱和铁路工会的乔治·哈里逊，促使他們更多地利用劳工部。格林說，劳工很明白分裂成这样多的集团所造成的困难，而且从岡珀

斯<sup>①</sup>的时代起就一直希望达到更大的团结。对于劳工部的改组计划以及挑选施魏伦巴赫出任部长,他表示很高兴。

---

① 网珀斯(1850—1924年)是美国著名的反动劳工领袖,1886年出任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一任主席,除1895年外,始终担任该职,直到逝世。他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和进步活动,主张劳工的公正目标是更多的工资和自由,更少的工作时数。——译者

## 第八章

### 德国投降

近年来，甚至在战前，美国总统这个职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复杂和吃力的工作。但是战争又给这个已经非常沉重的担子加上了新的极其繁重的责任。现在，总统不仅要担负起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而且必须担负起各盟国长期联盟的主导工作。当我宣誓就职时，我意识到总统的职权范围是多么广阔。虽然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正在走向最后胜利，但是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不过，在1945年4月欧洲的战争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

4月中旬，德国的抵抗已开始总崩溃。然而，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纳粹高级人物和德国司令部仍然有坚守最后一道防线的说法。人们相信，这条最后防线将包括巴伐利亚、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这一山区中的所谓方形地带。预料纳粹的领导人将把剩下的党卫军和嫡系部队撤退到这个地区，准备进行长期抵抗。盟军在战争最后一个阶段的行动准备绕过这个地区前进。谣传希特勒已于4月20日离开柏林到了这个方形地带，但当美国第三军和第七军深入这个地区时，发现德国人并没有能够把这个最后堡垒建立起来。

在4月的最后几天，美国和俄国军队会师了，德军在意大利投降，最后是德国的抵抗全部崩溃。由于我们的军事计划以无比的速度进展，纳粹的领导人非常恐慌，开始谋求与西方盟国谈判的门路。落在俄国人手里的想法使他们恐惧。他们权衡利害之后，觉得倒向我们这一方好。这种片面谈判的企图已经在我们与俄国人

之間引起了一些麻煩。3月里，駐意大利的德国党卫軍首腦卡尔·沃尔夫將軍已开始与美国在瑞士的战略情报局代理人談判，試探凱塞林指揮下的駐意大利德軍投降的条件。这些談判毫无結果，反而使俄国人非常怀疑我們的动机。莫洛托夫写信給駐莫斯科的哈里曼大使，要求停止同德国人的談判。罗斯福总统打电报給斯大林，說俄国人的情报不确实。他說明我們沒有理由不听取敌人向盟軍司令投降的建議，并說他不能因为莫洛托夫的反反对而同意停止这种努力。这种說明沒有使斯大林滿意，他回答說，德国人愚弄了盟国，并且乘机把三个师的軍队从意大利前綫調到俄国前綫。实际上那三个师是調到西綫来打我們的。局势很不妙。在目前，与俄国人的任何分裂都将影响我們在德国的前进。

俄国人总是怀疑任何事情和任何人。沃尔夫与美国和英国的接近，使他們怀疑我們企图使西綫德軍向我們投降，而使他們繼續在俄国战綫上作战。看来俄国人也害怕我們占領整个德国，而把他們拋在波兰边界的那边。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德国人在意大利还有强大的战斗力，他們有二十五个德国师和五个意大利法西斯师。他們据守着波河南岸的坚固陣地，据守着从比薩附近的西海岸到科馬基奧湖附近的亚德里亚海岸的一条战綫，这时候德軍的投降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意大利的司令部听取德国人的任何建議都不是为了談判，而是为了促进无条件投降。但是德国人不大願意接受我們所坚持的投降条件。为了避免与俄国人发生进一步的摩擦，在丘吉尔的敦促下，盟軍在意大利的司令亚历山大陆軍元帅接到訓令停止談判。我們的參謀长联席會議也指令瑞士的战略情报局停止与德国人接触。然后我們把这些行动告訴了俄国人。

在这以后不久，盟軍在意大利发动了最后的攻势。4月21日

盟軍占領了博洛尼亞城。23日美軍越過了波河。此后不久，德國就潰不成軍，亞歷山大請示允許他與德國有權投降的軍官聯繫。這次我們布置好請俄國人派一名代表參加。意大利的戰事很快就結束了。

4月28日，在意大利的盟軍總部把投降條件交給德國人。同一天德國人同意這些條件，並於29日簽字。基斯連柯將軍和另一位俄國軍官參加了談判。投降條件規定在5月2日中午停止敵對行動。投降也包括德國所指揮的意大利法西斯師團。這時墨索里尼的所謂意大利社會主義共和國偽政權已不存在，墨索里尼也於4月下旬被游擊隊擊斃了。

意大利的戰爭結束了，我打電報向陸軍元帥亞歷山大和該戰區的美國最高司令官馬克·克拉克將軍祝賀。我利用意大利境內德軍投降的機會警告德國人和日本人，只有無條件投降才能免于毀滅。

我的聲明說：“在意大利的盟軍已經首次在歐洲的土地上贏得了德國軍隊的無條件投降；我們曾經從西方把我們的武器和決心運到那里去。不過，軍事專制在意大利的崩潰并不僅僅是在意大利的勝利，也是我們在整个歐洲大陸所期待的全部勝利的一部分。現在只有愚蠢和神經錯亂的人才會拖延各地潰不成軍的德軍的總投降。

“我已致電向領導我軍全歼在意大利的德軍的盟國和美國軍官祝賀。對於這次勝利，他們應該受到我們的贊揚。我們有理由為我軍的勝利而驕傲。

“日本和德國應了解這些事件的意義。除非他們執迷不悟或決心自毀，否則他們必須認識到行動日益迅速的力量的意義，這個力量現在即將使不久以前為害人類的最殘暴的敵人投降或毀滅。”

在意大利沒有俄國軍隊。因此德國的投降是向西方盟國投降。

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情况就不同了。在各个主要战线上，德国人企图分别向西方盟国投降。这里面显然大有文章，因为纳粹领袖和他们的某些将领正在玩弄一出邪恶的把戏。

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打算在西方盟国和俄国之间制造纠纷，企图作最后挣扎，以求免于一死，并尽可能地保留他们的制度。希姆莱事件正好说明这一情况。

当这件事在旧金山会议上泄露出来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不过，我对纳粹领袖在最后一刻所耍的鬼把戏并不重视。我们知道德国已没有有组织的权威当局，而且也没有一个纳粹领袖能代表德国人民或德国军队讲话。从策略上来看，任何愿意投降的敌军都可以向当地的盟军司令投降。除局部投降外，当此最后时刻对于同时向三大国无条件投降和为此目的而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这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向在挪威的德军进攻的计划也在拟订中，以防止他们继续抵抗。早在3月间，挪威政府就曾请求瑞典参战，协助驱逐德国人。但瑞典政府拒绝这样做。他们的理由是任何干预行为都会招致德国人对挪威一定程度的破坏，也会使德国人对瑞典人民进行报复。挪威对瑞典政府这种推托表示愤慨，好像瑞典比挪威人自己更懂得怎样做对挪威更有利。他们说，瑞典人的行动本来使他们相信可以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在4月下旬，当战争的结束已经显然在望的时候，有迹象表明瑞典可以参加解放挪威。这已经有点晚了，但仍然是很重要的。1945年4月25日，代理国务卿格鲁报告我，如果英国、美国和挪威的政府提出建议，而且苏联人也不反对，那么瑞典会愿意参战的。不过，一般人认为瑞典对德国宣战是极其可疑的。

在战争的最后一星期，瑞典政府接受了盟国的建议，这个建议等于使瑞典参与战争。盟国计划通过瑞典国境进攻在挪威的德军，



但是正在策划这种进攻时，德国在挪威的军队已经投降了。

现在，各地德军的抵抗都在趋于崩溃。5月1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这个给世界带来无限灾难的人，死在他的总理办公大楼的废墟中。我所接到的报告说，他是自杀死的。我已预料到德国的许多高级将领在失败之余都将走这条绝路；我知道希特勒从来就没有遵守过普鲁士军官的法典，我以为，像他那样疯狂，他会抵抗到底。

希特勒对文明的禽兽般的进攻，使一千五百万人丧失了生命，同时他和他的政权还使无数人在身心上受到了摧残。但是现在，这个魔鬼建筑在德国人民身上的堡垒终于被粉碎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死已使战争接近结束，和平即将再度来临。

德国的投降，是通过军队的司令而不是通过在政治上已经死亡的纳粹领袖。现在，关于无条件投降的条件已是无可争辩的了。德国已成为废墟，它的军队已被打垮。德国的军事领袖知道这一点，也知道我们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向西方盟国投降。

5月2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报告说，在德国西北部指挥一个军的布鲁门特利特将军表示他的军队愿意向英军投降。艾森豪威尔解释说，他已发出训令，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并说，“我把这件事当作一件战术问题处理，并将通知俄国的苏斯拉帕洛夫将军。”

第二天，5月3日，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布鲁门特利特并没有到蒙哥马利元帅的总部来，并说现在德国人又另有企图。代替布鲁门特利特，并带着德国最高统帅部总司令凯特尔元帅的命令而来的是海军上将弗里德伯格和其他高级军官。他们请求蒙哥马利接受当时与俄国人作战的德国第十二和第二十一军的投降，并允许德国的难民通过盟国的战线到施勒斯维希—霍尔斯坦因去。这些请求被拒绝了。蒙哥马利元帅指示德国人转告凯特尔只有无条

件投降才可接受。艾森豪威尔說他已指示蒙哥馬利，关于丹麦、荷兰、佛里西安群島、赫耳果兰和施勒斯維希—霍尔斯坦因的投降可以由蒙哥馬利作为战术問題处理，談判可在当地进行。

艾森豪威尔的訓令繼續說：“如果有任何較大的投降建議，如在挪威和其他战綫的投降建議，应立即派密使到我的总部来。”

艾森豪威尔在訓令中又加上一句：“上述內容已通知苏斯拉帕洛夫將軍”。

5月4日，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的全部德軍都向蒙哥馬利投降了。敌对行动于5月5日上午八时停止。5月4日艾森豪威尔給陸軍部的报告如下：

“邓尼茨的代表将于明天到我的总部来，显然是为了談判其余敵軍的投降問題。我立即电告俄国司令部，我提議指令这位代表劝告他的政府，把面对俄国人的一切敵軍，向俄国司令部投降，把面对这条战綫包括挪威在內的德軍向我投降。

“我向俄国人建議，如果他們同意这一点，我还建議在双方战綫上同时尽快接受投降。”

5月6日艾森豪威尔在下面的报告中描述了当时的形勢。

“約道尔將軍今夜来到我的总部，同弗里德伯格一道来繼續与我的參謀长及其助手談判。在开始商談时就很明显地看出，德国人在拖延時間，他們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德国的兵士和平民从俄国战綫撤到我們的战綫这边来。他們繼續力求在这条战綫上单独投降，甚至說，不管我怎样回答，他們将命令西綫留下来的全部德軍停火，并停止向英美軍隊射击。他們請求在星期二上午会見，簽訂最后的投降条件，签字后給他們四十八小時的時間以便向外圍部队下达必要的命令。他們的真正的目的是爭取時間。最后我不得不通知他們，除非他們同意我的投降条件，我将中斷一切的談判，并封鎖西綫，以武力阻止德国士兵和平民再向西方移动。他們

面对这个最后通牒，立即草拟一份电报给邓尼茨，请求授权谈判全部和彻底的投降，但声明一点，即签字后四十八小时才能实际停止战斗。由于这个解决办法，显然是把何时停止战斗的决定权操在德国人手里，我拒绝接受，并说明从今天午夜起四十八小时内两条战线的一切战斗都必须停止，否则我将执行我的强迫行动。我再说一遍，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拖时间以对抗俄国人的那条战线，而把最大数量的德国人撤到我们的战线这边来。

“无论如何，为了一切实际目的，这条战线上的战斗几乎可以马上停止，因为除少数例外，我的军队都已进入我命令他们去占领的那条战线。

“如果事情像上面所安排的那样进行，我建议盟国政府于星期二发表声明，宣布5月9日星期三为胜利日，同时说明在这条战线上战斗已大部停止，并且按照协议的条件敌对行动将于5月8—9日午夜后一分钟正式停止……

“我们希望明天正式签字。”

5月7日艾森豪威尔报告说，一项无条件军事投降的简短文件已于当天早晨二点四十分签字。他说他准备第二天到柏林去最后签订正式投降文件，届时朱可夫元帅将为俄国的代表。

俄国人很担心在他们的战线上德国人是否会真正投降，因此莫斯科把正式投降的公告延迟了一天发表。我们原先与斯大林商定，公告于5月8日星期二华盛顿时间上午9时发表。可是丘吉尔催促提前一天发表，俄国人则坚持迟一天发表。7日丘吉尔用电话和电报催促正式公告于当天发表。我认为除非斯大林同意，否则没有理由擅自改变。然而，斯大林坚持，由于俄国战线上的不稳定的情况，发表公告有困难。他仍然主张在5月9日发表。经过几次电讯往来，最后决定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公告仍按原定时间，即5月8日星期二华盛顿时间上午9时发表。

我宣誓就任总统以后还不到四个星期，德国就投降了。5月7日，即胜利日的前一夜，我们从布莱尔大厦搬到白宫去住

胜利日那天我起得很早，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妈妈和姐姐玛丽。

.....

5月8日上午8时35分，我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我将向美国人民宣布欧洲的战争结束了。这时和我在一起的是我的夫人和我的女儿玛格丽特，美国和英国的陆海军高级将领，以及参众两院的领袖。

我准备先接见记者，但在开始之前，参议员麦克拉，参议院的临时主席，向我祝贺。

“总统先生，祝贺你的‘生日’，”他说。

我谢了他。接着报纸和广播电台的代表走了进来，一切都显得异乎寻常地肃静。

我向他们宣读官方的公告：

“这是一个严肃而光荣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将军向我报告，德国的军队已向联合国投降。自由的旗帜已在全欧洲飘扬。

“对于这次胜利，我们也同样地感谢上帝，他指引我们和保护我们经过了艰难黑暗的岁月。当我们为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严肃而沉重的，因为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为拯救世界免于希特勒及其罪恶匪帮的蹂躏所付出的可怕的代价。我的美国同胞们，请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许多邻居的痛苦和辛酸，他们牺牲了最宝贵的财产来赢得我们的自由。

“我们只有工作，只有无限忠心地负起我们面临的責任，才能偿付我们对上帝、对死者和对我们的子孙所欠下的债务。如果我能为未来的几个月向你们提出一个简单的口号的话，那末这个口号就是工作、工作、更多的工作。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来结束这场战争。因为我们的胜利还只有一半。”

然后我又向他們宣讀了另一項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我向日本人指出他們的前途，并提醒他們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們現在有能力把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战斗力量投入太平洋戰場上去。

声明警告說，“日本人民已經感觉到我們的陆海空軍攻势的威力。如果他們的領袖和武装部队企图繼續打下去，我們的攻击力量便会不断增加，打击也将更加頻繁，并将使日本的战争工业生产、造船业以及支持軍事活动的一切东西全部遭到毁灭。

“战争拖得越久，日本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灾难越严重，而这一切痛苦和灾难都是徒劳无益的。在日本的軍事和海軍力量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之前，我們的打击决不停止。

“日本武装力量的无条件投降，对日本人民來說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战争的結束。

“这意味着那些把日本推向今天这个灾难边缘的軍事領袖們的影响的終止。

“这意味着兵士和水手行将回到他們的家庭、田园和工作崗位。

“这也意味着日本人今天的苦难的終止，和胜利迷梦的破灭。

“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或是奴役日本民族。”

記者招待会之后，上午九时，我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說，宣布德国已經投降，并号召他們轉移努力的目标，去完成当前的偉大任务——首先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然后取得和平的胜利。

我說：“如果弗兰克林·罗斯福能够活着看到今天的胜利那就好了。艾森豪威尔將軍告訴我，德国的軍隊已向联合国家投降。自由的旗帜已飄揚全欧……

“我們必須努力工作来医治这个飽受苦难的世界的創伤，来建立基于正义与法律的持久和平。我們只有不辭劳苦地工作，只有

在和平时期像在战时一样，同我們的盟国取得諒解和它們共同努力，才能确立这样的和平。

“未来的任务同我們今天已經幸运地完成的任务比起来，是同样重要，同样迫切，同样困难的。

“我号召每一个美国人坚守自己的工作崗位，直到贏得最后胜利。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放棄自己的工作，或松懈自己的努力。”

在战争的过程中，我曾听到許多关于贊成和反对无条件投降的爭論。德国军队的彻底崩潰和无条件投降本身就結束了这种爭論。

欧洲战争中的三大盟国早在1943年就同意无条件投降。到我当总統的时候，也一直在信守这一原則。在1943年2月的卡薩布兰卡會議上，丘吉尔和罗斯福首先宣布了使敌人无条件投降是作战的基本原則。此后，官方文件屡次肯定了这一点，一直到雅尔塔會議。在雅尔塔會議上，盟国同意尽早地使“德国无条件投降”。

采取无条件投降这一坚定不移政策的理由是很明显的。在雅尔塔會議的时候，盟国知道德国的彻底失敗只是時間問題，他們想使德国人民知道德国军队在戰場上，以及在其他各方面都已被彻底击败。那时德国已遭到巨大的破坏，但是，这样大規模的破坏，不一定等于它在軍事上已經失敗。必須粉碎它的一切軍事力量，而这一点正是盟国所想要使德国人民清楚了解的。

盟国並沒有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事件。当停战协定在1918年11月11日簽訂的时候，德国的军队仍然完整地集結在西綫上，而这条战綫正是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內。德国境內並沒有外国军队，也沒有发生过战斗，甚至协約国的轰炸机对这个国家的損害也很小。

这一切都是具体的，都是德国人民在 1918 年能够亲眼看到的事情。当时他们看不到、认识不到德国军队内部正在解体，这种内部解体使德国军队在不可抗拒的、日益强大的协约国军队面前的继续抵抗归于无效。由于德国人民没有认清这些事实，不久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就大肆叫嚣，说什么德国是被叛徒出卖了。当 1919 年 6 月签订和约的时候，和德国人发生了很多麻烦。纳粹党徒就尽量利用了这个所谓出卖的神话。这是希特勒利用来取得政权的主要把戏之一，因为德意志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五年中，已经深信不疑地认为他们输了这场战争是由于被出卖，而不是由于军事上失败。不过，这一次已经决定使他们无条件投降。盟国要确定不疑地使德国人无法怀疑他们在军事上失败的理由或失败的彻底性。事情是否一定能达到这一步，我还不肯肯定。我们自己也碰到过一些失败，但是在我们心里，经过许多年之后，这些失败就变成不是什么失败了。比方说，我们赢得了 1812 年战争的胜利，可是英国的史册并不承认这一点。

在我看来，这些事情说明民族的自尊心掩盖了军事失败。别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我还认为，从道义和教育的观点出发，坚持无条件投降是一种错误。任何投降都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而投降的，无论这种投降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如果说无条件投降有道理的话，那只是为了占领被战败的国家并且更易于控制的实际目的。

但另一方面，假定德国人及时停止战争，也就是说假定希特勒在适当时机认识到他已经完蛋了，答应由一个新政府来代替自己，并且向盟国投降，那么我也不敢肯定，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过份坚持无条件投降的原则。

德国人投降的良好时机，可能是在俄国人把他们赶出斯大林格勒和西方盟国在意大利和法国登陆之后。假使德国人在那时候投降，整个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恢复就会更快一些。此外，这样也

不会发生德国目前的分裂；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结束时三大盟国的军队进驻德国所造成的。

在未来的任何大规模战争中，有关投降的全部事宜很可能都失去了实际意义；不过，我自己并不这样想。如果不幸将来发生战争，我们可以预料交战国的一方或另一方的要害地区会遭到彻底的破坏，很可能双方都是如此。我们的破坏力极大的新式武器，一定能夷平最大的城市。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很可能从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战，这样一来，交战国一方或迟或早——可能在最初的攻击之后不久——会被迫求和。

到那时，一个老问题就会出现在胜利者面前：他是否想全部占领敌国？如果这样，他就必须继续作战，这样他自己的领土就有遭受原子弹和氢弹攻击的危险。无论如何，尽管新式武器的破坏力巨大，它也不一定能解决现代战争中所经常存在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无论采取什么武器，战争始终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够通过有条件投降的谈判而达到这个目的，就没有必要再进行战争了。我相信，即使对待妄想征服世界的残酷和恐怖的国家，这种办法也是正确的。

我感到可怕的是，可能有人处心积虑地把灭绝整个民族作为政治—军事的目标。在纳粹领导集团中有过这种疯狂的表现，这也可能发生在别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投降的条件就失掉了意义。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有组织的国际努力，我再也想不出还有其他的道路。我认为，这是对付这种恐怖的威胁的唯一办法。

无条件投降这个原则，还产生了一个严重困难，那就是它打乱了划分政治决策和军事决策的界线。冯·克劳斯维茨<sup>①</sup>很早以前就指出过“战争是外交上其他手段的延续”，我们的许多将军以及

---

<sup>①</sup> 冯·克劳斯维茨(Von Clausewitz, 1780—1831), 系德国军事学家。——译者



大部分公众就从这句话得出结论，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一切决策都变成军事性质的。然而，克劳斯维茨除了这句容易被人们记住的话之外，还说了很多话。他说外交和战争两者都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性质是由政治来决定的。

我同三军参谋长召开的会议一向是内容充实和有成效的。这些会议解决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这就是在战争行动中政治考虑是否优先于军事考虑。当然，政府的政策决定军事政策是事实。军人总是从属于政府的。但是，当军事统帅深信某种政治方案在军事上过于冒险、过于划不来或不切合实际的时候，政府就必须考虑军事当局所采取的立场。

在欧洲战争结束阶段，我们就碰到了这类问题。由于我军在中部战线上迅速推进，我们的战线开始超越很早以前就议定的占领区的界线。这就产生了我军向东推进多远的问题，当战争结束时他们应当占领哪条线，以及这一切与占领区的关系问题。

丘吉尔根据政治的理由，坚持在战斗结束以前战线尽可能向东推进。我们的军事首脑基于军事上的理由反对这项政策。

这时，我们的目的是摧毁一切残余的抵抗。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全面向东推进，直到我军与西进的俄国军队会师为止。在这方面，西方盟军并没有承担向东推进多远，或在战斗结束时应据守那条战线的义务。但是，这个问题一方面涉及严重的政治考虑，同时对军事当局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

一切大规模的战略计划不管它是谁制定的，都必须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最后再由总统批准。向前推进或必要时撤退的问题，却等待战区司令官去决定。这使他们能够出其不意地利用敌人的弱点，根据他们的军事判断尽可能远地向前推进。

当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同俄国盟友之间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在政治方面，我们愿意看到我们的界线尽可能向东扩

进。我們早就发现我們实际上已被排除在俄国人所占領的那些国家之外，因此我們有理由怀疑他們目前在德国的意图。但是德国的各个占領区早經协商决定，英国、美国和俄国的軍队在战争结束后都要撤退到指定地区，不管他們在战斗停止时是在什么地方。俄国的以及我們的軍事司令都很明白，对于这些占領区所作的正式决定。

关于占領区的問題，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是丘吉尔4月18日給我的电报。这是几封电报中的一封，在这些封电报中他催促我們的軍队应当尽最大可能向东推进，并且坚决地据守这些地区。事实上，有一段时期，丘吉尔在給罗斯福的函电里也曾坚持这一点。丘吉尔先生本人还为这个問題同軍事当局发生过爭論，特别是同我們的軍事首領，而且在准备发动最后一次大攻势的时候，还为这个总的問題同艾森豪威尔发生了冲突。

这个計劃要求我們的軍队推进到易北河为止。布莱德雷的第十二集团軍担任主攻，直接通过德国中部到易北河，北面蒙哥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軍和南面的德佛斯的第六集团軍在各战区内推进，协助布莱德雷进军。等布莱德雷抵达易北河后，立即向北协助蒙哥馬利攻克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直到律貝克，向南协助德佛斯尽可能攻占奥地利的地区。

丘吉尔希望北方成为主攻方向，由蒙哥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軍担任，并由大量美軍增援。他认为攻克柏林是这次攻势的主要目标。但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我們也支持他。艾森豪威尔认为，自己的計劃在俄国軍队的配合下，将能最好地实现摧毁德国抵抗的总目标。他反对丘吉尔的計劃的理由是，样这做法将在軍事行动中加入政治的考虑。艾森豪威尔认为攻克柏林可能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也是一件困难的工作。而且，柏林是在已經商定的俄国占領区的二百英里之内。

在3月30日，艾森豪威尔將軍曾把这种情况报告給馬歇尔將軍。

他的电报說：“我想指出，柏林已不再是一个特別重要的目标。它对德国人的用途已經大部分被摧毀了，甚至他們的政府也准备迁移他处。目前的重要問題是集中我們的兵力发动一次攻势，攻陷柏林、拯救挪威和获得瑞典港口起运的貨物。这比分散力量要来得快。”

馬歇尔在3月31日經罗斯福批准的复信說：“德国的战事目前已进入由战区司令考虑应采取何种措施的阶段。有意識地不去利用敌人的弱點似乎并不妥当。唯一的目的是取得迅速而彻底的胜利。美国首脑在承认有不屬於盟国远征軍总司令直接考虑的因素的同时，认为他的战略思想是健全的，应当予以充分支持。他应当繼續与苏軍最高司令自由地保持联系。”

丘吉尔对俄国的意图感到忧虑，因而希望占領我們所能占領的一切領土，以便在战后討价还价。他爭辯說，这一切是大規模战略的一部分，是不能放在战争計劃之外的。在他看来，柏林不仅是一个軍事問題，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問題，需要由政府首脑来决定。然而，我們的參謀长联席會議支持艾森豪威尔，而罗斯福又不願干涉作战計劃。

到4月18日，軍事形势已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反映在丘吉尔給我的电报里。4月12日，在布莱德雷指揮下的部队已推进到易北河岸的馬格德堡，而俄国軍隊还在奥得河，距离易北河还有八十英里左右。

4月13日南綫俄軍攻占維也納，到了18日，他們的主力已到达柏林近郊，同日，美国第三軍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的抵抗已接近崩潰，广大地区在等待盟軍去占領。丘吉尔針對这种局面繼續催促我。

在18日的电报中，丘吉尔建議說，由于我軍很快就要跟俄国人会师，应当向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將軍发出如何行动的指示。他指出，各战区司令的職責只涉及他所謂的战术地区；在这些地区我軍应据守已經到达的战綫，除非是作战术上必要的疏散以对付敌人进一步的抵抗。

至于占領区，丘吉尔表示願意遵守原来的協議，但是指出，这一事件在胜利日以后会发生，并且会有一些困难問題要与俄国人討論。丘吉尔又补充說，在1944年的魁北克會議上，关于占領区的决定相当仓促，那时候沒有人能預見我們在德国境內的巨大进展。

这件事使我們得到一个結論，即国家元首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事件作出協議应当非常慎重，因为最后的结果如何是无法預見的。

我花了不少時間来回答这个电报，以便研究整个局势。我了解丘吉尔所苦恼的是什麼。他同俄国人的經驗和我們一样都是难以忍受的。我們明显地看出俄国人的意图，他們不同我們合作，想在他們占領的所有国家中单独行动。事实上，就在这一天我曾为波兰的局势而向斯大林提出抗議。

我仔細地研究了占領区問題。至于德国，委托我們占領的特殊地区是很明确的。拿奥地利來說，我們也負有占領的責任，但具体的地区还未划定。哈里曼从莫斯科向我报告，斯大林告訴他，由于攻占了維也納，現時已有必要确定盟軍在这个城市的占領区；斯大林建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立即到維也納去商談划定占領区的問題。

德国的占領区是由設在倫敦的欧洲諮詢委員會划定的。該委員會于1944年1月成立，旨在研究因战争的发展而产生的問題。我們的代表是魏南特大使，英国代表是威廉·斯特兰爵士，俄国的代表是格塞夫大使。

該委員會作出联合建議送各国政府批准；1944年9月12日，

在軍事当局的帮助下拟定了关于占领区的协定草案。在总的方面，这个草案在同月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为罗斯福和丘吉尔所接受。然而，由于俄国人没有出席，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

1944年11月，欧洲諮詢委员会提出关于三大国占领地区的最后的协定草案。每一国家都有自己的占领区，每一占领区的边界都具体划定，只有柏林是特殊的共同占领区。在雅尔塔，协定草案中所规定的占领区为三大国所接受。同时在雅尔塔还规定了第四占领区，即法国的占领区，有关细节由諮詢委员会拟定。

因此，我们在占领区问题上所承担的义务是一个既定事实，而我国政府自雅尔塔会议以来也一直在这个基础上行事。美国首脑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策划最后一次大攻势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一点，而且我们的军事首脑早已制定出在我国的占领区中军事政府的行政计划。

总的政策是由一个部长级的委员会制定的。这个委员会由国务卿、陆军部长和财政部长组成，它是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遵照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为执行雅尔塔的决定而成立的。

研究了这种局势之后，我看不出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来怀疑我们所十分明确承担的协定，也看不出干涉成功的军事行动有什么好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严格地遵守我们的协定，并尽最大的努力使俄国人也执行这个协定。

我抱着这种思想在4月23日复电丘吉尔。这封电报包括致斯大林的一个建议的草稿（如果丘吉尔同意的话），该建议概括地说明武装力量在进占各地区时所应遵守的秩序。

第二天我接到丘吉尔的复电。他大部分同意我给斯大林的建议，但对开头一部分表示不满意；在这一部分中，我建议一旦军事形势许可，军队应立即撤退到原来指定占领的地区。他说，这意味着在其他问题尚未解决之前，美国军队在中部撤退一百五十英里

左右，把大片領土交給俄國人。

艾森豪威爾在4月23日的電報中，對於正在發展中的許多問題作了一些說明，這些問題涉及俄國與我軍會師時的程序。

艾森豪威爾的電報說：“……我不大明白，為什麼首相這樣堅決要把政治因素和軍事因素混在一起，而企圖在我軍與俄國軍隊會師時制定行動程序。我最初提交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很簡單，但我以為那個建議提供了很合理的部署。

“我提出那個建議的理由之一是，俄國人可能在我們強渡易北河之前到達丹麥半島，我需要一個在我的請求下就可以使他們撤出這個地區的規定。我們將處於俄國佔領區中的唯一地區是現在美國軍隊所據守的地區。

“我的確看不出俄國人將專斷地要求我們立即撤出這個地區（如果他們這樣做，我將停止我軍在兩翼的攻勢），如果他們採取強硬立場，並照會我們，他們將直接向他們的佔領區的邊緣推進，美國軍隊將要感到非常為難。如我所說，這種恐懼是多餘的，不過我希望保護我所屬的司令官不致遇到意外和憂慮。

“我們正忙於調動工作，和忙於制定佔領德國境內美國佔領區的全部計劃。

“我已在電報中報告您關於我對於劃歸法國佔領地區的建議。史密斯已與朱恩會談，法國並不斤斤計較我們要求它放棄的地區。

“然而，他們對於英國拒絕他們佔領萊茵蘭直到科隆一帶感到非常憤慨。我懷疑在這一點上有某種幕後的政治鬥爭，關於這些我全無所知。

“我注意到調動計劃只會加劇目前存在着的關於後勤部队的混亂。我們如果要滿足目前的要求，對於修整和建設連隊以及許多類似部队的需要將比過去任何時期增多。況且，他們在太平洋地區也同樣需要這些部队，以便為戰鬥師的到達作好準備。”

我在4月26日打电报給丘吉尔，趁便指出現在在苏联占領区的軍隊是美国軍隊，并指出任何撤退到各个占領区的协定都要經三大国的同意。我还把修改过的致斯大林的电报請他考虑，第二天他同意这个电报并发給斯大林。同一天我也給斯大林一封电报，說丘吉尔給他的那封电报是經過我同意的。直到5月2日斯大林才复电。他說，俄国将照我們所建議的办法行事。

同时，我軍到达捷克斯洛伐克又使局势改观。4月23日我国駐倫敦大使館接到英国外交部的照会，在照会中艾登表示，从政治上来說，由美軍去解放布拉格是一件莫大的好事。照会接着說，捷克斯洛伐克由一个西方盟国去解放显然對我們有利，这还将帮助在該国建立我們的使团。

4月30日丘吉尔就这件事发給我一封电报。他爭辯說，解放布拉格以及尽可能地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方，将影响这个国家的战后局势，还可能影响邻近国家的局势。丘吉尔指出，这个建議并无意妨碍对德作战的主要活动，但应提醒艾森豪威尔重視这个建議。

丘吉尔还补充說，他已經指令英国參謀总部要求美国參謀长联席會議通知艾森豪威尔，在有机会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时，他不应放过这种机会。丘吉尔說，他希望这将得到我的同意。

我国国务院也有同样的看法。代理国务卿格魯給我一一份备忘录，建議參謀长联席會議慎重考虑这个意見。他的理由大致相同。如果我軍能推进到穿过布拉格市的摩尔道河，那末在我們与俄国人打交道时，就有某种討价还价的本錢。

第三軍已沿多瑙河深入上奥地利；奥地利的这一部分可能成为我国的占領区。然而俄国也很可能要求占領这地区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能全部占領摩尔道河，那在我們与苏联政府談判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时就会处于很有利的地位。格魯补充說，这

主要应由軍事当局考虑决定。

我要求我們的軍事領袖估計局勢，并把丘吉尔要求我們攻占布拉格和尽可能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領土的建議轉告艾森豪威尔，要他考虑。5月1日我給丘吉尔下列的答复：

“我对于目前艾森豪威尔將軍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态度表示同意。他的态度如下：

“引文。苏联參謀总部正在考虑向弗尔塔瓦河谷推进。我的計劃是，只要目前的作战行动許可，就繼續摧毀任何有組織的德軍的殘部。

“如果在这以后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是合乎要求的，同时这里的情况又許可这样做，我們当然首先向比尔森和卡尔斯巴德<sup>①</sup>推进。我将不采取任何我认为在軍事上不明智的行动。”

我們的參謀长联席會議同意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我們的一切軍事計劃向来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决不让我們的軍隊去冒不必要的危險。我們的东进計劃始終注意到这一点。至于究竟前进多远，而不使我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則由各个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將軍及其參謀人員决定。

丘吉尔經常催促我們尽可能在欧洲保持强大的軍事实力。他希望在欧洲大陆上尽可能有一支强大的軍隊，以便与俄国的大量軍隊相抗衡。然而，我們必須考虑到，在击败德国之后还有日本存在。要使日本投降，那就需要把許多軍隊調到太平洋地区去。不錯，我同意丘吉尔所說的，占領柏林、布拉格和維也納是一件称心的事，但事实是，这些城市，正如东欧的国家一样，是在俄国的控制之下或行将落入它的控制之中。俄国人处于有利的地位，他們也明白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他們坚持他們的立場，我們也可以坚持我

---

<sup>①</sup> 在布拉格西北一百三十公里，又名卡尔洛維—伐里(Karlovy Vary)。



們的立場。我們的立場是遵守我們的協定，並且堅持要他們也這樣做。我所謂堅持井然有序的程序，就是要堅持重要的細節。

還有維也納問題。4月30日，丘吉爾發給我一封電報說，他為奧地利的局勢擔心。俄國人未征求我們的同意，而且也不顧我們的抗議，已經在維也納建立了以卡爾·倫納為首的臨時政府。他們也拒絕我們的使團進入維也納。

丘吉爾對倫納本人並不反對，但是他怕俄國人玩弄他們的老把戲，組織一個適合於他們自己的政府，他沒有建議派軍隊到維也納去，而是建議致電斯大林表示抗議。致斯大林的電報初稿隨同丘吉爾的電報一同發來。我在當天就答復了丘吉爾，說明我已於當天按照他的意思向莫斯科發了表示抗議的電報。

我給斯大林的電報有一段這樣說：“本政府按照雅爾塔協定關於解放歐洲的精神，正準備坦率誠懇地與蘇聯政府商談關於倫納的建議，但據報道，奧地利臨時政府竟已在蘇聯占領的奧地利地區成立，這使我們不勝驚異。事態的這種發展只有在蘇聯當局的充分諒解和許可之下才能在該地區出現。

“然而，他們並沒有同我們商量，除開在您最近的電報中稍稍談到一點外，既沒有通知我們，也沒有給我們時間以便在倫納臨時政權成立之前跟他們協商。這件事情的詳細情況我們是從報紙上知道的。

“我們相信，蘇聯政府的意圖仍然是：奧地利的最高權力由四大國在平等的基础上、通過目前提交歐洲諮詢委員會審查的關於管制機構的建議中所規定的盟國聯合組成的軍事政府共同執行，‘直到由四大國所承認的奧地利政府成立為止。’

“為了按照克里米亞協定有關奧地利部分與蘇聯當局進行有效的合作，鑑於這種發展，就更有必要使盟國代表如斯大林元帥所建議的那樣立即赴維也納，同時關於占領區和管制機構的議定書

由欧洲諮詢委员会从速完成。”

俄国人想在維也納使用他們的老一套的策略。他們說，在欧洲諮詢委员会关于占領区問題未达成協議之前，我們的代表是不受欢迎的。很明显，除非委员会去当地視察，关于占領区問題是不可能达成協議的。5月1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要求他允許盟国代表立即飞往維也納。5月3日，我也給斯大林以同样的电报。

最后我們达到了目的。我們坚持完成一件具体的事情，因为这是我們在协定中所载明的权利。我怀疑提出不着边际的要求，是否能得到任何进展，那将給他們以过多的托詞。

5月6日，丘吉尔在电报中再一次要求据守我們的战綫。这时我們的战綫已扩展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我认为这件事情已經交給軍事当局，他們可以决定哪些地方可以安全地前进或据守。我体会到丘吉尔的意思，并且完全同意他对于未来問題的看法。但是在方法上，我不能跟着他走。像以前一样，他希望我們尽可能地保持全部領土，然后向俄国人表示，我們必須拿出或保留的是多少。他认为現在已經到了电訊往还不发生作用的时候，三国的政府首脑有必要进行会谈。我完全贊同他这个意見。5月9日，我发給他下面一封电报。

“我同意您的意見，三国政府首脑的會議将有利于着手解决三国政府共同关心的，并且尚未作出决定或达成共同諒解的問題。

“我很願意这个召开三国會議的邀請由斯大林元帅提出，而不是由我們两人中的任何一人发起。也許您有某种办法可以促使斯大林建議，或要求召开这样一个會議。

“同时，我目前的意图是坚持我們对于雅尔塔协定的解釋，并坚持我們目前对于一切存在的問題所宣布的态度。

“为了給在不久将来可能召开的三国會議作好准备，我很希望您能把您认为我們有必要或适于提出討論的問題列表告訴我并希

望将关于会议地点的建议通知我。

“现在斯大林似乎没有正当理由可以拒绝到西方来和我们会谈了。

“至于会谈时间，在本会计年度结束（6月30日）前，我很难抽出时间离开华盛顿，但是在这个日期之后，我很有可能离开。”

.....

## 第九章

### 租借法案的終止

在德國投降以前的十天中，我曾經不斷地和各閣員和三軍參謀長談話，研究應把哪些部隊和供應物資送往遠東。最後決定，凡是在火綫上參加戰鬥不多的師團和部隊，應首先從歐洲調往太平洋。

我們不能忘記，我們需要有足夠的占領歐洲的部隊，這不僅是為了維持被打敗的敵人的國土上的法律和秩序，也為了防止一些小希特勒之流策動的任何暴動事件，因為這些人是可能煽起瘋狂的民族主義火焰的。

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我們本國的經濟，我當時一直在擬訂一個詳盡的計劃並進行各項研究工作，考慮我們怎樣能有条不紊地把一個以軍需為基礎的經濟轉為民用經濟。

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到充滿飢饉和混亂的遭到蹂躪的歐洲的問題。在戰爭中的難民和流離失所的人必須予以安置。

歐洲的戰事一旦結束，我們在許多方面都需要重新計劃，現有的政府機構，無論普通部門和軍事部門，各項工作都需要重新部署。

我們目前的工業力量是十分雄厚的，我們可以同時供應各個戰場的需要。因此，在歐洲的戰事結束後，便會留下大量的剩餘生產設備。我們必須立即考慮如何把某些軍需生產工廠改為民用工廠。

我們現在已開始感覺到，我們主要食品的供應越來越不足。而

另一方面，往国外輸送粮食的要求却越来越多。例如，糖的供应就十分缺乏，因此，我們不得不发出严厉的命令，把消費者的分配定量削減25%。

不能不全部依靠現有的糖的生产，二十多年来这在我們还是第一次，因为所有剩余产品都消耗完了。

当物資越来越缺乏、而定量分配越来越紧的时候，許多地区滋长着埋怨物价管制局的情緒，国会里面也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評。

5月1日那天，我召請物价管制局局长切斯特·鮑尔斯来白宫会商当前局势。鮑尔斯指出，国会的批評和有些地区对定量分配的抗拒，已經使得他难于繼續領導管制局的工作。他的許多高級官員都不想干下去了。好些重要職員已經辞职。我告訴鮑尔斯說，我认为物价管制局所受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效劳的院外人士，我觉得当我們还在爭取战争胜利的时候，人民也好，国会也好，都不会轉过来反对物价管制局。我对鮑尔斯的才干、耐心和有卓越的行政工作表示贊揚，并告訴他，就在这一天，我将向公众发布一个文告，說明物价管制局怎样在爭取战争胜利和保持国内經濟稳定方面作出了貢獻。

在这个文告中，我強調指出了繼續保存物价管制局的必要性，尽管我也了解人民在实行定量分配的情况下自然会产生一种厌烦的情緒，企业界人士、农民和商人在听到自己的产品只能按照什么价錢出卖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完全正常的憤懣情緒。这个跟每一个公民的生活都有密切关系的物价管制局，仍然是迫切需要的，这不但是为了保持国内的經濟平衡，而且也为了补充我們盟国的极其枯竭的資源和供应品。要是我們打算防止无政府状态、暴动和疾疫的話，我們就必须援助解放了的地区的千百万人民。

我知道物价管制局犯过一些錯誤。但是我也知道物价管制計

划在防止毫无约束的通货膨胀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其他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曾经带来了混乱和暴政。物价管制局在美国进行了遏制通货膨胀的工作，从而保持了我們国家的健康和稳定。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尽管我国绝大多数公民在战争期间都能抛弃私利，但有些人却并不是这样。

例如，联合煤矿工人工会领袖约翰·路易斯就不顾我们是处于战争期间这一事实，而发出了罢工令。我們目前正处在文明史上的一次空前严重的斗争中。战士們在前线拚命。我国公民都束紧着裤带，忍受一切牺牲，为的是要拯救世界，使其不受暴君的统治。资方和劳方都在尽可能地减少争吵而获得妥协和调整。大多数工会在表示忍让和提出交换条件方面作出了良好的榜样，有些工会还派了自己最优秀的干部协助政府进行工作，防止工业方面的脱节现象。但是，约翰·路易斯却一点也不考虑国家将受到怎样的影响，竟然下令叫他的矿工罢工。这次罢工最不可原谅的是，似乎刘易斯所最热中的是力图词严义正地恐吓政府和威胁美国总统，而并不是为了矿工的福利。他似乎相信，只要他能使用压力，迫使政府接受他的条件，他就能够影响其他工会，使这些工会服从他的领导。

这种行为我是不能容忍的。煤矿工人的罢工将会严重地危害战争中的各项工作，这是我們不能容许的。路易斯采取这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这是极无耻的。

这次危机起因于美国联合煤矿工人工会和无烟煤矿主间的一场劳资争议。全国战时劳工局为此曾经在1945年4月20日发布一道临时命令。根据这项命令，争执双方应当按照过去实行的合同条款和条件，继续进行煤的生产，直到争执的问题获得解决。

战时劳工局在1945年5月1日举行了一次公开听证会，并批准了这项命令。无烟煤矿主立即接受了这项命令。但是，工会方

面却没有答复，远远超过三百个以上的无烟煤矿的罢工运动，仍在继续进行。

很明显，这些矿区生产的煤对于战时物资的生产和国内的消费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经济稳定局局长威廉·戴维森建议由政府掌管这些煤矿，使生产得以继续进行。司法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都表示同意，战时动员局局长弗雷德·文森也表示同意。

我批准了这项建议并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责令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接收了所有生产作业已中断或有中断危险的煤矿。实际上，这只是为了让原来的工人继续工作，不过他们现在是为政府工作罢了。我并不认为政府应当经营私人企业，但是为了打击像约翰·路易斯这样的公然挑衅，就不能不采取这种措施。

现在不是搞乱我们的生产和经济的时候。我们行将面临重新恢复民用生产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军备和生产计划的某些方面已经达到可以把政府的支出和合同上的规定加以削减的水平。当我一旦看到这样做不会妨害我们全力向日本进攻的时候，我便立即在5月2日向国会建议，从拟订中的1946年会计年度的预算中削减七十四亿四千五百万美元。我建议，其中绝大部分——七十亿可以从削减海运委员会的建筑费用中取得。

我要求财政部长摩根索就我国的税收情况作仔细的研究，以便在最短时间内能和我讨论一下减少赋税的问题。第二天我收到摩根索部长这样一封短信：

“我愿意告诉您，在我获悉您对联邦政府的支出所作的一些削减，我是如何的高兴。

“您的这项建议一定会对消除通货膨胀产生极有益的影响，而且也会有助于我国即将开展的第七次战时公债征募运动。”

在整个战争年代中，我国的农场一直是丰收的。当我国和我们的盟国迫切需要农产品的时候，我们能有那么无比丰盛的收成，

这是极幸运的。然而，1945年，我們在农业生产方面却面临着新的需要。解放后的欧洲实际上处在饥饿中。許多地区的土地沒有种什么东西，或者是种上的庄稼遭到了破坏，而在許多情况下，由于季节已过，已无法补种。

但是，我还是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一项关于延緩农业工人服兵役的決議。我认为在战争期間每一个公民都有为自己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沒有哪些群众应当享受特权。我在5月3日否决这项議案的咨文中說，国会曾經在1940年的甄选訓練和兵役法中明智地規定，个人不得按职业性质获得延緩服役期限。不到三小时之后，众議院以一百八十五票对一百七十七票希望撤銷我的否决，但这个比例距离規定的三分之二票数还远得很，因此我的否决依然成立。

此外，南半球方面正在发生旱災。这意味着更加需要我国的供应。众議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調查粮食缺乏的情况，主席是新墨西哥州的克林頓·安德森。5月2日，我請安德森議員和該委员会的其他成員到白宮和我会商。我們討論了应付这一局势的办法。随安德森来自宮的有斯提文·佩斯、厄尔·克萊門茨、克里斯琴·赫脫、馬丁·高尔斯基、奧古斯特·安德森和哈尔·霍姆斯等議員。

当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使我不能不予以注意的时候，国内还有艰巨的任务，也需要立即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

我在5月4日跟預算局局长哈罗德·史密斯第二次会晤时商討了这方面的問題。

我一面談到公众对削減預算的良好反应，一面也向史密斯指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对于削減現金方面的开支和减少过去曾經批准而現在已不再需要的合同所指定的款項二者間的区别，还有些模糊不清。

史密斯首先报告說，紅十字会正在发出紧急呼吁，請求政府撥



款，以補助該會募款之不足。我對他說，我仍然保持原來的看法：美國紅十字會不應當使用或花費政府的經費，而應當採取自動捐助的辦法來募集款項。

這位預算局長接着提到有關五千九百萬美元的那筆總統資金的問題，他說其中一千二百萬元用於國外情報工作，是一筆不用通過正式報銷手續就可以開銷的款項。我告訴史密斯說，我不希望增加這筆款項，同時我希望得到一份有關從事情報工作的一切機構和單位的研究報告。

我告訴他，我對我國情報工作的一些看法和對這種工作中的某些方面所憂慮的事情。我重復說明這樣一點：

“我最反對建立一種‘蓋世太保’制度，”我對他說。

他請示關於參議院提出的撥付大批款項以修建橫跨美國大陸的航空站網這一議案的問題。參議員帕特·麥卡倫（內華達州）正在努力使這一議案獲得通過，民用航空局支持這一議案。

我告訴他說，這是一個壞的議案，民航局的報告也不好。我反對這個議案，理由是這樣的議案會導致“政治分肥的”立法。

隨後我轉到另一個我認為應當立即設法解決的問題：改組政府行政部門，以增加工作效率。目前職權重復，推卸責任以及混亂和浪費的地方實在太多了。由於戰爭的關係，政府的負擔越來越重，許多這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對史密斯說得非常清楚，我想建立一個職權劃分得完全明確的政府體系，以便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找到直接負責人。我的意思是要把責任交給那些遴選派定的各個部門和單位的首長，但是我希望我能處在這樣一種地位：使這些人都確實按照我的政策方針辦事。

因此我命令史密斯立即着手草擬一項致國會的關於改組政府機構法案的咨文，請求國會授與總統必要的權力來進行必要的改革。當然，我所建議的那些改革，在一定時間內，國會有權加以否

决。我也想改组白宫的机构,改变它同政府其他部门互相沟通和联系的方式。为此,我要史密斯也研究一下总统办公厅的组织机构。

国会对于改组政府机构的问题一向是感到有些棘手的。立法部门很少主动提出改革的建议,为了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改革,就必须大力地督促。史密斯微笑着向我说,现在把改组机构的建议送往国会可能正是时候,因为“他们目前正在向您表示好感和支持”。

我以比较现实的态度提醒他不要太相信国会当时对我的赞扬,尽管我十分感激他们这种好意。我知道,国会和总统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争执的,这种赞扬迟早是会被人遗忘的。

我从前曾经和预算局长讨论过改组劳工部的问题。现在我要他提出一个有关这次改组的详细研究报告,并在6月16日完成,因为那天将是新劳工部长就职的日子。

我提出是否已经到了建立一个福利部的时候这一问题,因为联邦安全局已经扩大得超过了成立时预定的范围。我们必须使白领工人和农民也能享受社会保险。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范围必须扩大。我想如果成立一个由内阁阁员领导的福利部,所有这些事情就会办得很好,因此我请史密斯就这个意见进行研究。

在我们的商谈将结束的时候,我谈到了我经常关怀的并对国家的前途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问题:河流管理机构的发展问题。我告诉史密斯,我过一个时候再定期和他研究这个问题,希望他届时提出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研究报告。

在我和史密斯商谈政府组织问题后不几天,我就在权力下放问题上第一次得到了不愉快的教训。

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欧·克劳利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魯在5月8日内阁会议后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他们手里有一个有关租借法案的重要命令,已由罗斯福总统批准但没有经他签署。这是一道授权对外经济管理局和国务院在德国投降时采取联合行动以

削減租借物資供應量的命令。他們對我說的一切我都覺得很好；一旦德國退出戰爭，就應當減少租借物資。他們要我簽署這道命令。我拿起筆，也沒有看命令的本文，就簽了個字。

暴風雨差不多馬上就來了。執行這一命令所用的語氣是很有問題的。克勞利按照字面上的解釋去做，竟下令禁止把一切物資運往俄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甚至還要某些船隻中途開回美國港口卸貨。英國受到的打擊最大，但俄國人則說這一着特別是針對他們來的。由於當時我們正在以大量食品、衣服、武器和軍火供給俄國，這樣突如其來地中斷租借法案的援助，當然會引起俄國對我們的大肆攻擊。俄國人抱怨我國的不友好態度。我們很不明智地給了斯大林一個口實，他無疑會不放鬆每一個機會來提起這件事情的。歐洲其他國家的政府則抱怨中斷得太突然了。結果我只得撤銷這項命令。

我覺得克勞利和格魯在我執政初期就給我上了一課——當我簽署一個文件的時候，總應當知道它的內容是什麼。這次經驗使我認識到，我不但應當清楚地知道我是朝着什麼地方走，而且應當知道我的基本政策是否在執行。如果像我所應當作的那樣，讀過那項命令，這次事件是會發生的。但是，最好還是在我開始執行總統任務的時候就受到這個教訓。

這是我對於權力下放但自己仍舊負着責任這一問題的初次體驗。總統的職務是如此的繁重，有些事情勢必授權別人去做。但是，要使這樣做而不出問題，他周圍就必須擁有一些可以信賴而不擅自弄權的人。

最後我的周圍有了許多不弄權的同僚和助手，他們都是可以信賴的人。我的最高方針：總統遵照法律執行政府的任務。事實就是如此，一旦不這樣做，就會產生混亂。

關於租借法案這件事，造成了嚴重的局面。突然停止供應租借

物資，显然是克劳利和格魯的一种制訂政策的作法。计划在最后停止对俄国和其他国家的租借物資供应，这当然是完全恰当和正确的，但是这应当一步一步来，这样才不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們在故意冷落某些人。无論如何，我們同俄国人在雅尔塔好不容易簽訂了一个協議，他們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出兵打日本。当时美国对俄国是表示友好的，因为俄国人虽然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作战，但在对德战争中毕竟拯救了我国不少的生命。当时摆在中国的日本軍隊还有一百多万人，他們准备在那里长期打下去。我們迫切希望俄国人对日本作战，因为他們的国家同中国接壤，而他們的铁路則同欧洲連在一起。日本当时已經控制了中国从大連到香港的全部海港。

鉴于这种情况，我澄清了政府的态度。在5月23日的一次新聞和广播記者招待会上，我解釋說，克劳利所执行的命令的原意，并不是要一下子停止各种运物，而只是要逐步适应德国崩潰后的新情况。我同时表明，所有按照双方条約或議定书分配的物資，都将继续供应，其他各項义务，也将一一履行。

当5月27日哈里·霍浦金斯同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会談的时候，这位俄国領袖便提到了租借法案的問題，并且以这件事为例，說明美国在看到德国显然已告失敗的情况下对苏联的冷淡态度。斯大林說，这种中止租借法案的做法是很不幸的。他說，如果这种拒絕繼續执行租借法案的办法是用来向俄国人施加压力，使他們軟化，那是一个重大的錯誤。霍浦金斯力图使斯大林相信，情况并不是这样。

俄国人对于英国或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一向都是表示怀疑的。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前閱讀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間、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間以及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間就波兰問題、南斯拉夫局势和爭取在打敗德国以前跟意大利进行和談的問題所交換的大批函电

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例证。从斯大林的函电中，常常可以看出他在怀疑我们要和英国人进行双边协商，而把俄国人抛开。突然停止租借法案供应的事情又一次给予俄国人一个机会，谴责美国企图牺牲俄国人的利益来破坏三国为寻求和平所做的努力。不过，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采取友好和合作的方式同俄国人打交道。

英国对在“欧洲胜利日”以后从美国获得的援助日益减少这一前景也立即感到不安。英国要求继续执行租借法案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根据1944年9月14日魁北克会议上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的一次谈话。在这次会议上，虽然罗斯福总统概括地说美国愿意在打败德国后给予英国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他并没有在租借法案中所规定的任务以外另外承担什么具体任务。但是，他和丘吉尔同意成立一个由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副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当时还是副国务卿）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欧·克劳利组成的美国委员会，同英国的一个委员会商讨关于英国的国际金融地位问题和怎样为英帝国安排租借物资的问题。

英国现在向这个委员会提出申诉。魁北克委员会在经过好几个月的讨论以后，曾经提交罗斯福总统一个意见书，然后便认为这个委员会不再存在了。1945年5月下半月，曾经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摩根索部长通知我说，他收到了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安德逊爵士和奥利佛·利特耳顿先生一封紧急信。在这封信里面，这两位先生表示很耽心根据租借法案即将分配给英国的物资不足应付他们的需要。他们这样提的根据是，在初步的讨论中，我国陆军部的官员们向英国人表示过，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自己受前一年秋季魁北克协议中的原则的限制。

5月28日，英国政府送来了第二个更加紧急的关于继续给予租借物资援助的呼吁书——这次是以丘吉尔首相私人名义拍来的电报。

电报說：“当其他許多更为严重的問題还待处理的时候，我拍来这个电报麻煩您，深感內疚。但是，在这一問題上，整个机器已陷于停頓，現在各方面都感到必須由我向您提出这个問題。

“1944年9月我和罗斯福总統在魁北克会晤的时候，我們二人曾經就击败德国后的租借法案問題达成初步協議。根据这一協議，曾由凱恩斯—辛克莱代表团会同您的行政人員草拟了一个詳細的方案。而我們的一些生产計劃就是根据这个方案制訂出来的。

“我現在听說貴陸軍部的官員曾經告訴我們在華盛頓的人員，說政府撥給美国空軍部队的經費将大大削減，以至供应我国的物資也只好大大削減到去年秋季双方同意的計劃以下。当然，这許多需要是可以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而加以修改的。我希望去年秋季业經双方同意的各項需要現在可以减少，但是其中各項細節則須由我們两国參謀长的会商，而这次会商在5月31日以前是結束不了的。同时我还希望能让您方的人員知道，您的前任总統和我在魁北克所同意的一些原則应当維持，具体地說，應該撥給貴陸軍部足够的經費，以滿足我国在我們双方最后制訂的方案中所提出的各項需要。”

租借法案政策在英美双方面都必須加以澄清，这已变得越来越明显了。5月31日，我收到由下列五位国会議員署名的一封信：罗伯特·奇伯菲尔德、約翰·伏利斯，卡尔·蒙特、巴特尔·琼克曼和劳倫斯·史密斯。这封信說，总統的声明以及副国务卿格魯和利欧·克劳利的声明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使总統关于“欧洲胜利日”后的租借法案政策得到澄清，反而使它变得模糊了。我在6月15日回答了这五位国会議員，并請他們参看下列几段文字，这些都是从6月4日我寄給众議院議長的一封信中摘录下来的：

“对日本作战，正同对德国作战一样，有賴于同盟国家的通力合作。通过供应租借物资和取得对方的租借物资的办法，我們就能繼續把我国的資源和同盟国家的資源聚集一起，从而使我們結合起来的巨大力量能够用来对殘敌作战。只要租借法案中的資金能使我們盟国所作的努力更卓有成效，我們就一定使用这笔資金。當我們从欧洲重新部署我們的軍隊或由于我們要控制敌人的地区而需要其他国家援助的时候，租借法案即当予以实施，以便使这些国家都能尽量投入战斗。同样，通过相互实施租借法案，我們可以指望我們的盟国給予我們一切可能的援助。

“根据已經改变了的战局，我們曾經对給予个别国家租借物资的援助办法作了初步的檢查。在未来的年月中，当战事不断进展而我們盟国的需要和它們在战争中的地位也随着变化的时候，我們还必须經常作随时的檢查。因此，我們提出的任何計劃，都只能认为是試驗性质的。

“我們最近同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簽訂的租借协定，将根据战局的变化和租借物资援助在战时的基本目的，运用租借法案中的資金充分予以实施。除此以外，我建議由进出口銀行資助这些盟国以必要的装备和供应品。”

困难之一是我們决不可能使国会批准整个战争时期租借法案的資金。国会对于每一笔用于租借物资的經費在時間上都是有限制的，辯論和听取意見的全套程序每年都要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众議院也好，參議院也好，总会有人提出抵制的意見，阻碍租借法案的执行，或者在租借法案的行政管理方面进行一些重新調整。我始終无法使国会了解，这些办法实质上是在破坏我們为了贏得战争所作的努力。

我曾經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問題；一是从參議員的角度，一是从总统的角度。我和薩姆·雷朋議長曾經用我們彼此都了解的語

言討論过這個問題。我也能够同財政委員會的主席商談；有关租借法案的立法就是这个委員會制訂的。由于我在參議院具有經驗，因此能够删除一些修正的条文，如果保留这些条文，則勢将使这一法律变得毫无用处。事实上，有些国会議員本来就是想使它毫无用处的。

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授予总统的战时大权是很多的，但这些权力只在战争延續时是有效的。国会十分关心它那抓紧錢荷包的权利，租借物資的經費問題就是例子。在一个共和国里，当这个共和国并非处在危險状态的时候，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总觉得，像租借法案这类問題，还是应当一次就批准整个战争时期所需要的經費。我也并不是在担任总统之后才知道这一点。很早以前，我根据自己在杜魯門委員會所作的調查，就曾經一度在參議院的會議上发表过这种意見。这不过是普通常識，然而有时候常識却并不能贏得立法。

众議院的議長是知道我所努力追求的目标的，但他的周围有四百三十五名議員，他必須經常动脑筋应付他們，使政府能得到他們必要的协助，来进行一切工作。每一位議長总会要受到一些想在自己家乡的報紙上大出風头的人士的干預。有許多建議往往实际上是对国計民生有害的，但这些建議在他家乡的人看来可能很好，因為他們不一定了解全面情况。

我在回答那五位国会議員的信中說，“我当然完全同意你們的意見；租借法案并未批准对战后的救濟、恢复和建設进行援助；在取消任何战时租借法案供应协定的时候，凡是不再为战争需要的各种物資的轉移，应一律按付款办法处理。”

然而，問題还没有完。在6月7日的參謀长联席會議上，英国的官員接到通知，除了用于对日作战，法律上已无权再分配任何租借法案的物資給他們。威廉·李海海軍上将向我报告說，6月29



日他和克劳利会談的时候，又提到了这个問題，克劳利完全同意參謀长联席會議的說法，而且希望总统就这件事給他一个具体的指示。

据李海說，国务院和陆軍方面都希望繼續給予欧洲租借法案的援助，特别是供法国駐扎在德国的占領軍使用。担任战时动员和复員局局长的弗雷德·文森贊成国务院和陆軍方面的意見。

为了适应“欧洲胜利日”以后一年的需要，在提交国会的租借法案經費預算中，开列了一笔附有条件的款項九亿三千五百万美元，这是为了可能提出的俄国租借計劃而准备的。如果俄国不参加对日作战，那末在这笔款項中，只需花費很小一部分我們就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如果俄国很快地參战，那末这笔款項恐怕还不足以应付它来年的需要。我于是指令对外經濟管理局同軍事当局密切合作并在它的指揮下应付俄国方面的問題。

直到現在，我們以租借法案的方式給予中国的援助还是很少的，因为运输困难。中国現在的需要量十分巨大，当时我們觉得，中国所要求的很大一部分供应物資都会有效地用于軍事目的。但是，由于运输方面的困难，来年只好暫定为以五亿美元为限。如果由于战局的发展，事实证明可以更多地輸送一些物資，那显然是应当大大增加援助中国的計劃的。

在預算中，沒有关于可以用租借法案来援助意大利的直接規定，但按照陆軍方面的规划，国会批准从租借法案經費中轉撥一千万美元給陆軍司令部，允許它繼續执行其預防疾病和騷扰的計劃，从8月31日起算，限期四个月。在这个时期以內，陆軍司令部拿自己的經費来执行自己的計劃。

除了同时被批准的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意大利进行救济工作的五千万美元以外，沒有其他經費，只有轉撥給陆軍方面用来应付意大利局面的这笔款項。这就使我們必須在租借法案的規定

以外再制訂一个善后救济計劃。

在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我們沒有租借法案的規定，因为这些国家既沒有一个参加对日作战，也沒有一个帮助美国军队进行重新調配的工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这些国家是在进行救济工作的，但只限于局部的、紧急的救济，而沒有設法使这些国家能够有力量获得必要的物資和供应品，来恢复自己的工业和交通運輸。

为了应付这些情况，我提出了关于扩大进出口銀行业务的意見。我建議增加該銀行的貸款总額到三十五亿，这样就使我們在未來的一年中可多貸出二十八亿美元。我相信，这个数字是足够应付这一期間的合理需要的。我认为，一旦我們在把这笔錢貸給战后的欧洲方面取得某些經驗，我們就会处于一种有利得多的地位，来向国会提出一个明智的办法，以解决許多欧洲国家都需要經濟援助的問題。

我的計劃是到国会去請求核准适应每年需要所不可少的經費，而不是要去承担長時間的义务，因为这会使我国担負起用長时期支付款項的办法来資助外国的責任。

我把我在战时請求賦予的权力同在和平时期希望拥有的权力作了根本的區別。正如我在前面就租借法案經費問題所提到的，我一直认为国会应当賦予总统整个战争时期的权力，而用不着每到一定的时期就重新修改立法。

当一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的时候，負有贏得战争的責任的領袖应当拥有可以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各种武器。我觉得，为了应付欧洲战后的需要，美国必須推行一个各方面互相配合得很好的政策，而不是力图采取濫用租借法案的办法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当这场战争成为过去，而战时紧急权力也可以宣告終止的时候，我們就面临着要在全世界許多地区进行善后工作的問題。但

是恢复欧洲的计划同战时的租借法案完全是两回事。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根据我们能够送交国会的资料来处理,并随着经济情况的改善而将这种资料逐年加以审查。

租借法案的历史是天才的弗兰克林·罗斯福的伟大成绩。一个做总统的人是决不可能使国会一下子就把四百二十亿美元贷给外国的——那怕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就像他不可能飞上月球一样。但是,罗斯福想出租借法案的办法,居然达到了这个目的。毫无疑问,租借法案所花费的钱拯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通过租借法案而装备起来的每一个俄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士兵,当他们投入战斗的时候,就会大大减少我国的青年在争取战争胜利中所面临的危险。我们无法收回这笔款,但我们所拯救的许多人今天都还在这儿,在美国活着。

## 第十章

### 我們和戴高乐与铁托的糾葛

我現在首先所想到的是怎样能够很快地結束太平洋的战争，我当然要去問一問馬歇尔將軍和陸軍部长史汀生。从我們参战的时候起，馬歇尔一直就是我們在欧洲和太平洋方面的主要战略家。美国 and 整个自由世界都应当感激他的輝煌的計劃和在执行这些計劃时的神机妙算。我对史汀生的經驗和判断能力也很欽佩，他在担任国务卿的时候，曾經打算利用当时存在的机构，力图把日本赶出滿洲。这个机构——国际联盟——一直没有什么效用，而史汀生也沒有得到国内的支持。但是，他的功績在于認識到了这种危險，尽管他沒有能够制止这种危險。

5月16日，我召請史汀生来审查一下我們关于对日作战和在欧洲进行善后工作的計劃。我強調指出必須加速在太平洋进行的战争，并表示我很担心欧洲的饥荒，因为它可能引起混乱。我清楚地說明，我反对当时被人随随便便叫出来的摩根索計劃：把德国降为一个十足的农业經濟国家。甚至当我还在参議院的时候，我就沒有贊成过这个計劃；自从我来到白宮以后，就更加感觉到必須反对这个計劃。我认为，解除德国的武装，消灭它的軍事力量，惩治战争罪犯，在我們能够恢复和平以前，把它置于整个同盟国家的管制之下，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我不贊成把德国降为一个农业国。这样的計劃会把德国人餓死。这样做将是一种报复行为，而过去本着这种精神来締結的和約实在太多了。我决不贊成失敗者，一旦反过身来，成为胜利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失敗者一旦得势，也往

往可以变成一个更加殘暴的胜利者。

我向史汀生轉述了我往常跟我的朋友犹他州参議員埃耳伯特·托馬斯所讲的話。我曾对着欧洲的地图，指出它的“粮仓”区域——匈牙利是一个产牲畜的国家，羅馬尼亚和乌克兰是产麦地区。西北角上是西德、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英国，这些地方产煤，产铁，并拥有大工业。

正如我和参議員托馬斯所談到的，問題在于采取自由貿易的办法，把“粮仓”和工业中心联系起来，这样来帮助欧洲趋于統一。为了促进这种自由貿易，可以利用广大的运河网把莱茵河和多瑙河連結起来，有了这种运河网就可以一直由北海通到黑海和地中海。这样就会构成一种自由貿易的河道，而每一个靠近河道的国家都将保持其应有的河岸权利。此外，还可能通过把莱茵—多瑙河道同黑海海峽連結起来的办法，扩大全世界的自由河道，使苏伊士、基尔和巴拿馬等运河都成为商船可以自由航行的河道。

史汀生向我概括地敘述了我国的軍事参謀人員所策划的总战略。对日作战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我們不想用我們自己的地面部队同人数众多的日本軍隊在中国周旋。三軍参謀长认为，根据参謀长联席會議所制訂的对日作战計劃，不必使美国軍隊在中国进行严重斗争，以致遭受重大的生命牺牲，就足以打敗日本。計劃要求向日本国土进攻。

在談到欧洲的善后工作的时候，史汀生說，今年冬季中欧所有地区很可能发生瘟疫和饥荒。他认为，随着这种情况而来的大概会是政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滲入。我們賴以防御这种局面的将是法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和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使这些国家由于饥荒而被迫走向革命和共产主义。

看来，甚至就在今年夏季，这些国家中大多数都可能发生缺粮

的情况。但幸运的是，加拿大和美国都有大量剩余的小麦，这个比较迫切的问题也许能够解决。这与冬季到来中欧的粮食供应问题不同。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需要进行仔细的、长时间的计划工作和外交工作。史汀生反对任何这样一类的计划：剥夺德国的生产工具，使其最后不能建立一个知足的、愿意采取非军国主义的文明方式的国家。他知道，这势必要牵涉到某种程度的工业化的问题，但为了将来能使德国人和平生存下去，我们就应该寻求解决办法。不应当使德国人因为遭到艰难困苦而被迫过一种不民主的和必须习惯于一种以掠夺为生的生活。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

世界大战后恶果之一是产生了一些小的黠武领袖和他们所进行的侵略行动。当大国正在交战的时候，受到遏制的民族主义狂热便开始到处弥漫。这对和平是一个长期的威胁，因为这种小规模战争行为或侵略行为——这些“小战争”——往往是在争取解放的名义下进行的。这种行为是由各个民族要求获得充分自由这一理所当然的愿望产生的，这种愿望是不可能由大国仅仅凭强力的方式来予以压制或否认的。

当我们和受到外国统治或占领的国家的人民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耐心，并能体谅人家。不幸的是，扮演解放者角色的往往是一些坏的领袖，在这些领袖当中，后来发现许多人都是一些贪图权位或只是慕虚荣和反复无常之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紧接着便是一系列的流血冲突。而现在，甚至当前这场历史上最激烈、破坏性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我们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交战活动，有的说是为了收复失地，有的说是要修改疆界，而有的则说是为了民族解放，而跟着这些活动一道来的是一群新兴的小皇帝。

有些国家甚至准备不惜为了争执一小块土地而冒立即爆发战

爭的危險。它們乞靈于民族榮譽、民族尊嚴和其他種種蠱惑人心的說法，即使這種爭執會使自己趨于崩潰也在所不惜。像這種號召採取武力而不遵循規規矩矩的談判程序來解決問題的不合理的辦法，給同盟國家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局面。

這種騷動事件並不是個別的情況。衝突的事例在歐洲一天天增多，甚至我們的某些盟國也牽連在內。在北非、中東和亞洲的收復地區，人們展開了猛烈的抵抗運動，而且都是說為了爭取解放。他們想從殖民政權下立即獲得自由，而掌握這種政權的當然就是我們在大戰中的一些盟友。

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一直是承認並鼓勵一個民族具有決定自己政治命運的無可爭辯的權利的。這是我們自己的信條，也是我們自己的政治自由的基礎。如果這對我們適用，那麼就應該對其他民族同樣適用。對這種權利來說，是不可能有什麼“條件”的，除非我們背棄自己的政治信條。但是，在把這種信條應用到當前的一些事件中去的時候，我覺得真正的問題倒不是什麼原則問題。我們接受政治自由的原則作為我們自己的原則，並相信這個原則也同樣應當應用到其他地方。真正的問題是程序和方法的問題。

在一個分崩離析的世界的浩劫中，我們迫切地需要建立一個機構，不但用它來處理國際爭端，而且要用它來幫助和鼓勵各族人民實現他們的和平願望。我首先想到的是怎樣把這個世界組織起來，為和平而奮鬥，以及我們關於聯合國的各項計劃。

我們這個時候所面臨的困難說明我們所需要的是堅定地和按部就班地遵照程序辦事。例如，我們有過關於戴高樂將軍和他為法國提出的領土要求的事件。

戴高樂是一個奮不顧身的人物，1940年正當法國的士氣一蹶不振的時候，他對法國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法國人民希望重新多少恢復一點業已喪失的權力和榮譽，這是可以理解的，而美國人在

这一点上也是容易同情他們的。但是，戴高乐为了維護法国民族的事业所采取的方法，却并不是一貫遵循和平的路綫，他那种傾向使用武力来迫使別人滿足其民族要求的做法造成了很坏的局面。例如在斯图加特发生的事件，除了戴高乐决心要給自己划定一个占領区来迫使我們摊牌外，可以說毫无意义。

4月21日，德佛斯將軍率領的美国和法国的部队在迅速向东推进的时候迫近了斯图加特。当时美国部队便从这里轉向东南朝着多瑙河前进。按照計劃，法国部队應該夺取斯图加特，然后引兵南移，而由美国的一支队伍接管这个城市。拉特里將軍和派奇將軍都是同意这样做的。这完全是战区司令官的一种軍事部署。

但是，法国軍队在占領这个城市以后，却不顧前約，拒絕撤出。4月27日，德佛斯將軍下令法軍撤走，但当地的法軍司令官回答說，他奉戴高乐將軍之命，須繼續留在該地。艾森豪威尔將軍出面干涉也沒有能使戴高乐將軍把軍队撤走，5月4日我写了一封信給他也同样无效。这样我只好命令停止对法国軍队的供应，最后还是从斯图加特撤出来了。

戴高乐这次炫耀其武力可說一无所获。关于在德国划定法軍占領区的問題原已在商討中，而夺取土地是不許可的。戴高乐的解釋是不能使人信服的。他告訴卡弗里大使說，“只要法国的盟友認識到，像占領德国土地这类和法国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問題，应当跟法国一道来商量、决定，那末像过去的一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事实上，自从雅尔塔會議以来，我們就一直在考虑关于法国占領区的問題，而这个占領区，将从原来认为我国占領区的一部分德国土地中划出来。英国人和我們都力求恢复法国过去的地位，我們两国的使节已經在巴黎商議过这方面的問題。



然而，更加麻煩的事件是法国人企图片面地占領意大利西北部阿奧斯塔流域的一些地方。当时我們剛好在否认铁托有权用武力接管威尼薩—朱里亚，而現在，戴高乐却攫夺了意大利的阿奧斯塔流域，还认为这是一种民族权利。直到我威胁他要停止我們对法国軍队的供应，像对斯图加特事件那样，他才把軍隊撤走。

这件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在战争后期，法国軍隊进入意大利，占据了戴高乐想要据为己有的一些地区，說是为了他所謂的“边界小調整”，必須如此。法国軍隊是受盟軍最高司令部指揮的，在“欧洲胜利日”以后，艾森豪威尔便命令法軍撤回法国。但是，法軍司令官竟回答說，在沒有得到自己政府的指示以前，他不能听命撤走。而另一方面，法国軍隊还源源开入这些地区。实际上，法国占領区已經在逐步建立起来，而主張应把这个地区归并法国的宣傳工作也在进行。

5月5日，駐意大利的盟軍司令亚历山大元帅請示艾森豪威尔，看是否能叫法国軍隊服从他早已发布的命令，因为法軍的行为使当地居民受到惊扰。亚历山大指出，这样下去一定会发生冲突，而这对意大利政府的处境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們駐巴黎的大使卡弗里奉命向戴高乐进行交涉。5月6日，卡弗里来电报告，他已經和戴高乐会商，戴高乐將軍曾說，法国对这一地区并无領土野心，而不过想进行边界的小調整，而关于这一問題，他希望在稍后一个时期，同意意大利人举行和平談判。但是，根据我所接到的报告，阿奧斯塔流域的法軍数目还是在增加；当地本已不多的粮食被征收；意大利的国旗被人扯下来；到处張貼着布告，号召意大利居民宣布拥护法国，并命令他們接受使用法国货币。我接到軍事当局的报告，美国軍隊正在向法意边境管制区推进，但是这种推进为法国軍隊的消极抵抗所阻，包括沿途敷設障碍物之类。

我們的部队曾接到命令，一旦遭到敌对行动的威胁，便立即停

止待命。卡弗里大使奉命向法国外交部发出了一个关于这一问题的措辞强硬的备忘录，同时英国政府也通知法国政府，对法国军队继续留在意大利国土表示关切。

戴高乐答复我们的态度是有失尊严的。他说，法国不过是要求它所应得的一份而已。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他开始暗示我们，如果再召开一次“三巨头”会议，就应当邀请他参加，而且他应当同斯大林、丘吉尔和我自己具有同等地位。为了明确他对大国地位的这一主张，他提出法国军队应当包括在将给予日本帝国以最后打击的部队之内。当然，它的武器和装备都要由我们来供给。至于法国军队的活动，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对德战争既已宣告结束，这已经完全成为法国本身的问题了。

同法国的官方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我个人对戴高乐将军的看法也越来越不友好。5月18日，在戴高乐的请求下，我接见了法国的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我见到他感到很愉快，因为他是一个法国的爱国志士，他了解我们对盟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关切。我了解他在抵抗运动中的事迹。我告诉他，我一直都是关心法国的，差不多每一个美国人都很尊敬法国人民。我说，我们想尽我们力之所及使法国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一个大国。我告诉他，美国还在刚刚建国的時候，就为法国同它的最坚强的友谊联系所感动。一个强大的法国是对全世界的一种好处。我告诉皮杜尔，美国人民为了能够增加物资输往获得解放的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已经接受关于减少主要食品种类需要的决定。我对他说，美国已重申它决心放弃它在德国占领区的一部分，而让给法国，只是具体实施的细节尚待制订罢了。

这位法国外交部长提出了关于法国军队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他迫切地希望我承担帮助将法国军队输送到太平洋的义务。

我告诉他，关于输送军队的問題，完全要看在美国司令官指

揮下的軍隊的戰略部署如何，要看我們在輸送軍隊時提供設備和供應品的能力如何，才能決定。我希望皮杜爾清楚地了解這一點：如果使用法國軍隊的話，那末，我們必須事先同法國協商妥當，它的軍隊應當受我們的指揮。我還補充說，我堅持這樣一個條件，就是法國軍隊必須服從我國司令官的命令。目前我們在歐洲戰場上正碰到很不愉快的事情，但我不想這樣的事重演。我告訴皮杜爾，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很不高興，我想把所有的牌都攤開在桌面上。

我這樣解釋說：除非法國履行它自己的義務，除非責成法國軍隊服從它所隸屬的司令官的命令，否則我們便不可能供應運輸工具、裝備、飛機和其他物資給它使用。

這是一次很棘手的會談，而且是一次使我感到不愉快的會談，但是借此卻表明了我們的立場。我不想使我們對法國人民的崇敬有所貶損，但我希望戴高樂了解我們對他的所作所為感到很不痛快，意大利西北部的法國軍隊必須全部撤走。我在同皮杜爾會談結束的時候對他說，我將深感愉快地歡迎戴高樂將軍光臨美國。

皮杜爾了解我的態度，他表示這個問題是能夠得到解決的。但是卡弗里大使在6月4日報告說，戴高樂將軍一點不講道理，當他看到這位大使的時候，他所要對他說的全是關於他所說的什麼法國人遭受的“屈辱”問題。戴高樂說，他在意大利邊界上所要求的只不過是想對兩國的疆界作一番小小的調整，但是，當卡弗里問他為什麼不把自己的軍隊從那個地區撤走的時候，他說，“那將是對我們的另一次屈辱。”

我指示卡弗里應當強調我們兩國的傳統友誼。我們決沒有屈辱法國的意思。但是正當我們告戒俄國應當遵守自己的協定並告訴鐵托應當怎樣對待領土問題的時候，法國人片面地採取的這種策略使我們感到很難堪，也充滿了潛在的危險。

然而，法国和意大利之間的形势没有什么改善。法国军队一直在积极地阻碍該地区的盟国军政府的活动。由盟国军政府——也就是由英国人和我們自己任命的行政官員，实际上都被法国将军下令驅逐，盟国的布告等等也被法国士兵撕毀。

6月5日，我同参謀长联席會議和国务院会商这个局势。会后我便下令停止繼續把軍火和装备供应法国军队。

我同时致电給戴高乐将军，表示我对他的一位司令官多晏将军对克里頓伯捷将军所讲的那番話感到很惊異。这位法军司令官实际上曾經威胁要用他的军队来打美国军队，而这些美国军队是奉最高統帅部的命令开到那个地区去的。

我通知戴高乐，除非他把法国军队撤出阿奧斯塔流域，否則就不会再发給他們供应品。我准备了一个发到美国报刊上去的公开声明，宣布我已下令停止对法国军队的供应，因为他們威胁要用这些軍火来攻击美国士兵。我把这个声明寄給丘吉尔，征求他的同意。丘吉尔表示贊同。但是，由于看到当时法国人十分敏感，同时想看看戴高乐在直接收到我的信以后的反应，我便沒有把这个声明公开发表。

丘吉尔在6月6日打电报給我，評論我沒有把这个声明发表这件事，他說，“发表这个声明，就可能会使戴高乐下台，在长长的五年經驗中，使我認識到戴高乐是处在危难中的法国的最危险的敌人。”丘吉尔說，他认为戴高乐将军是“对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之一。沒有誰比英国人更加需要法国人的友誼，但我确信，归根結底，我們不会同戴高乐将军达成諒解”。

我寄給戴高乐的信产生了效果，这位将军同意把法国军队从阿奧斯塔撤走。

就在这个时候，近东又产生了同戴高乐有关的新問題。在过去，法国受国际联盟的委任，曾占領叙利亚和黎巴嫩。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各同盟国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是独立国家，它們現在已經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在旧金山都有自己的代表。1945年春季，戴高乐开始向这两个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們在政治、文化和軍事方面作某些特殊的让步，也就是說要把它們置于法国統治之下。法国軍隊开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支持戴高乐的要求。5月下旬，爆发了武力干涉事件，如轰炸大馬士革和叙利亚其他城市。

美国拍电报給戴高乐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它在和地中海东岸各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須把它們看做是国际大家庭中具有充分主权和完全独立的成員。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庫阿特利向我发出了有力的呼吁，請求援助，他說，法国的炸彈投在沒有設防的城市，因为“我們拒絕給予法国特殊权利”。

戴高乐为了力图恢复法国在地中海东岸各国的殖民利益，以致到处树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在全面子的情况下摆脱这种关系。戴高乐一旦牵涉到某些事情，面子問題便始終使他不能自拔，除非有人硬把他赶出来。

在旧金山的斯退丁紐斯国务卿向我說，地中海东岸国家的局势威胁着旧金山會議，使會議有陷于破裂的危險，因为阿拉伯国家的各代表都表示愤怒，大多数其他小国家也一致反对法国的举动。斯退丁紐斯說，小国家把这件事看做是一种序幕，从而知道如果授予五大国以否决权，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小国家的代表认为，如果联合国組織現在就开始工作，而法国具有否决权，那末它就可以阻止任何关于維護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行动。

丘吉尔首相在5月30日拍电报給我說，激烈的战斗威胁着整个中东的安全和我們对日作战的交通綫。这位英国首相請求我允許英国用軍隊去进行干涉，以便制止这场战斗，恢复秩序。我回电报給丘吉尔，告訴他我已同意他所提出的关于制止冲突的行动計劃。

英国政府于是命令它的中东司令官伯納德·佩吉特爵士將軍恢复秩序。佩吉特將軍請求法軍司令官发布“停火”令，法軍司令官終於发出了停止战斗的命令。

6月2日，国务院收到了6月1日苏維埃俄国关于地中海东岸国家局势的一个照会。俄国这个照会一定是在收到国务院为了表明美国的立場寄往莫斯科的信以前草拟的。在这件事情上，苏維埃俄国似乎同美国采取同样的立場，它这个照会寄来的时候，丘吉尔和我都已同意采取行动来約束戴高乐。叙利亚和黎巴嫩秩序終於恢复，英国保证这两国政府不再受到法国的新的压力。在几星期后，我們駐大馬士革的公使报告說，关于撤退一切外国軍隊的建議已經提出來了。

我們还面临着另一十分緊張、而且可能变得很严重的局面，那就是关于的里雅斯特地区的問題。这个問題是由一位游击領袖铁托的民族主义野心所引起的。由于盟国和俄国的支持，就使得铁托能够胜利地向德国人展开游击战并成为南斯拉夫临时国民政府的領袖。铁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把他的共产主义和鼓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熾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結合起来。他借口維護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提出了关于必須取得的里雅斯特这一重要海港和威尼薩—朱里亚附近地区的要求。

在这个地区，居民和各种語言集团都是很混杂的。的里雅斯特市的居民絕大多数是意大利人，而四郊的居民則主要是組成南斯拉夫的少数民族之一的斯洛文尼亚人。在奥地利的斯蒂里亚省和克临西亚省的边界地方，也可以找到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居民区，而铁托便把他的軍隊向这些地方移动，目的是要使这些地方归并南斯拉夫。

的里雅斯特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它是构成周圍整个地区和陆地上被封鎖的奥地利以及多瑙河盆地其他部分通向亚德里亚海

的一条出路的主要港口。

盟国的计划是要把所有这些发生纠纷的地区交由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统率的部队去占领。当时盟国的军队正在向意大利北部挺进，这些军队必须立即展开攻势，以便夺取如米兰和都灵等重要城市。

4月27日，丘吉尔打电报给我说：

“关于英美占领威尼萨—朱里亚的计划，在华盛顿搁浅了相当长的时间，结果至今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还没有接到命令。因此，如果承您亲自注意到这一点，我将十分感激。……在我看来，占有的里雅斯特似乎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按照计划不费气力地去取得它，并能冒存在于这类政治和军事行动中的风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铁托的游击部队占领该地区以前到达那里。因此，据我看这简直是刻不容缓的事。至于的里雅斯特的实际地位问题，那是可以从容解决的。占有它就可以在法律上构成有力的根据。我请您早日作出决定。”

我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榷后回电给丘吉尔说，“联合参谋部已取得我的同意，授权亚历山大来完成我们在的里雅斯特和从前在意大利统治下的其他地区的任务，我了解这都是根据您的意见，而且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亚历山大接到命令在威尼萨—朱里亚和北部地区成立盟国军政府；在1919年以前，这些北部地区原是奥地利的领土。我们告诉亚历山大，要顺利地实行原定计划，有赖于取得苏联的合作，而美国和英国都正在考虑采取最好的方式来取得这种合作并使南斯拉夫跟着也能同意这个计划；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军事上有必要，“甚至在取得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同意以前就必须这样做的话”，他就应当执行这个计划。

4月30日，我听到了丘吉尔就我给亚历山大的命令所发表的

意見。

他說，“在我看來，軍事方面似乎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認為有蘇維埃政府撐腰的南斯拉夫政府會同意我們進入或控制包括阜姆等地方在內的威尼薩—朱里亞，那肯定是靠不住的。南斯拉夫人無疑會力圖侵入所有這些地區，並要求占領的里雅斯特、普拉和阜姆諸港口，而他們一旦占領這些地方以後，我想他們就不會撤走。沒有人比我更加迫切需要同蘇維埃俄國在絕對公平的原則上來處理德國軍隊投降的問題。……在另一方面，我們從來沒有承擔這種義務，說是在清除意大利——包括靠近亞德里亞海的各省——的德國人方面，應當受到限制或應當得到南斯拉夫人或俄國人的同意，我們也沒有承擔這樣的義務，即當我們的司令官正確地認為必須進行軍事部署的時候，還要報告南斯拉夫人和俄國人。……只要我們能到達那個地方，我們是完全有權利自由地進入的里雅斯特的，正像俄國人爭先進入維也納一樣。如果可能，我們就應當首先到達那個地方，然後再來商談該省其餘各地的問題。總之，我們所一貫遵行的基本原則是，變更領土應當是締結和約或簽訂休戰協定的時候考慮的事情。

“因此，我希望能委託亞歷山大來儘可能迅速和儘可能秘密地執行那個已經由聯合參謀部諸參謀長批准了的計劃，而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在通知俄國人或南斯拉夫人以前，設法從海上占領的里雅斯特，當然，這也要看最高統帥是否認為依靠自己指揮下的海陸兩用部隊和其他部隊就能順利地完成這個任務。……”

我認為在這點上使丘吉爾了解我們4月30日所採取的立場，是必要和適宜的。就在同一天我拍給他這樣一個電報：

“在我看來，似乎陸軍元帥亞歷山大已經從聯合參謀部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指示。我同意，在行軍作戰的情況下，當亞歷山大力求建立自己通往奧地利的交通綫並建立對的里雅斯特和波拉的控



制的时候,是用不着在事先取得俄国的允許的。我注意到,在亚历山大的执行任务的部队进入威尼薩—朱里亚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意图通知铁托元帅,并向铁托解釋,如果他有任何留在該地区的部队,就必须受亚历山大的指揮。我們曾命令亚历山大,如果該地区的南斯拉夫部队不同他合作,以至他必須在該地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的时候,事先应当同联合參謀部取得联系。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希望避免把美国的部队用来和南斯拉夫人作战,或者被用来在巴尔干政治舞台上进行斗争。”

我力求小心謹慎地不使我們卷入巴尔干的騷乱中。巴尔干长期来就是一个糾紛和战争的策源地。我相信,如果巴尔干的政治情况能够加以适当的調整,使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波兰和奥地利都能够建立由自己人民所选择的政府,而不受外来的干涉,那就会有助于我們实现我們維護和平的計劃。

我不希望我国卷入巴尔干的旋渦中,因而使我們陷入另一次世界战争中。无论如何,我渴望能使俄国人尽快地参加对日作战,从而使无数美国人的生命不致牺牲。

在另一方面,丘吉尔却一直在关心怎样尽力保全英国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控制,以便維持英国在希腊、埃及和中东的势力。我不想責备丘吉尔所采取的立場。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許我也会去做他所做的事。

馬歇尔將軍和我在討論每个軍事形势的时候,都同意这样一点:如果我們要在贏得战争以后再贏得和平,就必须取得俄国的帮助。我当时便努力使丘吉尔在脑海里忘却陈腐的武力政治,而使联合国組織发挥作用。

意大利北部的疆界会引起爭执,这一点老早就为我們所了解。在1944年9月的魁北克會議上,罗斯福总统曾經批准一个計劃,根据这个計劃,关于意大利边境有所爭执的地区的最終处理問題,将

有待于最后和平解决。但是，同时应当在意大利建立盟国军政府，盟国管制的地区以1939年意大利的疆界为准；4月20日发给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指示就是根据这一点，他应当在沿着意大利北部的边疆地区驻扎盟国的军队并建立军政府，而在这些地区，包括威尼萨—朱里亚，是很有可能发生争执的。

1945年2月，亚历山大曾经同铁托在贝尔格莱德讨论过有关盟国的占领计划。铁托接受了这个计划，其中规定各地方当局，不管属于什么国籍，都应当听命于盟国军政府。关于英美在威尼萨—朱里亚的地位，在3月19日曾经通知过俄国；俄国人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是，现在铁托却说，由于自从他同亚历山大达成协议以来，情况有了变化，他不想继续遵守这一协议。他通知亚历山大说，他打算占领威尼萨—朱里亚直到奥地利边境地区，但他将允许盟国使用的里雅斯特港和通往奥地利的铁路。可是，当亚历山大的军队到达的里雅斯特、蒙法尔冈和戈里齐亚诸城市的时候，他们发现铁托的部队已走在前面，而且铁托还继续把南斯拉夫的军队大批开到伊松卓河整个东部地区。不但这样，他还硬说这一地区完全是他的活动范围。他的军队还在那里设立行政机构，而阻挠亚历山大的军队在那里建立盟国军政府，甚至在他的军队已经进入的那三个城市的一些地方都不可能这样做。最后，斯洛文尼亚政府终于在的里雅斯特宣告成立。

意大利政府越来越感到不安，它害怕铁托的行动会给意大利的一些进行颠覆活动的集团以可乘之机。5月7日，我们驻罗马的大使亚历山大·柯克报告说，伊松卓河东部地区已完全由南斯拉夫的军政府所控制。一切公共建筑物都已被南斯拉夫的军队占用，上面飘扬着南斯拉夫的国旗。甚至许多城镇的意大利名字都已改为南斯拉夫的名字。大批人士遭到逮捕或驱逐，其中包括戈里齐亚的意大利大主教。

两天以后，柯克大使报告說，意大利的局势已越来越紧张，邦諾米总理抱怨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声称铁托的行动曾經得到盟国的批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认为的里雅斯特应当归南斯拉夫所有。这是罗斯福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铁托现在显然决定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攫取領土的目的，而不想等待召开和平談判来解决一切有关疆界的要求問題。因此，我便召集了三军參謀长和国务院的代表在白宫举行了一次特別會議。接着我在5月11日拍了一个电报給丘吉尔，并向參謀长联席會議发出了一个指示。致丘吉尔的电报如下：

“自从4月30日我拍給您电报以来，我越来越关心铁托在威尼薩—朱里亚的行动所引起的錯綜复杂的局面。毫无疑问，您一定得到了同样一些报告，說明铁托无意放棄所占有的領土，或者同意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多年悬而未决的老問題，作为普遍地和平解决战后問題的一部分。我的結論是，我們现在必須作出决定，究竟我們应不应该拥护依靠一定的程序来解决領土問題这一基本原则，而反对采取武力、威胁或訛詐的办法。看来，只要铁托在威尼薩—朱里亚采取的办法获得成功，他对奥地利南部、克临西亚和斯蒂里亚也会准备提出同样的要求，而对匈牙利和希腊的某些地方也会有相类似的打算。尽管意大利的稳定性和关于它未来傾向俄国的趋势，都很可能有些問題，但当前的問題，据我的看法，倒不是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間发生爭执的时候应当站在哪一边的問題，也不是什么会卷入巴尔干内部政治旋渦的問題。而問題主要是：决定我們两个国家是否容許我們的盟国进行漫无限制地攫夺土地的活动，或者容許采取那种只能使我們想起完全是希特勒和日本人采取过的策略。的里雅斯特是这个地区的一个要害，也是中欧广大地区的一个重要咽喉，南斯拉夫占領的里雅斯特，就会产生——我想您一定会同意这个看法——比当前的領土問題所牵涉

到的更加深远的影响。……我建議我們指令我們駐貝爾格萊德的大使按照下列各点通知铁托：威尼薩—朱里亞只是靠普遍和平協議來解決的許多歐洲有關領土的問題之一。用征服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或通過占領，用片面地宣布主權屬於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種理論以及敵人採取過的那種曾經產生嚴重後果的辦法，都遭到了參加這次戰爭的同盟國家的堅決的和嚴厲的反對。……採納在威尼薩—朱里亞建立盟國軍政府的計劃正是為了要以和平方式永遠地解決這個人所公認的複雜問題。這個計劃是用來維護各有關國家的人民的利益的。……由於考慮到這些問題，並鑒於南斯拉夫在過去一般地同意了針對這個地區所提出的計劃，我國政府已責成我通知您，它希望南斯拉夫政府立即同意地中海地區必須包括的里雅斯特、戈里齊亞、蒙法爾岡和波拉歸盟軍最高統帥控制，并向這一地區的南斯拉夫的部隊發布適當的命令，與盟軍司令官進行合作，在該地區建立在盟軍司令官指揮下的軍政府。……”

5月12日，丘吉爾回電說：

“我同意您所說的每一個字，並將按照您所提出的各點全力以赴。……在我們的力量分散以前，如果能採取堅決的行動，是可以使歐洲免于再一次被浸入血泊中的。不然，我們的勝利果實就會全部喪失，建立一個世界性組織來防止可怖的侵略行動和未來的戰爭這些目的就不可能達到。……”

丘吉爾同意叫英國大使同我國大使一道去向鐵托表明我們的意圖，但他請求暫時停止把美國軍隊從歐洲撤走的命令。他希望我自己負責保持當時在亞歷山大指揮下的美國師團的數目。

我可不能夠承擔這樣的責任。要戰勝日本，就需要把軍隊從歐洲轉移到太平洋去，而且這一軍事行動已經開始。同時，在我們國家，各地還瀰漫着一種強大的壓力，要求“把兵士們送回家來”。

美国人民当时所最需要的莫过于结束战争。我拍电报给丘吉尔说，我不能考虑关于停止撤走美国军队的问题，除非由于新的形势发展而必须这样做。我对他说，“除非铁托的军队攻击我们，我决不会使这个国家卷入另一次战争。”

丘吉尔在他的回电中说，“我十分了解您为什么要等待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以后再来决定采取那种重大的措施，并且等待铁托在听到我们的意见以后所产生的效果。但我不很明白您所说的这句话：‘除非铁托的军队攻击我们，我决不会……’我认为，从您的第三十四号来电中可以知道，如果铁托竟然反抗，我们就必须把他的入侵的部队赶到您所规定的那条线的东面。我认为像铁托这样长期入侵这些地区，如果老是这样搞下去，就会构成‘一种攻击’。我相信，铁托是会让步，并按照我们的意图办事的，特别是当他认识到我们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管怎样，我同意我们应当等待他的答复。”

第二天，即5月13日，丘吉尔又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建议我同他联名就的里雅斯特的局势给斯大林写一封信。我同意这样做，在我们共同署名的一封信中，我们把争论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并告诉斯大林我们已经把一个措词严厉的照会寄往贝尔格莱德。5月16日，我再一次致电丘吉尔：

“您同意我们在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前，应当先等待我们寄给铁托的照会的结果，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

“为了使您正确地了解我上次电报中所说的那句话：‘除非铁托的军队攻击我们，我决不会……’可以肯定地这样说，我不可能、也不愿意使我国卷入一场对南斯拉夫人的战争中，除非他们竟然攻击我们，而如果他们向我们进行攻击，我们就有理由使用我们盟国的军队来把他们赶回去，一直要把他们赶回到不容许再行攻击我们军队的地方为止。”

丘吉尔在5月19日回电說，由于看到我們寄給铁托的照会所收到的完全相反的反应，他觉得亚历山大可能采取的那种必要的行动不能认为是对南斯拉夫作战。他不认为我們应当坐待一种十分明显的侵略行动的发展，而不立即采取行动，因为这可能会使南斯拉夫的部队得以孤立盟国的军队而使其陷于一筹莫展的地步。

我回答他說，“我們的司令官将采取重大的戒备措施，不让自己的部队处于一种难以自保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应当是毫无問題的。但是，我认为我們应当對我們的軍事长官說清楚，在采取这种戒备措施的时候，应当保证如果有公然挑衅行动的話，应当是由铁托部队发动的。”

然后我建議向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发布新的命令，要他們增援駐扎在的里雅斯特或其周圍的前綫部队。我再一次強調說，“对于把美国军队重新部署到太平洋去的事情，任何可以避免的干扰，都应当避免。”

南斯拉夫的军队繼續按他們的占領計劃推进。5月17日，陸軍元帥亚历山大寄給艾森豪威尔一封信，告訴他局势已严重恶化，如果不使用武力，南斯拉夫人的行动就将无法控制。

几天以前，我曾經召集三軍參謀长进行会商。我想知道，一旦我們必須使用武力的时候，附近地区有哪些部队可以調派。我相信，为了向铁托施加压力，我們所应当做的就是向他显示我們的强大威力，从而使他屈服，不敢采取任何孟浪的行动。我通过馬歇尔將軍征求艾森豪威尔將軍的意見，看他能否派遣三个师到勃倫納山口或的里雅斯特北部。我問金海軍上将，看他是否能把地中海舰队的某些单位派遣到亚德里亚海，并問需要多久時間。我还告訴他要保持必要数目的船只处于戒备状态。我問阿諾德能調动哪些空軍部队，并要他命令这些部队保持戒备。

馬歇尔將軍報告說，艾森豪威尔將軍已准备派遣派頓將軍帶

領五个装甲师赴勃倫納山口，必要时还将开进意大利。金海軍上将报告說，地中海舰队的許多船只正升火待发，准备开往亚德里亚海；阿諾德將軍則告訴我好几个空軍大队都已作好准备，待命起飞。

我再一次致电斯大林。我在5月20日給他的电报中說，“我一直在通过駐莫斯科大使館把美国对于威尼薩—朱里亚的临时行政管理問題所持的立場通知您。我还特別把最近美国和英国給铁托元帅的一些照会的抄本送交給貴国政府，这些照会建議按照亚历山大元帅和铁托元帅在今年2月間所达成的諒解由盟軍最高統帥在包括的里雅斯特、蒙法尔岡、戈里齐亚和普拉等地在內的地区实行管制，以免妨碍爭执的任何一方对这个地区的最后处理。

“我們現已收到铁托元帅的答复。这个答复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因为他表示，他的政府不准备‘放棄南斯拉夫軍隊拥有到伊松卓河为止的領土的权利’。至于該地区的行政管理問題，他提出一个与我們所提出的原則不能調和的解决办法。同时，亚历山大元帅和铁托元帅的部队在未划定的占領区內的問題和由此产生的管理上的双重性，都充滿了危險。我們认为这不单純是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之間的边界爭端，而必須把它看作是涉及和平解决領土爭端和奠定欧洲持久和平的原則問題。不論現在或将来，对于这块土地，任何不充分考虑南斯拉夫的合法要求和南斯拉夫軍隊對我們大家付出极大代价而取得的对德胜利所作出的貢獻的行动，都是我們所不能采取或容許的。不过，我們也不能接受对有秩序的和迅速的解决的原則的任何让步。我正在把这一点通知铁托元帅。

“我知道，您会同意，我們在原則問題上必須坚持。我希望我們能同样期望您运用您的影响来帮助实现我們最近給铁托元帅的照会中所概述的临时解决办法。只要亚历山大元帅的权力能扩大到我們的照会中所指出的那条綫以东的威尼薩—朱里亚地区并从

而能恢复安宁，我們就能按照在雅尔塔达成的諒解的精神，繼續为进一步調停这个問題而努力。”

我把这个建議通知丘吉尔，他回答說他将寄給斯大林一封类似的信件。他說：“我們的坚决态度在我們同斯大林进行討論的时候一定会很有帮助。在我看来，我們三个人在最短期間內举行一次會議，是十分必要的。”

我回答丘吉尔說，我在一两个星期內就可以告訴他我能够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来參加这样一次高級會議。我感謝他关于英国对我写給斯大林的那封信的支持，并說“我极希望斯大林能以自己的声望，帮助我們解决铁托在威尼薩—朱里亚的这个問題。”

5月23日，斯大林回了我的信。这封信很令人失望。俄国的这位領袖支持铁托的要求，并希望我們接受南斯拉夫的立場来解决这场冲突。斯大林写道：“您关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問題的来电，已經在5月21日收到。前些时候我已經收到您經由凱南先生給我的美国駐貝尔格萊德大使轉給南斯拉夫政府关于同一問題的信件的抄本。謝謝您的通知。

“至于問題的本质，那么我应当談談下面各点。

“我认为您的意見完全正确，这个問題是原則性問題，对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領土問題不允許有任何对南斯拉夫的合理要求以及南斯拉夫武装部队在盟国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共同斗争中所作出的貢獻不加充分考虑的行为。不言而喻，这一块大多数居民是南斯拉夫人的土地的未来命运应当在締結和約的时候加以决定。但是現在涉及到的是对这一地区实行临时性軍事占領的問題。依我看来，在这方面必須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作为盟国的南斯拉夫的部队把德寇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赶走，并从而对盟国的共同事业立下了重要的功績。仅仅由于这一情况，就足以說明，当南斯拉夫人民为爭取南斯拉夫的民族权利并为



联合国家的共同事业作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之后，要否定南斯拉夫有权占领这一块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取过来的土地，那是不公正的，而且对南斯拉夫军队和南斯拉夫人民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如果让南斯拉夫部队在伊斯的利亚一的里雅斯特地区就地留下并让现在在这一地区行使权力的南斯拉夫行政机关存在下去，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才是正确的。同时盟军最高司令部也可以在这一地区建立管制，并且由亚历山大元帅和铁托元帅相互协商确定分界线。如果接受这些建议，那么伊斯的利亚一的里雅斯特地区行政权力的问题就会获得正确的解决。

“既然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大多数是南斯拉夫人，并且远在德国占领时期那里已经建立起南斯拉夫的地方行政机关，这个行政机关到现在仍享有当地居民的信任，因此就应当考虑到既成的事实。让这个地区里现有的南斯拉夫民政机关隶属于南斯拉夫的军事指挥部，就会使这块土地上的行政管理问题获得适当的解决。

“我希望美、英两国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之间所发生的关于伊斯的利亚一的里雅斯特地区的地位问题的误解将会消除，而全部问题将获得妥善的解决。”

在这次冲突的危机中，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显示了巨大的耐心。但某次当他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他把铁托比作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南斯拉夫人和俄国人都同样对这件事掀起了愤怒抗议的浪潮。

5月下旬，铁托向我们说，如果南斯拉夫的部队能够留在盟国的占领地区，南斯拉夫的代表能够参加盟国军政府，同时我们的军政府当局在采取措施的时候能够通过铁托早已在那里建立的行政机构，他就可以同意由盟国来管制的里雅斯特和威尼萨—朱里亚。这样的建议是行不通的，而从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军事立场来看也是不可能接受的，但是它使我们仍然有作进一步协商的机会。

这就是我所希望的，尽管当地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我們还是进行会谈。然后在5月29日，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长伊凡·苏伯塞奇博士在南斯拉夫駐美大使的陪同下拜訪了我。苏伯塞奇博士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准备回貝尔格莱德。他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一位領袖，曾經担任过流亡政府的首相，他現在在新的铁托政府中所代表的是各党派的一种联合力量。他給了我一个很好的印象。我同他和那位駐美大使談得很坦率。我告訴他們，盟国打算把沒有偏私的行政机构扩大到威尼薩—朱里亚某些引起爭执的地区，而对于这些地区的最后处理办法則并不抱任何成見，我們希望南斯拉夫政府作为联合国成員之一，同我們进行合作。我指出，铁托已經破坏了雅尔塔协定，因为他建立了极权統治，而現在还要把这种統治用武力扩大到威尼薩—朱里亚去。如果铁托硬要这样搞，那我們就将用占压倒优势的武力来对付他，而現在已經是作出抉擇的时候了。我还告訴苏伯塞奇博士，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一个協議草案，很快就把这个草案寄給铁托，希望他同我們合作，而不要繼續采取妨碍事物进行的策略。

6月9日，終于簽訂了一項協議，把威尼薩—朱里亚划为两个軍事占領区。西区称为甲区，包括的里雅斯特市在內，置于英美占領之下，东区称为乙区，置于南斯拉夫占領之下。分界綫是由亚历山大的參謀长摩根將軍在取得南斯拉夫人的同意下划定的，因此这条綫后来称为摩根綫。南斯拉夫的軍隊必須撤退到它自己的占領区，而盟国的司令官則可以在我們的占領区内指揮号令所有的行政机构。这两个区都只能认为是暂时占領的地区，而不影响最后解决領土的問題。

为了执行这一協議中的一些軍事上和技术上的詳細条款，还必须达成补充的協議，这件事又遇到新的困难。

6月21日，斯大林为铁托的立場辯护。

他說：“英美代表在6月2日向南斯拉夫政府发表的声明所使用的那种最后通牒式的語調，……不是苏联政府所期望的。使用这种办法，怎能期望取得积极有力的結果呢？……像以前一样，我希望在伊斯特里亚一的里雅斯特这个問題上，南斯拉夫的正当利益应当得到滿足。”

我在6月25日拍电报給斯大林，叙述了談判的詳細过程，并向他保证，任何还没有解釋清楚的問題都可以在我們即将举行的會議中提出討論。的里雅斯特問題就是必須在这次會議中提出討論的許多問題之一。从5月到6月，在俄国人和我們以及和英国人之間产生了許多困难問題。在雅尔塔會議上，罗斯福总统曾經同意这样一个政策，即在盟国的互相监督下为被解放的欧洲各国重新建立自由的政府。但是，在保加利亚和羅馬尼亚，随着苏联軍隊的挺进，俄国的司令官便强迫建立了共产党政府。

5月2日，代理国务卿格魯陪同我国駐保、罗两国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两位代表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因此获得了关于这两个国家情况的第一手材料。这两位代表是科特兰德·范倫塞勒·斯凱勒准将和約翰·克倫少将。

斯凱勒將軍告訴我，在羅馬尼亚，俄国人把持了盟国管制委员会，而不与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商量。政府是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少数派的政府，据斯凱勒將軍估計，它所代表的还不到羅馬尼亚人口的十分之一。他說，絕大多数羅馬尼亚人民既不要原有的政府，也不要任何其他形式的共产党政府。但是，共产党却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企图完全掌握政府机构，而在年青的迈克尔国王領導下的反对派以及多数党的領袖們則越来越沒有力量。

在經濟方面，羅馬尼亚受到俄国紧紧的束縛，其办法是向羅馬尼亚索取賠款，把那些被俄国人說成是德国所有的財產据为己有，把工业装备，当作“战利品”接收过去。此外，几乎完全不让羅馬尼

並同其他国家发生貿易关系，而这就使它無論出口和进口都只能愈来愈依賴俄国。

根据克倫將軍的报告，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一样坏。这里的美国代表几乎是被当做俘虏看待。美国人如果没有俄国人陪同，就不許走出首都所在地索非亚城，而通常的情况是，除非是一个职位很高的美国人，就不可能找到那样的护卫者。寄交給美国使团的任何一点点供应品或邮件都必须取得俄国人的許可，而且在到达的时候要交由俄国人檢查。說到盟国管制委员会，美国的成員不但沒有发言权，而且連用委员会(他自己是成員之一)的名义发布的指示的副本都无法得到。

自从1944年9月俄国人进入这个国家以后，保加利亚政府就完全被共产党人控制，共产党人全部掌握了国家的警察和軍隊，他們在报刊上压制一切反对他們的思想情緒，給那些人戴上“法西斯”的帽子。

我从丘吉尔那里获悉英国的代表也在他面前描述了类似的令人煩惱的情况。另一方面，溫斯頓·丘吉尔自己透露，他在1944年10月曾經向斯大林建議，把羅馬尼亚和保加利亚看做屬於俄国势力范围之內，而这就不能承认了俄国人对这两个国家的統治。

根据这方面的情报，我命令国务院提醒俄国政府注意它在雅尔塔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要求它不再限制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的活动。

波兰的情况有些两样。关于組成临时政府的談判还在进行。我认为必须先达成关于波兰临时政府的協議，我們才能在外交上承认波兰并同意它出席旧金山會議。5月4日我致电斯大林說：

“丘吉尔首相在答复您4月24日信的时候，曾經把他在4月28日写給您的信的抄本寄給了我。既然您从罗斯福总统和我本人給您的信件中已深深地了解美国政府的立場，我就无须告訴您，我

是同意丘吉尔先生4月28日的信里关于改组波兰政府的意见的。我的政府仍然认为克里米亚决议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公正基础，并应在这个时候予以实现。

“三外长在关于波兰问题的会议上还没有制订出一个圆满的方案，我认为尽早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圆满办法是非常重要的。

“我应该告诉您，关于邀请现在的华沙临时政府的代表到旧金山的任何建议，无论有无条件，都是美国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美国若同意这个邀请，就意味着承认现在的华沙临时政府是波兰的代表，而这就等于放弃雅尔塔协定了。”

斯大林给丘吉尔的回信（我是同意丘吉尔信中的意见的）于5月6日送到。

他写道：“如果不把当前在波兰执政并博得大多数波兰人民支持和信任的临时政府作为将来的民族统一政府的基础，那么，就没有可能指望顺利地解决克里米亚会议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由于波兰作为俄国的邻国而具有“特殊地位”，斯大林争辩说苏联有理由坚持将来的波兰政府应当由那些积极促进苏波两国友谊关系的人士来组成。他说，仅仅排斥那些“对俄国采取极端不友好态度”的人，像丘吉尔曾经提出过的那样，是不够的。

斯大林还说，“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坚持，只有那些用行动证明自己对于苏联的友好态度并且忠实地、真诚地愿意同苏联合作的人，才能够参加关于组织将来的波兰政府的协商工作。”

他最后说，英美的态度同他的态度是如此明显地对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看到这种情况以后，丘吉尔认为继续用函电往返的办法不可能解决问题，而应当尽快地召开一次三国政府首脑会议。

我在回信中告诉丘吉尔，我愿意获得同他和斯大林会晤的机会。但是我希望由斯大林发起这次会议，我还告诉丘吉尔首相，

我在本財政年度以前还不便离开华盛顿。

丘吉尔在5月11日回信說：

“我认为我們应当联名或者分別在同一个时候向斯大林发出邀請，請他7月間同我們在大家都同意的一个沒有遭到破坏的德国城鎮举行三国政府首腦會議。我們不应当在目前俄国軍事占領区的任何一个地方会見。……我不知道我們的大选将在什么时候举行，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我們有重大任务的时候，您同我的行动竟要受到影响。如果您願意在7月初到我們这里来，英王陛下一定会誠摯地向您发出邀請，而您也一定会受到英国的盛大欢迎。……我当然应当召集我国两党的代表來同您会談，而这些代表在外交事务方面所要讲的話，也正就是我們所深深同意了的話。因此，我催促您在7月初来这里，然后一道去同斯大林会晤，会晤的地点最好是在俄国占領区以外的一个能够吸引他来的地方。同时，我衷心地希望美国的战綫不要从目前大家所同意的策略綫上向后移。

“我十分怀疑是否有一种巧妙的办法能使斯大林提出要召开一次三国政府首腦會議。但我认为他将考虑我們的邀請。要不然，我們又有什么办法？”

“我感到高兴的是，您目前的意图是按照我們对雅尔塔协定的正当解釋去办事，是坚持我們目前宣布的对一切爭執問題所采取的立場。

“总統先生，在今后两个月內，关系全世界的最重大的問題就将作出决定。請容許我补充說一句，从我們过去的来往函电中，我获得了很大的信心……”

5月12日，我答复丘吉尔說：

“我还是很希望能使斯大林提出召开这次會議，我认为值得我們在这方面努一把力通过我們的大使去誘导他提出这样的建議。

如果我們的努力失敗，然後我們可以考慮聯名或分別向他發出邀請。

“要是這樣一次會議得以安排妥當，在我看來，為了避免任何有關我們‘伙同一氣’的嫌疑，我們分別前往會晤地點是較為有利的。

“在會議結束以後，要是國內的任務容許的話，我將十分高興去訪問英國，然後您和我可以充分討論我們的共同的利益和問題。

“我完全同意，在今後幾箇月中，就將決定對整個世界有極其重大影響的一些問題。”

## 第十一章

### 霍浦金斯赴莫斯科的使命

罗斯福逝世势必引起英国、俄国和美国政府首脑共事关系的问题，这将是不可避免的。在经过一连串会议和频繁的会晤以后，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以及在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彼此都已经有所了解，有所认识。而我当然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必须跟丘吉尔和斯大林会晤。但是，在我担负着巨大的工作任务、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候，要举行那样一次会晤是不可能的。除此以外，我希望充分了解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态度，了解在罗斯福逝世以后他们的看法有些什么变化。同时，我还想通过一个受到罗斯福信任的代表去告诉丘吉尔和斯大林，美国的基本政策一直没有改变。

5月4日，我再一次召见霍浦金斯，这是我们从海德公园罗斯福总统墓地回来以后第一次见面。

在往返海德公园的路上，霍浦金斯和我一直谈论着俄国的问题。我向霍浦金斯示意他可以代表我个人去访问斯大林。我问到他的健康状况，看他是否能胜任这样一次旅行。霍浦金斯说，他必须找医生商量一下，并且说：“你为什么不能叫哈里曼以特使名义重新回到那里，他不是已经在那里作我们的大使吗？”在我和霍浦金斯的几次会谈中，我曾经好几次见到哈里曼。哈里曼建议我派霍浦金斯到莫斯科去，因为霍浦金斯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中间的一根纽带。由于霍浦金斯向我提出了他的健康问题，我便对哈里曼说，我想要他充当我的特使去见斯大林。哈里曼回答说，据他看，由于



霍浦金斯和罗斯福非常接近，他就更能影响斯大林，使斯大林知道我們决心要执行罗斯福的政策。

当我同霍浦金斯握手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病容。但是霍浦金斯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由于我在看到俄国的发展趋势以后——特别是在和莫洛托夫会晤以后，感到很不安，我便貿然再一次提出了請他担任特使去見斯大林的問題。

霍浦金斯說，他了解情勢的迫切，并准备到莫斯科去。他問我哈里曼打算什么时候回莫斯科。我告訴他說，我希望哈里曼在一个星期內能从旧金山回到华盛顿，届时我将和他商談俄国局势和关于他返回任所的問題。我請霍浦金斯第二天再来同我繼續商談出使俄国的事情。我还請他会同国务院研究一下最近俄国局势的发展情况。

这就使我获得了一个机会来探詢一下科德耳·赫尔、杰米·貝尔納斯和其他一些人的意見——不光是关于霍浦金斯这次赴莫斯科的特殊使命問題，同时还有派前美国駐俄国大使約瑟夫·戴維斯担任特使前往倫敦的問題。

国务院反对把霍浦金斯派往莫斯科，貝尔納斯也表示反对。科德耳·赫尔則对我說，这个使命由霍浦金斯去最合适。

5月19日，霍浦金斯来白宫听取最后的指示。就在当天，我拍給斯大林如下一个电报：

“我确信您和我同样感到通过函电处理我們所面临的复杂而重要的問題是很困难的。因此，在我們可能会見之前，我派遣哈里·霍浦金斯先生同哈里曼大使前往莫斯科，以使他們有机会和您面談这些問題。霍浦金斯先生将在会談完毕后立即返回华盛顿向我当面汇报。他們二位預計将在5月26日左右到达莫斯科。如蒙您告訴我这个時間对您是否方便，我将很感激。”

我請霍浦金斯告訴斯大林，我迫切希望同俄国政府有一个相

当明确的諒解，告訴他我們从不想拒絕严格履行我們所承担的一切义务，我們也希望斯大林履行他的协定。我向霍浦金斯表明，当他同斯大林談話的时候，只要他认为恰当，他可以随意使用婉轉的外交術語，或采取開門見山的方式。我还要他告訴斯大林，我很乐意亲自和他會見，而且我认为这一次應該輪到他来美国，因为我国的總統曾經去过俄国。

第二天晚上，我召見了約瑟夫·戴維斯，告訴他根据我們的計劃，現在已決定派霍浦金斯赴莫斯科，因此我希望戴維斯自己到倫敦去。我說，霍浦金斯將於5月26日抵達莫斯科，我希望戴維斯安排一下，以便在同一个时候到达倫敦。

两天以后，5月21日，我收到斯大林的回電：

“关于霍浦金斯先生和哈里曼大使將在5月26日到达莫斯科的來電已經收到了。我欣然同意您提出的与霍浦金斯先生和哈里曼大使會晤的建議。5月26日对我完全适宜。”

5月22日，我再復電斯大林：

“关于霍浦金斯先生的訪問的電報已經收到了，这使我非常高兴。我认为，我在他离开美国之后就把他这次訪問莫斯科的消息公布会比走漏消息而变成新聞界猜測的題目要强一些。霍浦金斯先生計劃明天——5月23日早晨离此，在当天晚些时候我打算向新聞界宣布他同哈里曼大使前往莫斯科和您商談两国政府目前正在討論的一些事務。”

同日我致電給丘吉尔：

“我請約瑟夫·戴維斯先生在您和斯大林元帅和我舉行會議以前訪問閣下。有許多問題我不願意通过電報来解决，而想要他来和您一同研究。戴維斯先生大概將於5月25日抵達倫敦，如承惠予接見，非常感激。”

丘吉尔回電說：

“戴維斯先生一到，即当欣然接見。”

5月23日，我宣布了关于霍浦金斯和戴維斯担負特殊使命分別前往莫斯科和倫敦的消息。

我曾經囑咐陪同霍浦金斯前往莫斯科的哈里曼大使先到倫敦去看看丘吉尔。我认为最好是能通过哈里曼使丘吉尔能完全明了霍浦金斯这次使命的性质。5月22日，英国首相单独和哈里曼共进了晚餐。第二天，丘吉尔结束了他的战时联合政府而成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这就是說，很快就要举行大选。

哈里曼在5月23日从他和霍浦金斯約定会面的巴黎拍电报給我，报告丘吉尔在听到霍浦金斯前往莫斯科的消息时感到很高兴。他說，丘吉尔政府的辞职和即将举行的选举，这一切都攔在丘吉尔心上。他說这位英国首相极其关心同俄国关系的进展情况，并认为对于威尼薩—朱里亚的局势应当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这件事十分重要。但是，他认为像波兰一类的問題，在“您和他”同斯大林会晤以前，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丘吉尔請哈里曼向我保证，对于俄国，他不会采取任何沒有得到我們充分支持的立場，而且“他願意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当您准备見他的时候前来同您会晤。”

从5月26日到29日，戴維斯大使在棋盘別墅<sup>①</sup>和唐宁街十号同丘吉尔首相进行了私人会談。戴維斯沒有把他和英国首相会晤的詳細情况在电报中告訴我，他願意当面向我报告。但是，在5月31日，我接到了丘吉尔关于他和戴維斯进行会談情况的电报，其中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

丘吉尔說，他盼望我能很快让他知道“‘三人’會議”的日期。这位首相說，他和戴維斯进行的会談是很融洽的，这一点在戴維斯

---

<sup>①</sup> 丘吉尔的乡間別墅。——譯者

回国以后当会向我报告。接着丘吉尔便說出了一番令人惊異的話，他說他不准备参加只是我和斯大林之間繼續举行会談的那种會議，而“三人”应当同时会晤，并且要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会晤。

我从来沒有打算在任何一次单独的會議上和斯大林单独会晤。我所迫切要做的是使斯大林、丘吉尔和我自己能够圍坐在一張桌子旁边，保持我們在战争期間的团结。为了維持和平，保持团结是最必要的。我甚至曾經反对关于我和丘吉尔单独会晤的主張。丘吉尔曾經通过正常的途徑暗示他願意在我們同斯大林举行会談以前跟我見見面。他的意思是他先来华盛顿，然后我們一道前往“三人”會議地点。在我看来，当我們想要和斯大林一道来解决許多問題的时候，这样做将是一个严重的錯誤。斯大林一直害怕英国人和我們在伙通一气地来欺負他。我們不想这样做。我們要世界和平，我們需要三个大国共同努力来爭取这种和平。当然，由于我無論同斯大林或丘吉尔都从来沒有过私人的接触，我也曾經想在我們到达會議地点以后，找机会同他們二位单独見面。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地認識他們，能對他們作出估計，而他們也可以趁此机会对我作出估計。

我打算等待一下，看戴維斯能否就丘吉尔的这个电报作些解釋。6月5日，戴維斯来向我做报告。我請代理国务卿格魯、李海海軍上將和貝尔納斯法官一道听取他的报告。

戴維斯进行了口头报告——后来递交了书面报告。他准确地表达了我的立場和美国的政策，非常高明地执行了我的指示。

戴維斯告訴我，他曾經和英国首相单独进行了将近八小时的談話。第一次会談是在棋盘別墅进行的，从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一直談到星期天早晨四点半。这天上午十一点在丘吉尔的臥室（他躺在床上）繼續談到一点半吃午飯的时候，这天下午和星期二在唐宁街十号又繼續談了一下。

戴維斯告訴丘吉爾說，我對蘇聯和英美兩國關係的嚴重惡化極為關切，我認為如果不能繼續保持三大國的團結，就沒有理由可以希望獲得和平。戴維斯對英國首相說，我所抱的態度是，羅斯福總統所簽訂的每一項協議，我無不衷心支持，如果對這些協議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見，那麼我希望對此能得到澄清。

戴維斯對丘吉爾說，“總統相信，當前最重要的目標是維護勝利後的和平。他認為贏得了戰爭的三個國家光榮地、不遺余力地解決彼此間的分歧問題，並通過繼續保持團結，從而使一個正義的、持久的和平機構的建立成為可能，這是三國的責任。

“總統有理由相信，由於蘇聯懷疑英國和美國同聯合國一道在‘伙通一氣’地欺負它，因此局勢變得更加嚴重。事實上這種懷疑是沒有根據的，必須消除這種懷疑。這就需要在彼此講究信用和互相信賴的基礎上建立大家的信心，而要作到這一點，就只有通過坦率的商談，要有彼此認識和估計對方的機會。

“就這一點說來，要是同首相和斯大林元帥相比，總統是處於劣勢的。首相和艾登先生都曾經和斯大林元帥以及莫洛托夫人民委員有過頻繁的接觸和友好的聯繫。由於總統看到他必須擔負起來的責任，因此他希望有一個同樣的機會去認識斯大林元帥，也使斯大林元帥有機會認識他……”

戴維斯還加以解釋說，“因此總統希望在出席定期召開的會議以前，有和斯大林元帥見面的機會。他確信首相一定會了解他的這種合乎情理的態度，並協助安排這樣一次見面的機會。”

就在這一點上，我認識到首相可能把這一建議看做是我想先同斯大林舉行一次預備會議。我可沒有這個意思。戴維斯所要傳達的意思是，在舉行正式會議以前，我打算拜訪一下斯大林，也拜訪一下丘吉爾，就在召開會議的那個地方進行私人的訪問，為的是能夠通過個人的接觸更好地了解他們。

我立即采取了步驟來向丘吉爾澄清這個問題，我告訴他我的本意是不想和他或者斯大林單獨商討任何有關問題的。

戴維斯接着報告了丘吉爾關於歐洲局勢的分析。戴維斯說，他對丘吉爾在談到戴高樂、鐵托和斯大林的時候所用的冷酷語調，感到很吃驚。他說，“丘吉爾詳盡、強調和激動地闡述了關於美國軍隊撤出歐洲後將引起的嚴重危險。如果美國軍隊從歐洲撤走，那將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歐洲將會屈服於紅軍和共產主義之下，而任人擺布。”

講到這裡，我打斷戴維斯的話說，我可沒有這種想法，我們只打算撤走一部分可以從歐洲撤走的軍隊去應付我們在太平洋的戰爭。我們已經承擔恢復歐洲的責任，當然不容許放棄這種責任。

霍浦金斯和哈里曼在5月26日會見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霍浦金斯報告說，斯大林渴望同丘吉爾和我會晤，就同我們渴望同他會晤一樣。從第一次會見一直到6月7日，他們舉行了許多次重要的會議，不斷地進行了會談。霍浦金斯每天用電報向我報告，使我了解全部情況。這就使我得以和丘吉爾磋商許多有關三國政府的問題。

霍浦金斯出使莫斯科的第一個收穫是確定了斯大林、丘吉爾和我舉行會議的日期和地點。

5月27日，霍浦金斯用電報拍來了他的第一個報告：

“我們詳盡地敘述了美國一般人所流露的沉重的心情，並盡我們力之所及表達了您盼望我們代為傳達的一些看法。我們曾經特別着重地指出波蘭問題的重要性。當我們敘述美國輿論當前的情況時，斯大林是極其注意地聆聽我們的發言的，並且使我們感覺到，似乎他也為時局的發展趨勢而感到不安。……”

哈里曼後來報告說，這位俄國的獨裁者表示他不完全了解那些困難的基礎。他向我們進行攻擊，埋怨“我們的不當行動”，並很

气憤地表示，“如果我們不想在友好的基础上同苏联打交道，强大的苏联尽可自己管自己”。然而，他很高兴能見到霍浦金斯，并且毫无疑問地承认，我既派遣霍浦金斯到莫斯科，这就表明我希望同俄国人共同合作。

5月28日，霍浦金斯告訴我，斯大林曾經对他說，他將在我所願意的任何时候同我会晤，并且說，在柏林的郊区，做为举行这样一次會議的地点是适宜的。

我指示霍浦金斯回答斯大林說，我不反对在柏林地区会晤，就我來說，7月15日左右是較為合适的日期。我还通知了丘吉尔，他在回电中再一次要求把日期定在6月中旬。而斯大林来电則又同意7月15日。丘吉尔还想爭取定在7月初，但最后我們三个都同意7月15日，地点为波茨坦郊区的巴培尔斯堡。

哈里曼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在向斯大林陈述您的意見的时候，在闡明我們大家都很关心的重大問題——特别是波兰問題的时候，霍浦金斯所做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担心，”哈里曼接着說，“斯大林不完全了解、也决不会完全了解我們对自由波兰的关心是一个原則問題。俄国的这位政府首脑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都是很現实的，很难使他了解我們对抽象的原則所怀的信念。也很难使他了解，为什么我們要在像波兰这种他认为对苏联的安全十分重要的国家去干預苏联的政策，除非說我們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然而他却懂得，他必須应付我們所采取的立場……”

霍浦金斯报告說，斯大林准备立即开始談正經事，談談現在倫敦和波兰的一些非卢布林政府成員的人士，而这些人将被邀請来莫斯科同波兰委员会的人員見面，协商关于組織波兰临时政府的問題。因此霍浦金斯建議提出这样一个名单：倫敦方面三个，波兰五个，而这些人过去都是由英国和我們自己批准了的。斯大林表示他希望目前在波兰建立的临时政府能有三四个人，但無論如

何不能多于四个。霍浦金斯认为这个初步的名单是令人满意的，他催促我批准它。我在6月1日同霍浦金斯通电话的时候便批准了这个名单。

这个时候，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的函电往返也是很频繁的。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名字。我们极力想使波兰流亡政府的立场和我们自己的态度以及斯大林的意图取得一致。最后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霍浦金斯在6月6日同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便结束了这个问题。

这并没有解决波兰问题。这次会谈的成就是打开了我们和俄国人之间在波兰问题上所造成的僵局。

在霍浦金斯动身赴莫斯科以前，我曾经着重地嘱咐他，必须得到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尽可能早的日期。在雅尔塔会议的时候，霍浦金斯是和罗斯福在一起的，他知道俄国在这次会议上承担了在欧洲的战争结束后出兵攻打日本的责任。6月28日，霍浦金斯和哈里曼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这个声明由霍浦金斯用电报告诉我。

霍浦金斯说：“哈里曼和我昨晚第三次见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下面是我们重要的收获：

“苏联军队将于8月8日在满洲各个据点部署妥当。

“斯大林重申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发言：俄国人民参加战争必须具备正当的理由，而这就要看中国是不是愿意同意雅尔塔各项建议。

“他第一次说他愿意在宋子文来莫斯科的时候，直接同宋商谈这些建议。他希望能在7月1日以前见到宋子文，并盼望我们能同时同蒋介石商谈这个问题。由于斯大林就远东问题作了如下的发言，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样做似乎是十分必要的。

“他使我们完全相信他将于8月间开始攻击。因此，重要的是



宋子文应于7月1日以前来到这里。斯大林准备随时接見他。

“斯大林毅然决然地說，他将尽一切努力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統一。他并且說，这种领导在战后还应当繼續保持下去，因为沒有其他的人像他那样强大。他特別提到沒有哪个共产党領袖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統一中国。尽管他对蔣委員長有許多保留的意見，但他仍建議支持这位委員長。

“他重申他在雅尔塔會議上提出的全部意見，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統一的和稳定的国家，并希望中国控制整个滿洲，把它作为統一的中国的一部分。他断然說，他对中国沒有領土要求，并且特別提到滿洲和新疆，他还說，在他的軍隊为了打日本人而进入的任何地区，他都将尊重中国的主权。

“斯大林說，他将欢迎蔣委員長的代表同他的軍隊一同进入滿洲，以便在滿洲設立中国的行政机构。

“斯大林同意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并且特意表示美国是战后能够用自己的資源在經濟上援助中国的唯一的国家。他认为在未来的許多年內，俄国人将忙于用自己所有的力量来巩固苏联國內的經濟。

“斯大林同意应当由中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共同托管朝鮮。”

至于日本，霍浦金斯报告說，斯大林准备貫徹无条件投降的原則，以便永远摧毁日本的軍事力量和武装。但是他认为，如果我們硬要它无条件投降，它就会頑抗，而我們就不能不像粉碎德国那样去粉碎它。但如果日本人表示願意投降，爭取較寬大的条件，那末盟国就应当放棄业經宣布的要它无条件投降的政策，而准备接受另一种投降形式。他預料我們可以通过占領部队来实现我們的意志，从而在实质上收到通过无条件投降所能获得的效果。他还說，俄国期望分担对日本的实际占領，他盼望同我們和英国就占領地区問題达成一項協議，并就盟国在滿洲和中国进行軍事活动的地

区达成諒解。

我在5月31日拍电报給霍浦金斯：

“我們將把斯大林想要在7月1日以前于莫斯科会見宋子文的意图轉告宋氏，并为他准备必要的航空交通工具。

“在宋子文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我就將同蔣介石談判在雅尔塔會議上所提出的条件。”

霍浦金斯同斯大林最后商談的是关于联合国的投票程序的問題。霍浦金斯报告說，斯大林显然是不懂得这里面所牽涉到的問題。在霍浦金斯將这些問題加以澄清以后，斯大林便接受了我們所采取的立場，尽管莫洛托夫反对，他摆手势加以制止。但是斯大林指出，他不认为“一个国家并不因为它的国家小就是有道义的”，有些小国家对过去世界上的許多糾紛是負有責任的。他着重表示他不願意让苏联的利益因为这样一些国家而受到影响。

我从霍浦金斯那里获悉斯大林已证实在雅尔塔會議上所达成的关于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諒解一事，使我感到寬慰。我国的軍事专家曾經估計过，进攻日本至少要使美国死伤五十万人，即使当时日本在亚洲的軍隊被牽制在中国大陆的話。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對我們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雅尔塔會議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意必須剝夺日本人从1894年以来所攫取的全部战争果实。这里面包括1904—1905年日俄战争以前原来归俄国所有的某些土地和特权。由于这一協議牽涉到中国的利益和海港，美国曾經表示贊同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

我們駐中国的大使佩特里克·赫尔利將軍給我拍来了几封很长的电报，詳細地談到了战争期間我們在中国的經驗，以及罗斯福告訴他的关于雅尔塔协定涉及中国的条款。赫尔利报告說，他一直是能够和蔣介石商談一切有关問題的，但他从未向蔣透露关于

雅尔塔會議的任何協議。赫尔利大使在5月10日拍电报給我說，在关于大連港的一段中，除了两处措詞以外，他“相信他（蒋介石）会同意每一个要求的”。这两处用詞是“租用”和“优越”，因为这两个詞在中国人民看来含义很坏。

赫尔利的电报說：“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个人都曾叮囑过我，他們二人已达成協議，一直要等斯大林向我发出了信号，我才能和蒋介石开始談判关于雅尔塔決議的問題。斯大林說他願意給我全权，由我自己考虑在甚么时候和以甚么方式提出這個問題。但是，哈里曼和我都认为最好是暫緩提出這個問題，因为怕走漏消息，引起不好的結果。我向斯大林說明了这一点，最后决定現在暫不由我向蒋介石提出這個問題，必須在我們认为是适当的时机，向斯大林請示并得到他的信号以后，再向蒋介石提出這個問題。”

現在，赫尔利提出已經到了采取这一行动的适当时机，他請我給他一道命令去請求斯大林准許他告訴蔣委員長关于雅尔塔會議达成的有关远东的決議。

5月12日，我給赫尔利如下一个电报：

“請繼續努力完成罗斯福总統向你指示的各项任务。

“我已获悉你前此关于各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态度的一些报告，希望你报告中所提到的同丘吉尔和斯大林所达成的協議能够导致建立一个自由、統一和民主的中国政府。

“至于雅尔塔协定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未來行动的‘序曲’問題，你目前不宜把任何消息告訴中国政府。

“在适当的时机和对共同事业有利的情况下，我将指示你把届时可能已經生效的具体安排通知中国政府。

“我們將努力通过你并在一个尽可能早的日期使蒋介石得到关于这一問題的一切消息，只要这些消息宣布以后无损于整个事业的前景。”

赫尔利大使除了担任駐中国的大使职务以外，还由罗斯福总统委托了他两件特殊的任务。第一件是促使丘吉尔和斯大林就美国在中国所一向奉行的政策达成一项协议。这个政策就是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促使中国所有抗日武装部队统一于全国性的政府之下，并且贊助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政府的愿望。第二件任务是继续坚持中国应建立自己的领导，作出自己的决定，对自己的政策负责，从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前途。

在我们努力巩固和支持中国实现其战争计划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进行许多活动，也进行过微妙的外交谈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向中国派遣了许多美国顾问，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过第一流水平的意见，曾经给与它各种各样的贷款。1945年5月14日，过去曾一度拜访过我的宋子文外交部长来看我，要求我撥付给他两亿美元的黄金（1942年1月，国会曾经批准貸給中国五亿美元，其中两亿美元尚未付出）。宋子文說，中国目前很需要这笔黄金来支持自己的经济，因为它正遭到通货膨胀的严重灾难。

据我所知，在七年期间，中国的物价每月平均要漲10%，最近三个月漲得更厉害，每月超过30%。由于物价这样高漲，中国政府只好印发更多的鈔票，而通货膨胀便达到了“野馬奔馳”的状态。

财政部和国务院建議可以根据我们的协议付出这笔黄金，虽然我认为中国所更加需要的是进行紧急的财政上和經濟上的改革。因此我还是批准了把这笔黄金运到中国去。我还批准了财政部长摩根索写給宋子文博士的一封表明美国立场的信。摩根索部长的信指出，对中国的这五亿美元财政援助，特别是1943年7月所达成的关于把黄金运往中国的协议，其目的是要帮助中国实现制止通货膨胀的计划，从而加强人们对中国政府的信心，使其在财政

上得到巩固，这样来帮助中国維持它的經濟。

摩根索部长写道：“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出卖黄金的办法已证明对消除通貨膨脹并没有发生什么效果。

“并且出卖黄金所采取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中国引起的輿論的指責，对于美国給予中国財政援助的目的也并没有帮助。

“因此，我們請中国政府郑重考虑一下美国財政部在1945年5月8日的备忘录中所建議的一些办法，特别是关于中国应当从其外汇資產中設立为数五亿美元的一笔基金来制止通貨膨脹和穩定币制的建議。

“这一步驟无论現在或将来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它将加强人們对中国政府应付其困难的經濟局面的信心……

“进行有效的改革将比出售黄金的办法更能坚定人民的信心和穩定目前經濟和財政的局面。……”

6月4日，当我从霍浦金斯那里听到斯大林現在准备和中国人会談的消息以后，我拍了一个电报給赫尔利大使。

电报略称：“在最近的将来，你可望得到指示，爭取蔣介石贊同一項至关重要的軍事和政治任务；如果这项任务获得贊同，那就会根本地对我們有利地改变你那一地区的整个軍事局面。

“宋子文已前往莫斯科商談同一問題，特此告知你，保密。”

电报最后說：“为了避免泄漏这项絕密的消息，上述指示将迟至宋子文到达俄国以前不久再告訴你。”

6月7日，斯退丁紐斯从旧金山告訴我，宋子文博士已乘飞机前来看我。

我在6月9日上午11点钟接見了宋子文。陪同这位中国外交部长一道来的是代理国务卿格魯。

我告訴宋子文，斯大林說他对中国沒有領上要求，并贊成在蔣介石领导下統一中国。但是斯大林希望把日本在1904年从俄国手

中搶過去的太平洋上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俄國，而且他希望俄國在參加對日作戰以前能同中國就這一問題達成協議。

在這次會談以後，我便指示代理國務卿給赫爾利大使拍發了如下一個電報：

“你是知道 2 月間達成的那項協定的<sup>①</sup>，根據這項協定，總統應當採取措施，以便取得蔣介石對蘇聯政府提出的下列諒解事項的同意。

“斯大林希望在 7 月 1 日以前直接和宋子文在莫斯科討論他所提出的建議。

“(一)斯大林曾經向我們發表一個斬釘截鐵的聲明，說他將盡一切可能促進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

“(二)這種領導在戰後還應當繼續下去。

“(三)他希望有一個統一的和穩定的中國，並希望中國控制整個滿洲作為統一的一部分。

“(四)他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在他的軍隊為了同日本人作戰而進入的任何地區，他都會尊重中國的主權。

“(五)他歡迎蔣委員長的代表同他的軍隊一同進入滿洲，以便在滿洲設立中國的行政機構。

“(六)他同意美國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七)他同意由中國、英國、蘇聯和美國共同托管朝鮮。

“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如下，如果答應這些條件，蘇聯將在 8 月間發動攻勢：

“‘1.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

“‘2. 由日本 1904 年背信棄義的進攻所破壞的俄國以前權益須予恢復，即：

---

<sup>①</sup> 即羅斯福在雅爾塔達成的協定。

“‘(甲)庫頁島南部及邻近一切島嶼应交还苏联，

“‘(乙)大連商港須国际化，苏联在該港的优越权益須予保障，  
苏联租用旅順港为海軍基地須予恢复，

“‘(丙)对中东铁路和作为大連的出路的南滿铁路，应設立一  
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苏联的优越权  
益应予保障，而中国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島群島須交予苏联。

“‘4. 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簽訂一項中苏友好同盟条約，  
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鎖下解放中国的目的。’

“告訴蔣介石，罗斯福总統在雅尔塔會議上已同意苏联就其参  
加对日作战的問題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我也同意这些要求。

“这项消息业已告訴宋子文。

“茲命令你在6月15日同蔣介石談判這個問題，并且尽一切努  
力爭取获得他的贊同。”

6月14日，我在宋子文博士离美回重庆以前再一次和他会見。  
在座的还有格魯和查尔斯·波倫。我告訴了宋子文博士关于哈  
里·霍浦金斯和斯大林元帅在莫斯科进行的会談中的一些要点。

宋子文博士回答說，他听到我所告訴他的事情感到很高兴，但  
是他希望我能注意到少数几个必須加以澄清的問題。他說，雅尔  
塔會議取得的諒解要求恢复俄国在滿洲的权益，而这些权益都是  
由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而丧失了的。

宋子文說，在1924年訂立的两个条約中，苏联政府已經放棄了  
它在中国的一切租让、租借和其他特权，其中也包括治外法权。他  
补充說，在他到莫斯科的时候，有必要和斯大林把这一切問題澄清  
一下，如苏联在大連港的‘优越权益’一詞的含意等等。宋子文指  
出，苏联要求中最困难的一条是租用旅順港。中国政府和人民現在  
在极共强烈地反对任何在中国恢复特殊租用港口的旧制度，要接

受俄国在这一点上所采取的立場是很困难的。

我像前次一样向宋子文进行解釋，我說我迫切希望看到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以便縮短战争的时间，从而拯救无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但是，尽管这是我当前所主要关心的問題，我告訴他我希望他了解我不会做出任何損害中国——我們的远东朋友的利益的事情。

我对他說，我最感到焦虑的是想要避免在远东或欧洲撒下可能在将来引起糾紛和战争的火种。宋子文回答說，他很高兴听到这句话，并且說，在世界各国中，还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被中国看作是朋友的。

我于是拍給斯大林如下一封电报：

“宋子文今天乘飞机离此經重庆前往莫斯科。

“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商談締結中苏协定的細节。

“已指示赫尔利大使在6月15日把苏联的条件通知蔣介石，并尽一切努力取得他的同意。还指示赫尔利大使通知蔣介石，美国政府将支持雅尔塔协定。”

我还給丘吉尔拍发了一封类似的电报，这位英国首相回电說：“我完全同意并欢迎这些安排。”



## 第十二章

### 联合国的产生

作为美国总统，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再次肯定美国有赞助一个世界机构来维持和平的愿望。在宣誓就职后数分钟内，我就声明美国将参加旧金山会议，会期将不迟延，计划亦不改变。

我愿意使大家明确知道，对于建立一个防止战争维持和平的国际机构，我是极端重视的。我知道在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遇到许多的陷阱和障碍，但我也知道，假若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构，我们将注定永远蒙受毁灭的威胁。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开始行动，不管第一步是多么的不完善。就连我们本国的宪法机构，在未实现一个实际可行的联邦时，也是经过许多考验和变化，甚至经过一场流血的战争的。

我盼望总有一天我们能建立起一个国际机构，终于能在像美国联邦同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我曾研究过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伟大计划”。该计划号召一些欧洲独立自主的国家建立一种联盟，一致行动，防止战争。据我所知，这个计划是所有倡议中第一个实际可行的国际组织。伍德罗·威尔逊在筹划国际联盟时一定想到这个计划的。据说国王亨利四世曾和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讨论过这个意见，在他赴德国讨论他的计划时，不幸在途中被刺殒命。有人认为亨利并非这个计划的首倡者，他不过从他的财政大臣萨利公爵那里抄袭来的罢了。但我认为是亨利独创这个计划的人。

我也仔细地阅读了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国际联盟的一切写作和演讲。我逐字逐句地读过参议院关于凡尔赛条约的辩论纪录，

看到伍德罗·威尔逊所謂的一小撮“頑固者”曾陰謀阻止美国参加国际联盟。

罗斯福和我決定用預先取得两党領袖参加和同意的办法，來避免重蹈伍德罗·威尔逊的覆轍。为保证參議院的通过，罗斯福和我二人坚持，赴旧金山联合国筹备會議的代表团中，要包括参众两院外交委員會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重要委員。代表团包括参众两院代表这种办法，在敦巴頓橡树园會議中曾經被采取过，这个會議提供了将要在旧金山會議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則。

在美国代表团赴旧金山以前，我和他們开会討論，并和許多个別代表談話。我告訴他們我的想法，并且在一些基本目的上和他們交換意見。我們同意应当努力建立一个机构，一切国家要授予它足够的权力，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我們知道，我們建議的这个机构的宪章，必須能为美国參議院所接受。我們不願意冒另一个国际联盟悲剧的危險，致使美国孤立地袖手旁观。我特別指令国务卿斯退丁紐斯每一举动都要和參議員康納利和范登堡商量，以取得他們的完全同意。假若不能获得他們的同意时，他就可以打電話給我，我就亲自在電話里和他們商談，以解决爭端。我請斯退丁紐斯用電話或电报与我保持經常的联系。在每天和每晚开会結束时打電話給我。任何时刻他都可以毫不迟疑地打電話給我。由于这种布置，一切重要事件他都向我請示，取得我的意見或批准。

斯退丁紐斯在給我打電話以前，經常与代表团商量，因此他能給我有关个别代表的报道和建議。另外，我时常同參議員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重要委員康納利和范登堡二人談話。我願意这两位樞要人物随时和我直接联系，使我从他們的意見和體驗中获得教益。

在整个長時間的討論中，我經常設法使苏联和英国同我們自己的目标協調一致。很明显，除非美国、英国、苏联在联合国的范

圍內通力合作，我們就得不到世界和平。我反对在基本原則上让步，但在小的問題上，假若它威胁到會議的进行，我是准备妥协的。

我經常記得我国宪法演进的历史和經驗。經過許多年以及一些修改和妥协，我們的宪法方能发生作用。要使一个国际机构有效地发生作用也需要許多年。在主权国家間的談判过程中，总会要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和痛苦的經驗。拟訂出一个世界宪章，比为一个国家創制宪法，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耐心。許多政治家要費尽心机方能获得一个实际可行的協議。但我始終认为政治家比战士更能沉得住气。

赴旧金山的美国代表团携带着几个由全体代表同意和經我批准的指令。1944年秋在敦巴頓橡树园會議的提議，是起草联合国宪章的藍图，但我們的代表团提出了几个修正案，通过国务卿呈交給我，让我考虑和批准。我仔細檢查了提出的这些修正案。它們被採納了，并且經過我的批准，成为在會議中的訓令和工作的指針。这些修正案是經代表团举行过許多次會議，以及我和他們的談話中产生出来的。这些談話在4月13日我就任总统的第二天就已开始，当时我接到国务卿斯退丁紐斯的一个全面报告。

斯退丁紐斯告訴我，罗斯福总统指派的代表团<sup>①</sup>每天开会审查敦巴頓橡树园會議提議的內容，并且考虑我应当在旧金山提出的任何修正案，或者別人提出而我們应当贊成的提案。例如代表团拟接受范登堡的提議，在联合国的宪章中要包括提到正义和国际法。斯退丁紐斯告訴我，代表团最后建議的修正案将呈交給我，由我酌定和批准。

在雅尔塔會議上已經同意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和法国将制

---

① 除斯退丁紐斯担任主席以外，代表团包括前国务卿科德耳·赫尔任高級顧問，參議員托姆·康納利，參議員阿瑟·范登堡，众議員索耳·布卢姆和查尔斯·伊頓，哈罗德·史塔生海軍中校和教务长佛吉尼亚·吉耳德斯利夫。

定一个新的托管制度来代替国际联盟的委任統治制度。这五个国家将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个托管制度将作为宪章的一部分。但在旧金山會議上不准备討論那些将被托管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将作为和平解决国际問題的一部分来处理。由于太平洋中某些战略地区对我国未来安全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对于在这个时候討論这个問題是否明智提出疑問。斯退丁紐斯說，这件事情在罗斯福总统逝世以前的数日中已經提交給他，并建議他从溫泉回来后与国务卿、陆軍部长和海軍部长等审查这个問題，而且他已答应照办。

托管制度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問題。当战争即将結束时，它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罗斯福总统和一些对于美国安全和国防負責的人面临着双重問題：第一，各附屬国人民的未来，特别是从敌人解放出来的地区的人民的未来；第二，对于战时日本用作陆軍和海軍基地的太平洋中的島屿的处理办法。这些是馬紹尔群島、馬利亚納群島和加罗林群島，其中共包括数百个小島和五万左右的土人。它們的总面积很小，約八百五十平方英里，但是它們散布在西太平洋的寬广地区之上。一旦落在敌对强国手中，它們就能又被利用来在那个地区對我們实行封鎖，割斷我国与菲律宾和关島以及英国与荷兰在那个部分的一些屬地的联系。它們也可被用来威胁我們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交通綫。这些島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日本管轄，日本人馬上在那里建設了防禦工事，并且禁止外国人参观。作为日本作战的基地，在战争时它們給了我們許多麻煩，所以我們不但願意接受托管它們，而且关于某些島屿，我們願把它們作为托管制度下的特別战略地区。随着美国軍隊将日本从島屿根据地逐一驅逐出去，太平洋战争的胜利現在已可肯定，而和平时期控制这些島屿的問題，在美国战后政策的发展中，便越来越重要了。

在早期同內閣閣員討論托管問題的會議中，我发现国务院与陆、海軍部持有不同的看法。对两种观点我都細心傾听。最后，在有关这些基地的安全这个主要問題上，我支持了陆軍和海軍部长的意見。但是我也看到国务院所爭执的理想是正当的——假若联合国任何时候願意观察这些島屿上的社会經濟情况，那么，联合国不应被禁止进入基地以外的地区。在国际联盟曾一度委任日本統治的地区中，美国将永远不采取日本的政策。这样，对一个未来的太平洋上的侵略者，我国既有充分自卫的保障，同时也为島上人民的未来建立自治政府打下了基础。

我的态度一貫是在和平确立以前，我們必須控制太平洋中的某些島屿，但这些地区对世界上別的国家不应关起門来。我相信我們应当尽快地建立民治政府（civil government）来代替軍事政府。虽然有些軍事領袖提出反对，但在我总統任內，我打算在我們負責的任何地区內尽力促成自治政府。我們在古巴这样作了。在菲律宾我們就要这样去做，在波多黎各这同样也是我們的目標。

我一貫反对殖民主义。在任何阶段不管可以提出什么样的理由来为它辯护，但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都是为美国人民所痛恨的。美国自己为反对殖民主义而进行了解放战争，所以我們对各处人民脱离殖民主义束縛的願望，将永远予以同情和諒解。罗斯福总統和国会提早給予菲律宾自治的意图正是这个政策和美国人民意志的一种表現，我决定要尽快地促其实现。

我願意看到英勇的菲律宾人民重新站立起来，并且作为一个自由和成功的共和国的公民而昌盛起来。我盼望菲律宾像古巴一样得到自由，这将影响英国、荷兰、法国在处理它們远东事务中的政策。

我还是相信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的哲学。

有些人反对在这个时候提出菲律宾独立的問題。有些人觉得

这是太平洋許多問題之一，最好等到战后再来解决。特殊利益集团的意見也听取了。它們要求得到攫取某些資源的时间，以便自行开采。甚至內务部长伊克斯也强烈地反对提早給予独立，起初在罗斯福后来在我面前对此事件采取了坚硬态度。事实上他甚至請我推迟与菲律宾总统奥斯敏納于4月19日的初次会面。对我和对罗斯福总统一样，他表现出激烈的反对。他曾致信在温泉休养的罗斯福总统說，假若提早給予菲律宾独立，他希望解除他对菲律宾的一切責任。

我拒絕了伊克斯任性的态度，并且决定設立促使菲律宾独立的必要机构。伊克斯在这个处理办法中将沒有他的份儿。4月19日我接見了奥斯敏納总统。第二次的会見决定为5月4日，我打算向他表示我执行我国公开声明过的政策的决心。

奥斯敏納总统是罗斯福在温泉最后接見的官方訪客之一。4月5日当罗斯福举行記者招待会时他在那里。会上罗斯福讲到他和奥斯敏納的談話。

罗斯福当时說：“我們两年前关于尽快給予菲律宾独立的政策，絕對沒有改变。”

在我第二次会見奥斯敏納以前，我曾告知在馬尼拉的麦克阿瑟將軍关于我催促迅速給予菲律宾完全独立的計劃，我还告訴他我不打算派送一位高級專員或特使，而仅指派一个以參議員泰丁斯为首的特別委员会赴馬尼拉，由他向我报告該群島的情况。馬歇尔將軍向我报告，已經得到麦克阿瑟將軍的答复，他完全同意我提議的計劃。

5月4日中午我接見奥斯敏納总统的时候，我們很快地就轉入了正題。我再次声明我願执行我們的一切諾言和保证，我并且說，我贊成独立的日期尽可能早点到来。我告訴他我已經与參議員泰丁斯談过話，請他率領一个委员会前往馬尼拉，并向我报告菲

律宾的情况。奥斯敏納总统表示了他对美国人民的深挚感激，并且說这是他本国的人民的一个重要日子。

次日，我就菲律宾問題发表了一个声明。

声明說：“我曾和奥斯敏納总统多次討論有关菲律宾独立的問題。这些討論，原是由罗斯福总统开始的。

“与菲律宾总统討論以后，我决定把罗斯福总统所制訂的尊重菲律宾人民的領土和独立的政策，加以承认并贯彻执行。

“按照国会在参議院司法委员会第九十三号決議案中的規定，独立的日期将尽可能地提前。菲律宾人民在这次战争中英勇忠誠的立場，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热爱和欽佩，在他們所面临的复兴和建設的重大問題方面，一定会得到美国充分的援助。

“由于参議院司法委员会第九十三号決議案而建立的美国和菲律宾間的特別关系，我相信在独立以后，两国間适当的互惠貿易应当繼續，直到为新生的共和国提供获得經濟上自由独立的良好机会时为止。这种經濟上的自由和独立，将使菲律宾爱国人民永远幸福。

“为了协助我达到这些目的，并在得到奥斯敏納总统同意的情况下，我請菲律宾复兴委员会主席馬里兰州参議員米勒德·泰丁斯以我的特使的名义，前往馬尼拉調查情况，并向我提出他的建議。

“我将不断努力帮助菲律宾。我切盼我們两国人民間經過多年有益的結合而发展起来的亲密友誼，將繼續保持和加强。

“我希望在菲律宾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能应奥斯敏納总统的邀請赴馬尼拉訪問。”

5月14日奥斯敏納总统再来見我，并簽訂一个协定，允許美国在菲律宾群島建立陆海軍基地。菲律宾群島是太平洋中极关重要的战略中心，我們希望同菲律宾訂立軍事协定，以便我們将来能繼續保护它們抵抗外来的襲击。菲律宾人民本身也迫切盼望获得这

样的保护。因为不如此，我們帮助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便很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而毫无办法。

4月19日，国务卿斯退丁紐斯带来已由我們旧金山代表团全体同意的一系列建議。我和他逐段进行討論，并批准以如下提綱作为給代表团的一般工作指示：

“題目：国际組織的宪章。

“出席联合国国际組織會議的美国代表团一致同意，在旧金山會議期間，我們应当对敦巴頓橡树园的建議提出一些修改。当然，在我們还不知道別国政府的看法的时候，对一切修改我們將抱最后的保留态度。最重要的几点是：

“宗旨

“(一)包括一項声明：該組織在調停或解决爭端时，应按照正义和平等的原則办事，該組織还应当促进国际法的发展。

“(二)包括一項声明：关于提倡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敦巴頓橡树园建議中，只在經濟与社会合作章中提到）。

“原則

“(一)‘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辞句改为‘各會員国主权平等’。

“(二)明确規定會員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彼此間的爭端，并且必須按照宪章規定的方法。

“大会

“(一)明确指出大会可随时討論任何与維持和平和安全有关的問題，大会对于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的問題提出建議的权力，应以特殊的建議为限。

“(二)給予大会决定會員資格的权力，除非安全理事会因为安全的理由提出抗議，大会可以自行决定接納新會員。

“(三)大会在會員国中分攤經費时应根据适当的比例分配。



“(四)增加建議的权力，使大会在提倡建立正义的措施、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被遵守，鼓励国际法規約的发展等方面，能提出各种建議。

“(五)扩大建議和平調解方案的权力，以便对可能違反大西洋宪章所宣布的原則的局勢以及違反任何条約和国际协定所产生的局勢，都能提出各种建議。

“安全理事会

“(一)删除可以成立軍事參謀委员会地区小組的規定。

“維持和平与安全

“(一)建議关于屬于一个国家內政事务的和平解决，不在安全理事会权限之內，并应声明不必受現有条件的限制——这些事务‘按国际法’是‘完全’屬于內政权限的。

“修改

“我們应当支持現在的提案，但我們慎重考虑提出或支持如下可能增加的一項規定：

“‘由大会三分之二票数的通过和安全理事会的同意，可决定联合国會員国大会的日期和地点来审查宪章。在代表大会中每个會員国只有一票。大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的关于宪章的任何修正案，当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按照各国的宪法手續和其他过半数會員国批准以后，即发生效力’。

“未作出最后决定的各种問題

“对以下問題我們曾加以考虑，但展緩作出最后决定，

“(一)序言的措辞。

“(二)自卫权利的定义。

“(三)經濟和社会合作章中措辞方面可能的修改。

“(四)可以退出的条款。”

我同意在未得到別国政府意見以前，在一切問題上，我們最好暫抱保留态度。我們不願使我們中美、南美和加拿大的邻邦政府面临既成事实。我們願意給他們一个机会說“我們不喜欢这个或那个。”

我們特別渴望西半球国家和英联邦真正與我們一致。我們觉得假若我們有这种支持，我們几乎可以获得我們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来建立一个能起作用的国际組織。

我向斯退丁紐斯強調指出了关于人权宣言的重要性。我深深感觉到需要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类似我們本国的“人权法案”。

关于賦予联合国大会权力的問題，我告訴斯退丁紐斯說，我觉得假若某个頑强的大国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来阻碍和平解决糾紛的努力，那末大会就应当有办法来处理这个問題。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要像在我国的众議院或參議院中那样，容許提出任何問題。但是各大国已經同意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国有絕對否决权，这主要是认为諸大国对任何重要的决定必須有一致的看法。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中，主权国家对自己的权利是很珍視的。我們必須承认这个事实，并且通过让步来寻找一致的行动。

我一貫盼望各独立国家能有一天制定出一个世界議會制度，像美国參議院和众議院一样。但是我知道，在国家主权对抗的現阶段，这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設法集中各国願意授予的任何权力，来防止侵略，保障和平。这就是我的想法，至于有关必須采取的最后形式的細節，那是次要的問題。

我也想到必須設法修改宪章。除非宪章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加以修改，否則它将变为陈腐的东西，不能作为有效的政府工具。我国的州多半曾經有过好几个宪法，而且这些宪法都經過多次修正和更改。美国宪法本身在1945年就有二十一条修正附則。在我和我們代表的討論中，我时常指出我們自己的宪法不但是一个模范，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說明一个宪法和政府是如何发展成长的。

在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时候，我們最好記住我們自己的历史。假若我們在旧金山得不到一个完美无缺的文件，我們一定能提出一些为時間所证明的必要修改，使它能发挥作用，保障和平。

我一貫相信，一旦世界各主权国家結合在一个世界組織中，并給这个組織适当的机会来进行工作，和平就能实现。

旧金山會議于1945年4月25日開幕。我未能参加，但国务卿斯退丁紐斯使我詳細地知道了會議进行的情况。

我曾經訓令我們的代表团投票贊成苏联的提議，接納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为所倡議的世界組織中的最初會員。

4月27日會議的总务委员会同意接納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共和国为联合国會員。当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与丘吉尔、斯大林同意支持苏联提出的接受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會員的主張时，他說他的目的是要保持俄国人的协商情緒。当罗斯福总统告訴我他在雅尔塔的决定时，他說他希望俄国人同我們一道，以一个大国的資格来协助建立联合国。他說当斯大林初次提出多票数时，这位苏联領袖希望得十六票。他希望苏联十六个共和国各得一票。罗斯福說：“这时我頂上去，說我們应有四十八票，我們四十八个主权州每州各得一票。这就結束了这个問題。斯大林再也沒有提起十六票的建議。”

我的意見是，一切主权国家最后都应当参加联合国。当然，我們和軸心国家仍保持着战争状态，但我相信，等到和平的条約簽訂以后，它們也将按照宪章的規定正式被接納为會員国。不应当拒絕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

在总务委员会的那次会议中，一貫引起麻煩的波兰問題再次被提出。据斯退丁紐斯的报告，莫洛托夫提議波兰临时政府应被

邀請參加會議。俄國的立場是，雅爾塔關於改組波蘭政府的決議是應當執行的，但波蘭不應當由於這個決議被拖延了而不讓它參加會議。

斯退丁紐斯回答說，按照克里米亞決議，在新的波蘭政府沒有組成以前，美國政府不能接受莫洛托夫的提議。艾登作了很強硬的聲明，贊成美國的立場，並且說英國政府因未獲得許可派遣代表進入波蘭，因此無法知道臨時政府是否得到波蘭人民的支持。

莫洛托夫此時提議這個問題應送到執行委員會里作初步的討論，但新西蘭和委內瑞拉的代表不贊成將這個問題送交執行委員會，而主張由三個有關國家來解決。但美國代表團主席指出，按照雅爾塔協定，在波蘭政府改組以前，會議沒有權利來討論這個問題。

莫洛托夫聲明蘇聯政府在這次會議上有權提出這個問題，並且希望將它提交執行委員會。這時比利時的斯巴克先生挽救了這個局面，他發表了動人的演說，他說他感到很失望，因為會議還沒有開始，就有人把這個最傷腦筋的爭執的問題提出來。他表示恐怕這樣下去，會議將永遠不能處理實際問題，他隨即提出了一個議案，表示會議希望波蘭政府由五個發起國家幫助改組以後，立刻派代表參加。經過長時間和頗為劇烈的討論以後，莫洛托夫聲明他將不勉強對他的提議進行表決，於是斯巴克的提議被採納了，三十一個國家投票贊成，沒有一國反對。

我們代表團的立場是與我們的政策相符合的。我對波蘭政府拒絕按照雅爾塔協定改組大有意見。在未改組以前，我們將反對波蘭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但莫洛托夫不讓這個問題安靜下來。

6月1日執行委員會全體通過接納兩個蘇維埃共和國為會員國，此後並在大會全體會議上口頭表決通過。同日，阿根廷參加會議的問題被提出來。這是由墨西哥和智利代表團向執行委員會提出的，這個提議得到拉丁美洲其他代表團的支持。

莫洛托夫发言反对，他打算利用这个时机来实现波兰参加会议的要求。他辯論說，阿根廷在战争时期一贯帮助了敌人，如果阿根廷被邀请而波兰不被邀请参加，这对会议的威信将是一个打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建議延迟到下次委员会会议再作討論。他觉得战时阿根廷是亲法西斯的，并且是反对联合国家的。但是他也承认阿根廷回到国际大家庭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而且也許它应被接納。

斯退丁紐斯声明美洲各共和国希望阿根廷在旧金山有代表参加，美国对它的姊妹国家的願望表示完全同意。

莫洛托夫想要将問題送到四个发起国家先作初步的討論，但艾登說他看不出延緩决定会有什么用处。墨西哥請阿根廷参加会议的提案于是付诸表决，以九对三票获得通过。俄国、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投票反对，中国和伊朗棄权。

这天上午总务委员会接着对这个問題作了长时间的討論，莫洛托夫采取同样的立場，他极力想把阿根廷和波兰問題連系起来。但是，苏联延迟討論这个問題的提議以七对二十五票被否决，厄瓜多尔的接納阿根廷参加会议的提議以二十九票对五票通过。反对厄瓜多尔提議的有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比利时和希腊。

在全体會議中也提出了这个問題。同样的提案再次被提出，苏联的提議被否决，拉丁美洲的提議被通过，票数几乎像总务委员会的记录一样。

美国一年以来拒絕承认阿根廷的法雷尔政府，因为它进行过亲軸心国家的活动，又因为它未曾遵守美洲各国間关于美洲共同防御的协定。但在4月9日，阿根廷又被接納加入泛美联盟，在法雷尔政府对軸心国家宣战以后，我們便承认了这个政府。

我觉得阿根廷的举动很像杂耍的“乐队車”一样，但我指令斯退丁紐斯在适当时机支持接納阿根廷，以促进西半球的团结。

5月3日，罗森曼和斯退丁紐斯同艾登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议，讨论战争罪犯的处理问题。罗森曼法官提出了美国的提案，以图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达成协议。

在前一天，5月2日，我公布指派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罗伯特·杰克逊为美国代表和总顾问来进行准备工作并向欧洲轴心国家的战争罪犯提出控诉。我国政府从战争最早的日子起就提出采取惩罚战争罪犯的政策。1942年8月罗斯福总统向纳粹分子提出过警告：“总有一天他们会要站在目前受他们压迫的国家的法庭里，受到应有的惩处。”1942年10月7日，他声明：“我国政府的愿望是，战争的胜利结束，应当包括关于向联合国家交出战争罪犯的规定。”罗斯福也曾说过，美国准备同英国和其他政府共同来建立调查战争罪行的联合国家委员会。

现在旧金山的罗森曼法官曾代表罗斯福总统本人，在伦敦与英国开会讨论关于战争罪犯问题。我就任总统后，罗森曼告诉我，讨论中大家已暂且同意，任何战争罪犯，如有确切证明，即应送回到他犯罪的国家，由那个国家加以审判和处罚。六个或更多一些的罪犯头子（原来的名单包括希特勒、墨索里尼、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和馮·里宾特洛甫）将由一个混合军事法庭进行特别审判。这个法庭将包括四名法官——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各派一名（或者再添加代表联合国其他较小国家的三位代表）。

这个审判将包括对他们提出一个起诉书，利用各种文件来陈述这些人侵害人类的罪行——如纳粹压迫少数民族的正式法令；《我的奋斗》书中的摘录；集中营、酷刑室、焚葬场等的照片。起诉书完全掌握了确凿的证明，基本上不需要任何口头证明。罪犯每人都可给予一份申诉书，并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时间都预先规定好，因此审判就不至于拖延下去。

其他的大量战争罪犯，如对其身份缺乏充足的证明，或者犯罪

的证据搜查不到，就要因他們参加过罪恶的組織——如盖世太保、党卫軍等类似的組織——加以审判定罪。

罗森曼告訴我，英国战时內閣曾于罗斯福总统逝世的那天，在还没有接到他逝世的消息以前，举行过一次特別會議討論这个問題。罗森曼听到噩耗以后馬上离开倫敦，但在未动身以前，大法官告知他，英国战时內閣一般地贊成那个临时的協議，但一致反对审判六个战犯头子。他們的看法是，这些罪犯不应給以审判，而应由四大国協議用政治手段处理他們，立刻予以枪毙。此外，丘吉尔首相告訴罗森曼，他本人也有同样的意見，而且在发布莫斯科声明的时候，他也这样告訴过斯大林元帅，但斯大林坚持审判。

我告訴罗森曼，我不认为应当用政治的手段来处理头号战争罪犯，而相信应給他們某种审判。我随即請罗森曼法官前往旧金山，与莫洛托夫和艾登討論这个問題。

在旧金山，罗森曼告訴艾登和莫洛托夫，我們提議設立一个国际軍事法庭来审判納粹头子和盖世太保、党卫軍等一类的組織，罪状是进行罪恶阴谋。他还告訴他們，我們反对英国用政治处罰来对待納粹党魁的建議。

艾登声言英国战时內閣最近改变了态度，因为許多納粹头子已經自杀或者被杀，而且无疑地在开审以前很多的納粹領袖将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战时內閣仍不反对正式的政治审判，但是假若俄国和美国贊成法律审判方法的話，英国也准备同意。对此莫洛托夫沒有表示什么意見。5月6日罗森曼法官打給我一个电报：

“事情頗为順利。法国、俄国和英国的代表目前似乎一般地同意我們的主張，由各国派出一位代表組成国际軍事法庭；对重要罪犯施行审判而不作政治处理；由四名高等顧問組成委员会，由四大国各派一名。”

根据斯退丁紐斯 5 月 21 日的报告，由創始国提議的安全理事会的投票手續，遭到了几乎一切小国的攻击。他們攻击的目标是雅尔塔協議中所規定的大国否决权。

按照这个協議，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和法国在安全理事会每逢遇到涉及軍事或經濟制裁問題时都有否决权。我們一切的民政和軍事专家对此表示贊成，沒有这样的否决权任何協議將不能被参議院通过。各小国施加很大的压力，企图修改雅尔塔所采取的投票程序，特别是关于和平解决爭端和修改宪章的批准程序。在和平解决爭端問題上，这就意味着假若五大国不在糾紛之內，就不需要它們的一致同意。我們的代表团在苏联准备接受这种修改的条件下是可以表示同意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代表团建議，除非苏联願接受这种修改，雅尔塔决定的方式是应当坚持的。在任何情况下，我們的代表团认为在宪章的修改上不应当有什么改变。

5 月 8 日莫洛托夫离开了旧金山回莫斯科。

斯退丁紐斯向我报告說：“今晨莫洛托夫很高兴地动身經由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回莫斯科。他上飞机时，特別托我向您致意。

“艾登今早私下对我說，他收到首相的信，因为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希望他和艾德礼立刻回到倫敦去。艾登觉得他們在几天內必須回去，但他向我保证将要在這裡搞完这个星期。

“阿弗里尔·哈里曼今天下午即离此去华盛顿，他抵达后当立刻向您报告。……”

5 月 9 日以后，創始国的會議被称为五大国会議，因为法国参加了这方面的一切討論。代表大会进行得也頗順利，完成了一切初步的討論和協議。重要的工作目前都由各种不同的委员会主持。

理事会中的否决权問題漸漸成为會議中爭論的焦点。

就联合国大会問題进行討論的委员会还同时通过了創始国所



倡議的范登堡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授权大会可以建議对任何局势采取和平調解的措施，不論这种局势的起因是什么，不論它是由于損害到各国間友好关系的普遍利益，或者是由于違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則和宗旨而造成的。

5月22日我請斯退丁紐斯回華盛頓見我。我希望仔細審查一遍會議悬而未决的重要問題，并討論确定最近的閉会日期。

在旧金山所获得的进展令人振奋。看到一个包括这么多国家和涉及这么多特殊利益的會議，虽有时爭論得很激烈，但危机发生得很少，这使我感到很放心。

我們的代表团工作得很出色。敦巴頓橡树园會議所打下的基础，以及曾經由美国參議院樞要人物提供过意見的关于联合国的初步討論，都給了他們很大的帮助。查普德庇克會議<sup>①</sup>也使拉丁美洲各邻国获得了协调，在他們赴旧金山时已准备在世界組織問題上彼此合作。

国务卿于5月23日抵華盛頓，我同他檢查了會議仍待解决的每一个問題。我告訴斯退丁紐斯我們在安全理事会投票問題上坚持雅尔塔决定的方式。我們既已許諾，就應該坚持这个方式。

关于目前正在討論的退出联合国的权利問題，我同意范登堡和康納利两位參議員的意見，那就是不应当特別限制任何国家退出的权利。但同时我也同意代表团的看法，在現阶段通过这样的修正案是很不适宜的。

我反对那种认为我們必須坚持世界法庭的裁判权应以自願为基础的建議。我觉得我們既然要有一个法庭，它就應該是有效力

---

① 查普德庇克會議于1945年2月21日至3月8日在墨西哥城的近郊查普德庇克举行。会上簽訂了一个战时的公約，把拉丁美洲国家置于美帝控制之下。公約規定任何“侵略”美洲一国的行为等于对整个美洲国家的“侵略”，締約国家应謀協力“防御”。——譯者

的，有強制的裁判權。因此我命令斯退丁紐斯努力尋求一個法規，至少最後使國際法院有強制的裁判權。

尚待解決問題之一是會議結束的日期。有人曾經建議暫時休會，因為幾位重要的外交部長，如莫洛托夫、艾登、宋子文等，已因緊要公務他去。在大會未完成它制定憲章的重要任務以前——這個憲章須送許多國家批准——我反對在任何的借口下延期。休會即使是短暫的也很可能危害會議的順利進行和使已經完成的工作複雜化。所以我命令斯退丁紐斯繼續工作，以期達到延至6月初閉幕的目的。

在會議的過程中，四個創始國——美國、英國、蘇聯、中國——和法國代表團的領袖們養成了在懸而未決的問題上彼此協商的習慣。到6月1日，尚待解決問題的數目已大大減少，只有其中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安全理事會的投票程序——仍未解決。斯退丁紐斯告訴我，他可以肯定這個問題一旦解決，其他問題如選舉秘書長和國際法院法官的手續與設立籌備委員會等，就可迎刃而解。

關於安全理事會投票程序的爭論似乎已陷入僵局。真正的焦點在於，對一個爭端的討論和協商，是否可由理事會中的一個常任理事國使用否決權而中止。俄國堅持否決權，但我們和英國、中國、法國一起，反對這種做法。我們覺得，這樣來使用否決權，將限制理事會的自由討論。

6月2日晨，斯退丁紐斯用電話向我報告情況，在這個問題的結尾，他提出斯大林是否真正知道他的代表團所堅持的立場。斯退丁紐斯認為，我們從前幾次中發覺斯大林並不是經常地获悉克里姆林宮發出的一些訓令，有時是莫洛托夫沒有通知他的上級而發出的。

既然哈里·霍浦金斯此時正在莫斯科與斯大林商談，斯退丁紐斯建議我們直接聯繫，看這樣是否可以打破僵局。我告訴斯退

丁紐斯致電給哈里曼大使和霍浦金斯，請他們向俄國總理陳述安全理事會投票程序的問題。

6月6日我從霍浦金斯那里得到消息，那天他同斯大林談到我們對於投票程序有關否決權方面的立場。

霍浦金斯的電報說：“我們……向他陳述在舊金山關於投票程序的僵局。斯大林不了解癥結的所在。經過有莫洛托夫積極參加的長時間討論後，斯大林否定了莫洛托夫的立場，並且說，美國的立場他是可以接受的。假若葛羅米柯還沒有得到訓令，應通知哈里曼。”

這就意味着威脅整個會議，使會議瀕於瓦解的僵局打破了。

次日斯退丁紐斯報告說，葛羅米柯已從莫斯科接到訓令，他的政府已同意我們對於投票程序的立場。

這樣，四個創始國和法國在投票程序問題上完全取得了協議，結果，沒有任何國家能阻止安全理事會解決某個爭端。

這個問題既已解決，大家同意用盡各種努力使會議於星期六即6月23日結束。但是我們還必須拖延一下。俄國再次提出異議，我們又必須越過他們的代表團和莫斯科直接討論問題。莫斯科又接受了我們的意見。這次爭執的是關於聯合國大會的權利問題，在各會員國有代表參加的大會上，應有權自由討論一切問題，并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建議。這成為各小國在聯合國中能分享權利的象征。

向憲章提出的修正案表現了小國的立場，它規定“大會有權討論國際關係範圍內的任何問題，並（除某種特別例外）……在任何這樣的問題上，有權向這個組織的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同時向以上二者提出建議。”

斯退丁紐斯告訴我，大多數代表擁護這個提案。6月4日葛羅米柯向各代表團領袖聲稱，俄國將堅持刪掉這一節。澳大利亞外

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作了一个强硬的演說，为这个提案辯护，他的話一般地代表了各小国的意見。斯退丁紐斯向我报告說，这个提案已越来越获得有力的支持，因为它給各小国一种发言权；各小国看到安全理事会的优越地位，特别是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特权，本来就感觉很不光彩的。

俄国反对这个修正案，我命令斯退丁紐斯直接与莫洛托夫联系討論这个問題，并說如果没有結果，我将直接与斯大林商談。

6月18日斯退丁紐斯致电莫洛托夫。6月19日我离华盛顿前往西海岸，在华盛顿州稍停后，即赴旧金山，以便在閉幕那天向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說。莫洛托夫的回电是寄到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城交給我的。他建議稍稍改变俄国原来的立場，但我們仍不能接受。我命令斯退丁紐斯再作一次嘗試。

莫洛托夫最后接受了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它規定大会有权討論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問題，只要安全理事会已开始討論处理这个問題，同时大会也有权在这种問題上向联合国的會員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同时向二者提出建議。制定联合国宪章道路上最后的障碍物現在被清除了。

6月25日下午我乘“圣牛”号飞机从奥林匹亚到达旧金山。当地的人民給了我极盛大的欢迎，当我从汉密尔顿机场乘汽車进城的时候，上百万的人民出来迎接。我和美国代表团一同住在費尔芒特旅館，当晚为出席會議的代表們举行了招待会。

次日下午三点光景，我偕国务卿斯退丁紐斯和美国代表团的 其他代表一起赴退伍軍人战争紀念館参加联合国宪章的签字仪式。我們由人陪同走上該館大礼堂的讲台，台上联合国各国的旗帜組成了一个令人感动的背幕。

国务卿坐在圓桌边，我坐在他右边的位置上。桌子上摆着包括联合国組織五种官方文字写成的新宪章的书册。当国务卿代表

美国签字的时候，我走向前去同他握手，感谢他的卓越成就。

参议员托姆·康纳利随后签字，跟着美国代表团其他代表也签了字。代表团包括科德耳·赫尔，他在华盛顿签字。为了他们在这个历史性成就中的贡献，我向他们每个人一一表示谢意。然后我们前往歌剧院，我在那里向全体大会的最末一次会议发表了演说。

我说，“你们方才签字的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固的基础，在它上面我们可以建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此你们将在历史上受到尊敬。在欧洲胜利以后和对日最后胜利以前，在这次比一切战争都被破坏得更厉害的战争中，你们已经战胜了战争本身。

“饱经忧患的人民热望产生一部这样的宪章，这种希望帮助他们保持勇气，度过战争最黑暗的日子。因为它是世界各国伟大信念的宣言——相信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相信和平是能够保持的。

“假若几年前我们就有了这个宪章，特别是具有实行这个宪章的决心，那末千百万的死者今日当仍活在人间。如果将来我们使用这个宪章的决心不够坚强，那末现在的千百万生者就一定会遭到死亡。

“许多人已经说过，这只是走向持久和平的第一步。这是真实的。重要的是，我们一切的思想和我们的一切行动应根据这个认识，而事实上这只是第一步。让我们牢牢地记在心头，我们今天以一个良好的开端开始，让我们的眼睛永远注视着终极的目标，向前迈进。

“我们本国的宪法来自像这样的一个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是由许多不同意见的代表组成的。像这个宪章一样，我们的宪法是从矛盾的意見，经过自由的有时是尖锐的争论而产生的。当它被采纳时，没有人认为它是完美无疵的文件，但是它生长、发展、扩大。在它的上面建立了一个更大、更美、更完善的联邦。

“这个宪章，像我們自己的宪法一样，随着时代的前进，将获得发展与改善。沒有人承认目前它是一个最終的或者完善无缺的工具。它不是灌入任何一个固定的模型而鑄成的。改变着的世界情况，将需要一些調整——但这些是屬於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調整。

“我們現在居然有了这个宪章，这就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事情。这也是我們需要深深感謝全能上帝的緣故，在我們通过世界机构寻求和平的道路上，他把我們领导得这么远。

“曾有許多人怀疑，在种族、宗教、語言、文化上如此差異的五十个国家能达到任何協議。但在一种不可动摇的坚强团結中——为覓致停止战争的途徑而斗争，这些差異都是不足挂怀的。

“从許許多多的辯駁和爭論以及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我們找到了一个同意的途徑。在众目睽睽的注視下，遵照爱好自由人民的傳統，我們坦白地和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見。五十个爱好和平国家的信心和希望在这个世界的讲坛上被提出来了。我們克服了一切分歧意見。这个宪章不是任何或大或小的一国或数国的产物。它是互相妥协、寬大容忍他人的看法和利益的結晶。

“它证明国家像一个人那样，能陈述它們的不同意見，正視这些不同意見，然后找到共同的根据。这是民主的基本要素；这是保持未来和平的要素。由于你們的協議，我們看到了未来岁月中取得協議的途徑。

“这个會議的成功，主要由于你們把你們的思想坚定不移地放在主要的目标上。你們唯一的任务是制定一个宪章——和平的宪章。你們坚持了这个任务。

“你們不顾許許多多騷扰你們心神的事物，不管是关于新的国界、对德国的統治、和平解决爭端、賠償、战争罪犯、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形式等每日碰到的問題和爭論——你們不顾这一切，还是繼續进行了制訂这个文件的工作。

“這些問題和許多將要發生的別的問題，都是困難和複雜的。它們是容易引起爭論和具有危險性的。

“但是在戰爭時期，由於團結一致的精神，我們相聚一堂，並且解決了甚至更加困難的問題。本着同樣的精神，只要我們保持我們的原則而決不放棄我們的目標，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和將來所遇到的一切問題，也是可以獲得解決的。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考驗過合作的原則，並看到它是有效的。通過物資的匯集，通過聯合的軍事指揮，通過經常舉行的參謀會議，我們看見了在戰爭中團結力量的功能。這種團結的力量迫使德國投降，並且也將迫使日本投降。……

“你們在舊金山的成就表明你們如何地從軍事和經濟合作中取得深刻的教訓。你們為世界和平與安全以及人類進步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工具。

“現代世界必須使用這個工具。

“假若我們不使用這個工具，我們就是辜負了那些為了使我們能在这里自由和安全地開會來創造這個工具而犧牲自己生命的人。

“如果我們打算自私自利地來使用這個工具——為了任何一國或任何一小撮國家的利益——我們將同樣地犯了背信棄義的罪惡。

“成功地使用這個工具，需要創造這個工具的自由人民的團結意志和堅強決心。這個任務要求我們大家貢獻我們道義上的全部力量。

“我們大家必須承認——不論我們的力量多么強大——我們必須放棄那種經常為所欲為的極端自由。沒有一個國家或區域性的集團，可以或者希望以損害任何別的国家而獲得任何特權。假若任何國家願意保持它自己的安全，它必須準備和願意同大家共

享安全。这是每个国家为获得世界和平必须付出的代价。除非我们大家都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否则没有任何维持世界和平的机构能达到它的目的。

“这是一个多么公平合理的代价啊！”

“在这次战争中出现了目前的兵精器利、随时可以应战的强大军事国家。但是它们没有统治世界的权利。而我们这些强国的本份倒是负起领导世界走向和平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决定，权力不应当用于战争，而应当用于维护世界和平，使人类不遭受战争的威胁。

“世界列强应当以身作则，领导走向国际正义的道路。正义的原则是这个宪章的基石。这个原则是一种领导精神，必须按照这种精神来执行这个宪章——这不止是靠言词，而且要靠善意的和继续不断的具体行动。

“有做出计划的时候——也有行动的时候。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了。所以让我们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国家里，按照本国的途径，设法从速地批准这个宪章——使它变成一个活的东西。

“我将立刻把这个宪章送到美国的参议院。我肯定我国人民和他们在参议院的代表的不可压抑的情绪是赞成立刻加以批准的。

“正义与持久的和平不能只由外交上的协议或军事上的合作来获致。经验告诉我们，经济上的竞争和社会上的不公平是如何深深地播下了战争的种子。宪章承认这个事实，因为它同时规定了经济和社会的合作。它规定这种合作是全部宪章核心的一部分。

“它设立了一个国际合作的机构，善良的人民和国家，可以用这个机构来帮助纠正导致战争的经济和社会原因。

“人为的和不合经济原则的贸易障碍应当消除——以便达到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因为免于匮乏的自由，是我们大



家努力爭取的四个基本自由之一。像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世界上的强大国家必須在經濟方面負起領導的責任。

“根据这个宪章，我們有許多理由来制定一个所有有关国家可以接受的国际人权法案。这个人权法案将成为国际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我国的民权条例是我国宪法的一部分一样。这个宪章将致力于爭取和遵守人类权利和基本自由。除非我們能为全世界男女——不分种族、語言和宗教——得到这个目标，我們就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与安全。

“有了这个宪章，世界就可以开始期望一个新的时代，那时一切高尚的人类将能作为自由的人民，而安适地生活下去。

“世界再次体会到，所有的国家，像个人一样，假若它們要得到自由，必須知道真理——必須閱讀和听取真理，学习和傳授真理。

“我們必須設立一个有效的机构来不断地彻底地交流思想和意見。因为这是使国家和人民之間进一步走向互相諒解的道路。

“一切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同墨索里尼一齐死去。希特勒完了——但他荒謬思想所散播的种子在許多狂热分子的头脑中却根深蒂固。除掉暴君和毀掉集中营是比消除产生和滋长这些坏东西的思想容易些。在戰場上获得胜利是主要的，但这是不够的。为了得到真正的和平，持久的和平，世界上善良的人民必須繼續下决心打掉过去十年中弥漫世界的那股邪气。

“世界上各处的反动的暴虐势力企图使联合国的团结不能維持下去。甚至当軸心国家的軍事机器在欧洲遭到毀灭的时候——甚至到它最后一天——它們还是企图分裂我們。

“它們失敗了。但它們将再次嘗試。

“它們甚至現在也正在嘗試。‘各个击破’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它們的計劃。它們仍企图使一个盟国怀疑別个盟国，仇恨或拋棄別个盟国。

“但是我相信，我說联合国将要繼續團結下去這句話，我是代表了你們每個人的。联合国將不會被宣傳攻勢所分裂——無論在日本投降以前或以後都將不會被分裂。

“這個場合又一次表明歷史的連續性。

“由於這個憲章，你們實現了三十年前那個偉大政治家——伍德羅·威爾遜的理想。

“由於這個憲章，你們走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個英勇的領袖——弗蘭克林·羅斯福的目標，為了這個目標，他工作、奮鬥並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由於這個憲章，你們實現了你們自己國家中許多有眼光的人的目標，他們為了世界和平組織的事業，貢獻了他們畢生的精力。

“在我們的國家和大家的身上，負有把你們所寫出的文字變為行動的責任。在我們堅決的行動上，寄托着那些已經犧牲的、那些現在仍活着的以及那些還未降生的人的希望——希望一個自由國家組成的世界，有着高度的生活水平，大家在友好的、有文化的國際大家庭里進行勞動和合作。

“這個和平的新的建築正在堅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讓我們不錯過時機，抓緊這個絕好的機會，建立一個全世界的理智統治——在上帝的領導下創造持久的和平。”

六天以後，我將走上華盛頓國會參議院會議室的講台上，向美國參議院提出聯合國憲章，請求批准。

.....

## 第十三章

### 德国的占领

战争的结束和盟国恢复欧洲秩序的努力，带来了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占领德国和奥地利的头一阶段引起了新的紧张局势。按照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协定，盟国有绝对的权力和完全的统治。但主要问题是如何制定使每个盟国都满意的占领规划。

除了在弗伦斯堡的邓尼茨海军大将——他自称为德国的代理最高统治者——下边的一个集团外，德国没有任何其他政府。虽然我们的陆军警惕地注视着邓尼茨，但实际上我们不承认他的所谓政府。

在奥地利，我们面临着俄国的占领和它通常那一套“临时政府”的机构；这个临时政府完全在俄国控制之下，同时又自称是代表奥地利全国的。我们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指出维也纳临时政府的设立没有同美国、英国和法国商量。我命令美国驻莫斯科的代办通知苏联政府，“在占领地区内，虽然我们反对设立由当地人组成的地方政府，但我们坚决反对苏联政府允许设立一个自称是代表奥地利全国——包括美国占领区在内——的政府。事先应该有充分的互相协商，而有效的协商只有在各盟国代表到达维也纳和开始共同统治时方为可能。在这以前，美国政府对维也纳地区采取的措施毫未参与，因而不负任何责任。”

我又命令代办重新说明美国对于维也纳划分占领区的立场，指出“即苏联政府拒绝引用德国的先例，将大维也纳城划分为几个小的区域从而使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便利的设备。”

在德國和奧地利，我們面臨的主要任務是：設立管理機構，並部署各盟國軍隊撤回到它們各自的區域。在奧地利，這個任務根本沒有完成。但是在德國，佔領和統治的籌備工作已經由歐洲諮詢委員會完成。只待蘇聯的同意，每個區域機構的細則就可以公布。

我們得到英國的同意，計劃一俟各佔領區建立起來，馬上就解散艾森豪威爾將軍所領導的聯合司令部（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然後艾森豪威爾將被指派管理美國區域，蒙哥馬利將接管劃歸英國的區域，法國一位將軍則將統治原來美國區域的一部分，這部分將變為法國區域。這三位盟國的軍官同俄國區域的指揮官，將組成全德國的盟國管制委員會。

5月10日艾森豪威爾將軍建議，在美國、英國和法國佔領各自的區域以後，立刻解散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

5月11日丘吉爾致電給我，敦促我們的軍隊應當繼續駐紮在他們所達到的最前綫。雖然他對各國佔領區域表示同意，他強調在我們同俄國的所有關於波蘭和其他問題未得到滿意解決以前，盟國不應當從它們所達到的位置撤退。

在這個電報以後，丘吉爾隨着發來另外一些與我們軍隊撤退問題有關的電報。他說他對我們向太平洋輸送軍隊的計劃表示不安，並且請求對美國軍隊的行動發布駐紮原地不動的命令。但是，在太平洋我們仍進行着大規模的戰爭，那里需要我們的軍隊。再者，國內公眾輿論却喧嚷着除送往太平洋的軍隊以外，其餘士兵應當回家。

我曾經向丘吉爾表示，我願意遵守我們已經應允的關於佔領區的諾言，並且不願把我們自己擴張到這些區域以外。我採取這個態度是經過與我們的軍事領袖商量以後才決定的。我們對俄國的策略和目的當然很擔心，我也同意丘吉爾的意見，局勢是嚴重的。但我可不能同意違背我們的諾言。此外，我們還有不可能和

不应当忽視的軍事上的重要考慮。

關於這些問題，丘吉爾和我交換了多次函電。5月16日我致函給斯大林，因為他仍不允許我們軍隊進入維也納。

我的電報中說：

“4月13日您向哈里曼大使提出一項好的建議，美國和盟國代表前往維也納了解維也納占領區，以便解決歐洲諮詢委員會懸而未決的占領奧地利的協議問題。我不能理解為什麼蘇聯當局現在却與您的建議相反，拒絕允許這些代表前往維也納。

“由將來負責使盟國對奧地利的行政管理工作順利進行的軍事當局就地進行研究和討論，會大大有助於就維也納占領區作出妥善安排。例如，在歐洲諮詢委員會里的蘇聯代表最近建議，為了滿足美國部队的空中交通綫的需要，把維也納西北二十公里的特倫機場交美國管理，代替維也納機場。但是，不論他或是我們都不了解這機場的確實面積和情況，如果要我們對他的建議予以適當考慮，就應該允許我們去視察這個機場。

“鑒於要劃分的地區已不再為敵人所占領，似應按您的建議前往調查為宜，以便易於在歐洲諮詢委員會中達成協議。美國公眾對蘇聯當局不顧您原來的建議而繼續不允許這樣做，是不會理解的。

“所以我希望請您自己告訴我，您是否要給多爾布亨元帥發出指示使盟國代表便於在目前正由歐洲諮詢委員會討論的維也納各地區進行視察。”

18日我收到斯大林的復電。

信中說：“您5月17日關於美國和各盟國的軍事代表前往維也納的來電已經收到了。實際上我原則上已同意他們去維也納，當然，我在同意時有一個諒解，就是在上述代表到達維也納之前，已經就奧地利占領區問題達成必要的協議，並且占領區本身已由歐

洲諮詢委員會決定。正如丘吉爾先生、羅斯福總統和我商定了的，這些問題完全屬於歐洲諮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我現在仍然持有這種觀點。因此，對於把佔領區問題和關於奧地利的其它問題移到維也納處理的觀點，我們不能同意。

“但是，我對美國及各盟國代表赴維也納了解該市的情況及起草關於該市佔領區的建議的問題，並沒有反對意見。多爾布亨元帥即將接到必要的指示。但美國軍事代表必須在5月底或6月初到達維也納，因為目前在來莫斯科途中的多爾布亨元帥那時將已返回維也納。”

我們當前在德國的問題是如何使盟國管制委員會開始工作。德國目前實際上是由當地的軍事司令官管理，全國正面臨着經濟和社會完全崩潰的危險。所以必須儘快地設立一個委員會，來為德國全國制定政策，並在大柏林區指導行政工作。

5月22日，美國、英國、俄國和法國批准了歐洲諮詢委員會所起草的關於戰敗德國的正式宣言。四國的軍事司令官6月初將于柏林會見，在這個宣言上簽字，並將留在那裡制訂管制委員會機構的細則。

在批准這些計劃時，我的目的是要使德國被看成是一個國家，最後由一個政府管理。這個政府將受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約束，以便防止納粹主義和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復活。此時鄧尼茨海軍大將已為戰爭罪犯委員會列為納粹最高領袖之一而被逮捕。

代理國務卿格魯向我報告，5月16日艾森豪威爾將軍和丘吉爾在舉行討論時，艾森豪威爾將軍極力主張，即使俄國的代表事事都必須請示莫斯科，盟國管制委員會亦應早日管轄德國。

艾森豪威爾敘述了丘吉爾所採取的看法和立場：

“丘吉爾雖然覺得這個問題應當趕快考慮，但在其他機構建立和接管以前，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應負責管制德國。他對這個問

題好像不是真的着急。丘吉尔表示完全同意英国外交部备忘录中的意見，备忘录除了提到許多別的事件以外，还指出設立某种德国政府的需要正日趋明显。丘吉尔說，盟国对德国不应担負全部责任，只应采取措施防止德国有可能发动另一次战争。德国的問題应由德国人来解决，而目前被我們所拘留的某些德国將軍，由于德国人服从他們的命令，可以用他們来达到这个目的。丘吉尔提到的其他的各点中，包括不工作的战犯的食品定額应当减低的問題，以及发表一个声明：对德国的战争設備，特别是飞机，不应毀掉，而应保存下来，以便装备被解放了的國家。”

6月2日艾森豪威尔將軍以盟国远征軍最高司令部的司令官的資格，致电联合參謀总部，請求发出命令規定我們所留下的軍隊退到指定占領区域的日期。电报說，

“我們預料在为签字和发表宣言而举行的柏林會議上，将提出的一个問題是：我們部队从俄国占領区开始撤退的日期。俄国可能以这种撤退作为在柏林設立起作用的管制委员会和移交柏林的几个区給占領軍隊的必要条件。因此由于延迟軍隊的撤退而导致管制委员会的延迟設立，将归罪于我們，并且很可能引起輿論對我們的强烈譴責。我們至今仍未收到关于撤退的命令。我們相信最好是在柏林會議以前分別向我——美国指揮官——和英国指揮官发出訓令，假若提出这个問題，我們应当如何答复。”

6月3日，參謀总部經我批准向艾森豪威尔將軍发出如下訓令：

“撤退到我們自己区域的問題不应作为設立起作用的管制委员会和移交柏林占領区的先决条件。假若俄国提出这点，你当切实地說明撤退軍隊到自己区域内的問題，是必須由管制委员会規定的事項之一。至于美国部队的实际調动，你应当說，根据你的看法，这主要是一个軍事問題，它的时间将要按照美国是否能从它自

已占領区以外的地区撤退和英国、俄国是否能够加以接管才能确定。”

6月4日丘吉尔再次劝告美国军队不应撤退到指定的占領区去。他說，他“极为忧虑地看到美国陆军撤退到中部自己的占領綫，从而使苏联的权力移到西欧的中心，在我們同东方的一切事物之間垂下了一道铁幕。”他盼望“这种撤退，假若必須实行的話，須要与許多重大問題的解决同时进行，这些重大問題的解决才是世界和平的真实基础。目前尚沒有任何真正重要的問題获得解决，您我二人对未来仍須負起重大的責任。”

6月5日四个盟国陆军司令官在柏林签署了关于击败德国的宣言。会上俄国坦白指出，它认为盟国军队应当重新分布在它們各自的区域内，并在管制委员会組織以前，政府应当規定关于各区的界限。6月8日国务院向我报告，“艾森豪威尔将军有力地指出，通过四国军事領袖签署的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盟国军事政府在德国已經成为事实。……會議完結时大家同意重新部署军队的問題应列为政府决定的問題之一，各军事領袖应向其本国政府請示办法。”

国务院的报告引用了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顧問墨菲大使的話，最后說：

“墨菲秘密地告知本院，他相信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在俄国占領区域保持我們军队一节，认为是不明智的，同时他也觉得这样做我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墨菲本人相信这些发展无任何理由使人灰心，相反地，他看到了真正的进步。他确信苏联认为管制委员会是必要的，它的活动将对苏联有利。

“朱可夫元帅接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邀請，将于6月10日赴法兰克福訪問。”

霍浦金斯在与斯大林会晤的归途中，到德国的法兰克福稍停，



与艾森豪威尔会谈。6月8日他告知我，他曾同艾森豪威尔讨论俄国在德国的形势，并且体会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同朱可夫谈话所得到的印象。霍浦金斯相信“目前从划给俄国的区域中撤退盟国驻军日期仍然没有决定的情况，一定会引起俄国和我国人民的误会。”

霍浦金斯着重指出，在盟国军队未从俄国占领区域所包括的地区内撤退以前，盟国管制机构不能开始建立，而建立管制机构的任何拖延将严重地妨害德国政府行政机构的发展。霍浦金斯建议，“作为我们撤军同时进行的条件，我们应当指定我们的军队同时开进柏林，并在各国军事领袖的协议下，对我们从不来梅和法兰克福到柏林区域间，给予由各方同意所规定的航空、铁道、公路等路线无限制的交通便利。”

我告知丘吉尔，我已决定自6月21日起从苏占区撤退美国的军队。

我致电给他：“考虑到罗斯福总统在同您长期思考和仔细讨论以后所批准的关于在德国国内占领区域的三国协定，我不能拖延从苏占区撤退美国军队，以便施加压力解决其他问题。

“我得到最可靠的报导，在盟国军队从俄国区域撤退以前，盟国管制委员会不能开始进行工作。

“我也相信目前盟国最高统帅所行使的军事政府权力应立即停止，这种权力应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二人分担，各人在他自己军队占领的区域内行使这种权力。

“我得到通知，在这个问题上把我们的行动拖延到7月的会议，将极不利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

“因此我建议拍给斯大林下述电报：

“目前德国无条件投降已经宣布，而且德国管制委员会已举行第一次会议，我建议，我们应立即发出明确的指示，使军队分别进入各自的区域内，并开始在被占领国领土内实行有秩序的行政工作。

至于德国，我准备向所有美军发出指示，按照各区司令官的协议，在6月21日开始撤退到自己的区域以内；这些协议包括各国驻军同时开进大柏林区，并为美国军队提供从不来梅和法兰克福到柏林间的航空、公路、铁路方面自由来往的便利。

“至于奥地利，如果让我们的司令官就地负责决定在奥地利全国和维也纳地区占领区域的界限和军队的调整，似乎能更快和更令人满意地达成协议，他们只须把他们之间不能解决的问题请示本国政府。我认为，解决奥地利问题与解决德国问题同样迫切。

“假若您同意上述意见，我建议立刻向我们各自的司令发出适当的指示。”

6月14日收到丘吉尔的答复。他说：“我们显然必须遵照您的决定”，必要的指示当即发出。

丘吉尔还说：

“您说关于在德国占领区域的三国协议，是我和罗斯福总统二人间‘长久考虑和仔细讨论’的问题，这是不正确的。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所谈到的话是很简短的，而且只是关于英美二国的协议，这个协议罗斯福总统不愿事先用通信讨论。这个协议已寄给联合参谋总部，而且他们是一定可以接受的。”

丘吉尔建议我致斯大林电报最后第二段改动一些字句，并提供以下的意见：

“我认为，解决奥地利问题同解决德国问题同样迫切。进驻到已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原则上协议的各占领区的军队重新配置、各国卫戍部队的开进维也纳和成立奥地利问题的盟国委员会，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与在德国采取类似措施同时进行。因此，我极为重视解决突出的问题，以便有关德国和奥地利问题的整个协议能同时付诸实施。我希望，最近美国、英国、法国代表团的来到维也纳，将使欧洲咨询委员会能毫不延迟地为此目的作出必要的其余

的決定。”

他說他認為特別重要的是，當英美軍隊從在德國的俄國佔領區域退出時，俄國軍隊應當同時從他們在奧地利當時仍佔領的英國區域撤退。

丘吉爾還補充說：“我誠懇地盼望您的行動終將造成歐洲的持久和平。”

我完全接受了丘吉爾對我致斯大林的電報所建議的修改，而且當天就拍發出去。次日丘吉爾告訴我，他已致電斯大林支持我的觀點，並告訴他英國政府也將命令軍隊於6月21日從俄國區域撤退。

儘管俄國從前曾施加壓力使我們從俄國區域儘早撤出，但斯大林忽然又令人驚奇地提議略為延遲。這位俄國總理寧願比我所建議的日期更遲一些。原來斯大林打算舉行一次檢閱。

他的電報說：“您關於在德國和奧地利的盟國部隊儘快撤回到各自佔領區的來電已經收到。

“很遺憾，我應當說，您建議美國部隊在6月21日開始撤退到他們的駐區以及美國部隊在6月21日開進柏林，這是有困難的，因為朱可夫元帥和其他軍事司令官將從6月19日起前赴莫斯科參加最高蘇維埃會議以及籌備並參加6月24日的檢閱。此外，柏林某些地區的地雷還沒有清除，而掃雷工作最早到6月底才能結束。由於朱可夫元帥和其他蘇聯軍事司令官不能在6月28—30日之前回到德國，我請求把撤軍工作推遲到7月1日開始，那時，司令官們將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而且掃雷工作將會結束。

“至於奧地利，我上面說過的關於蘇聯的司令官們被召回莫斯科以及關於他們返回維也納的日期的話也是適用的。此外，歐洲諮詢委員會必須在近日內結束關於確定奧地利和維也納佔領區的工作，因為這項工作直到現在尚未結束。

“由于上述一切，我建議把有关部队調动和进駐他們各自在奧地利的占領区的日期也同样推延到7月1日开始。

“此外，無論在德国或奧地利，現在就應該确定由法国部队占領的区域。

“我們將根据上述计划在德国和奧地利采取必要的步驟。”

6月18日我答复斯大林：

“我已指示美国司令官，像您要求那样，于7月1日开始調动。大概将有足够的美国部队早日进駐柏林，以便执行他們的任务，为我們的会晤作好准备。”

我隨即指示馬歇尔將軍命令美国司令官于7月1日开始撤退。为了使他了解情况，我曾将斯大林和我交換的电报的抄本送他参考。

撤退日期既已确定为7月1日，我們軍队的調动和最后的一些具体措施就成为各司令官所执行的任务了。

我們履行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关于如何处理德国的協議。我一貫願意严格履行罗斯福同我們盟国所签定的一切協議。主要目的是要建立包括三个强国和法国在內的德国联合政府。

我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統一的德国，在柏林有一个中央政府。至于奧地利，我則希望它成为一个統一的國家，在維也納有它自己的政府。我认为，假若这些协定使柏林和維也納孤立，連我們也不能进去，那将是愚蠢可笑的。在我6月14日的电报里，——得到丘吉尔的支持——請斯大林給我們到柏林和維也納航空、公路、铁道的自由交通便利，作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人間以前关于撤退軍队的協議的一部分。

在即将到来的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會議中，我要求設立一个在盟国管轄下的統一的政府。我反对将德国瓜分为几个盟国的

区划。按照我們的計劃，運輸、交通、財政應在全德國的基礎上進行管理，由盟國統轄。我從來不認為德國應分裂為幾個對抗的地理區域，或者使它的首都成為與國內其餘部分完全斷絕交通的孤島。

6月25日馬歇爾將軍通知艾森豪威爾將軍，我們想得到去柏林的交通便利。這個意見還通知了麥克納尼將軍和我們在俄國的軍事使團團長迪恩將軍。

馬歇爾致電給他們說：“請注意提議中的……指令……不包括在聯合的基礎上獲得到柏林和維也納交通權利的行動。按照總統致斯大林的電報，這些問題應當在與有關俄國將領商談其他調整事宜的同時達成協議，在柏林由艾森豪威爾負責，在維也納由克拉克負責。我們預料，適當的俄國將領也已得到訓令。……我們希望由迪恩向蘇聯參謀部證實此事。”

次日迪恩來電說：

“照您的……指令，今天下午曾力圖證實蘇聯將領是否已得到關於自由進入柏林和維也納一節訓令。斯拉文中將雖然不能立刻給我答复，但從他說話的態度中看來，我不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將發生任何困難。得到正式答复後當立即通知。”

6月25日迪恩將軍從莫斯科致電馬歇爾、艾森豪威爾和麥克納尼：

“按照6月25日您的……指令，我曾請求安東諾夫將軍以書面證實蘇聯將領已接到命令，同意美國將領關於進入柏林與維也納的公路、鐵道、航空方面的交通自由。今天將與安東諾夫或他的代表會見，盼望屆時得到答复。”

6月27日迪恩報告說，朱可夫元帥已獲得代表俄國與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助手克萊將軍進行磋商的權力。

6月28日迪恩將軍在電報中告知馬歇爾：“我認為當我們的

代表与朱可夫會議时，在为我軍安排通向柏林自由交通一节上将不会遇到困难；假若我在这个問題上估計正确的話，同样的原則亦将适用于維也納。……”

苏联同意向盟国提供无限制的使用从果斯拉尔經過馬格德堡到柏林的标准铁軌铁路。盟国也可使用哈瑙—馬格德堡—柏林汽車路，但不能自由使用柏林—法兰克福汽車路。盟国从柏林到馬格德堡将有約二十英里寬的航空路，从馬格德堡到法兰克福将有两条航空路。

随着軍隊重新分布到各自的占領区内，为建立盟国对德管制鋪平道路，我們現在已經能考虑对付战敗的敌人的一些原則。

在我們国内，关于我們应当和德国訂立一个“强硬”的或是“溫和”的和約，曾經有过許多討論。我們大家多半同意德国应被永远剝夺再度从事侵略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們願意和約是“强硬”的。但同时我們記得，1919年后德国被弄得那般孱弱，只有美国的金錢才能使它偿还加在它身上的賠款。

当然，賠偿問題是整个問題中最棘手一个方面。在雅尔塔，很明显，关于賠偿問題俄国同我国和英国持有不同观点。在雅尔塔會議上，苏联要求从德国經濟中抽出整整二百亿美元来賠偿各盟国的損失，而这个数目的一半应分配給苏联。

美国和英国都不願决定一个金錢数目，也不同意俄国的分配方式。最后，大家同意，将“賠偿損失”（罗斯福总统願意这种称呼）的整个問題，交給一个盟国賠偿委员会来处理。这个委员会将在莫斯科举行會議，以便为下次各国首脑會議准备提案。

为了給美国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打下基础，一个各部間的委员会在助理国务卿維尔·克莱頓領導之下，从2月以来一直在工作。伊薩多·路宾博士被派为我国在盟国賠偿委员会的代表，他已开始召集少数工作人員。他們的工作計劃正在順利进行中。

路宾是一个富有才智而能干的公務員。但是鉴于执行雅尔塔协定中关于波兰的部分同苏联发生的困难，我觉得这个职位需要一个倔强的能討价还价的人，像莫洛托夫那样倔强的人物。因此我請埃德溫·保萊在賠償問題上作为我的个人代表，而路宾博士則答应以盟国委员会中的美国副代表的資格充当保萊的助手。

保萊很适合担任这项任务，因为他不但在工商业中富有經驗，而且是一个經濟学家，他明了我在賠償問題上所持的态度。

我深切关心的是，将簽訂的和約不应带有使另一个像希特勒的人物再次攫取政权这种“自掘坟墓”的規定。我希望制定一个永久的和約。

我們将被呼請对許多战争破坏的地区給予大規模的援助，这个事实已逐渐明显。罗森曼法官刚从西欧作了关于經濟、特别是粮食情况的广泛視察后回到国内。他向我作的詳尽的报告，說明这些地区迫切需要援助，而这些援助必須来自我国。

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挪威，情况看来是同样的悲惨。粮食供应面临危机；在欧洲大陆，由于田地到处是地雷炸药，重新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受到了阻碍；各处燃料、运输和工厂远远赶不上最低限度的需要。加以在欧洲大陆更有数百万因为战争而流亡的平民，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都严重地缺乏住所。

当我們的军队进入德国时，很明显地那里的局势是极坏的。除了制造战争用品的机器以外，若想从德国榨取許多东西，就不能不把这个国家降到受賑济者的地位。德国需要粮食，但我下定决心不再完全由我們的布施来供給它。

这些考虑反映在保萊所接到的訓令中。这个文件由克莱頓的委员会拟定，我在5月18日批准。

这个文件的一部分說：“美国現在和过去的基本政策是，用搬走或破坏德国工厂、設備和其他财产的方法来消灭德国的战争潜

力，并尽可能防止它的复活。”但我们也指示我们的代表团，反对“任何这类赔偿计划，这类计划的根据是：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将直接地或间接地资助德国的重新建设或资助德国的赔款。”

既然苏联将占领德国大半粮食来源的东德，我国和英国将占据大半工业力量所在的地区，于是我们训令保莱注意赔偿的负担将尽可能地由数个占领区域平均分担。我们又指令我们的代表团施用压力促使采取这个原则：在最大的可能范围内，赔偿应从德国崩溃时全国的财富中取出，而最主要的是搬走工业机器、设备和工厂。应当剥夺德国人民发动战争的能力，但是应当留下足够的物资以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而不要老是靠国外（只可能是美国）的救济。

但是如果从日常的生产中能不断提供赔偿时，我们将坚持遵守“首先抵付”的原则。那就是，在任何东西作为赔偿以前，我们希望以维持最低生产必需的出口货，来抵付供给人民食粮必需的进口货。

我又指令保莱就战利品、占领费用的偿还和赔偿损失等的范围问题，设法达成协议。由于这些名词的定义对赔偿所有物资的数量有重要影响，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是很必要的。

欧洲的粮食情况使我增加忧虑。农业部的专家们作出一个估计，光是欧洲大陆，不包括英伦三岛在内，为防止大规模的饥饿，明年将需要一千二百万吨粮食。他们计算1946年的产量将比战事发生后最低的年份1945年尚低5%到10%。我国自己今年的农业产量同战争开始以来的年份比较，收成可能减低。鉴于这种情况，我想最好向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请教一下。我请他来见我，并供给我有关他在粮食救济方面的丰富经验。他帮助我审查了他最熟悉的世界粮食分布问题。这位前总统觉得能对战争余灾的处理作



出个人的贡献，感到很高兴。

这时保萊率領的代表团已經动身前往莫斯科参加盟国賠償委员会的會議。保萊罗致了一群很有声望的人。这个代表团是由两个党的人士組成的，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魯尔、路德·糾利克博士和从工商界与政府中挑选出来的一些专家。

保萊抵达莫斯科时，正当莫斯科广播电台大肆攻击“美国工业资本家尽力恢复德国重工业”。直到6月21日委员会才召开會議。在我們代表团陈述包含我們立場的八項原則的声明后，苏联代表提出苏联政府的計劃。这个計劃主張从德国現有的国家財富中提取賠償二年之久。此后，从当前的生产中每年以产品償付，为期十年，此外还須广泛使用德国的劳工。另外，除劳工不計外，一切賠償总額定为二百亿美元。俄国提議委员会首先着手計劃对德国国家財富的提取，然后討論苏联議事日程中其他項目。我們的代表团要求提供索取二百亿美元这一数目所根据的資料，这个請求已在雅尔塔时提出，但这种資料至今未見提供出来。事实上，苏联是不願作任何让步的，它使用拖延的手段，以阻止全体委員繼續举行任何會議。

委员会的总务委员会决定在賠償总数分配問題上采取妥协的办法。俄国曾提議它得50%，美国和英国共得40%，其他各国家共得10%。英国願意将它所要求的財物一一写明，我們主張，在委员会中沒有代表参加的国家所要求的財物，不应未經他們同意而貿然决定。妥协的办法規定三个参加會議国家的比例是56—22—22，其他国家应得部分以后再决定。那时，其他国家無論所得多少，均由三国按56—22—22的同样比例分配。

保萊在莫斯科进行討論（他經常向我报告情况）的同时，我們收到越来越多的报导，說是在德国的苏联占領区域内，正在大批地运走工厂設備。俄国所选择“战利品”一詞的解釋包括曾經用来供

应被击败的敌人军队的任何机械或设备。在现代战争情况下，这种定义几乎什么都包括在内。

同时在莫斯科，关于在定义上取得协议的任何努力都遭到失败，因为俄国在从德国国家财富首先提取赔偿的计划未制定以前，拒绝讨论任何其他问题。当我们想到从德国国家财富提取赔偿时，我们自然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面积。根据这种思想，我们曾经要求、并使苏联同意这样一个基本论点——为了赔偿的目的，应把德国视为一个经济整体。尽管这个原则在莫斯科已经取得协议，但德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却被置于波兰的行政统治下，这样，这块土地就从可以提取赔偿的地区内被划出去。而这部分土地和苏联占领的区域曾供给战前德国绝大部分的粮食，因此，这种改变对德国经济所发生的影响一定是很剧烈的。同时全欧地区日趋恶劣的经济情况不能同我们在赔偿问题上的想法分开。德国和欧洲任何部分一样，已彻底地遭受破坏，而千百万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使问题更加严重。

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6月向我报告，国务院听取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建议，正在计划派遣前移民局长、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厄尔·哈里逊前赴欧洲，视察战争流亡的平民和他们的需要的問題，特别是那些被认为“不能遣返”的人。格鲁告诉我，大多数的流亡平民已被欧洲的军事当局送回他们的本国去。但留下的是纳粹迫害下未死的犹太人和波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些人民，他们的遣回由于政治的原因而拖延下来了。

我批准了所提議的派遣命令，并于6月22日直接致函哈里逊。我告诉他为了使欧洲早日恢复和平与秩序，主要的是制定一个计划，以适应那些因为正当理由不能回到他们从前居住国家的人的需要。

很明显，由于俄国的不合作态度，各占领国势将指望能从自己

区域内滿足其賠償要求。

作为我在賠償問題上的代表和經濟顧問的保萊將到波茨坦与其他工作人員会晤。在波茨坦會議开始以前，保萊呈上的进度报告是一个准备得很充分的文件。它对莫斯科談判作了清晰的分析，并指出必須解决的爭端。爭端之一就是我們和俄国間在对强迫劳工問題上根本分歧。根据我們参加战争罪犯审判的首席顧問杰克逊法官的建議，我向保萊发出訓令，肯定我們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劳工作为對我們的賠償。另外，我們采取的立場是：任何战胜国家，除对法律手續被判为战争罪犯的个人强迫劳动外，其他人不应强迫劳动。

我同杰克逊和罗森曼两位法官會会談过几次，以便在我們对付德国的法律問題上，决定我們政策的主要方針。

6月6日杰克逊法官送来一个进度报告。这个报告表达了我同杰克逊法官在以前数次會談中通过討論而获得的决定和意見。这个报告指出了我国政策的主要方針：

“被告自然必須得到公平的審訊，以确定我們只懲罰罪有應得的罪犯本人。

“但这些審訊的手續应适当地防止被告采用妨碍和拖延的手段，像在我国一般的刑事审判中那样。

“那种陈旧过时的理論即国家首腦是超法律的辯护，不得予以承认。我們深深怀疑这种思想是王权神授說的殘余。

“無論如何，这种理論是与我們對我們自己官員所采取的立場不相符合的；这些官員常常由于被控告侵害公民权利而被帶到法庭。

“我們不能接受权力越大法律責任越小的荒謬言論。

“我們坚持三个世紀以前大法官寇克向国王詹姆斯声明的責任政府的原則；他宣称即使是国王，也还是‘在上帝和法律之

下’……

“我們將控訴哪些人，把他們当作被告呢？我們將控訴許多个人和官員，他們在德國政府里，在軍事机关里（包括參謀部），在財政、工業和經濟生活里曾掌握權力，按照一切文明的标准可以證明是一些普通罪犯。

“我們也提議確定幾個可以自由參加的團體的犯罪性質，這些團體先是在壓制德國人，後來在壓制它鄰國的行動中，起了殘酷的和控制的作用。

“當然，沒有人建議，一個人只是因他曾經選舉某些候選人，或曾保持某種政治聯繫，像我們在美国支持某個政黨那樣，就應當被判為罪犯。我們所要控訴的團體同我國的政黨毫無相似之處。

“像‘蓋世太保’、黨衛軍等一類的組織是直接行動的團體，它們的隊伍由自願參加者組成，接受的條件是這些自願者對它們的強暴行動具有才干和狂熱的忠誠。

“我們對於重要的被告的控訴，是由于他們與納粹的最高計劃有關，而不是由于與中心計劃毫無關連的個人的野蠻行為和墮落行為。

“我們的起訴書的基礎必須是確切的事實，必須能構成一部有充分證明文件的史實，使我們相信它是用來煽起和實行使全世界震驚的侵略行為和野蠻行為的一個完備的和預定的陰謀。

“我們決不要忘記，當納粹計劃被悍然宣布時，它是那樣的誇張，世界上的人都不敢相信。

“除非我們清楚、詳細地記載了這次的活動，我們就不能埋怨後世在和平的時代里覺得戰爭時期所述說的一般性的控訴是難以置信的。我們必須用可靠的證據來確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

“按照一切文明國家普遍接受的標準，那些傷害我國人民良心的行動是犯罪的；我相信我們可以一面完全按照我們自己公平的

傳統，一面按照國際間所接受的正義行為的標準，懲罰那些負有責任的人。

“我也認為通過這些審訊，我們將能設立一種‘自食其果’的法律程序，來對付那些將來以同樣方式破壞文明的人。……”

“我國人民抱着伍德羅·威爾遜的精神等待着這些審問，他曾盼望‘給予國際法律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只有當它是我們道義判斷的真實表現時才可獲得’。”

傑克遜最後說：“讓我再說幾句，當我們進行這樣巨大任務——這個任務絕對不能做得盡善盡美，但我們希望能夠做到可以接受的程度——的時候，您親切的鼓勵和支持，是使我們工作人員和我個人獲得力量和鼓舞的源泉。”

## 第十四章

### 斯大林的对华和对日政策

我們現在正在加紧制定計劃，集中我們占絕對优势的軍事力量，作最后的进攻，以結束太平洋的战争。在我們这样做的时候，我們在欧洲的軍事和政治专家正在担负着重建欧洲和恢复西方和平这项极端复杂的任务。

自从1941年12月7日以来，太平洋战争是很艰巨和損失頗大的。从珍珠港和巴丹半島，我們已經走了很长一段回去的路程。我們的軍隊，从南方的澳大利亚和新喀里多尼島以及东太平洋夏威夷上的根据地，已經打回到菲律宾和日本門戶的最后一系列群島。敌人曾頑强地防守冲绳和硫磺島，我軍生命的損失极为沉重。但現在我們有了基地，从那里可以向日本开始进行直接的攻击。我們也知道我們离日本本国的島屿越近，敌人的抵抗也越加坚决和頑强。日本軍事力量尚有四百万人以上，都用于防守日本主要島屿、朝鮮、滿洲和華北。为了作最后的掙扎，日本在国内也正在建立“国民志願軍”。

三軍參謀长在估計我們进攻日本本国时所必須付出的伤亡代价，是很大的。

由于我們太平洋軍隊在向前推进时死亡非常惨重，促使俄国加入战争便更迫切。俄国参加战争意味着美国可以免除数十万伤亡。

这是一个迫使我不得不离开本国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举行會議的原因之一。这也說明了为什么我們要敦促中国和俄国根据罗斯

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达成的协定，締結一項協議。

我們沒有办法把軍隊運往中國，以便把日本人從中國大陸趕出去。我們一貫希望有足夠的俄國軍隊開入滿洲，把日本人驅逐出去。在這個時候這是唯一的辦法。

在中國，我們整個戰時政策，是企圖保持中國人民團結抗日。5月20日赫爾利大使曾向我報告：“我們成功地使國民政府承認武裝的中國共產黨為一個政黨，它已委任一位共產黨員為代表團員之一，代表國民政府赴舊金山。共產黨人接受了這個委任，從而承認了國民政府。我們曾在共產黨領袖所在的區域里，訪問了他們。我們促使共產黨和國民黨雙方的領袖舉行會談，在會議中他們彷彿消除了某些衝突。對於國民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的爭執，我們抱着兩個主要目標：

“（一）避免彷彿是一觸即發的內戰；

“（二）聯合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在統一指揮之下對日抗戰。……”

俄國的參加戰爭既然大半取決於斯大林和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間協商的結果，我於是請哈里曼大使向我詳細報告關於將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的進展情況。

6月30日宋子文抵達俄國首都，當天即被斯大林召見。斯大林開口就堅持中國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宋答以中國不能同意割讓領土，因為這樣做將使西藏問題複雜化，假若割讓外蒙古，任何一個中國政府都不能夠繼續存在下去。宋後來向哈里曼解釋，這是深深嵌在中國人民心中的一個原則問題，雖然他們知道中國目前不能對外蒙古行使主權，但假若某個政府永遠放棄中國在這個區域的權利，那麼人民是不會擁護它的。

哈里曼報告，宋告訴他，斯大林曾建議簽訂一個關於外蒙古獨

立的秘密协定，到日本投降后当可发表。宋表示反对，但致电蒋介石请示。宋问哈里曼，罗斯福总统关于这点的见解如何，并且说据他的了解，我对俄国的建议的解释是同他（宋）一样的。虽然如此，他请哈里曼急速打电报询问美国政府实际见解如何。

当谈判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宋告诉哈里曼，在海港和铁路问题上发生了困难。斯大林的要求范围比以前还要大，提议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所有权应归俄国；两条铁路应由苏联和中国的联合董事会共同经营，但管理权属于俄国。

哈里曼致电说：“宋主张铁路的所有权应属中国，两条铁路应由共同负责的苏中公司经营，并由一部分中国人和一部分俄国人共同管理。斯大林指出他感兴趣的只是铁路干线而不是支线。但莫洛托夫提出了经营铁路所需要的煤的生产管理问题。斯大林同意俄国只有在作战时或对战争威胁作准备时，方有运输军队的权利。

“斯大林又同意俄国在满洲没有驻扎军队的权利。关于大连港，斯大林对‘国际化’的解释是指它应由中国和俄国来控制，并不涉及他国，俄国应有优越的利益，并应有俄国的一个管理机构。该港的收入应半归俄国，半归中国。宋主张该港应为在中国管理下的自由港，而由俄国进行某些技术上的协助，同时俄国有充分权利自由使用该港。至于旅顺港，斯大林同意取消‘租用’字样，而商谈出一种两国都能够据以获得海军便利的办法。斯大林提议关于铁路和海港的协议期限应规定为四十五年。……关于中国在满洲的宗主权问题，斯大林的声明使宋放了心。斯大林同意当红军开进满洲时，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应随同去组织政府。斯大林告诉宋，国民政府指派胜任的人去这一点颇属重要。斯大林询问国民政府对于共产党人的态度，宋告以蒋委员长准备请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但国民党仍应占统治地位。宋说斯大林好像在原则上同意，但国民党同共产党应达到何种谅解，没有进行详细讨论或达成协



議。……

“至于朝鮮，斯大林向宋肯定他同意設立四國托管。莫洛托夫插言，這是一個沒有先例的不平常的安排，因此需要就細節達成諒解。斯大林說在朝鮮不應當有外國軍隊或外國政府。宋知道俄國在西伯利亞訓練着二師朝鮮軍隊。他相信這些軍隊將在戰後留在朝鮮，還有蘇聯訓練的政治幹部，也將被送回國去。在這種情況下，他怕即使有四國托管，蘇聯在朝鮮事務中也將獲得控制地位。”

7月4日我命令國務卿貝爾納斯告知哈里曼，美國在目前莫斯科的討論中不願對雅爾塔協定中的任何一點充任解釋者。但我們通知哈里曼他可“非正式地”向宋說明他的了解：就美國方面來說，雅爾塔協定中關於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釋，沒有任何討論。既無討論，那麼按照大家對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認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實上和法律上的地位應當保持下去。

我給哈里曼電報的結尾說：“只供你一個人知道：我們對現狀的了解是，雖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權至今屬於中國，但事實上這個主權未被行使。美國政府，按照1922年的九國公約，一向謹慎地沒有絲毫表示，它認為中國邊遠的屬地，如外蒙古，與中國其他部分具有不同的地位。”

7月6日我命令哈里曼告訴俄國和中國人，美國政府既是雅爾塔協定的一方，它期望在俄中兩國取得最後協議以前，有提出意見的機會。

此外，我們提議在適當的時機向蘇聯和中國政府說明，我們希望蘇聯和中國政府之間的任何協議將保證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國民對大連海港的設備有平等使用的權利，對鐵路運輸的特權得以共享，並將杜絕像日本統治時期那種實際上取消經濟機會平等的做法。

我告訴哈里曼，我們高興地知道，斯大林關於中國和滿洲主權

問題的聲明使宋安心，同時斯大林同意俄國在滿洲沒有駐紮軍隊的權利。至於斯大林關於滿洲主要鐵路的所有權應屬俄國的提議，我告訴哈里曼，我們對雅爾塔協定的了解是蘇聯和中國應當共同經營這些鐵路，並沒有條文規定所有權專屬蘇聯。

7月7日赫爾利大使向我傳達了蔣介石委員長的電報：

“昨晚蔣與他的顧問們舉行了長時期的會議，會後他電示宋，主要內容如下：

“中國同意戰後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假若蘇聯同意完全尊重主權與領土和行政的完整的話。蘇聯將獲得旅順的共同使用權，但無共同控制權。大連將作為自由港，但歸中國管理。兩條鐵路將共同經營，但所有權和主權屬於中國。蘇聯須同意對中國共產黨或新疆的叛亂分子不予任何支持。……

“委員長說這是中國能作的‘最大讓步’。……

“委員長極盼他所願意做的讓步立刻使美國總統知道。”

從7月9日到7月13日，哈里曼每天和宋談話，宋向他報告他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磋商的一切詳情。因我正在赴波茨坦會議的途中，因此電報都送到美國軍艦《奧古斯塔號》來。在這些電報里，我得知斯大林提出了四個協議的草案，其中包括俄國的上述提議。這些是友好同盟的一般條約，和關於外蒙古獨立、大連旅順海港以及滿洲鐵路的經營的協議。

外蒙古的提議引起很長的爭論，雙方都不願讓步。宋將條文送往重慶請示。蔣介石提出一個反建議，假若斯大林完全承認中國在滿洲的主權，並同意撤銷對中國共產黨和新疆叛亂分子的一切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援助，蔣就同意戰後在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該地區的地位。

關於旅順大連問題，爭論的要点在於蘇聯要求該兩海港城市的民政應由他們管轄。俄國希望將作為俄中共同使用的軍港的旅

順，直接由它管轄。在將向一切國家開放的大連，俄國希望有一個聯合董事會管理城市和海港的行政，董事會主席和最高行政長官由俄國人擔任。在期限的長短上意見也有沖突，中國希望期限為二十年，而俄國則主張四十年。

斯大林總是盡量要求他所能得到的東西。中國國民政府許多年來在外蒙古，在滿洲的大部分或在大連或旅順，沒有行使任何權力。

7月10日斯大林接受了中國關於外蒙古的折衷方案，俄國並應諾不支持新疆的叛亂分子或中國的共產黨人。斯大林否認過去曾有任何這種支持。宋告訴哈里曼，斯大林“明確地聲言，他只支持中國的國民政府，而且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必須歸政府統轄。”宋概述了國民政府準備給予共產黨的條件，斯大林未發表任何不同意見。

俄國對兩個海港和滿洲鐵路進行軍事管轄的問題尚未解決。斯大林堅持鐵路的董事們必須由俄國人擔任，而且俄國統治下的軍事地帶必須包括旅順和大連。宋提供了大連以南和旅順地區。

哈里曼致電給我：“宋然後向斯大林建議，讓他回重慶向蔣委員長請示尚待解決的諸點。但是斯大林說，頂好在柏林和您會面以前達成協議，因為他希望和您商定他參加戰爭的日期。因此規定於12日晚再次會面。宋打算仔細說明他受權在上述方面所能作出的最大讓步。假設不能達成協議，他將回重慶向蔣委員長請示。”

會議無結果而散，宋返回重慶，並說任何時候斯大林願意的話，他將重返莫斯科。

7月20日，蔣介石在同宋討論他和斯大林的會議後，致電給我：

“中國在雅爾塔會議上雖沒有代表參加，但您，總統先生，應當

体会到我們已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問題上我們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們作了中国輿論所許可的最大让步。我們的让步可能已經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範圍。我相信在您同斯大林大元帅的談話中，将向他明确指出我們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場，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7月23日我从波茨坦致电蔣介石：

“我請您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未請您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您若同斯大林元帅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釋上持有不同意見，希望派宋回莫斯科繼續努力，以便达到完全諒解。”

斯大林在与中国談判中所采取的策略就是他在波兰問題上使用的現已为大家所熟悉的方式。俄国人几个月的拖延策略，加上华盛顿、倫敦、莫斯科間的尖銳的爭論，已妨碍了并几乎破坏了在雅尔塔會議中設立的关于改組波兰临时政府的机构。

在雅尔塔會議上曾經設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与波兰临时政府的成員和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領袖們商量关于波兰临时政府，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改組的問題，以便把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領袖吸收进去。”这是1945年2月11日的事。从这个委员会的創立到它开始发出邀請，整整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委员会——包括代表俄国的莫洛托夫，代表美国的哈里曼，代表英国的克拉克—克尔，于6月11日发出邀請书，請收信人于6月15日来到莫斯科組成一个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

此时莫斯科忽然发表声明，从前在荒謬絕倫的情况下被拘捕的十六位波兰民主領袖即将受审。这是使人气忿和灰心的举动。苏联故意地挑选时机制造事件，在双方討論正要开始时使談判者面临既成事实，这种办法很快成为俄国策略中經常采取的方式。

我記得还有其他的事例。1941年，正当波兰錫柯尔斯基总理抵达莫斯科的时候，俄国政府忽然宣布一切乌克兰或白俄罗斯后

裔的波兰人将认为是苏联的公民而不是波兰人。此后，在米柯拉契克于战后第一次从倫敦赴莫斯科訪問的途中，便成立了卢布林政府；在他第二次赴莫斯科訪問的途中，卢布林政府得到了苏联的正式承认，而正当莫洛托夫离开莫斯科赴旧金山會議同我討論波兰問題以前，苏联和卢布林政府簽訂了为期二十年的协定。以上一切都是苏联外交手段的一部分。

尽管突然被宣布的审問是打算使波兰人扫兴，但莫斯科會議还是举行了，代表們并且順利地达成了協議。協議規定扩大临时政府，把迄未参加华沙政府的米柯拉契克、葛拉勃斯基、維托斯、斯坦奇克和其他的人吸收进去。

哈里曼向我报告，協議的达成是因为一切未参加卢布林政府的波兰人对于波兰目前局势的关心，这种关心促使他們接受任何妥协，只要它能对波兰的独立和个人自由提供一些希望。

但是他們的協議只不过是一个开端，哈里曼和克拉克一克尔二位大使代表本国政府明确地說，成立波兰全国統一临时政府只是执行雅尔塔协定的第一个步驟。他們指出，在波兰国内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以前，雅尔塔协定并没有完全实现。哈里曼向主要的各方請求并获得保证，在自由选举以前，維持基本的協議。他并請求在选举以前，保证給予人民以集会言論的自由，并对被控訴的政治犯給予大赦。貝魯特总统亲自向哈里曼保证，他預料波兰政治犯 80% 将获釋放。

我令国务卿通知波兰外交部长，波兰新政府一旦正式宣布它在波兰执行政权，美国即当予以承认。6月30日代理国务卿格魯向我报告，波兰全国統一临时政府的总理已致函給我，声明新政府已于6月28日按照克里米亚协定成立，并以新政府的名义向我請求两国間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哈里曼大使同时也报告，依他的意見，新政府事实上确已按照

克里米亚协定成立，因此我們应当履行我們的义务加以承认。我于是决定，再作延緩已无必要，乃于7月2日致电丘吉尔，請两国同时承认波兰政府。

我的电报說：“哈里曼大使向我报告，我也同意，波兰全国統一临时新政府已按照克里米亚协定成立。如您所知，新政府已向我們同时发出函电，請求我們予以承认。

“根据新政府所給的保证和哈里曼大使的建議，我打算于7月3日东方战争時間(Eastern War Time)晚上七点钟承认新政府。

“我觉得事情既已发展至此，任何迁延是无意义的，并对我們二国或許是难堪的。因此我希望您同意与我国同时加以承认。”

次日丘吉尔复电，对于距离承认波兰新政府的决定仅有“数小时”，表示惊讶。他指出波兰旧政府設在倫敦，它統轄着有十七万人的波兰军队，这些军队的态度必須加以考虑。他准备承认新政府，但“我們盼望在应付与你們毫无关連的困难情况中，我們应当获得一些体諒。我們曾盼望至少在二十四小时前通知倫敦的波兰人，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他們必須向一切雇用人員告知他們当前的命运，并发給三个月的薪金。”

因此他請我延緩我的声明至7月4日。我回答首相，

“根据您所提出的理由，我同意您的建議，暂时延緩承认波兰新政府。

“您所建議的延至二十四小时以后，将意味着我們于独立日給予承认。因此我建議并希望您同意，将承认推迟四十八小时，即为7月5日，东方战争時間晚上七点钟。……”

“为了避免关于延迟承认的不必要的猜测，我提議今日通知哈里曼大使，由于我离开华盛顿和独立日到来所产生的行政原因，我們不能在7月5日以前承认新政府。我命令他向波兰駐莫斯科大使讲明，我們于7月5日将承认他的政府。

“除非听到您不同的意見，我将按計劃办事，于7月5日我們两国同时承认新政府。”

丘吉尔表示同意，我乃于7月5日公布同波兰全国統一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在筹备同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會議期間，我在考虑我赴波茨坦的目的。当然，我当前的目的是使俄国尽快地参加对日作战，但我主要的目标是战后获得一种共事关系，以防止另一次世界浩劫。

我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們的經驗。那时威尔逊总统企图制定一种方法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他去欧洲时和他回来时，他是我国历史上最受崇敬的人物。但不幸地，在国会里有人嫉妒威尔逊的荣誉，他們开始破坏他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威尔逊总统帮助了他的政敌，因为他沒有对参議員的任何領袖們推心置腹。相反，等到他帶回条約的时候，他很少顾及到国会人士的情緒，便徑向国会提出。我认为，假若威尔逊总统經常对国会領袖們推心置腹，信賴他們，在国际联盟問題上他将不致失敗。事实上他对他們中的許多人很不喜欢，而很少人是他亲近的朋友。

我下定决心同国会密切合作，在作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决方案中，避免导致美国人民灰心失望的錯誤。有一个陷阱我决意避免。在任何情况下，我們不願由我們支付欧洲的賠償賬单。我們希望有一种使欧洲自力更生的欧洲复兴計劃。我們不願只是因为德国沒有能力支付巨額賠款，而由我們向俄国交付数十亿美元——尽管在道义上我們应当强迫德国支付这笔款項。

我企图从伍德罗·威尔逊和杰斐逊·戴維斯以及亚伯拉罕·林肯所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我盼望从这次戰爭中，我們將获得一个維持和平的有效的世界組織，盼望我們能帮助我們的朋友和盟国在經濟上站立起来。

.....

当我就任总统时，内阁的成员有：

国务卿——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

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

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

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耳

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

邮政总长——弗兰克·沃克

农业部长——克劳德·威卡德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

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

劳工部长——弗朗塞斯·佩金斯女士

.....

6月底和7月初，内阁发生了两起重要变动，这是我继任总统后内阁的第五和第六次变动：任命詹姆斯·贝尔纳斯继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为国务卿，和任命弗雷德·文森代替小亨利·摩根索为财政部长。

斯退丁纽斯在旧金山会议结束时提出了辞呈，我建议他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6月30日我宣布任命贝尔纳斯为国务卿。三天以后他在白宫我的办公室里宣誓就职。

我就任总统后，贝尔纳斯立即来到了华盛顿，表示愿意为我效劳。当时我就决定任命他为国务卿，在为罗斯福举行葬礼后从海德公园回来的路上，我向他提出了这项任命。我们同意，为了顾全斯退丁纽斯的体面，在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结束以前暂不宣布这个消息。

摩根索部长于7月5日在白宫向我提出了辞呈。他的辞职信



和我的答复，是当天晚一些时候在新聞記者和广播会上宣布的。去年秋天他曾經参加罗斯福、丘吉尔和麦根齐·金举行的魁北克會議，并制訂了一个把德国变成一个完全田园式的农业社会，从而消除德国工业潜力的計劃。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摩根索計劃。我們这些审核过这个計劃的人都不重視这个計劃。我不喜欢这个計劃。当摩根索部长获悉我将在7月間去波茨坦时，他問我是否能同我一起去参加會議。我对他說，我感到美国国内非常需要財政部长，比在波茨坦更为需要。他回答說，他一定得去一趟，并且說，如果他不能去的話，他只好辞职。

我回答說：“那好吧，要是你这样认为的話，我可以立即接受你的辞职。”而且我真的这样做了。談話到此为止，摩根索計劃也到此为止。

.....

我对內閣的地位和发展具有明确的概念。在华盛頓时期政府內閣中只有四个閣員：国务卿、財政部长、陸軍部长和司法部长。那个时候所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些人。由于国家的发展，內閣也扩大了，因此今天的內閣有十个閣員。总统內閣的部长是政府执行部門的文职主管人員。他們对总统負責，根据法律的規定貫徹政府执行部門的指示和政策。

林肯和他的內閣发生了很大的糾紛，因为某些閣員把內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是他們而不是总统，成为政策的制訂者。詹姆斯·波耳克和他的內閣有过同样的麻煩。弗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內閣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麻煩，照我看来，原因很简单，即他本人过多地做了原应交給內閣处理的工作。差不多在他担任总统的全部期間，他就是他自己的国务卿。他是他自己的財政部长。而且当采取軍事行动的时候，他还是自己的陸軍部长和海軍部长。

罗斯福有他自己的一套同內閣共事的工作方式。每个总统都

有自己的方式。罗斯福喜欢在召开內閣全体會議以前，同个别的閣員进行談話。他經常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閣員对同一問題单独进行商討，尽管这些事情与他們負責的工作无关。这是他获得不同意見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常常引起內閣內部的对立和冲突。

我认为获得不同意見而又不助长个别閣員之間产生对立的最好的办法，是在內閣全体會議上把意見全部公开。当內閣閣員中間产生分歧的时候，我便坦率地把这些分歧摆出来加以解决。

.....

## 第十五章

### 波茨坦會議開幕

7月17日下午五時前不久，我到達波茨坦塞西林宮(Cecilienhof Palace)出席會議的開幕式。塞西林宮曾是前皇太子威廉的行宮。這是一座二層樓四邊帶耳房的褐色石房子，當中有一個院子——現在鋪滿了蘇聯人種植的二十四呎寬的紅星花坛，由天竺葵、粉紅玫瑰花和紫陽花組成。三個同盟國的國旗在宮殿的正門前飄揚。

在戰爭期間，德國人和蘇聯人都曾把塞西林宮作過醫院。所有的裝飾家具都曾被搬走。但是俄國人為了開會又重新配置裝修了這個宮殿，工作做得很出色。家具和設備都從莫斯科運來。為丘吉爾首相和斯大林元帥和我都準備了單獨的一套房間。每一個代表團都有一間休息室和一些辦公室。

會議室是四十呎寬六十呎長的一個大房間，房間一端的盡頭是一個涼台。近房間中央是一個巨大的圓桌，直徑約十二至十四呎。環繞桌子有三大國政府代表團的各主要代表們的椅子。我和貝爾納斯、前美國大使約瑟夫·戴維斯和李海坐在桌子的一邊，挨近我的是我的翻譯波倫，緊坐在我身後的是我團的其他團員。斯大林、莫洛托夫、維辛斯基和他的翻譯坐在我右邊，在他後面是他的文武官員。丘吉爾同樣地被安置在我左邊，和他同坐的是艾登、艾德禮和他的其他幾個部屬。這種坐位的安排使得任何人便於接近和他們有關的政府代表團，使他們在通報時出入方便。

警衛人員規規矩矩地站在房間里的重要據點。他們是三個政

府的便衣警察或相同身份的人。武装警察圍繞着宮殿和花园保护會議的进行。

出席開幕式的有：

俄国方面：斯大林元帅、莫洛托夫、維辛斯基、葛罗米柯大使、古雪夫大使、諾維科、索波列夫和翻譯巴甫洛夫。

英国方面：丘吉尔首相、安东尼·艾登、克萊門特·艾德礼、亚历山大·賈德干爵士、克拉克-克尔大使、威廉·斯特朗爵士和翻譯伯斯少校。

美国方面：总统、国务卿貝尔納斯、李海上将、哈里曼大使、保萊大使、戴維斯大使、助理国务卿邓恩和克萊頓、本杰明·寇因、弗里曼·馬修斯和翻譯查尔斯·波倫。

五点十分，波茨坦會議正式宣布开会。斯大林主持開幕式时提議我任大会主席，丘吉尔附議，我向他們表示謝意。

第一次會議的一般目的是起草准备在日后會議上詳細討論的議事日程的項目。我声明我已有了具体提案提交大会。我的第一件提案就是成立一个外长會議。我說我們不应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媾和方面所犯的錯誤。

我指出：“今天，我們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外交关系上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为了开展和平談判和領土的处理而制定一些步驟和机构。沒有这些，則目前存在的混乱局勢、政治和經濟上的不景气将继续严重地危害欧洲和全世界。

“我們从上一次大战后的凡尔賽會議所吸取的經驗是，如果事前沒有准备，就不能使一个正式的和会成功。”

我提議該会的成員应由英、俄、中、法、美五国外长組成。这些国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我建議在我們开完会后，能尽快地召开这个外长會議。

丘吉尔建議提案交給貝尔納斯、艾登与莫洛托夫三外长研究。

斯大林同意这个办法，但他說，他不了解为何中国要参加外长會議討論欧洲和平問題。

我告訴斯大林，他的問題可由外长們討論后再汇报給我們。

我于是把我的第二項提案提交大会，这是有关在初期阶段对德国的管制問題。我說明美国认为管制委员会应当立即开始执行职务。我提交管制德国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原則的声明。这个文件的副本我交給斯大林与丘吉尔，对指导管制委员会的基本原則摘要如下：

解除德国全部武装，鏟除或控制全部德国可供軍事生产的工业。

应使德国人民感到他們在軍事上的完全失敗，他們不能逃避自食其果的責任。

国社党及一切納粹机构应予摧毀，一切納粹官員应予免职。

应作准备使德国在民主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其政治生活，并在国际生活中最終参与和平合作。

希特勒政权时代以不同种族、信仰和政治見解为理由而制定的各种歧視的法律，应予以廢除。

一切策划和执行納粹事业以致卷入或产生暴行和战争罪行的战犯，必須予以逮捕并交付审讯。

經濟管制的执行，应視其对达到这些目的有否必要而定。我強調德国应被視为一个单独的經濟单位。

这件提案未經討論，就提交給外长們，并責成他們第二天向我們汇报。

此后我提出并宣讀了如下声明：

“1945年2月11日所簽訂的关于解放了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中，三国政府对被解放的欧洲人民和过去軸心国的附庸国人民担負起某些义务。自雅尔塔會議后，宣言中所担負的义务未付諸实

施。美国政府认为若再不履行这些义务，会使全世界认为这是三大国之間不团结的表现，并会对他们所宣布的目的的真诚失去信心。

“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建议本会应对履行宣言中的义务的以下步骤取得一致意见。

“（一）按照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第三段丙款的规定，三同盟国政府应同意必须立即改组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现政府。

“（二）应立即进行协商，制订一切必要的办法，来改组这些政府，使其包括一切重要民主人士的代表。一旦改组完毕，在外交上应予承认，并与这些国家订立和约。

“（三）遵照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第三段丁款所包括的义务，三国政府应考虑如何很好地协助这些临时政府举行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举。希腊迫切需要这种援助，无疑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可能尚有其他国家将来亦需要这种援助。”

丘吉尔随即发言，他说他需要时间来阅读和研究这个文件，他或许会大致同意。

我对议事日程最后的建议是我们对意大利政策的修改。我解释道，由于意大利人已加入对日战争，我认为这是允许意大利加入联合国的时机。我提出一个对意大利议和的提案。

丘吉尔插言。他指出我们准备讨论重大的政策未免过于仓猝。他说1940年法国崩溃时，英国人受到意大利的进攻。罗斯福总统形容这是“暗箭伤人”。他又说英国人在美国参战前已和意大利人作战过一段时间。在最危急的关头，英国人不得不派最必要的军队到非洲去。在美国军队开到以前，他们已经在这一带海岸上打了两年仗。他还指出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同意意大利人作战时，损失惨重。

丘吉尔提议我可继续进行我的提案，斯大林也同意。于是我

提出了一个有关意大利的文件，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如下：

“三国政府对意大利政策的目的是希望它早日获得政治独立和經濟恢复，最后使意大利人民有选择他们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

“当盟国的军队还駐留在意大利以保证領土糾紛的公正处置的时候，在临时的安排下，維持意大利的管制仅为了适应盟国的軍事需要。”

在我提出美国的四件提案后，我說，虽然我认为这些問題极其重要，我还希望能使人了解我可能在議事日程上再增加其它的項目。我于是轉向丘吉尔和斯大林致謝，我被指定担任主席，不胜荣幸。我对他們所想到的任何提案和建議都表示欢迎。我又說，能出席这次會議，十分愉快。我說，我是抱着惶恐的心情开会的，因为我知道我必須继承一个人的工作，而这个人的确是他人无法代替的。我知道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元帅都极为友好，我說我希望我够得上获得同样的友誼和善意。

丘吉尔回答說，他确信他和斯大林都願意和我繼續他們与罗斯福总统的那种彼此关怀的感情。他极其希望而且相信，我們国家和我們个人之間的关系必将日益增进。

斯大林代表俄国代表团全体人員，表示他和丘吉尔首相具有同样的心情。

丘吉尔建議我們进行商討議事日程中的簡單的問題，或者直接討論，或者把它們提交給外长們。他說，英国希望在議事日程中增加波兰問題。

斯大林接着发言，他提出了俄国所拟定的討論的題目，内容如下：（一）德国商船和軍艦的分配；（二）賠償問題；（三）联合国宪章下的俄国托管权問題；（四）与軸心国的附庸国的关系問題；（五）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問題。在他的提案大綱的这一点上，俄国的領

袖离开正題，宣稱西班牙政權並非出自西班牙，而是由德國和意大利輸入，並強加在西班牙人民頭上的。他說這對聯合國是一種危險。他認為創造條件來使西班牙人民建立自己所需要的政權是必要的。

丘吉爾向斯大林指出，“我們只談應該加入議事日程的各種問題”，但是他同意應當增加西班牙問題。

斯大林繼續提出（六）丹吉爾問題；（七）敘利亞與黎巴嫩問題；（八）波蘭問題，包括有關波蘭西部邊界的決定與倫敦流亡政府的解散問題。

丘吉爾同意波蘭問題的各方面都應進行討論。他說他相信斯大林和我會認識到英國曾是波蘭政府的所在地，而且也是供應和維持波蘭軍隊的基地。他說雖然我們三人可以有同樣的目的，但英國人的任務比其他兩國要困難，因為他們要處理一些具體問題。他們不願在沒有作出適當安排以前就在他們當中解散大批士兵。他說實施雅爾塔協定很重要。為了使波蘭人民的意志得到反映，他很重視波蘭的選舉。他又說英國代表團正在提出書面的議事日程，他建議當晚外長開會，並在我們次日將討論的項目上取得一致的意見。斯大林和我都表示同意。

丘吉爾說，“在這張桌子上外長們比我們能準備一張更好的菜單，明天他們將為我們準備好一些最稱心的意見——或者我應該說非常令人不稱心的意見。”

斯大林回答，無論如何我們迴避不了一些不稱心的問題。

在第一次會議休會前，我詢問是否還有任何其他建議。斯大林提出我在會議開始時所提議的外長會議問題。他反對中國參加。

我解釋道，中國曾被建議參加外長會議，因為它是安全理事會五個理事國之一。



斯大林想知道自雅尔塔协定以来，每季度举行的外长会议，是否不再继续举行。

我提醒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安排是临时的。

丘吉尔说，他发现每季度召开外长会议，对于向英国政府提供意见，极有帮助。他接着说，他认为把中国带到会议上去，是使事情复杂化，他怀疑，使世界那一边的国家参加这个会议是否明智，而这个国家在击败欧洲的敌人时，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我申明在外长会议上所考虑的问题，和一般的外长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大不相同。我所建议的这个会议是为了明确的、特殊的目的。它们是：拟定提交联合国的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的和约草案；提出欧洲战争结束后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的解决办法。外长会议也用来作对德媾和的准备。

斯大林认为这将是一个“为了准备未来和会的会议”，这个会议将讨论战后赔款，并决定和会召开的日期等问题。

我回答道，当我们感到我们有充分准备足以开会的时候可以确定日期。

丘吉尔说，他看不到调和我們不同的目标有什么困难。他说，在日本人被打败以前，中国在处理欧洲——“战争爆发的火山”——的复杂问题上，难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他说，在开会期间，对日战争可能结束；那时中国可以参加世界和会。在那以前，中国在媾和方面，只能有理论上的兴趣。

我说，我不反对在对日战争结束前中国不参加会议。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我将整个问题提交外长们考虑，并请他们日后向我们提供意见。

斯大林开玩笑说：“既然一切问题都由外长们来讨论，我们无事可作了。”

斯大林的尖刻的幽默感不时在会议中表现出来。当丘吉尔提

議由外長們研究一下究竟外長會議需要四個還是五個會員這個問題時，斯大林插言說：“或者只是三個吧？”

我告訴斯大林和丘吉爾，我們次日應討論幾個能得出結論的問題。丘吉爾回答道，外長們應給我們三四個問題——足夠使我們忙才行。

我說我不願只是討論，我要作出決定。

丘吉爾問我是否每天都要有所收穫。

他的說法完全正確。我在這裡是為了完成某些任務，如果我們不能這樣作，我就打算回去。我提議我們在四點鐘而不是在五點鐘開會，這樣在會議中可以多做事情。其他的人都表示同意，我於是建議散會。

斯大林同意散會，但他說他還想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丘吉爾拒絕分配給俄國分內應得到的一部分德國艦隊？”

丘吉爾解釋說，他認為應該毀滅或平分這些艦隊，他說戰爭武器是可怕的东西，應該擊沉掉繳獲的艦隊。

斯大林說：“讓我們來平分吧。”他又說：“如果丘吉爾先生願意，他可以沉掉他所分到的船隻。”

波茨坦會議的第一次會議就此散會。

我在第一次與丘吉爾先生和斯大林開完會後，頗有信心地回到了我在巴培爾斯堡的臨時寓所。我希望斯大林是一個能遵守他的協議的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得到了許多的教益。因為俄國人在人力物力上作了巨大的犧牲——五百餘萬人陣亡，數百萬人在希特勒入侵烏克蘭時被殺死或餓死——我們希望俄國將全心全意地參加一個維持世界和平的計劃。

我並沒有低估我們當前的困難。我認識到，作為會議的主席，我將面臨因利益衝突而發生的許多問題。我知道斯大林與丘吉爾都要求特別的利益，而這種利益會使我們彼此衝突而感到麻煩。

我知道斯大林正如他以前的沙皇一样，愿意为俄国争取黑海海峡。丘吉尔决心使英国保持甚至加强它对地中海的控制。我知道我正在对付两个具有完全不同性格、态度和背景的人。丘吉尔善于雄辩，他的流利的口才很难有人能和他相比。斯大林不喜欢作长篇演说。他会很快地把争论化为权力的问题，对任何其他的谈话，都表示不耐烦。

我很满意翻译人员有条不紊地履行他们的重要职责。这三个翻译曾经参加以前所有的会议，精通本行业务。要了解会上的发言毫无困难。当我谈话时，波伦替我翻译。巴甫洛夫为斯大林翻译。伯斯少校则为俄国人翻译丘吉尔的话。我们往往把话说得慢一些，使口译人员便于逐句翻译。如果翻译者之间有不同的意见——例如要采用与英文意义恰切的俄文字，他们就当场解决，这时候斯大林总是笑容满面地靠后面坐着。有时我怀疑斯大林实际上是懂英语的。

第一次休会后，我们被邀请到无忧宫的一间大餐厅赴盛宴，在那儿俄国人在一个二十呎宽三十呎长的大餐桌上摆设了极其丰富精美的饭菜。桌子上摆满了应有的食物——鹅肝、鱼子酱、各色肉类、干酪、鸡、火鸡、鸭、酒和饮料。餐会的大厨师来自莫斯科的第一流旅馆。他说英语，并且小心翼翼地对所有政府领袖和他们的外长们都表示最大的尊敬。

在我们回到巴培尔斯堡的途中，我们必须乘车经过许多俄管区的地方。李海上将和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一块，在一个十字街口，一个俄国中尉拦住了我们的汽车。只耽误了几分钟，其他赶到场的俄国军官就很快地证明了我们的身份。这些军官几乎把这个中尉吓死，因为他犯了这样的错误。李海转身对我说：“我敢打赌他明天早上就会被枪毙。”

18日晨，在与我的顾问开过会后，我走到英国首相的寓所，回

拜他。后来我又到斯大林元帅的寓所回拜。下午四时，我回到塞西林宫开第二次会议。

丘吉尔在第二次会议上首先发言，他提出了记者与会议的关系问题。他说，在德黑兰记者很不容易进入会场，在雅尔塔，更是不可能的。但在这里，他抱怨说，有许多报界代表聚集在这个保卫得很严密的正在举行会议的堡垒外面。他们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大声疾呼地喊叫他们采访新闻的不便。

“谁放他们进来的？”斯大林大声叫道。

丘吉尔告诉他，新闻记者被关在场外。如果我和斯大林同意，他愿意和他们谈话，并不是要讲会议进行的情况，而是解释为何记者不能入场。

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我指出每一个代表团都有它的新闻代表，我建议不如由他们去处理。在太平洋上我们还在作战，在欧洲有许多棘手的問題正待解决，因此我们不能在报上公开发表有关会议进行的报导。

丘吉尔表示同意，他说：“我不过把自己当作一只小绵羊。但不管怎样，只有斯大林元帅答应救我时，我才出去。”

我觉得丘吉尔对斯大林和我对于他那戏剧性的建议——在这样一个场合下作我们的代言人——的反应，会感到很有趣。

在第二次会上，我把外长们提交大会的三项题目列入议事日程。第一个是关于美国对成立外长会议提案的新草案。它规定会议的成员为和敌人已签订投降条约的国家。这为中国日后在对日战争结束后参加会议开了门。因此，这件提案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全体一致同意外长会议的成员与媾和的步骤。

讨论到一切条约应提交联合国时，斯大林认为这无所谓，因为“三大国将代表全世界的利益”。

这是斯大林一贯的观点。他认为俄国、英国和美国可以解决

世界事务，他人不必过問。我深深感到，一切国家、不論大小，都应参加，它們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正和三大国一样。我的政策和目的是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有效的重要机构。

我請国务卿貝尔納斯宣讀外长們所作关于美国对德政策提案的报告。貝尔納斯說，政治和經濟专家尙未完成他們的工作。但是外长們认为政府首脑应当举行一个关于占領德国的各种政治問題的預备會議。

丘吉尔指出“德国”这个字重复过多次，他問这个字眼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意味着战前的德国，他可以同意。

斯大林回答說：“德国是指战后已改变了的德国，現在并无其他的德国存在。奥地利不是德国的一部分。”

我建議我們认为是 1937 年的德国。

斯大林提議我們加上“减掉德国在 1945 年失去的土地”。

我对斯大林說，德国在 1945 年丧失了一切。斯大林元帅提到德国从捷克斯洛伐克夺去的苏台德区，他問我們是否提議这也被认为是德国的一部分。我回答說，我指的是 1937 年的德国。

斯大林同意从官方的观点出发对德国的看法应当如此。他提議現在可以决定波兰的西部边界，这样問題就更清楚了。

我說这个問題頂好在决定了如何处理德国以后，再作决定。

斯大林显然在拖延这个問題，他說德国是一个沒有政府和固定边界的国家，沒有边防軍，也沒有軍隊。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領区。

我重复提到 1937 年的德国可以作为我們的出发点。

斯大林回答，他同意以 1937 年的德国作为討論的出发点。

丘吉尔說他也同意。

作为主席，我宣布以 1937 年存在的凡尔赛和約規定的德国作为討論的根据。

丘吉尔請大家注意文件中包括破坏德国軍器和战争武器及其他武器的一个条款。他說有許多东西不應該被破坏，例如通風隧道和其他的技术設備。

斯大林說，俄国人不是野蛮人，他們不会破坏研究机构。

这一切自然是在俄国占領滿洲以前，我們后来看到俄国人是如何对付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技术設備的。甚至在柏林，他們也表現出不熟悉那些文明設備。他們搶走了房間里的珍貴物品，如人們的祖父一輩遺留下來的精美座钟等，他們常常把这些东西放在貨車里，而把沉重的物品压在它們上面。他們也像这样地打碎艺术品。

我們現在轉而討論波兰問題。斯大林提出俄国对波兰問題的草案。其主要內容是會議应号召联合国所有會員国政府撤回对倫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該政府的一切財產移交給华沙临时政府。俄国的草案提議將一切波兰軍隊归华沙政府統轄，由該政府来处理。

俄国的这个建議很明显地是想达到以下目的：他們想使华沙政府得到波兰十五万名軍隊的一切財產和装备，虽然这些装备原来是由英国和美国供給的。

丘吉尔立刻指出这个提案中的重担多半落在英国的身上。当波兰人被德国人赶出来时，英国收容了他們。他沒有提醒斯大林元帅，由于俄国的默許才使这事成为可能。他又說，波兰旧政府沒有任何財產。在倫敦与加拿大只有已經冻结的二千万鎊黄金，这是波兰国家仅有的財產。他說有一个旧大使迁走后的波兰大使館，一俟新政府派遣大使即可让給他用，而且希望“愈快愈好”。

丘吉尔詳細談到波兰軍隊对同盟国战胜軸心国所作的貢獻。他又說，英国曾以它的名誉对这些人作过保证。他告訴我們，他在国会里說过如果有曾和同盟国并肩作战的波兰士兵不願回波兰的

話，英國將接受他們作英國的公民。

他宣稱：“我們不能拋棄曾經成為我們戰友的人。”

他希望他們之中大多數人能回到自己的祖國，但是他認為應當保證他們能在那裡安全地謀生。他說，如能遵守這些保留條件，他就同意俄國的提案，而且樂於將它交給外長們商討。

斯大林說他了解英國的困難，在俄國方面，並無意使英國的處境更複雜化。他僅希望結束倫敦的前波蘭政府。斯大林提出他願意取消俄國草案中任何使英國的地位複雜化的地方。

我說我願意使波蘭問題達成協議，但對雅爾塔協定所保證的波蘭的自由選舉，特別關懷。

斯大林回答說，波蘭政府從未拒絕過舉行選舉。他建議這個問題轉交給外長們，丘吉爾和我都表示同意。

這是第二次會議的全部議事日程。只開了一小時零四十五分，在六點鐘就宣告休會。我感到有些進步，但我開始急於要少說話多作事。

.....

## 第十六章

### 波茨坦：賠償与波兰边界問題

在7月19日的第三次會議上，我請艾登提交外長們為我們的討論所準備的議事日程。他提出一個對德政治協定的修正草案。丘吉爾、斯大林和我都接受了這個草案。議事日程上的其他項目包括對德國艦隊與商船的处理，佛朗哥西班牙問題，南斯拉夫的局勢，以及從羅馬尼亞運走采油設備的問題。

在处理德國艦隊這個問題上，我說我們必須分清什麼是賠償，什麼是戰利品。我說，商船應列入賠償，因而此事最後應提交給賠償委員會。我宣稱，我們對商船發生興趣，是因為想在日本戰區內使用它們。

斯大林說，軍隊在戰爭時期所得到的戰爭物資就是戰利品。他說，軍隊放下武器投降，便繳出他們的武器作為戰利品。它同樣地應用於德國海軍；當艦隊向三國投降時，它因此也成為戰利品。斯大林繼續說，但商船究竟是戰利品還是賠償物，仍是可討論的問題。至於海軍，他說，這件事已不成為問題。他記起了意大利的情況，艦隊與商船都當作戰利品，並沒有人提出任何問題。

丘吉爾說，他希望我們能在會上達成協議來解決這些問題。他所指的只是德國海軍艦隊。他說在目前，英國人保管着全部的德國商船。

丘吉爾指出，在法律上，潛水艇可以在某種限制內使用，但德國人在使用它時，違反了國際協定。他認為，能夠盡量地毀滅它們才好，剩下的可以平分。至於其他的軍艦，他認為如果在會議上能



够达成共同的協議，亦可平分。他說，他并不认为像俄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应当获得它应有的一份。由于建造新軍艦費时頗久，他說这些軍艦应用作发展俄国海軍和訓練人員的工具，而且便于使俄国的旗帜飄揚在海面上。

丘吉尔繼續扼要地叙述了这个問題。他說他认为一切的船只都应用来帮助結束对日战争。

我說我很同意把德国的商船和艦队由三国平分，但我願意在太平洋战争結束后再来执行。我強調我們需要这些船只，不仅是为了作战，还要为了复兴欧洲而运输食物和供应物資，甚至为了我們的盟友俄国，为了希腊和其他国家。我們需要船只所能运输的每一顆炸彈与每一吨食物。

斯大林征求我对德国海軍的意見。

我告訴他我准备當場处理德国軍艦。我說，“当对日战争結束后，美国将出售商船与軍艦。”但在打敗日本以前，我不願扰乱現有的局面。

斯大林問道：“难道俄国不是正要对日作战嗎？”

我回答道，当俄国准备对日作战时，它会和其他国家一样参加海运同盟。我又說我們热烈地盼望俄国能参加我們的海运同盟。

丘吉尔提議可以在这些軍艦上作些記号，“如果对日战争結束后，这些軍艦还得幸存的話”；如果任何軍艦有所損坏，可以用我們的一般物資来修理。他声言他必須支持斯大林元帅提出的分得这些軍艦和商船的要求。否則只好把这些軍艦沉掉。但是“當我們的一个忠实的盟国希望得到它們的时候”，这种作法未免有些鹵莽。

我說我們在这个問題上是一致的。

斯大林說，把俄国人說成有妨碍对日战争的企图自然是不可能的。也不能把这件事理解为他們想从盟国手中取得礼物。他声

明他們的目的不在爭取禮物。

丘吉尔和我提醒他，我們二人並沒有这种提法。

斯大林繼續要求明确一下：俄国究竟是否有权利要求分到三分之一的德国商船和舰队。如果三分之一分配給俄国，他答应他不反对在对日本作战中使用它們。

丘吉尔提議这个問題在會議結束时再作决定，大家都同意。

斯大林說他希望能办到一件事。他的代表們被禁止視察德国舰队，俄国人設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个問題。他說，但是他們未被許可視察舰队，軍舰的名单也沒給他們。他要求有一个名单，并請求視察軍舰。

丘吉尔回答說，这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英国人要求得到互惠的便利，參觀波罗的海的德国設備。他相信俄国人在但澤获得了四十五只德国潛水艇。他建議彼此交換視察。

斯大林叙述这些潛水艇已遭到损坏而无用处，但是他可以安排让丘吉尔的人員去看。

丘吉尔回答說：“我們所要求的仅是互惠。”

我說就德国的美管区而言，俄国人可以随意看他們所想看的東西，但是我們也希望得到相互的便利。我打算为賠償委员会打开一条路，使他們能看到俄国人在他們所接管的区域里所繳获的任何東西。我曾經瞧見俄国人对待从德国夺取的物資的情况，在柏林的俄国占領区——該城的工业中心——我看到俄国人破坏了工厂，拿走了每一样東西。他們把工业装备装在貨車里，而在許多情况下，車輛停在铁路支綫上。这些物資已生鏽剝落，很快地就要完全变成廢物。

我建議我們轉到西班牙問題，丘吉尔說，他的政府非常厌恶佛朗哥將軍和他的政府。他說，但是他們对待西班牙的政策并不止于丑化佛朗哥。他泄露出佛朗哥曾写給他一封信，建議他們联合

起来組織西方国家来反对“那个可怕的国家俄国”。丘吉尔說，在征得英国内閣的同意后，他曾給佛朗哥一个冷淡的答复，而且曾把它的副本送給莫洛托夫。

斯大林說，他曾收到英国答复佛朗哥的副本。

丘吉尔繼續說，他认为斯大林的提案中有些困难，特别是有关与佛朗哥断絕一切关系的事。他說他反对于干涉一个并未妨害盟国的国家的內政。他认为由于西班牙国内的行动而和它絕交是一个危險的原則。他說他会因任何引导西班牙走向內战的事而感到遺憾。他指出联合国宪章有一个条款反对于干涉国家內政。当准备批准該宪章时，反而采取一种它所禁止的行动，这种作法是前后矛盾的。

我声明我并不喜欢佛朗哥。我也沒有任何意图来插手在西班牙发动另一次內战，欧洲的战争够多了。我說我很乐意承认在西班牙的另一个政府。但是我认为应由西班牙人自己解决这个問題。

斯大林說这不是內政問題，因为佛朗哥政权是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强加在人民头上的。他說他相信他的同事并不喜欢佛朗哥。他也未曾建議重新发动西班牙的內战。如果絕交是一个过分严厉的表示的話，他問是否尚有其他婉轉的办法，能使西班牙人民了解三国政府同情的是西班牙人民而不是佛朗哥。他說三大国是被认为能够解决这种問題的，我們不能对这个欧洲的毒瘤置之不理。他警告說，如果我們保持沉默，我們就可能被认为是贊許佛朗哥。

丘吉尔再次叙述他反对絕交。他提到英国和西班牙所維持的那种珍貴的貿易关系。他說，除非他相信絕交会达成所期待的效果，他不願意中止和西班牙的这种建立得好好的老貿易关系。他完全了解斯大林元帅的心情，特别是佛朗哥竟敢派遣了西班牙“藍色师团”到俄国去作战。他承认俄国的处境不同，因为它受到了危

害。他指出当西班牙的干涉可能給英国带来巨大灾难时，西班牙人便制止向英国人开火。他說，在“火炬战役”中，西班牙只要向直布罗陀海峡区的船只开火，就会給英国造成巨大的損失。但是如果西班牙人胆敢对盟国采取这种行动的話，那将是自取灭亡。

斯大林建議外长們應該設法使人明了三国政府首脑是不贊成佛朗哥政府的。

我同意他的主張，但丘吉尔要求由政府首脑自己来处理此事。

斯大林指出最終还要由我們三人解决，外长們对这个問題仅作初步研究而已。

丘吉尔說他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討論来，討論去，形成了拉鋸的局面，斯大林与丘吉尔都重复談到他們最初的論点。我看到在这个爭端上一时还不会取得協議，就建議我們轉移到其他我們能有所决定的項目上去，在以后的會議上，我們再回到西班牙問題上来。

斯大林又提議这个問題可提交給外长們来考虑。丘吉尔在这一点上，又作了阻撓，他坚持国家元首应擱下这个問題，不作决定。我指出我們任何时候都可以再回到这个問題上来。

我們把注意力轉向南斯拉夫。斯大林說我們不能討論这个問題，因为南斯拉夫沒有代表出席发表意見，它也是盟国。

艾登发言，他說，雅尔塔會議虽然沒有南斯拉夫出席，但三大国还是对发表宣言的問題达成了協議。

斯大林回答道，他們在雅尔塔會議时，南斯拉夫有两个政府，但是現在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府。

丘吉尔問斯大林所指的是铁托政府还是苏巴塞奇政府。他說南斯拉夫人对此意見极不一致。

斯大林回答說，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种說法。他建議，为了证实这种說法，應該邀請南斯拉夫代表团来告訴他們这种情况。

我問道，根据丘吉尔首相的了解，我們是否應該請南斯拉夫代表团前来。

丘吉尔回答說，铁托—苏巴塞奇协定尙未执行。他对雅尔塔決議以来在南斯拉夫所发生的情况頗感失望。

斯大林責备丘吉尔未回答主席提出的問題而繼續进行討論。接着丘吉尔和斯大林彼此交換了有关邀請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意見。

我感到我听得厌烦了。我告訴丘吉尔和斯大林：我是以一个美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討論世界大事的，我并不是来这里設立警察法庭，来审理一件已解决了的事件或終究将为联合国所解决的事件。我說如果我們开了这个例，那我們将被卷入这样一种情况：试图解决每一个政治上的困难問題，我們將听取一系列代表——包括戴高乐、佛朗哥和其他的人的意見。我坦白地告訴他們，我不願浪費時間来听人們訴苦，而是想討論三国政府首脑必須在这里解决的問題。我說如果他們不接触到主要問題，我就要收拾行装回国去了。我当真会这样做的。

斯大林大笑起来，他說他不責怪总统想回家，他也想回家哩。

丘吉尔說，他想美国是热心于执行雅尔塔协定的。他說，有鉴于南斯拉夫国内的巨大騷动，必須多多原諒铁托。

我回答說，我不仅希望看到雅尔塔协定付諸实现，就美国而言，我願逐字逐句地实现这个协定。我說我們也接到有关南斯拉夫的控訴。我建議延期討論南斯拉夫問題，使得我們能进行討論我們面临的其他更迫切的問題。

那天，我們的議事日程上最后的項目涉及英国和美国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装备問題。

丘吉尔說，英国提供了一个有关此問題的文件。他們认为外长們可以就这个文件达成協議。他建議既然这是一个牵涉細节頗

多的問題，應先交給他們。

斯大林說，他認為這是一件小事，可以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不必在會議上提出。但既已被提出，他希望更正一個錯誤的說法。他宣稱蘇聯在羅馬尼亞沒有拿去任何英國財產。這些石油公司中某些公司的財產是在德國獲得的。原來德國人強占了它們，利用它們來反對盟國。斯大林承認俄國人搬走了若干這類的裝備，因為德國人破壞了蘇聯的石油工業。他再三說這是一件小事，不必使大會麻煩。

斯大林堅持這是“一件小事”的理由是他占有了原屬於美國和英國的設備。觀察一下他的情況是令人感到好笑的。每當發生這樣的事件，也就是在俄國人偷走了棺材並處置了屍體以後他總是很謹慎地堅持可以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但如果是一件有關佛朗哥西班牙或南斯拉夫的事件，他便急于要把它攤在桌上求得解決。我看到了這種情況，這就是為什麼我有時候有“警察法庭”的說法。

丘吉爾說，處理英國和美國的油田設備不是一件小事情。他同意德國人偷走了英國人的油管是屬實，但是這是英國化錢購買的油管。丘吉爾首相聲明，如果蘇聯搬走了一些油管，認為這是賠償品，那麼，羅馬尼亞就應賠償英國。

我說美國的石油公司方面，也有同樣的情況。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再發表意見。

大家都同意這件事應交給外長們處理，这样就結束了第三次會議。

開完下午的第三次會議那個晚上，我在小白宮舉行國宴。出席宴會的賓客，除丘吉爾和斯大林外還有：貝爾納斯、艾德禮、莫洛托夫、李海、維辛斯基、賈德干、哈里曼、葛羅米柯、恰韋爾勳爵、保萊、戴維斯、索波列夫、波倫、巴甫洛夫和伯斯。

音乐是由一个特别的管弦乐队演奏的。尤金·利斯特军曹弹钢琴，演奏了萧邦的降A大调圆舞曲、作品第四十二号和萧邦的几首夜曲。斯大林是一个萧邦迷。丘吉尔不大欢喜这类音乐。斯大林对萧邦的圆舞曲和夜曲欣赏备至，他从餐桌上站起来，走到利斯特军曹身旁，和他握手，为他举杯，并请他再弹下去。丘吉尔首相也夸赞他。我也参加了表演音乐节目，当他们请我弹钢琴时，我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巴德列夫斯基的C调小步舞曲。因为我曾听说斯大林喜欢萧邦，我便叫利斯特军曹练习萧邦的曲子。他要来了降A大调圆舞曲乐谱，在宴会前练习了一个星期。这个钢琴质量并不好，但是无论如何，利斯特演奏得很精彩。

这是三国政府首脑几次非正式集会的第一次。这些社交活动有助于促进来柏林处理问题的人们的友好气氛。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最大的合作。

……7月20日下午四时过五分我召集了第四次会议。

按照外长们建立的轮流向三巨头汇报他们的会议结果的制度，莫洛托夫提出了第四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他报告外长们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问题上作了长久的讨论。这是关于实施雅尔塔决议中如何监督选举的问题，但是他们未达成协议。

我打断了苏联外长的话，我说，我无意要在被解放的国家“监督”选举。我认为“观察”是一个较合适的字眼。

丘吉尔也插言说，英国没有想到控制选举，也不愿对这些选举负责。他们只想知道选举是如何在这些国家进行的。

然后转到对意大利政策问题，我说，我支持我在会议开幕那天提出的草案。这就是要求意大利承担一系列的简单义务，代替投降条件，使得它在和约准备期间，可以不受占领的限制。

斯大林说，他在原则上不反对美国的提议。但他要求德国的其他附庸国——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受到

同样的待遇。

我說，我首先提出意大利，因为它是第一个投降的。加在意大利头上的投降条件比其他的附庸国要苛刻些。我提議我們首先考虑意大利，然后再談論其他的国家。

丘吉尔不願意放棄意大利的投降条件，他在这个题目上长篇大論地发表了意見。他說意大利政府打算在冬季前举行选举。虽然他同意应开始准备和約，但在意大利政府尚未建立在一个众所公认的民主基础之上以前，对它不应作出最后决定。他說，他不完全同意我的主張，用承担义务来代替投降条件，而且这些义务，意大利人民还不准备承担。我所建議的义务，他感到沒有包括意大利舰队的前途、賠償、殖民地和其他的細节。他害怕英国将失掉投降条件下的权利。最后他說，英帝国的自治領也簽訂了投降条件，必須同它們协商。他除同意对和約应作准备以外，不願再前进一步。

在这类的問題上，尤其是牵涉到地中海的問題时，丘吉尔常常认为必須大发議論，然后再同意大家的意見。那时，地中海对英国极端重要，因为它是通向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要道。很明显，他在作一个記錄以备日后真正談判和約时英国人可引为根据。当我们談及佛朗哥和西班牙时，他也是这样作。好几次，当丘吉尔詳細討論某事时，斯大林就支着臂肘，摸摸他的短鬚說：“你为什么不同意？美国人同意，我們都同意，你終究是要同意的，因此你为什么不在现在就同意呢？”这样爭論就停止了。最后丘吉尔也同意，但是他必須先演說一番。

斯大林說，意大利和附庸国問題是屬於重大政策性的問題。这样一个政策的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同德国分离。他說有两种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一个方法是用强力，但他感觉这样不够。他警告說如果我們仅用强力，我們就会引起这些国家和德国联合。因此，他



认为明智的办法是采用一种政策，使附庸国自动地抛棄德国，在这种政策上再施以压力。他說这是使附庸国跟我們一道走的唯一办法。他說，一切复仇的想法和一切的訴苦，当它們和这个重大的政策比較时，就相对地都不重要了。他說在原則上他不反对我的提議，但他声明草案措詞上也許要加以修改。

斯大林认为意大利罪大恶极。对侵犯俄国人來說，它也犯了一些罪。他指出意大利人曾到頓河和烏克蘭作战，但是采取仇恨或报复的情緒来对付这件事是不正确的。这种情緒在政治上起的作用很坏。他繼續說，在政治上，我們的指导原則应是計算实力。問題是我們是否要意大利站到联合国这一边来。这决定了一切。在他看来，同样的原則也适用于其他附庸国家。

斯大林虽然对德国的附庸国家——保加利亚、意大利、匈牙利能夸夸其談，但在他的軍隊已經占領了的附庸国家內，始終实行铁蹄政策，使它們无翻身的余地。他的铁蹄政策已扩張到爱沙尼亚、拉脫維亞、立陶宛、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羅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

斯大林指出附庸国家給他們造成了許多困难和牺牲。羅馬尼亚用了二十二个师攻打他們。战争結束时，匈牙利仍有二十六个师在作战。芬兰給他們造成了更大的損害。他說，如果不是芬兰的帮助，当然德国不可能維持对列宁格勒的封鎖。芬兰开了二十四四个师来对苏联軍隊作战。他认为保加利亚因为造成对盟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損害，应受到懲罰。停战条件中規定了对这两国家給予賠償。他告訴我們“不要发愁，因为俄国将强迫保加利亚付出这笔賠償”。

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俄国人用其他任何方法得不到賠償的話，他們就会使用偷窃的办法。

斯大林繼續作了長時間的发言。这是在整个會議中他所作的

一次最长的发言。他从来不用草稿，虽然他有时詢問莫洛托夫或維辛斯基。他每次約讲五分钟之久，便由巴甫洛夫翻譯。斯大林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見，他知道要收到怎样的效果。他說話的态度既鎮靜也很和气。

我說，据我了解的情况，我已經作出了一个具体建議。

斯大林插入說，英帝国自治領沒有簽訂这些协定。

艾登回答道，三个国家是代表其他所有联合国會員国签字的。

这时我插嘴說，我希望我們不要离开我們所討論的話題。我說，在我們的議事日程上，有关于对意大利政策声明的建議；而斯大林元帅則提出了羅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問題。

我想在所有这些附庸国家的問題上，我們是可以达成協議的。我解釋道，在这件事上，美国的政策是在世界上造成一种和平的情緒，这并不需要等待一个最后为了整个世界而召开的和平會議来解决它。

我說，我国面临着由于欧洲国家的情况而必須花費巨款的局面。关于意大利賠款問題，我提醒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元帅，美国为了供給意大利今冬的粮食，花費达七亿五千万至十亿美元。我承认美国富有，但假若在取得和平方面我們的努力沒有一些成績的話，我們是不能够永远拿出它的資源来援助他人的。

我警告他們，除非我們能够帮助这些政府自力更生，当他們應該能够帮助自己的时候，美国将不能无期限地繼續維持他們。我說，三大国必須在这次會議上，准备条件，造成一种局势，使得这些国家能够自給自足。

我們对意大利政策的討論，像我們到目前為止所接触到的大多数其他問題的途徑一样，我們交給外长們研究，然后再由他們向我們汇报。

議事日程上第二項是有关奧地利，尤其是維也納的局势問題。

丘吉尔抱怨說，由于俄国部队的干涉，英国人尚未得到許可进入在維也納的指定区域。

斯大林回答說，只是在昨天才对維也納境內占領区問題达成協議。就他來說，部队可以立刻开始調入維也納。

丘吉尔說，这件事得到解决，这使他很高兴。

閉会后，我立刻回到巴培尔斯堡，在小白宮我很高兴地見到欧洲戰場隨軍首席牧师提尔南上校。提尔南先生曾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所在的第三十五师第一二九野战炮兵部队的牧师。在我的野战炮兵部队夜間巡查时（我是D炮兵中队的指揮官），提尔南先生——我們都亲切地称他为神父——和我同坐在一輛車中走在部队的前头，我們討論世上一切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罪惡，他是我所認識的知識廣博仁愛可親的一個人。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善良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他駐在巴黎，當我在安特衛普登岸時，曾邀請他來波茨坦晤談。他在小白宮同我在一塊兒度過了幾天。

7月21日，我們開第五次會議，首先是關於波蘭問題的聲明。國務卿貝爾納斯報告外長們不能達成協議，希望將這個問題交給三國政府首腦來作最後決定。丘吉爾和我，沒有經過多少辯論，就使斯大林接受對波蘭所擬的宣言中的兩段，這是莫洛托夫事先在外長會議上加以阻撓的。其中的一段承認這個原則：在決定波蘭國外資產——主要在英國與美國——的問題上，舊波蘭政府的債務應在考慮之列，這些財產與債務應移交給華沙政府。斯大林的第二個讓步牽涉到一個特殊的聲明，即應許可新聞記者進入波蘭觀察選舉。

議事日程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波蘭西部邊界問題。我首先說，我對波蘭邊界要作一個总的聲明。我說在雅爾塔已作了決定，德國將由蘇聯、聯合王國、美國和法國共同占領。波蘭邊界也得到四國政府善意的考慮，但是邊界最後的安排，將在和會上來決定。我

提醒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我們第一次會議時，我們同意用1937年德國的疆界作出發點。我指出三國政府對在德國的占領區已作了決定。這些區域的邊界已經劃定，美國人和英國人早已進入指定給他們的區域。我說，現在看來，好像在德國指定了一個區域給另一個占領國政府。我指責說，這樣的做法未經過協商，如果波蘭人真正要占領這個區域，就應該預先對此達成協議。我又說，如果德國被瓜分了，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來解決賠償或其他問題。我說明我對波蘭臨時政府是非常友好的，我感到在蘇聯政府的願望方面，或許可能完全達成協議，但是我要求預先協商。

斯大林回答說，雅爾塔協定是波蘭東部邊界應依照寇松綫。至於西部邊界雅爾塔會議已決定波蘭應得到北方和西方割讓的土地。他說，當時又決定波蘭新政府應在適當的時候商談有關西部邊界的最後處置問題。

我同意這對雅爾塔協定是一個正確的聲明，但是分配一個占領區給波蘭人是對的。

斯大林宣稱，所謂俄國人未經同意就給波蘭人一個占領區的說法是不恰當的。他解釋道，事情的发生是由于這些區域的德國居民跟隨着德國軍隊西去，而波蘭人留下來了。他說紅軍在這個地區需要當地的行政組織。蘇聯不能夠同時肅清敵人的間諜，進行作戰，還要建立行政機構。他看不出在只有波蘭人留下的地區內建立波蘭行政機構有什麼害處。

我回答道，我不反對對波蘭西部邊界發表意見，但我希望大家明確地認識到占領區應完全按照過去雅爾塔的協定。我警告說，任何其他辦法將給賠償問題造成困難，尤其是对賠償應包括什麼尚未達成協議以前，德國就已經喪失一部分的領土了。

斯大林夸口說，蘇聯是不擔心賠償問題的，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完全放棄賠償。

我回答道，這個問題不論如何處理，美國將得不到任何賠償——我們只希望防止從美國國庫來支付賠償——正如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樣。

斯大林說，雅爾塔會議除了規定波蘭將得到土地以外，沒有說割讓任何邊界。西部邊界問題仍未確定，蘇聯不受任何約束。

我轉向斯大林問道：“你不受任何約束嗎？”

斯大林答道，“不”。

丘吉爾說，他想講許多有關實際邊界的話，但是認為時機未到。

我同意政府首腦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應由和會來解決。

斯大林發表意見，認為要在東普魯士這一地區恢復德國行政機構是很困難的。他說，他希望我能了解俄國在戰爭和占領期間都堅持的意見。按照這種意見，當一支軍隊作戰時，它只關心如何努力來戰勝敵人。為了使一支軍隊打勝仗並有所進展，必須要有一個安定的後方。如果後方安寧，它會打得好。如果後方是友好的，它就會打得更好。

他繼續說，即使德國人沒有逃走，在這個地區設立德國行政機構也是很困難的，因為大多數的居民是波蘭人。他強調說，在那里的波蘭人很熱情地迎接蘇軍，蘇聯政府設立朋友們主持的行政機構，原是很自然的事，尤其是在俄國軍隊為取得戰爭的勝利仍在作戰的時候。他堅持說沒有其他的辦法。他說，蘇聯的行動並不意味著俄國人自己已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建議或許整個問題應該作為懸案。

丘吉爾懷疑這個問題是否能作為懸案，他說還有供應的問題。這是一個很緊急的問題，因為所討論的地區是供給德國糧食的重要源泉。

斯大林提出了由誰來生產糧食和誰來耕地的問題。

我指出問題不在于誰占領一個區域，而是占領德國全國的問題。我們應該占領我們的地區，英國占領英國的地區，法國占領法國的地區，俄國也應占領俄國的地區。我說沒有人反對討論波蘭西部的邊界，我又說我不相信在這件事上我們有大不相同的看法。

斯大林堅持，在文件上，這些區域是德國領土的一部分。但从任何實際意義上看來，它的确是波蘭的領土，因為那里沒有德國人。

我不同意他的說法。我說，在我看來，九百萬德國人民是一個不少的人口數目。

但斯大林堅持說，所有的德國人都逃到了西方。

丘吉爾說，如果這是真的，就應該考慮如何供應他們逃往的地區的糧食問題。他又說，他們在土地上留下來的產品，還沒有用來供養德國人哩。

他繼續說，他的理解是在蘇聯政府所提出有關波蘭的全面計劃下，1937年德國四分之一的耕地將被割讓，而食物和賠償是根據德國的總面積來計算的。這太驚人了。他接着說：看來三四百萬的人民將被遷移，但是這個地區的戰前人口為八百二十五萬。他最后說，如果糧食的供應被斷絕，德國人口大批地被遷移，加重德國所留下的地區的負擔，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我插言發問說，如果我們把薩爾和魯爾區域交給法國，我們將造成什麼樣的局勢。

斯大林回答道，蘇聯政府對法國的要求尚未作出任何決定，但對波蘭西部邊界問題却已作了決定。他又說，他完全了解把這片土地從德國人手中移交給波蘭人所造成的困難。但是德國人對這些困難應負主要責任。他說，丘吉爾將這個地區的人口說成八百二十五萬。但是，不應當忘記，在戰爭期間，那里曾經有過幾次“參軍”運動。在蘇軍未到達之前，剩下的居民已離開了。他強調在這片要割讓給波蘭的土地上沒有一個德國人。

李海上将輕輕地对我說，“当然沒有，布尔什維克已經把他們全部杀光了！”

斯大林繼續說，在奧得河和維斯拉河之間，德国人离开了他們的田地。現在波兰人正在耕种这些田地。他說波兰人不会同意德国人回来的。

自然我知道斯大林是在捏造事实。苏联人夺走了寇松綫以东的波兰土地，他們想使其他三个占領国吃亏来补偿波兰的土地，我不能容忍，丘吉尔也不能容忍。我认为俄国人不是杀光了德国居民，就是把他們赶进了我們的区域。

我坐在那里傾听那滔滔不絕的辯論，感到厌倦。而所辯論的事情在会上又不能得到解决，但是却浪費了寶貴的时间。由于还有更多急待解决的緊急問題，我渴望避免口头上的冲突。我变得很不耐煩。有好几次，我感到我想炸开塞西林宮的屋頂。

当斯大林結束談話后，我說，我想再次声明在德国的占領区域应按照大家已同意的办法占領。我說，至于波兰人应否占領德国的一部分土地問題，不能在这里解决。

斯大林和丘吉尔繼續辯論不休。

最后，我插言道，德国的一大块領土已割让給波兰，这似乎是已成为事实。我指出西里西亚煤矿是德国作为賠償和供給食物的一部分地方，現在这煤矿已落在波兰人的手中了。我強調說，我們可以討論边界、賠償、粮食等問題，但波兰人沒有权利取得这块土地，也不能把它从德国經濟中拿走。我說，情况简单地說来是这样：在和約未簽訂以前，这些占領地区的規定是否有效？或是我們把德国零零碎碎地分割出去？

斯大林扼要地重述他对波兰管制西里西亚可耕地和煤矿的要求。他說他的政策是給德国人造成困难，从而使德国的势力不再抬头。他的理由是，給德国人造成困难，要比給波兰人造成困难好

些。

我回答道，給盟国造成困难是很坏的。

斯大林断定說，德国的工业愈少，美国和英国貨物的市場就愈大。他說，德国是一个危險的商业勁敌，除非我們使它永远屈服。丘吉尔說，我們不希望面临着一大群飢餓的人民。斯大林向他担保說：“一个也不会有。”

艾德礼作了长篇的发言，他的意見与丘吉尔和我的一样。

在我看来似乎无話可談了，除了坦白地重复我所坚持的立場，我不能同意把德国的东部和德国分开。

斯大林也显然已經了解繼續这种討論不会有任何結果。

他猝然发問說，“我們談完了嗎？”

丘吉尔說，我們的討論还没有結束，但我們應該轉向能取得一致意見的題目。

我宣布在这个問題上會議很明显地陷入了僵局，于是休会。

.....



## 第十七章

### 波茨坦：附庸国家

7月22日是星期日，可是我們已决定繼續举行正式會議，并不間歇。……我在小白宮吃罢午飯后不久，丘吉尔首相便來訪，我們晤談了約一小时。我在处理了一些发往华盛顿的紧急函件后，便赴无忧宮，在下午五时第六次會議宣布开会。

我們繼續前一天的討論，談到波兰的西部边界問題。丘吉尔首相重申他的理由来拒絕斯大林关于把德国东部領土割让給波兰的建議。斯大林則反过来也以他从前提出过的同样的論点来反駁首相。

随后我就宣讀了雅尔塔公报中有关波兰西部边界的那部分，并提醒他們，這項協議是由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首相共同达成的。我并說我完全同意這項協議，而且願說明一点，即波兰目前已在德国获得了一个占領区这件事，并未在三强之間进行过任何磋商。虽然我并不反对划撥一个占領区給波兰，可是我不喜欢这种做法。我重复地說，我們在这里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四个被授权的强国如何占領德国的問題。我說我的立場昨天是、今天仍然是、明天还是这样。

斯大林說如果我們对边界問題不厌煩的話，他願意指出，雅尔塔決議的真正涵义在于我們在波兰的西部边界的問題上，必須采納波兰政府的意見。既然我們不能同意波兰的建議，便應該听取一下波兰新政府代表的意見。如果政府首腦們不願意听取，外长們就應該听取他們的意見。

斯大林說他願意提醒丘吉尔先生以及其他曾参加过克里米亚會議的人士，关于西部邊界的問題，罗斯福總統和丘吉尔先生所持的見解是：界綫应从奥得河入口起，沿着奥得河直到它和尼斯河东段汇合之处为止。他不同意这样的界綫，而坚持界綫应在尼斯河西段。斯大林說，罗斯福總統和丘吉尔首相提出的方案把斯德丁和弗劳茲瓦夫以及弗劳茲瓦夫以西的地区都留在德国那一边了。

談到这一点时，斯大林繞着桌子走了过来，在一張地图上向我指出这条界綫。

斯大林說，有待解決的問題是一个邊界的問題而不是一个临时界綫的問題。我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也可以把它擺一擺，可是我們不能置之不理。

丘吉尔也认为這個問題沒有波兰人参加就不能解決，当然，除非我們接受波兰提出的建議。于是斯大林就轉向我說，关于我所提到的目前有第五个国家在占領德国一事，他希望說明若要責怪誰的話，不应只是怪波兰人，当时的环境和俄国人也有責任。

我回答說，那恰好正是我所曾談到的事。我于是同意让波兰的代表們到波茨坦来，由各外长听取他們的意見后向我們汇报。

現在大家同意由我作为會議的主席来向波兰人发出邀請，請他們派代表到波茨坦来参加外长會議，以求对于邊界問題获致某种切实的解决办法，直到这件事最后在和平會議上解決时为止。

莫洛托夫随后提出了托管制这个題目，并說旧金山會議已在原則上建立了一个托管制，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处置个别領土的問題，諸如意大利的殖民地以及或許还有朝鮮。

莫洛托夫繼續說，他曾从外国報紙上看到意大利已喪失了它的殖民地，問題就在于是誰得到了这些殖民地？这件事又是在哪里決定的？丘吉尔作了回答，提到了英国所曾遭受的重大損失以

及英国军队在“单独征服意大利的全部殖民地”时所获得的胜利。

我轉向这位首相并問他，“是全部嗎？”

丘吉尔解釋說，当他談到意大利的殖民地时，他是指利比亚、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他說英国曾在这些地方遭到猛烈轰击和孤立无援时加以占領，至少是在初期是这样。莫洛托夫插言說，柏林是被紅軍攻克的。

丘吉尔沒有理会莫洛托夫，繼續說他們并不想从这场战争中獲得什么好处。英国的損失是惊人的，虽然在喪失生命方面还比不上他們英勇的苏联盟友所曾喪失的那樣众多。但是，英国在战后变为世界上一个巨大的債務国。虽然英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却没有提出任何領土要求，沒有提出要哥尼斯堡<sup>①</sup>，也沒有提出要波罗的海国家，什么都沒有。关于意大利的殖民地，他說他认为意大利已經喪失了这些土地，但是这并不妨碍和平會議去考虑是否应将其中某些地方归还意大利的問題。他不是表明自己贊成归还殖民地，只是願意討論这个問題而已。丘吉尔說，目前，英国占有着这些殖民地。他希望知道誰想得到它們。并且說，如果有申請人的話，應該把他們的申請提出来。我便說美国并不想要这些殖民地，也不想接受托管它們。莫洛托夫說，苏联的建議已經书面提出过了，希望會議能对它加以考虑。丘吉尔便問苏联盟友要求些什么？是否斯大林希望对某一块意大利殖民地提出要求？

斯大林回答說，他們願意知道这个會議是不是准备对意大利是否將喪失这些殖民地的問題进行討論。如果进行討論的話，他們才能决定这些殖民地將移交給哪些国家托管。丘吉尔說，他并未考虑过苏联想在非洲海岸获得一大块土地的可能性。若真是那样，这个問題就得同許多其他問題結合起来一并考虑。

<sup>①</sup> 1945年4月苏軍发动哥尼斯堡战役，4月9日占領哥尼斯堡，歼灭德寇五万人，完成1945年东普魯士战役。1946年7月4日哥尼斯堡改称加里宁格勒。——譯者

斯大林声称，苏联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上已表明他们渴望在某些领土上获得委任统治权，这件事现在已在俄国的文件中提出来了。

我指出苏联建议应由外长会议来讨论的事，我并不反对。

丘吉尔说他也并不反对，于是大家都同意把托管制问题提交给外长会议。我们便转移注意力到土耳其问题上。

丘吉尔说，牵涉土耳其的那个旧的蒙特娄公约，显然有必要加以修改，并且他曾屡次表示愿意看到对俄国船只在黑海中自由进出航行一事能有所安排。不过他希望斯大林元帅记住，切勿使土耳其惶恐不安。他说，苏联和保加利亚的大量军队在保境内集结一事，以及苏联报刊上不断进行攻击的事实都使土耳其极为不安，而在莫洛托夫先生同土耳其大使之间的谈话中提到了修正土耳其的东部边界及苏联要在海峡地带建立基地等事，这也使土耳其同样感到不安。

莫洛托夫解释说，土耳其政府曾采取主动通过它驻莫斯科的大使向苏联提出了缔结同盟条约的建议。他说在1921年时，曾有一部分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及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土地被从俄国的领土上夺走，因此他坚持要在缔结同盟条约前先解决这个问题。

丘吉尔反诘俄国人有什么权利认为黑海海峡的事件除了他们自己和土耳其之外，别人没有发言权。莫洛托夫回答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在过去也有过同样的条约，于是他引证了1805年和1833年的条约。

丘吉尔说，他需要请他的随员去查一查这些古老的条约。他说英国并不准备促使土耳其去接受俄国方面的这种建议。

我说，我没有准备发表意见，因而建议在进行必要的研究之前，暂缓考虑这个问题。大家都表示同意。

在丘吉尔和莫洛托夫交換了如何处理在意大利的俄国战俘問題之后，我便宣布休会。

次日，7月23日，我們又举行了第七次会议。那一天的議程牵涉到爭論頗多的四个地区：土耳其、哥尼斯堡、叙利亚和黎巴嫩、伊朗。其他曾轉交或委托給外长們的問題，都尚在起草阶段或仍由首脑們、秘书們以及集聚在波茨坦的专家們在研究。軍事會議則在各參謀长之間进行着。三巨头的會議仅仅是在波茨坦会场区域内昼夜不息地进行着的、繼續不断的討論和商量的一部分。

丘吉尔首先发言，重申了他的立場，即不能同意让俄国在海峽地带建立基地。他并說他认为土耳其不会同意那样的建議。

斯大林声称，丘吉尔所說的俄国在保加利亚集結了过多的军队，使土耳其感到不安一事，这种說法是錯誤的。斯大林說，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军队比英国在希腊的军队要少。丘吉尔便問斯大林他认为英国在希腊有多少军队。斯大林說，“五个师。”丘吉尔說只有两个师。

斯大林問到了装甲部队，問英国师的实力如何。

丘吉尔說英国在希腊总共約有军队四万人。

斯大林便說俄国在保加利亚只有三万人。

丘吉尔說他希望这个會議能由亚历山大元帅来提供一些数字，斯大林就說他并不要求确切的数字，他“百分之百地”相信丘吉爾的話。他又說，但是土耳其人自己有着二十三个师的军队，用不着害怕俄国人。至于談到修改边界一事，他解釋道，或許土耳其人害怕的是可能恢复在沙皇时代的战前边界。他說他想到的有过去屬于亚美尼亚的卡斯，以及过去屬于格魯吉亚的阿尔达汉这些地方，并且強調如果土耳其不提出要與俄国締結同盟的話，修改边界的問題也完全不会发生。締結同盟意味着双方須共同保卫他們之間的边界，而在俄国方面看来，上述地区的边界是不正确的，因此

他們告訴了土耳其方面，若要締結同盟，這些邊界必須要修改。他說，如果土耳其人不同意這一點，那麼締結同盟的問題也只好不談了。他很想知道在這個問題上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關於黑海海峽，斯大林說俄國認為蒙特婁公約對他們非常不利。他埋怨說，根據這項公約，土耳其不僅在發生戰爭時有權利封鎖海峽，而且即使是在土耳其感到有戰爭威脅的時候，它也能這樣做。他繼續說，這種結果便成為一個得到英國支持的小國扼住了一個大國的咽喉，不給它出路。他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一個類似的政權存在於直布羅陀海峽或蘇伊士運河，將會在英國引起多大的騷動，或者存在於巴拿馬運河的話，將會在美國引起多大的騷動。他最後說，爭執之點即在於須讓蘇聯船只有可能自由地進出黑海。在一旦複雜事件發生時，由於土耳其無力保證自由通行的可能性，蘇聯希望海峽能得到武裝保衛。

我說美國政府的態度是蒙特婁公約應加以修訂。可是我認為海峽應成為向全世界開放的自由水道，並且應由我們大家來保證。我說我對歷史作了長期的研究後獲得了這麼一個結論，即過去二百年內的一切戰爭都策源於自黑海至波羅的海和自法國的東部邊界至俄國的西部邊界這一片區域內。以最近兩次戰爭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奧地利，這次大戰是德國破壞了全世界的和平。我想本屆會議及未來的和平會議應設法使這種事情不再發生。

我宣稱，將提出一個方案建議俄國及所有其他國家都能自由進入全世界各個海洋。作為解決海峽問題的方案，我提出的建議將把丹麥境內的基爾運河<sup>①</sup>、把自北海至黑海間的萊茵河—多瑙河水道、以及黑海海峽、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等都作為供所有國家客運和貨運通航的自由水道，只徵收管理和保養這些水道

---

① 基爾運河在德國北部鄰近丹麥地區，但不在丹麥境內，原文有誤。——譯者

所必需的費用。

我繼續說，我們并不希望这个世界在二十五年内又因海峽或多瑙河再打一次仗。我說我們唯一所期望的是見到一個在經濟上巩固的，能自給自足的歐洲。我願意見到一個使俄國、英國、法國和所有其他位於歐洲的國家都安全、繁榮、幸福的歐洲，這樣，美國能與之貿易，並且也同樣既繁榮又幸福。我感到我那個建議便是朝這個方向走去的一步。

我說，有關領土割讓問題是土耳其和俄國之間的爭論，這一問題他們必須自行解決，而斯大林元帥也曾表示他願意解決。可是關於黑海海峽的問題，我指出，就涉及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了。

丘吉爾對於斯大林要修訂蒙特婁公約使俄國的商船和軍艦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都能在海峽自由航行的建議，表示同意。他說他也同意我的建議，即這一點應由我們大家來保證。由大國和利益相關的國家共同作出的保證當然會有效。他真誠地希望斯大林元帥在和海峽中間靠近君士坦丁堡<sup>①</sup>的地方建立基地的辦法對比以後，能選擇這個辦法。

關於其他水道，英國完全同意我在聲明中所採取的總方針。丘吉爾認為基爾運河當然應該自由地開放，並由所有大國來加以保證。他對多瑙河及萊茵河的自由航行問題特別認為重要。他感到在這項議題上三強之間已有了極大程度的一致。

我說，在修訂蒙特婁公約的問題上，一致同意已是無疑問的了。

斯大林說，關於我的建議他暫時不想發表任何意見，因為他要在討論這項建議前先仔細地讀一下我的建議。接着斯大林就提起了哥尼斯堡的問題，並指出這個問題曾在德黑蘭會議上討論過。

---

<sup>①</sup> 即伊斯坦布尔。——譯者

俄国人申訴說，他們在波罗的海的全部港口每年总要冰冻一个时期，因此他們感到至少需要从德国取得一个常年不冻的海港。斯大林又說，俄国人从德国手中吃了不少苦，因而极渴望获得一些德国領土来略微滿足千百万苏联公民的心意。他說，这一点曾为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时所同意，他渴望本會議能批准这项協議。

我說我在原則上是准备同意的，虽然还需要研究一下牵涉到的人口和其他有关問題。丘吉尔也同意割让一个不冻港給俄国。他說，唯一的問題，是在什么場合割让較为合法。他指出，苏联在这个問題上的草案将要求我們承认东普魯士并不存在，并要我們承认哥尼斯堡地区并不屬于在德国的盟軍管制委员会的管轄范围。他指出，这个草案将使我們去承认把立陶宛归并給苏联。他說，所有这些事情应该由最后的和平會議来解决，不过他願意向斯大林元帅担保他将繼續支持俄国在世界上那一地区的立場。斯大林同意把这些事情放到和平會議中去解决，并且說，英美政府承认了这些事，俄国已感到滿意。

随后莫洛托夫宣称俄国代表团願意提交一份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問題的文件，并建議在先征得法国的同意后由美、英、苏、法四国的代表組成的四强會議来考虑这两个国家的局势。

丘吉尔說，保卫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責任早已落在英国的肩上。当英国兵开进叙利亚和黎巴嫩，赶跑了德国兵及維希政府的軍隊后，他們已和法国方面共同作了安排，双方都承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他指出，英国方面曾告訴戴高乐將軍，一旦他能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一項圓滿的協議，英国就立刻撤出軍隊。他解釋道，如果英国現在就撤軍，会导致那里的法国平民及少量的軍隊遭到殘杀。他警告說，这样将会在阿拉伯世界造成一場大混乱和爆发战争，也会波及埃及，这就严重地危害了目前同盟国家在对日战争中使用的經由苏伊士运河的交通綫。他表示深信能和法国达成一項协



議，在協議中戴高乐應該保证叙利亞和黎巴嫩獨立，同時，協議中也將替法國保留若干它在該地的文化利益和商業利益。他在總結他的發言時說，英國對召開四強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的建議並不表歡迎，因為這個問題只涉及英國、法國以及叙利亞和黎巴嫩等地區。除了美國給予它們外交上的承認外，英國方面已經擔負了全部重任。英國不願意讓這類機構來審核這整個問題。當然，如果美國要想取英國而代之，那又另當別論了。

我回答說，“不，謝謝。”

我又指出，當這場爭執發生時，首相和我曾交換過一次函件。我解釋道，首相曾表示願將英國軍隊留駐在當地以阻止戰爭爆發，而我也曾要求他立刻照辦以保護我們經由蘇伊士運河通往遠東的交通綫。然而，我認為沒有一個國家應享有像擬議中給予法國的那種特權。我說，法國在造成了這樣大的麻煩後，實在不配享有特殊地位。我又說，一切國家都應該權利平等。

斯大林見到我們不願把這件事交給四國的機構來討論，便撤回俄國的建議。

這樣我們就接下去談到了當天議程的最後一項——伊朗局勢問題。

丘吉爾說英國方面已就這項問題提出了一個文件，他想听听別人的意見。

斯大林說英國提出的建議是以盟國軍隊駐扎在伊朗的期限已滿的假定為根據的。蘇聯對待這件事所根據的假定是這個期限要到對日戰爭結束以後才滿。他指出這一點是由條約規定的。他說，不過蘇聯代表團同意從德黑蘭撤出軍隊的建議，因此建議我們就照這樣辦好了。

我說我們早就準備撤退，可是我們在伊朗有許多供應物資，希望加以保護，以使用在對日戰爭中。

斯大林說俄国代表团并不反对美国和英国的军队駐在伊朗，不过他觉得留在德黑兰的军队可以撤退。

我說我想在德黑兰并没有美国军队。

斯大林說即使在德黑兰有的話，俄国也不反对。他建議他們只須即刻撤出德黑兰。

丘吉尔說，英国方面迫切希望双方都能繼續撤退军队，因为他们曾答应过在对德战争结束后撤退的。

斯大林說他还須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說，条約要求军队在对德国及其伙伴的战争结束后六个月之内撤退，那是包括对日本的战争在内的。他們在結束了对日本的战争后还有六个月。斯大林說，这給了我們充分的时间。

丘吉尔建議我們接受从德黑兰撤退的意見，并让外长們在开会时再審議一下这件事。

我表明美軍已在撤退中，因为我們在远东需要军队。我估計我們在六十天内就能撤出伊朗。

斯大林就說，美国完全有权利照顾它的供应物資。他补充說，“为了免除美国一切忧虑，我們答应对伊朗将不采取任何行动。”

我对元帅的这个声明表示了感謝。

在这时候，英国的亚历山大元帅走进了屋子，并和斯大林元帅和我握了手。接下来的談話便提到了那个在我們的第四次會議中首先談到的关于占領維也納的問題。丘吉尔表示，关于分配給英美军队占領的区域，現在看来維也納的英占区有五十万居民。他說英国方面将无法負責供应这五十万人的食粮，因为維也納的粮食集中在該城的东部。因此他建議先作一个临时性的安排，由俄国方面繼續供应他們粮食，直到能作出一个較长期的安排时为止。随后亚历山大元帅也提供了一些有关維也納的粮食情况的补充情报。

我說在我們的占領区内約有三十七万五千个居民，而我們的运输体系又几乎全部应用在处理对日战争的供应物资上以及供应意大利、法国、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上了。

斯大林問了几个問題后，告訴我們說，他和倫納博士的奧地利政府間已有一項暫行協議，俄国方面將供給奧地利一些糧食。他答应再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一問題，并在數日内告訴我們他在供应奧地利首都的糧食方面还能提供哪些帮助。

丘吉尔于是提出了英国大选的事情。他对斯大林和我說，艾德礼先生和他在下星期四必須赶回倫敦參加大选，他們并将携艾登同行。他們將回来參加7月27日晚上的會議。又說，“也許我們之中有些人会回来。”他問我們能否在星期三早晨他离去前开一次会。这一点大家都同意了，大家还同意外长們將繼續开会，而在艾登缺席期間由亚历山大·賈德干爵士代替他。

會議到此休会。晚上八时我同国务卿貝尔納斯和李海海軍上将一起走到丘吉尔的寓所，参加了首相为斯大林元帅和我举行的国宴。

次日早晨——那是7月24日——李海海軍上将、金海軍上将、馬歇尔將軍、阿諾德將軍和薩摩微尔將軍等陪同我到了英国的总部，檢查对日战争下一阶段的軍事部署。

在英国方面，除了丘吉尔之外，在場的还有战时运输大臣萊瑟斯勋爵、艾倫·布魯克元帅、皇家空軍元帅查尔斯·波特耳爵士、海軍元帅安德魯·肯宁安爵士、海斯廷斯·伊斯梅將軍、H. M. 威尔逊元帅和R. E. 累科克少将等人。

自从我們抵达波茨坦以来，英美两国的參謀长每日都举行會議，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便是他們呈給丘吉尔和我的最后报告的初稿。我們一段一段地仔細檢查。我們的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要日本尽可能早地无条件投降。丘吉尔和我批准了全部报告。这份报

告中闡明的若干主要的战略目标是：

同其他盟国合作，削弱日本抵抗的能力和意志，施行海上和空中的封鎖，进行猛烈的空襲轰炸，以及摧毁日本的空軍和傀儡軍，以期尽可能提早击败日本；以主要努力来攻击和占领日本本島的各项目标；对除了日本本島以外的、有助于完成主要努力的各项目标实行进攻；在日本建立绝对的軍事管制；并且，在必要时，解放日本所占領的領土；

同其他盟国合作，按照需要建立并維持对德国和奥地利的軍事管制；

对日本的进攻以及与之直接关联的各项作战行动，将对日战争中的最高行动；軍隊和給养将按照所需的規模部署分配，以保证这次进攻能在最可靠的尽早日子內完成。任何可能危害或可能拖延达成这些主要作战行动的行为，将不予采取；

应当鼓励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应该提供对俄国作战能力的必需援助；

应采取必要的和切实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国的抗战力量，使其成为对日战争中一个得力的同盟；

太平洋战区的作战策略仍将由美軍參謀部掌握；

美軍參謀部将以其未来的計劃和意图向英軍參謀部提供詳尽而及时的情报；

在苏联加入对日本作战后，所采用的战略应在有关各方之間共同討論；

英国太平洋舰队将如目前拟定的計劃参加作战；

一支英国的拥有十个中队的长距离轰炸机队将参加作战；一俟能找到更多的飞机場后，这支队伍将扩大到二十个中队；

大家同意英国将派适当的司令官和參謀人員訪問尼米茲海軍

上将和麦克阿瑟將軍，并同他們一起制訂一項呈給联合參謀部的計劃；

为了計劃生产和分配人力，拟議中的終止日本有組織的抵抗的日期为1946年11月15日，这个期限应經常校正，以适应战局的进展。

同一天下午，联合參謀部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俄国的各軍參謀长举行了會議，他們是：紅軍參謀长安东諾夫上将、海軍人民委員部的庫茲涅佐夫海軍上将和苏联空軍參謀长法拉列夫空軍元帅。安东諾夫有他的助手斯拉文中将陪同。會議由李海海軍上将担任主席，他和馬歇尔將軍后来給了我一份詳細的报告。

會議的首要目的，是要求能在远东战略上相互配合，这是使俄国站在我們这一边作战的一个重要步驟。安东諾夫上将声称苏联軍隊正在远东集結，为的是准备于8月下半月对日本开始行动。至于确实的行动日期，他向我們的軍事領袖們說，将要取决于同中国方面的談判何时能圓滿結束而定。

安东諾夫說明俄国在远东的目标将为击潰在滿洲的日本軍隊并占領辽东半島。他說，等到日本战败后，苏联打算自滿洲撤出所有的俄国軍隊。

随后馬歇尔將軍便把我們所知道的日本軍力的部署概况告知了俄国方面。他把我們在太平洋上的处境向他們描述了一个大概，并談到了可能采取的若干对日行动的路綫。金海軍上将和阿諾德將軍也談了談对日本軍隊采取的海上和空中行动的效用。

安东諾夫上将对于我們可能对千島群島或朝鮮采取的任何行动的意图都表示了特殊的兴趣。金海軍上将告訴他，我們將无法对千島群島展开进攻，不过不用占据其中任何島屿也能維持住一条通过該島的交通綫。

馬歇尔將軍聲稱，我們目前并無對朝鮮採取水陸兩栖戰術的計劃。他解釋道，按我們的觀點看來，這類行動需要耗費極大的運輸量，而我方的專家們深信只要一俟我們的飛機能從日本的九州島上的機場起飛，控制住朝鮮是毫無困難的。

李海海軍上將報告說，那次會議開得很友好。

兩天以後，在7月26日又召開了另一次會議，可是出席的只有美國和俄國兩方。會議的首要目的是听取俄國方面答复关于以前馬歇尔將軍向他們提出的一些詳盡的問題。俄國人在他們的答复中，同意了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和伯力兩地建立氣象站，并同意由美國方面來配備人員，雖然最初他們在這一點上是有些勉強的。

在划分各方海空部队的行动区域方面，也达成了協議。这些区分界綫大概是从日本的北端起，橫跨过朝鮮的極北部。至于地面作战方面並沒有划这样的綫，因为我們的軍事領袖們并不准备在朝鮮作战。

这两个軍事代表团还同意交換聯絡人員，其中包括駐在華盛頓的一个蘇聯軍事使团，还同意在西伯利亞指定港口和機場供我們的部队作修整和緊急使用。俄國方面并聲明这一切協議只有在俄國参加了對日戰爭后才生效，不过这次會議的总的氣氛仍是像前一次那樣合作和友好。

在7月24日政府首腦的第八次會議上，我們又談到了和平條約的問題及与意大利和其他附庸國家的臨時協定。在我原建議的新稿中我曾同意把東方附庸國家也包括在內，現在國務卿貝爾納斯已把這份新擬的方案擺在我們面前了。

會議到這里展開了最激烈的辯論，爭執之點是斯大林要我們承認他在俄國軍隊占領過的附庸國家內制造的傀儡政府。

斯大林說，現今在意大利和其他附庸國家之間已划了一條不

正常的界綫，似乎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芬蘭都屬於不潔淨的國家之類。在這種界綫上，他看到了一種企圖不信任蘇聯的危險，並反問是否意大利政府比其他國家的政府更民主或更能負責些。他說，在意大利還未曾舉行過民主選舉呢。

我回答斯大林說，任何人都能自由地進入意大利——美國、英國、蘇聯及其他國家——可是我們並未能自由地進入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匈牙利，而且未能得到有關這些國家的消息。我說，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能建立在允許我們自由進入的基礎上時，我們就會承認它們，但不會在那時之前作這種承認。我說我要求按照民主的路綫來改組其他附庸國家的政府，像曾在雅爾塔會議上一致同意過的那樣。

斯大林反對草稿中“能負責的和民主的政府”這些字眼，他說由於這些字眼會導致對那些國家的不信任，因此應該刪掉。我指出，為了要表示他們若想得到我們的支持來進入聯合國，唯一的方法是成立民主的政府，這些字眼是必不可少的。斯大林說這些政府並不是法西斯政府。他指出，在阿根廷有一個更加不民主的政府，雖然如此，它還是被允許參加了聯合國。

丘吉爾說他願意為意大利說幾句話。他說他對意大利有相當的同情，因為那里沒有檢查制度，自由也有了相當的發展，現在意大利北部即將舉行民主選舉了。他不了解為什麼三大國不能同意意大利談判和平。他補充說，關於羅馬尼亞，特別是保加利亞，英國是一無所知的。他斷言英國在布加勒斯特的代表團曾被隔離起來，簡直像遭到拘留一樣。

斯大林插進來問，丘吉爾未經證實怎麼就能引證這類事情。

丘吉爾說，英國是從他們派駐當地的代表們那里獲知這類情況的。他說，斯大林若讀到那張開列着他們的代表團在該地所碰到的困難的長長的單子，一定會非常驚奇。他指控說，他們的代表

团人員的周圍已被筑起了一道铁柵栏了。

斯大林插进来解釋道，“这些都是神話。”丘吉尔又說，政治家們只要自己願意，是可以把別人的发言称作神話的。他表示他完全相信駐在布加勒斯特的代表們的話，并說英国代表团在那边的情况已使他产生了莫大的忧虑。

我說，就美国的情形来看，我們对于我們駐在羅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所遭遇到的許多困难，也曾十分担心。

这样的交談繼續着，言詞尖銳，似无止境，于是我建議把这一問題也交給外长們去重拟方案。

下一項議程是重新討論黑海海峽問題。我問大家是否已考虑过我那份关于內水通道的文件。

斯大林說这份文件只涉及多瑙河和萊因河，并未涉及土耳其和黑海海峽的問題。他說，苏联代表团希望就他們提議的关于黑海海峽的俄土条約，得到一个答复。我回答說我的希望是把这两个問題一并考虑。

斯大林說，他担心我們在海峡問題上无法达成協議，因为我們的观点分歧太大。他建議我們暫緩討論这一問題而討論下一項議程。

丘吉尔說，据他了解大家已同意由三大国及其他大国来承认和保证黑海海峽的自由。他說我的建議，大家参加一个使全世界的水道自由通航的組織，在他看来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說首相在这件事上已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因而同意他的說法，即这将是一个重大步驟。

丘吉尔說，他希望斯大林能考虑到总统所提議的这种保证，較之在海峡地区設防更可靠。

莫洛托夫便問苏伊士运河是否也是根据这样的原則管理的。

丘吉尔說，苏伊士运河在战争时期与平时时期都是向一切国



家开放的。

莫洛托夫問，苏伊士运河是否处于国际管制之下，像提議中应用于黑海海峡的一样。

丘吉尔說这个問題并未被提出来过。

莫洛托夫回嘴說，“我現在就提出这个問題。”他說，如果那真是个完善的办法，为什么不应用于苏伊士运河呢。

丘吉尔解釋說，英国早有了一个滿意的安排，而且他們已这样管理了約七十年，并未听到过抱怨之声。

莫洛托夫指責說，抱怨之声已經有过不少了。他說，“你應該問一下埃及。”

艾登插进来指出埃及曾同英国簽訂过条約。

莫洛托夫說，英国會硬說国际管制的方法最好。

莫洛托夫在波茨坦會議上发言极多。他和斯大林以及托洛茨基和列宁，都是 1917 年革命时代的老布尔什維克。莫洛托夫經常爱反辯，发言时似乎他就代表俄国那样，直到斯大林微微一笑，并以俄語对他說了几个字，他才改变語气。

我时常感觉莫洛托夫向斯大林隱瞞了一些事实，或是非到不得已就不把全部事实告訴斯大林。要同莫洛托夫取得協議往往比同斯大林取得協議还要困难。斯大林有时还能微笑或松弛一下，但莫洛托夫給人的印象是經常咄咄逼人的样子。

丘吉尔說，提出国际管理內陆水道的建議，是为了迎合俄国的立場，即俄国应能在黑海自由地出入，他的政府已准备同其他国家一起参与作这次保证，并准备促使土耳其接受。他說，这样可以使土耳其不产生困难而实现海上的航行自由。他同意这問題必須攔一攔，可是他希望他們的俄国朋友不应低估他們“在會議时听到的惊人的事实。”

我說我願意闡明一下我对于国际保证海峡航行自由一事的了

解；它意味着任何国家不論抱着什么目的都有自由进入的权利。我又說，我并未考虑过任何形式的設防措施。

我們同意各自将再研究一下海峡的問題。

在繼續进行討論其他事項之前，我指明这个會議必須在一个星期或十天之內結束，而且必須准备好一份公报。我建議任命一个委员会着手草拟公报，并提議外长們于次日向我們提出一个方案来。

我說我渴望尽可能多作些工作，因为当沒有更多的事我們能一致同意时，我就要回国了。我补充說，在華盛頓有好多公事在等待着我呢。

丘吉尔說他在这里的停留也不能超出8月6日，因为他和艾德礼先生都必須在8月8日回到英国参加新选出的議會。

我們討論的最后一項議程是占領維也納的問題。斯大林宣称他已同科涅夫元帅談論过，苏联准备繼續向維也納所有各占領区發給口粮，直到英国和美国方面认为有可能另作安排时为止。

我来到波茨坦的时候曾携带一份号召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的草案，这个草案我想同丘吉尔討論一下。这将成为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政府首脑們的联合公告。在我于7月24日送給他看一份草案的副本之前，我曾等待參謀长联席會議在我們的軍事战略方面达成協議。丘吉尔和我一样渴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他和我們的軍事領袖們一样，都认为俄国的参战将加速日本的潰敗。同时，丘吉尔很快地同意了那个公告的原則，并說他将把那份副本拿去进一步研究它的具体內容。

斯大林当然不能参加发布這項公告，因为他同日本仍保持着和平，可是我考虑到最好是让他知道我們即将采取的行动。因而在會議开会的期間，我曾私下同他談到过这件事情。

丘吉尔和我们都认为蔣介石应被邀参与发布這項文件，而且中

国应被列为发起的政府之一。于是我就把这项文件的内容电致在重庆的赫尔利大使，并指示他从速取得蒋委员长的赞同。电报是通过海军方面发出的，同时也经由陆军的电讯系统发出。可是经过了二十四小时以上仍未获得答复或回音。丘吉尔即将回伦敦了解大选的结果去了，不过他在离去前传话给我，对公告的措词表示赞同，并同意由我自行处理发布这项文件。

7月25日那天是温斯顿·丘吉尔必须离开会议的日子，斯大林和我为了迎合他的意思曾同意在那天早晨开一次会。在我们开这第九次会议之前，丘吉尔、斯大林和我便在塞西林宫的庭园内第一次正式拍摄了几张波茨坦会议的照片。

第九次会议讨论了目前众所周知的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丘吉尔说他曾同贝鲁特总统进行过谈话，艾登昨夜也同波兰代表团谈了两个小时。他说，波兰方面全都一致说约有一百五十万德国人留在目前讨论中的西部地区。

我表示这是事实。我又说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也曾同波兰代表们商谈过，准备还要同他们谈几次。

丘吉尔说他认为自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迁移人口的问题应该予以讨论。他指出，波兰方面正在从占领区内赶走德国居民。那地区是俄国占领区的一部分，波兰人在赶德国人出去。他觉得，在没有考虑过粮食供应问题、赔偿问题及其他尚未决定的问题之前，这种作法是不应该的。他说，结果使波兰没有食物和燃料，而很多人口被推到了英国方面。

斯大林说，我们应该体会波兰方面当前的处境。他说，由于他们几世纪以来所遭受德国人的祸害，他们在向德国人报复。丘吉尔指出说，他们的报复是采取了把德国人赶到美国和英国占领区去找饭吃的方式。

我表示完全同意首相的意见，认为不应当容忍这样的事。我

重复地说，如果波兰方面将要取得一个占领区，这件事应当非常谨慎地考虑。占领德国的国家是英国、苏联、法国和美国。如果波兰方面进入了一个占领区，关于这一地区他们应对苏联负责。我表明我愿意尽我所能提供帮助，而我所采取的立场便是边界问题应在和平会议上解决。

说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就和平条约的问题说明一下我作为总统的权力界限。我说，当我们讨论到可以列入和平条约内的事情时，我希望大家都了解，根据美国宪法，只有在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后才能缔结条约。我向他们保证，当我在这次会议上支持某项提议时，我将在这项提议交到参议院考虑时仍尽我最大努力去支持它。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回来对大家讲，由于我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舆论，我无法再在这件事上施加压力，不然就有可能损害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危险。我解释说，我所以要说明这些话并不是想改变我同我的同事们讨论问题的基础，也不是要改变大家曾同罗斯福总统进行讨论时所依赖的基础，我只是要说清楚宪法赋予我的权限。我继续说，我不得不站在美国人民的立场来考虑这些事情，我希望能够使参议院批准一些最妥善的决定。最后我说我相信只有目前在座的三大列强的合作，才能够维持世界和平。

斯大林问我的声明是只指和平条约，抑或指我们的全部讨论。我回答说我只是指那些必须送到参议院去批准的协定和条约。我指出我拥有极大的战时权力，可是我不愿意滥用这些权力到可能危害获致和平的地步。而且，我解释说，我永远希望我的政策能得到美国人民的充分支持。

斯大林说他了解这一点。丘吉尔我知道他是了解的。

斯大林采取的立场是，在讨论德国的供应和生产时，他认为煤和钢比粮食重要得多。我能看出，斯大林想在这个地方找到获得

魯尔盆地的資源的机会。現在他主張这块德国工业地区的产品應該使德国全境都能得到，正像丘吉尔主張把东德的粮食供应全德国那样。

丘吉尔答复說，英国本身也缺少煤，因为他們还在向荷兰、法国和比利时出口。他們克制自己而去供应这些国家；今年冬天对英国人民来讲将为战争以来最接近无火取暖的冬天。

斯大林回答說，俄国的情况比英国还要恶劣。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丧失了五百万人以上，并且缺乏煤和其他东西。他說他如果把俄国的局面描繪出来的話，他恐怕会使丘吉尔忍不住流泪的。

丘吉尔坚称他仍切望以魯尔的煤来交換德国人民需要的粮食，斯大林也同意这个問題必須加以討論。丘吉尔答称他并不期望今天就能作出决定，但他希望不久就能作出决定。而且他并不以为我們应认为我們已解决了一些重大的問題。就他看来，我們仅仅交換了一些意見。

接着大家又交談了几句，丘吉尔在談到他次日将回去參加英国大选时，宣称他已經完事大吉了。

“多么可惜呀，”斯大林一語双关地說。

“我希望能回来，”丘吉尔說。

斯大林回答說，从艾德礼先生的臉部表情来判断，他并不认为艾德礼先生在等待继承丘吉尔的职权。

在第九次會議結束时，波茨坦會議也告休会，等英国代表团自英国回来之后再开。

当丘吉尔动身返回倫敦时，我們仍未得到蔣介石的答复。送致給他的电报碰到了意外的困难。首先是在檀香山的通訊站傳送时耽擱了。其次是檀香山和关島之間的通訊繁忙也推迟了它的发送時間。但这份电报終於在重庆時間晚上八时三十五分送达赫尔利。

赫尔利大使拍回的无线电报說，給日本的公告已經送給宋院长了，但是蔣委員長却不在重庆而在长江对岸的山上。他說那份电报将于当晚譯出送給蔣委員長。随后赫尔利就叙述了要見到蔣氏的困难：“电报的譯文到半夜以后才譯毕。那时我們想找到一条渡船渡过长江也有困难。院长不願意在深夜出来，同我一起赴黄山。今天早晨，外交部次长吳国楨陪着我到了黄山蔣委員長的官邸。蔣委員長仔細地閱讀了譯文，然后吳国楨把我所說的需要立刻同意的理由，翻譯給他听。委員長自始至終謙恭有礼。在他對我說他同意這項公告之后，宣傳部长王世杰博士来到了。于是又有必要把整个事情再向王世杰解釋一遍。順便提一下，王氏將继宋院长任外交部长。当蔣介石对这份电报表示了贊同后，我們发觉电话坏了。因此我只有回到重庆才能应用各項設備向你轉达……”

蔣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項保留条件：他要我們把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換一下，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蔣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這項改动。

7月26日晚上九时二十分，我从柏林发出了這項联合公告。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波茨坦公告”的最后通牒。我指示华盛顿的战时情报局立刻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使這項公告让日本人民知道。公告全文如下：

#### “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一) 余等，美国总統、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經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結束此次战事。

(二) 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龐大陆海空部队，由于自西方調来陆軍及空軍业已增加多倍，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

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

(三) 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地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民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目，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

(四) 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需决定一途，彼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而使日本帝国陷于毁灭边缘之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 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他途可循，吾人亦决不犹豫迁延。

(六)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滥不负责之黠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七) 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经盟国指定之日本领土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

(九) 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使其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 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严厉之法律制裁。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

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尊重必須建立。

(十一) 日本将被允許保留其經濟所必需及足以償付实物賠償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內。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別于統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貿易关系当可准許。

(十二) 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領軍隊当即撤退。

(十三) 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之誠意予以适当之各項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由于7月26日那天不开会,我一早便乘飞机到法兰克福去。在法兰克福机場上,艾森豪威尔將軍、韦德·海斯利普中将、哈罗德·布尔少将和道伊尔·希凱准将都在迎接我以及我們一行人。

當我們乘着敞蓬車駛入法兰克福时,我开始对希凱准将統轄下的第三装甲师的各种部队进行了視察。各种兵种的队伍沿着約三十英里长的道路旁排列着。

到达黑本海姆城时,我受到了被称作“伐木者”的第八十四步兵师的仪仗队的迎接。这个步兵师是屬於A·R·布林少將統率的。当我檢閱仪仗队时,在仪仗队后面跟着第八十四师的一个一百人的乐队,柔和地吹奏着“密苏里圓舞曲”。我向仪仗队作了一个簡短的致詞后,便跨进了艾森豪威尔將軍的装甲汽車,我們和布林少将一起徑赴他那远在魏因海姆的司令部。

一路經過了几个非常美丽的德国小村庄,它們看上去似乎毫未遭受到战火的灾难。然而在路旁还殘留着“地雷扫入沟內”的牌子,使人回想到战争。

中午时分我們抵达了布林少将的司令部,那是一座美丽的別



墅，曾經是德国皇族的宮邸。別墅里面裝飾得很精緻，显然仍保持着原狀，什么都沒有改动过。在大厅的一个角落挂着一面紅旗，上面写着，“俄国第三十二斯摩棱斯克騎兵师向第八十四伐木者师致敬”，这面旗是当这两个同盟的部队在易北河上会师时，苏联方面贈給布林少將的。

我在布林少將的司令部用了午餐并同我的一个堂兄弟、布林少將的參謀长杜魯門上校晤談以后，我又对第八十四师作了視察。第一大队里面約有四百五十人，都是密苏里人。当我在他們的行列面前走过时，我向其中的几个人詢問了他們的家乡在哪里，并看看是否他們和我有着共同相識的人。

在和这队士兵作了簡短的談話后，我結束时對他們說，我不想再讓他們在烈日底下站下去听我講話了，因为我不是在竞选什么官职，而且他們無論如何也无法投我的票。

然后我們坐上了装甲汽車，沿着大路开駛，繼續进行視察。第八十四师的士兵在道路两旁各站成单行，排列到长达七英里以上。接着我們便离开了那里，經由大公路回到了法兰克福。德国的大公路繞过所有的城市，据說德国人对于在大公路上行駛的車輛是沒有限制速度的法令的。

到了法兰克福，我便赴艾森豪威尔將軍的司令部。这座由多幢側翼建筑組成的黄色大楼，略微有些像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在一片荒涼的法兰克福，这座大楼显然未吃过炸彈。它原来是龐大的法本企业的总公司所在地。

回到了飞机場后，我向四位英国的高級陆空軍官頒贈了嘉勉他們杰出功績的特殊功勳章。完毕后，早晨来迎接我的同一支队伍接受了他們的总司令的檢閱。我們的飞机接着就駛向加多机場，傍晚七时我就回到了巴培尔斯堡。

我的新聞秘书查尔斯·罗斯的儿子約翰·罗斯上尉，以及前

国会議員弗兰克·李的儿子，我的朋友艾尔弗雷德·李少校那天晚上都在小白宮成了我晚餐席上的宾客。罗斯上尉在巴培尔斯堡住了几天，探望他的父亲。其他來訪的人尚有馬歇爾將軍和哈里曼大使。

同一天我从倫敦丘吉尔首相那里接到了下列的邀請书，

“假如您于6日或7日启程，如果能乘飞机赴普利茅斯港，在那里登上《奥古斯大号》軍舰的話，我們將非常高兴。您自机場赴軍舰时的行踪将得到严密的防卫，不致泄露。英王认为，您若来到了我国的海岸而他竟沒有同您見面的机会，那将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因此他将等在普利茅斯港灣內的一艘巡洋舰上，并且非常願意同您一起用午餐。他随后将在《奥古斯大号》起錨前作一次回訪。我希望这些安排能对您合适。”

我电复道：“我十分盼望于8月6日前能离开‘特密納尔’(Terminal)①，我将尽早事先通知您。

“承您允許我于普利茅斯登舰，极表感謝。我将极高兴于普利茅斯迎合英王陛下所表达的願望，如果我需要早日回华盛顿之事对英王陛下完全方便的話。”

第二天，7月27日，照样沒有开会，因为英国代表团尚未返抵巴培尔斯堡。整个上午我在处理信件，下午同国务卿貝尔納斯和李海海軍上将商談。黄昏时分約瑟夫·戴維斯來訪，晚上总统特別助理塞繆尔·罗森曼法官从华盛顿来到此地，加进了我們的代表团。当举行降旗仪式时，我觉得吹号的声音非常动听，因而我走过草坪亲自去向吹号手們祝賀。那天晚上我还欣賞了利斯特軍曹彈奏鋼琴。

.....

---

① 系丘吉尔和杜魯門之間所使用的电报代号，意指波茨坦會議。——譯者

## 第十八章

### 波茨坦會議的結束

7月28日下午，英國代表團的領袖們回來了，但是丘吉爾和艾登已不再是代表團的代表。他們的黨在競選中遭到慘敗，保守黨內閣垮台。

新首相是克萊門特·艾德禮，隨他上台擔任外交大臣的是歐內斯特·貝文。他們兩人從倫敦到達不久便由英國外交部常務次官亞歷山大·賈德干爵士陪伴到小白宮來拜會我。他們拜會的主要目的是介紹貝文。在座的有國務卿貝爾納斯和史汀生、李海海軍上將和馬歇爾將軍。從一開始新首相便一直出席會議，因而我能透徹地了解他。他對世界問題有深刻的認識；我知道在我們共同努力下，將會很順利。

在我看來，貝文似乎是一個不易打交道的人，但和他比較熟悉之後，我發現他是一個心地善良，頭腦清醒而通情達理的人。他急於竭盡他一切所能來致力於世界和平與維護英美間的友誼和諒解。

艾德禮和貝文在第十次會議的圓桌旁就座，這是一個民主國家變更政府的穩定而和平的方式的深刻表現。

政府領袖間的會議兩天沒有舉行了。由於新首相和他的同僚從倫敦來得太遲，於是我們決定於十點十五分在無憂宮舉行我們第一次夜間會議。

斯大林說，他願在我們開始討論會議議程以前，宣布一項聲明。他說俄國代表團曾經接到日本一項建議，雖然當英美起草對

日最后通牒时，并没有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但是他还是愿意把关于日本的建议通知盟国。

接着俄国的译员代斯大林宣读了驻莫斯科的日本大使佐藤的电报，这个电报的要点如下：

“7月13日，日本大使荣幸地提交了日本政府准备派近卫公爵来莫斯科访问的建议。大使已接到苏联政府的答复，但其中对日本的建议并没有作明确的回答，因为它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件事，大使作如下的说明：近卫公爵的使命是要求苏联政府进行调停，以结束这次战争，并在这方面转达日本要求谈判的全部情况。日本天皇也将授权近卫公爵对苏日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关系的谈判。同时，大使愿重复说明，近卫公爵受天皇陛下的特别嘱咐，通知苏联政府，希望避免战争中双方军队更多的牺牲，完全是天皇陛下的愿望。鉴于上述情况，陛下希望苏联政府对他的要求给予适当的考虑，并同意日本使节来莫斯科。他又说，苏联政府是知道近卫公爵在日本所享有的地位的。”

斯大林在我们到达波茨坦不久，便告诉我，日本曾问克里姆林宫是否允许近卫公爵到莫斯科来。据斯大林告诉我，俄国人答复说，在没有了解近卫公爵所要谈判的内容以前，他们不能答复这一要求。现在看来，日本人又致电通知苏联政府，近卫公爵是代表日皇要求俄国从中调停的，日皇希望停止战争，以免造成更大牺牲。

在译员读完日本致苏联的电报以后，斯大林宣称，这个电报除了比以前的建议更加明确以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这个电报所要得到的答复将比上一次更加明确。他说，他的答复将是否定的。

由于俄国政府的上述答复，我向斯大林元帅致谢。我们不断地向日本人民广播7月26日的最后通牒，并曾通过一般的中立国的外交途径，也就是通过居间的瑞士和瑞典转达我们的最后通牒。日本人并没有给我们答复。但是在斯大林向会议宣读日本的电报

的这一天（7月28日），我們的无綫电监听員报告說，东京电台重申日本政府作战的决心。我們的声明被說成是“不值得考虑”，“荒唐”和“无礼”的。

接着我宣布开会，并說苏联代表团有两个問題要討論。

艾德礼插言，为英国“国内发生的事件”耽誤了會議工作，表示了歉意，并說他准备根据會議需要，留下来完成工作。

随后我們討論議案，第一項議程是关于起草承认意大利和东欧附庸国家——保加利亚、羅馬尼亚和匈牙利——的协定。三国外长发觉对于他們的政府首脑所同意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們彼此各执一辞，不能統一。俄国外长說的是一回事；英国外交大臣說的又是另外一回事；而貝尔納斯只能表示“不幸得很，美国感到如果它同意苏联代表团，英国代表团就不同意，如果它同意英国代表团，苏联代表团又不同意。”

在英国和俄国重复提出他們的意見以后，我們决定把承认意大利和附庸国家的問題擱一擱再說。

我接着提出意大利賠償問題，指出美国和英国政府一起，认为有必要贈与意大利五亿美元作为购买粮食和重建之用。我又說，我們承认，要使意大利免于饥饉还需要更多的錢，我明白表示美国并不是打算为賠償提供現金。我說，如果苏联政府需要兵工厂設備，我們同意他們可以把它拿走，但是我們为支持意大利而提供的贈与在出口和拆迁方面須享有优先权。

斯大林說，可以同意不向奧地利索取賠償，但是如果使意大利享受同样的待遇，苏联人民是不会理解的。奧地利并没有自己的軍隊，但意大利曾派遣軍隊远至伏尔加河来破坏苏联。

我回答說，如果能从意大利得到任何賠償，我是完全願意的，但是美国却不能只是为了使意大利能够对其他国家支付賠償，而耗費金錢去重建意大利。斯大林回答說他懂得这一点，他所提的

是苏联在道义上对赔偿享有权利，因为有三年半的时间苏联土地一直被占领和横遭蹂躏。他说，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俄国人已发现能构成一笔三亿美元赔偿数额的装备。斯大林问道，意大利准备用可供拆迁的装备来支付赔款的数目究竟有多少？

我回答说，我甚至不愿去猜想它，因为，无论如何，美国对任何国家的赔偿都不感兴趣。

斯大林说，答复可以推迟。但贝文质问道，俄国从意大利索取赔偿的计划，是否以不涉及美英向意大利提供的供应物资为基础呢？

斯大林回答说，“我不愿意忽视美国的利益”。

艾德礼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同时也表示完全同情俄国人所遭受的灾难。不过，他也提醒斯大林，英国人也受到意大利的攻击。他说，如果意大利付出的赔偿实际上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话，那么斯大林元帅定能想像到英国人民将怎样感觉。他不反对把军事设备当作赔偿，但是事实上意大利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接受援助。

斯大林回答说，他将愿意拿装备当作赔偿。

“军事设备吗？”贝文追问道。

“是的，”斯大林表示同意，“是军事设备。”

艾德礼问，是否只限于搬拆一次，而不是征收军用品。

斯大林答道，“是的，只限一次搬拆的设备。”

贝文继续追问道，这是不是没有平时价值的军事设备。

斯大林说，军事工厂能用于任何目的，又说他心目中所指的是取自德国的同一类型的设备。艾德礼说，那就是没有平时用途的设备。斯大林回答说一切的设备都能够改作平时生产。他接着说，苏联现在就正在改装自己的设备，因为所有这些设备在平时都有用处。

贝文认为，很难说清楚俄国人所要拿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难以确定搬运设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斯大林

承认有这个困难存在，但是他說他只希望获得承认这一原則的决定。他接着說道，俄国要求賠償的数目可以减少。

我說，我认为我們在原則上相距并不远。我坚持道，我所要保障的是我們給予意大利的援助。我又說，我不願我們的援助由于对俄国的賠償而消耗掉。斯大林表示同意，并对我保证俄国人“并不希望动用美国給意大利的款項。”

貝文問道，这是不是构成一个优先权的問題。他建議由于英美所提供給意大利的援助，所以應該享有偿还的优先权，然后才輪到战争的賠償。斯大林說，他不願給侵略者这样的好处，侵略者所造成的破坏至少应作小部分的賠償。我表示同意这一点。午夜十二时五分会議休会。

当我回到小白宮，我立刻跑到高級地图室去看从华盛顿拍来的报告参議院辯論批准联合国宪章的电报。从华盛顿白宮拍来的一封信报告我說，“关于联合国宪章的辯論进行得很順利，本周約有四十位参議員发了言。沒有引起什么麻煩。各种迹象都表明，参議院将在下午对宪章进行表决，今晚休会。海勒姆·約翰遜在 hospital 里。惠勒和辣斐德已公开宣称他們将投票贊成宪章，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希普斯泰德和朗格也将投票贊成宪章。今天早上會議开始时，麦克拉宣讀了总统关于与其簽訂盟約，不如采取共同决定訴諸武力这一問題的電报。这封电报收到良好的效果。

“表决后我将立刻再打电报給您。”

昨日(7月27日)，我曾給参議院临时議長麦克拉一封信，帮助他消除宪章中有关共同防禦条款的疑問。白宮报告說，这封信帮助穩定了参議院对这个条款的支持。

高級地图室曾拍給华盛顿一封信說：“总统、国务卿和所有的人員都迫切地等待着你們报告宪章表决情况的急电。他們希望随时有消息随时通知。今晚三国領袖将星夜开会，总统希望能在

这次會議中把宪章通过的消息告訴斯大林和艾德礼。”

在我就寝以前，斯退丁紐斯送来一份快报，說：“參院剛才以八十九票对二票批准了联合国宪章。只有參議員朗格和希普斯泰德投反对票。”

从这个报告看来，美国參議院已經支持了我对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在联合国組織內充分合作的保证。我立刻給新聞界写了下述声明，分別在柏林和華盛頓同时发表：

“我深深地感激參議院，实际上等于以一致的票决批准了联合国宪章。參議院的行动实际上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

第二天，7月29日，是我在德国的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到考罗錫姆教堂去做礼拜。当我回到巴培尔斯堡寓所时，我看到莫洛托夫和他的譯員卡隆斯基先生正等着我。莫洛托夫通知我斯大林总理因感冒遵医囑不能离开寓所。莫洛托夫說，因此，总理不能出席今天的會議。

莫洛托夫接着告訴我，他希望討論某些預定在下次會議提出的問題。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便通知国务卿貝尔納斯，李海上將和我的譯員契普·波倫来我的寓所。我們的會談进行了一小时左右。莫洛托夫一开始就說，他希望討論一下在會議中碰到困難的問題。国务卿貝尔納斯指出，在他看来有二个主要問題是突出的，如果能就这二个問題作出决定，就有可能考虑結束三巨头會議了。这二个問題是：波兰西部边界問題和德国賠償問題。

接着，国务卿貝尔納斯把美国关于划定波兰西部边界的建議书副本一份交給莫洛托夫，建議书有一部分內容如下：

“三国政府首腦同意，在波兰西部边界未获最后决定以前，沿波罗的海以东一綫，經過史溫曼德到斯德丁以西至奧得河，再从該区沿奧得河到尼斯河东段合流处，又沿尼斯河东段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德国領土，包括按照本次會議所获致的諒解不置于苏



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管轄之下的那一部分东普魯士地区和前但澤自由市地区，將統归波兰管轄，为此，上述領土不应視为苏联在德占領区内的一部分。”

莫洛托夫表示反对，他說根据这个建議，尼斯河东段与尼斯河西段之間的地区便不屬於波兰管轄，并說斯大林元帅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而不会贊成。

我說，我以为这个建議是可以得到苏联代表团同意的，因为在我看来，这說明我們这一方面已作了很大的让步，因此我希望莫洛托夫把这个建議书轉交斯大林元帅。莫洛托夫說，他当然願意这样做。

随后我們轉而討論德国賠償問題。莫洛托夫希望知道从魯尔方面可以移交多少設備。他說他希望得到一个固定的数目，如从魯尔区获得二十亿美元或五、六百万吨設備。国务卿貝尔納斯說我們的专家认为在現有設備上，規定出特定的美元价值或吨位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的建議准备把魯尔可供利用的总設備量的 25% 提交苏联。

莫洛托夫說，一个未定数額的 25% 太少了，并說苏联代表团希望有一个双方同意的固定数額或数量。貝尔納斯回答說，在雅尔塔會議上，俄国人曾建議从德国取得一笔总数在二十亿美元的賠償，其中十亿美元归苏联。他指出，这些数目不符合实际情况，从这一点也說明了过早地企图确定賠償数目的危險性。他又說，如果在沒有足够材料的条件下，我們现在就确定数目，而这个数目結果又证明不正确，六个月以后苏联政府就很可能責备我們違反波茨坦會議所达成的協議。

在这个問題上，我向莫洛托夫明白表示，我們力求获得一个切实可行的賠償計劃，而我則願意让苏联获得总数 50% 的賠償。

我們又討論了关于分配德国舰艇和商船的一些問題，我表示

了我的意見：我們已經達成協議，俄國現在就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的艦艇，商船將用作對日本作戰，其中的三分之一將標出記號撥歸蘇聯。

莫洛托夫說，他想代表斯大林總理與我們討論最後一個問題，即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近因問題。他說，蘇聯政府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美英和其他在遠東作戰的盟國，正式向蘇聯政府提出參加對日作戰的要求。他說這個要求可以用日本拒絕接受向盟國投降的最後通牒和縮短戰爭與拯救人類為根據。莫洛托夫說，蘇聯政府認為在蘇聯對日作戰以前，當然和中國簽定一項協議。

這個建議對我來說是很突然的。我告訴莫洛托夫，我願意仔細考慮蘇聯的建議。隨後俄國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便告辭，向斯大林元帥報告我們討論的情況。

當天下午，艾德禮首相、貝文先生和亞歷山大·賈德干爵士來小白宮同我以及國務卿貝爾納斯商談，我們把與莫洛托夫的談話經過告訴了他們。

第二天（7月30日），三國政府領袖仍然沒有舉行會議，因為斯大林的病還沒有痊愈。這一天我大部分時間都和福萊斯泰爾部長、艾森豪威爾將軍、庫克海軍上將、柯克倫海軍上將、克萊將軍、謝德艦隊司令和 E. B. 泰勒艦長舉行會議，討論軍事問題。

.....

自7月29日斯大林通過莫洛托夫提出關於美國與盟國正式要求蘇聯政府參加對日作戰的建議以後，我一直在仔細考慮這個問題。我曾和艾德禮首相以及我的顧問詳細討論了俄國的建議。

我不同意這個建議是由於一個主要原因。我看出其中的諷刺性的外交動向：俄國在這個時候參戰，似乎是致勝的決定性因素。在雅爾塔，俄國曾經同意，而在波茨坦，俄國也重申它的諾言，在俄國與中國事先締結互助條約的條件下，在歐戰勝利後三個月內參

加对日作战。这里沒有别的条件，美国和盟国当然沒有义务来替俄国找理由和日本决裂。但是我們的軍事顧問竭力主張俄国参加战争，以便牵制住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大量兵力，从而拯救美国和盟国成千的生命。而我却不願意让俄国分享我們长时期艰苦和英勇作战而取得的果实，因为俄国並沒有献出它的力量。

在和軍事当局以及我們的英国盟国进一步商討以后，认为根据 1943 年 10 月在莫斯科以及最近在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俄国参战是沒有疑問的。由于这些事实和条件，我准备写信給斯大林。7 月 31 日我給斯大林的信写道：

“您要我写一封关于远东局势的信件給您，我应您的建議，茲附上一信稿，我打算在您通知我您已同中国政府达成協議之后，在您方便的时候把这封信寄給您。如果这信稿使您滿意，您可以在您达成这种協議的时候立即让我知道，我将用电报把这封信拍給您，在您认为合适时加以使用。我还願意由最快的信使把我签名的正式信件送上。如果您决定使用此信，就請使用。但是，如果您决定发表一項声明，以其它理由作为您的行动的根据，或者由于其它原因而不願使用此信，我也会感到滿意。一切听凭您处理。

“哈·杜魯門”

信的格式如下：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

“美国、苏联、联合王国和中国于 1943 年 10 月 30 日在莫斯科簽訂的宣言的第五节規定：

“‘5. 为維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起見，在法律与秩序重建及普遍安全制度建立以前，各該国将彼此磋商，并于必要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磋商，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

“拟議中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六条規定：

“‘在第四十三条所称之特別协定尙未生效，而安全理事会认

为尚不得开始履行第四十二条所规定之责任前，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签订四国宣言之当事国及法兰西应依该宣言第五节之规定互相洽商，并于必要时，与联合国其它会员国洽商，以代表本组织采取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宗旨所必要之联合行动。’

“宪章第一百零三条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在宪章下的义务与其依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虽然宪章尚未正式得到批准，但是它在旧金山会议上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同意，而且苏联政府将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我看来，根据上述莫斯科宣言的条款和宪章的规定，苏联表明它愿意同目前在对日作战的其它大国进行磋商和合作，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来维护和平与安全，将是适当的。

“您的诚挚的，

……

“1945年7月31日”

波茨坦会议现在即将闭幕。第十一次会议于7月31日举行，而在8月1日，会议最后一天，我们举行了两次会议。我们现在正力图在意见分歧很大的许多问题上取得协议。

我们的代表团提出一个把三个主要问题合并讨论的建议：赔偿问题、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和附庸国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问题。

斯大林立刻反对说，这些问题彼此不相关联，而且是以不同的问题为主题的。国务卿贝尔纳斯说，当然它是不同的主题，但是这些主题在会议上讨论了几星期而没有取得协议。他说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连在一起了，因为美国代表团为了加速处理这三个问题，不再为了单独考虑一个问题而不顾到其他问题。

斯大林說，爭論最多的問題就是德國賠償問題。他說他準備接受美國的意見，對賠償數字不作具體規定，各國家得在它自己的占領區內取得賠償。斯大林也同意，俄國從西方占領區分得設備的問題於六個月內作出決定。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固執地要確定俄國將從英國、法國和美國占領區取得賠償的百分比。既然大部分賠償將取自英國占領區以內的魯爾區，因而貝文力爭削減俄國的百分比。他終於答應斯大林的15%和10%的數字。15%將提供商品，與俄國交換，而10%則完全是賠償。我們預先曾同意這個數字。貝文說蘇聯所要求的百分比，加上從他們自己占領區所取得的賠償，將給予他們50%以上的賠償。斯大林堅持說這不夠50%。最後大家同意的處理辦法是，由我組織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三國政府各派代表二名組成，起草賠償草案。

我宣布會議議程的下一個問題是美國所提出的三項建議的第二項——波蘭西部邊界問題。貝爾納斯宣讀美國的建議書，其中規定以奧得河與尼斯河西段為界的地區為波蘭臨時管轄地區。

貝文說他奉命支持波蘭管轄區伸展到尼斯河東段。他希望知道蘇聯軍隊是否將完全撤出這一地區，而將它完全交給波蘭人。貝文又說，依照美國提案，這些土地將置於波蘭管轄之下，而不是蘇聯占領區或蘇聯負責管轄的地區。

我插言道，割讓土地是屬於和約考慮的問題，而美國計劃所關懷的只是這些地區的臨時管轄問題。貝文說，根據他的理解，從技術上來看這些土地將依然處於盟軍的軍事管轄之下。他說，否則，我們就形成在和會以前轉讓領土了。他說，如果這是領土的直接轉讓問題，他願首先得到法國的同意。斯大林回答說，這事涉及到蘇聯占領區，而與法國無關。

貝文問，在英國沒有得到其他國家政府的認可之前，是否能夠放棄自己占領區的某些地方。斯大林回答說，就波蘭而言，可以這

样做，因为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个没有西部边界的国家。他强调说，这是世界上处于这种状况的唯一例子。

貝文指出，管制委员会的权限是处理全部德国1937年的边界。他问，没有和管制委员会商讨之前是否能作出任何领土的转让？

貝尔納斯說，我们都认为领土的割让应交和会解决。他说，这里的形势是波兰取得苏联同意，管辖这部分领土的一大部分。他表明，依照美国的提案，为了使三强之间对波兰临时政府管辖地区不致引起进一步的纷争，三强将同意波兰临时管理这一地区。他还说，在管制委员会上有波兰人的代表是没有必要的。

在再一次交换意见之后，我宣布我们全都对波兰问题有了一致意见。斯大林说，“斯德丁在波兰领土之内。”貝文说，“是的，我们应该通知法国。”于是大家同意通知法国。

接着我請貝尔納斯談談美国的第三个提案。我们关于各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条件，很快得到采纳，其中由于苏联代表团的要求，在文字上作了二处无关重要的修改。

下一项议程是管制德国的经济原则。貝文建議，我們在决定政治原则问题以后再來討論这个问题。这个建議得到大家同意。莫洛托夫指出，苏联人曾就魯尔区问题发表了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里，主張把魯尔当作德国的一部分。我表示，我承认，魯尔无疑是德国的一部分。

貝文問，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回答說，这是因为在德黑兰会议上，曾經提出魯尔区应从德国划分出来，置于大国的管辖之下。他说，几个月以后，他曾乘丘吉尔訪問莫斯科之便与英国討論过这个问题，当时曾經談到，建立魯尔区的国际管制也許是一桩好事情。这种討論是由于考虑彻底瓦解德国的結果。斯大林接着道，从那时以后，大国的看法已有改变，瓦解德国是不适宜的。他说，俄国代表团希望知道，是否同意不把魯尔区分割出去。

我重复說，魯尔是德国的一部分，它应受管制委员会的管轄。斯大林說，苏联同意这一点，但认为應該在某項文件中加以說明。他問英国代表团是否同意。貝文說，他在沒有进一步考虑以前不能表示同意。他知道魯尔由国际共管以削減德国的战争潜力曾討論过，但他认为这一地区在另作安排以前，应置于管制委员会管轄之下。他要和政府商量这件事，并願意把它提交外长會議。关于这一点大家都表示同意。

波茨坦會議第十二次會議是在8月1日下午4时召开的，这一天正是我留在波茨坦的最后一天。貝尔納斯說，外长們未能完成对賠償問題的起草工作，因为三强对俄国要求获得德国黄金和国外资产的問題沒有达成協議。

斯大林宣称，在下述原則下取得協議是可能的，他建議，俄国人并不要求盟国在德国已发现的黄金。但是关于股份和外国投資，他建議苏联和西方占領区之間划出一条分界綫，将这条綫以西的一切东西归盟国，以东的一切东西归俄国。

我問道，他的分界綫是否意味着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斯大林回答說，是这样，并举例說，德国在羅馬尼亚和匈牙利的投資应归俄国。

接着貝文和斯大林引伸地交換了意見，英国外长企图向斯大林試探在不同地理区域内俄国所要求的各种德国财产的界限，但是却沒有多大收获。

最后，大家同意接受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决定从德国财产中取得賠償的分界綫的建議。斯大林說，他认为这个决定应載在議定书中，但不必发表。我立刻表示反对。我看不出有保守秘密的理由，我也把这种看法說了出來。因此，斯大林撤消他的建議。

我們並沒有被斯大林在較小的或是在議程問題上的让步所迷惑。当接触到基本問題的时候，他会用声东击西的方法来对付，他

曾說，“如果我沒有准备好作出決定，我有什麼辦法呢？”

接着我請國務卿貝爾納斯報告有關戰犯的問題。貝爾納斯說，除了特殊的戰犯名單以外，草案已準備就緒，他建議戰犯名單由起訴人決定。斯大林堅持名單是必需的。他說，如果我們去審問實業家，人民是應該知道的。他說，這是俄國人為什麼要把克虜伯包括在名單中的原因。我說，我並不喜歡任何納粹戰犯，但是，把其中幾個指名出來，倒會使其他戰犯以為他們可以逍遙法外了。

斯大林說，把戰犯的名字提出來只是當作一種典型，而輿論對這件事是感興趣的。他說，人們正在為赫斯為什麼在英國生活得那麼舒適感到難於理解。艾德禮說，“您用不着為這件事擔憂。”斯大林回答說，不容忽視的是占領區人民的意見。貝文說，如果對赫斯有任何懷疑，他能夠保證把赫斯交出來，他又說，英國人還願意交出一份赫斯的生活費的賬單。

斯大林說，他希望預先引渡戰犯。艾德禮回答說，他已經接受了某些預先引渡的人，已把戈培爾監視起來。斯大林說，他個人並不需要什麼保證。他是急於要使輿論感到滿意。

我說，正像斯大林元帥所知道的，美國已任命一位最幹練的法律學家到委員會來處理這個問題，而傑克遜法官曾向我提出建議，如果委員會準備在審訊他們以前就提名，這對他將是一個障礙。我希望在三十天內進行審訊。我說，所有這些人都將被提名起訴，斯大林元帥不必擔心，他們都將受到審訊和懲罰的。

斯大林說，只要提出三個人的名字，他就會滿意了。艾德禮提議希特勒是其中之一，斯大林說，我們已無法處理希特勒了，但是他並不反對把希特勒的名字列進去。接着他建議，我們是否可以宣布在一個月內公布第一批戰犯名單。關於這一點大家都同意了。

我們繼續研究了會議的各個委員會所同意的各項問題，并一



一給予批准。最后，只有最后的公告和議定书留待当天下午的會議解决。关于这方面，我要求公告中提到我所提議的内水通道的国际管制問題，但，斯大林反对，他說这在議定书里已經有充分的說明。然而，我指出，这个問題虽然在会上討論过，但我希望把它包括到公告里去。

斯大林仍表示反对。他爭辯道，这个問題並沒有在提交會議討論的一系列問題中提到过，俄国人沒有参加討論过，我們不應該急于处理这个問題。我說，我并不會要求处理这个問題，但可以提交外长會議討論。这一点已經做到，然后我才要求把这一点列入公告里。

斯大林指出，公告中一点也沒有談到黑海海峡。他說，内水通道問題是由黑海海峡問題引起的。他希望知道为什么要优先提出这个問題。我回答說，黑海海峡問題也要提到。但斯大林坚持这会使公告和議定书太冗长。我說，我力图避免被人指責會議簽訂了秘密协定。斯大林說，我們的答复是並沒有秘密协定。

“我們已結束了嗎？”他問道。

“我并不以为如此，”我答道。

国务卿貝尔納斯說，他想提醒我們注意，我們已同意把文件提交外长會議討論。他問道，既然这一点已經做到了，为什么我們不能同意在公告里加以說明呢？他指出，如果这一点不包括在公告里面，我們美国就无需就这点提出声明。

斯大林說，在德黑兰和在以前几次會議中，有两种决定。一种决定是包括在議定书里的，这些决定比那些在公告中宣布的来得重大，但并不意味着是秘密的。这只是說无須加以公布。他說，前一种性质的决定并不影响問題的实质，不应在公告里提到，只須写在議定书里。

我說，如果这对所有的問題都适用，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

可以自由地在參議院中进行任何声明时提到內水通道問題。

下午的會議到此結束。

最后一次會議——第十三次會議——預定于那天晚上九时召开，但是为了让各代表团有充分時間完成起草會議所决定的二个主要文件——議定书和公告，延迟到晚上十点四十分举行。

議定书是會議的参加国取得諒解的正式記載。在波茨坦會議上並沒有什么秘密条款。从一开始我就下决心不締結秘密协定，結果当然是沒有。

在这次最后的會議中，許多時間都耗費在对議定书和公告的原稿作文字上的更动和次要的修改。例如，莫洛托夫建議修改波兰西部边界的措辞。在說明从波罗的海經過史溫曼德一綫的那一段中，他建議把“經過”字样改为“以西”。

“以西多远？”我問道。

斯大林建議用“自……以西”，这个修改就被通过了。莫洛托夫接着希望在同一文件中作另一处文字上的修改。他建議用“实际上的精确界綫应由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波兰的专家加以确定”字样来代替“交专家审查”。

貝文說，这未免要求太苛了。他又說，英国人不能被关在門外。斯大林說這個問題关系到俄国和波兰的边界問題。貝文承认这个事实，但他指出，这条界綫必須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他接着說，英美已同意用和平解决办法来确定这条綫，但我們并不同意接受一条由俄国人和波兰人所确立的界綫。

斯大林指出，建立边界綫的条件文件已載明，而所有留下来的問題只是确立精确的边界綫。他說，这只是意味着一公里上下的变动，“包括这里或那里的一个乡村而已。”

艾德礼辯論道，莫洛托夫所建議的修改将干涉到和会的工作。他希望由和会指派一个專門委員會来划定波兰和俄国的边界。

斯大林回答說，他無法理解這種態度。他問道，英國人心目中應該作為專門委員會的委員是誰——英國人，美國人還是澳大利亞人？不過，他却同意保持原來的字樣，終於俄國的建議撤消了。

在議定書的最後文字推敲上進行了冗長而無聊的辯論。正像過去歷次會議的許多次情況一樣，我對於這一切反復說明和旁敲側擊，感到非常不耐煩，但是我看到我們正在非常緩慢地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因而我還是克制住自己。我不懂為什麼人們不能開門見山，直截了當，而要白費許多唇舌。

議定書終於得到三國政府首腦的同意，而最後一次會議所留下來的是關於公告問題。在這裡，斯大林主張在列入重大的決定以後，那些小的決定會妨礙公告。他說，我們沒有必要對我們的決定保守秘密，但是他就是不讓把小的決定包括在公告里。

貝文問道，他是否能在下院談這些決定。斯大林回答說，“當然可以。”

若干小的文字上的建議——大多數由貝文提出——付諸討論。有一處，當貝文指責公告的英文用語時，斯大林說，任何英文用語凡是美國人能接受，俄國人也能接受的。

公告草案終於得到批准，可是現在蘇聯代表團卻提出了應該由誰先簽字的問題。他們指出，在三大國以前的兩次會議上，首相或總統都首先在公報上簽字。按照循環的辦法，斯大林說，他認為在波茨坦文件上他應該首先簽字。

“您願意什麼時候簽就什麼時候簽，”我說，“我根本不在乎誰先簽誰後簽。”

艾德禮說，他贊成依字母順序來簽字。

“用這辦法”，他開玩笑地說，“我一定能擊敗朱可夫元帥。”<sup>①</sup>

---

① 按英文字母順序朱可夫元帥(Zhukov)是最末一個字母。——譯者

公告发表的时间，三国同意在第二天（8月2日）格林威治时间九时三十分。这正是华盛顿时间下午五时三十分。当然，将在伦敦和莫斯科同时发表。

于是我说，我们已没有其他问题讨论，会议现在准备闭幕。我表示，希望我们下一次会议能够在华盛顿召开。

有人说，“如果上帝允许的话，”他就是斯大林。

当波茨坦会议正式闭幕，正是早晨三点钟。三国代表们互相告别，早晨四时我和同僚们便离开无忧宫回到小白宫。不久我离开巴培尔斯堡到加多航空站，开始我的回国旅行。

为了波茨坦会议，我离开美国几乎有一个月的光景，我急于回到华盛顿向美国人民报告。当我回国时，我感到我们已达成几项重要的协议。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心中所获得的某些结论和我对未来外交政策的制定应该做些什么的认识。

在回国途中，我写出了一份给人民的书面报告，准备回国后广播出去。在这个报告里，我概述了会议的重要成就。其中包括建立外长会议作为五大国政府的咨询机构。

另一项重要协议是赔偿方式的决定。我们不再重复以往的错误，即在取得赔偿后又把这笔钱借给他们。我们盼望德国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正义的国家，而列为世界文明国家之一。

我们在波兰边界问题上取得了协议，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理想的协议，不过我们是在服从和会的最后决定的前提下接受的。

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一件事。我在会议的最初几天就从斯大林得到这种保证。在战时我们的一切军事部署都得保守秘密，为了这个原因，在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把它略去。这是我们在波茨坦所达成的唯一的秘密协议。

和斯大林以及其他俄国人的直接会谈对我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这使我能直接看出我们和西方国家将来必须面临什么样的局势。

在波茨坦会议上，俄国人已在保证欧洲合作与和平发展的文件上签了字。我已经看到俄国人是冷酷的交易者，他们永远为自己的每一点利益在打主意。举行三国首脑会议的地点，离开被战争粉碎的纳粹政权所在地仅仅几英里远，任何政府的首脑不集中全力去寻求真正的和平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发觉俄国人对和平并没有热诚的愿望，但是我并不感到完全绝望。很显然，俄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筑在我们正要面临一次严重的经济恐慌的结论上的。他们企图抓住我们的弱点，从中取利。

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波茨坦的经验却使我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我们和俄国人在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使我决定决不在和俄国人设立的联合机构中冒险。当我在回国途中回顾国际形势时，我决定在战胜日本后由麦克阿瑟全权统辖和管制日本。在太平洋，我们决不再受俄国策略的愚弄。

武力是俄国人所理解的唯一的東西。虽然我希望俄国总有一天会接受劝告，会为和平而共同努力，但是我还是懂得不应该让俄国人在日本享有任何控制权。

斯大林坚决阻挠我所提出的一个防止战争的措施的方式，显示了他是怎样想的和所追求的是什么。我曾建议对一切主要航线实行国际化管理。斯大林并不要这个。斯大林要的是管制黑海海峡和多瑙河。俄国人正在策划征服世界。

.....

## 第十九章

### 原子彈；俄国参加对日作战

陸軍部長史汀生于7月16日早晨所发出的电报，使我获悉第一顆原子彈爆发的历史性消息。我們的絕對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計劃实现了。我們現在拥有一种战争武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轉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轉历史和文明的方向。这个消息，是在我出席三巨头會議到达波茨坦的第二天得到的。

当我离开美国赴欧洲的时候，在新墨西哥的阿拉默果尔多原子爆炸試驗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在远涉重洋的旅途中，我也迫切地等待着試驗結果的消息。我曾听到科学家們的許多預言，但是誰也不能肯定大規模原子彈爆炸的結果。当我看到史汀生的电报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試驗不仅符合科学家的最乐观的期待，而且也使美国拥有无敌的轰炸力量。

史汀生第二天飞到波茨坦来看我，带来了爆炸試驗的全部詳情。我立刻接見了他，并召集国务卿貝尔納斯、李海海軍上将、馬歇尔將軍、阿諾德將軍和金海軍上将等一起到我的小白宫的办公室来。我們按照这个革命性的发展，研究我們的战略。我們还没有准备好运用这个武器来对付日本，我們还不知道这个新的武器在用来对付敌人时，它在物质上和心理上将产生什么后果。为了这个緣故，軍事当局建議，我們繼續进行原定作战計劃直搗日本的老巢。

在波茨坦，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我們严密地保守了原子彈的秘密。我們并没有扩大知道原子彈秘密的很小一批美国人的人数。

丘吉尔自然从一开始就知道原子彈計劃，因为这牵涉到联合英美两国的专门技术的問題。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們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別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會議主席并没有表示異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說，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們“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

在原子彈爆炸試驗的一个月以前，三軍部长和參謀长联席會議將他們击败日本的詳細計劃交給我，要求我批示。很显然，这些計劃在應該采取的最好的办法上，还存在着某种分歧意見，但是，这些不同的意見已明确地得到了协调，因为当馬歇尔將軍提出他的从两方面向日本进軍的計劃时，金海軍上将和阿諾德將軍都衷心地支持这个建議。

陸軍的計劃着重在1945年秋在日本本土上的极南部——九州——作水陆两面的登陆。这将由华尔特·克呂格尔將軍統率下的第六軍来完成。第一次登陆約在四个月以后，接着将由第八軍和第十軍作第二次大举进攻，接着由欧洲調来的第一軍进攻，所有这一切进攻都将在靠近东京的关东地区登陆。总之，据估計，这需要到1946年的深秋，才能使日本屈膝。

这是一个龐大的計劃，我們所有的人都充分認識到战斗將非常酷烈，損失也很重大。我們希望要是俄国参战，日本一些部队將繼續被牵制在中国，同时另外一些部队也將被阻，不能增援本土諸島。

当然，日本人会早日选择投降的机会是仍然存在的。我們的空軍和舰队已經开始攻击日本本土的工业和城市地区，使它受到严重的破坏。除了中国以外，皇軍遭到一系列惨重的失敗，到处都在后退。

助理国务卿格魯在5月下旬曾和我談起发出一个宣言以促使

日本投降的問題，他說我們向他們保證，我們允許保存日本天皇為國家元首。格魯用他從出任駐日大使十年的經驗中所獲得的證據來支持這一點。我告訴他自己也曾考慮過這件事，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一種真知灼見。格魯還草擬了一個宣言，我指示他經過通常的手續把它寄到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務院、陸軍部和海軍部協調委員會，以便在作出決定以前，听取一切有關方面的意見。

6月18日，格魯報告說，這個建議已經受到他的閣僚們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認可。軍事領袖們也在當天向我作報告時和我討論了這個問題。儘管格魯主張立刻發表這個宣言，以便配合即將開始的沖繩戰役，但是三軍的首長卻主張，我們應該等到在日本一旦拒絕投降之後我們能以進攻部隊猛襲日本本土時才發表。

我作出決定，對日本的宣言應由即將召開的波茨坦會議發出。我相信，這將明確地向日本和世界表明，盟國的目標是一致的。到那時，我們也會進一步了解這兩件對我們今后的努力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和原子彈。我們知道，原子彈將在7月中旬作第一次試驗。如果原子彈試驗成功，我希望在我們運用這個新獲得的威力以前，給日本一個停戰的適當機會。如果試驗失敗，那末，在必須用武力征服日本以前，使日本投降，對我們說來，就更加重要了。馬歇爾將軍告訴我，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計要犧牲五十萬美國人的生命。

原子彈試驗成功了。原子彈的整個發展是從軍事上的考慮出發的。原子彈的設計是由著名的艾伯特·愛因斯坦博士向羅斯福總統建議的，而它已發展成為一個巨大的事業。這是科學、工業、勞動和軍事的聯合力量的成就，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負責人員和他們的僚屬在極端緊張的情況之下進行工作。全部艱巨的任務需要十萬人以上和大量的物資。整個試驗需要二年半以上的時間和二十五億美元的必需費用。



工作在这些工厂里面的几千人中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们在生产什么。计划保持绝对的机密，甚至连某些华盛顿最高级官员都丝毫不知道究竟在搞些什么名堂。我事前就毫无所知。1939年以前，科学家们一般都同意，从原子中发出原子能在理论上是可能的。1940年我们开始和英国汇集一切对战争有用的科学知识，那时英国已在作战而我们还没有。以后(1942年)，我们获悉德国正在研究利用原子能作为战争武器的方法。我们了解，他们要把原子能装在V—1、V—2火箭上用来征服世界。当然，他们是失败了，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但是现在，一场制造原子弹的竞赛已经开始了，这是一场“在实验室作战”的竞赛。

在汇集英美两国知识的总政策下，原子弹的研究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着手进行。英美科学家联合起来和德国竞争。我们美国在许多彼此关联的知识领域里，拥有大批卓越的科学家，我们也有其他重大的便利条件。为了一个耗资极多的计划，我们能够提供庞大的工业和经济资源，而不致影响我们的战时生产计划。不仅如此，我们的工厂远在敌人轰炸机的航程之外。英国的科学家曾带头进行这个计划，并贡献出许多有关原子的原始材料，但英国不断暴露在敌人轰炸之下，在它开始原子研究的时候，也面临着敌人侵袭的危险。

由于这些原故，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合并研究，把一切有关发展这个计划的工作集中在美国国内。由于和英国人一起工作，因而我们能够在原子能领域内获得科学上的伟大成就。虽然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基本事件，但是对于我们以美国人生命的可怕代价，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远涉重洋的战争来说，在当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件比较偶然的事。

我们希望出现奇迹。残酷的战争每天所造成的悲剧在逼迫着我们。我们努力制造一种无法抵抗的武器，一旦使用到它，就可以

强迫敌人立刻屈服。这是我們保守秘密和付出巨大努力的主要目标。但是我們还必须全力进行傳統的基本軍事計劃。

制造原子彈的任务交付給以萊斯利·格罗夫斯少将为首的所謂“曼哈頓区”的工兵团的特种部队。然而，主要力量却来自英美的科学家，他們在散布于全国的實驗室和办公处里进行工作。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谿斯建立了全部制造程序的关键机构。在原子彈制造的成就上的功劳奥本海默比任何人都大。

我个人知道这些发展是在我做总统以后，当时史汀生部长曾向我报告全部情况。他当时告訴我計劃接近完成，預期在四個月內可以制成一顆原子彈。根据他向我提出的建議，随后我就成立了一个由首脑人物組成的委员会，責成他們极其仔細地研究新武器對我們可能产生的意义。

史汀生部长担任主席领导这个組織，其他成員是：乔治·哈里逊（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總經理，当时担任陸軍部长特別助理）；詹姆斯·貝尔納斯（作为我私人代表）；海軍部副部长腊耳夫·巴德；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頓；以及三位我們最著名的科学家——范尼伐尔·布希博士（华盛顿卡內基学会主席兼科学研究和发展局局长）；卡尔·康普頓博士（馬薩諸塞理工学院院长兼科学研究和发展局地方服务部主任）；詹姆斯·康南特（哈佛大学校长兼全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

这个委员会由一批科学家协助进行工作，其中与制造原子彈有最密切关系的是奥本海默博士，阿瑟·康普頓博士，E·劳倫斯博士和意大利出生的恩里科·弗米博士。科学家顧問委员会和更大的委员会两个組織的人士所得的結論，都由史汀生部长于6月1日帶來給我。

他們建議在条件具备时，应立即使用原子彈对付敌人。他們

进一步建議投擲原子彈前，不必提出特別警告，目标應該是選擇能明显表現原子彈强大破坏力的地方。当然，我認識到，原子彈的爆炸將造成不可想像的破坏和損失。但另一方面，委員會的科学顧問報告說：“我們提不出可能結束戰爭的技术上的示威；我們看不到适合軍事用途的其他可供采用的办法。”他們的結論是，任何技术上的示威（如在荒島上投原子彈）都很难結束這場戰爭。我們必須用原子彈來襲擊敵人。

至于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去投原子彈，則由我作最后決定。在这方面我們不能造成錯誤。我认为原子彈是一种戰爭武器，从来沒有人怀疑过可以应用它。總統高級軍事顧問們建議应用它，而当我告訴丘吉尔时，他毫不躊躇地告訴我，如果原子彈有助于結束戰爭，他主張应当用它。

在決定应用原子彈时，我要依照戰爭法規所確定的方式，把它当作戰爭的武器来应用。这就是說，我要把它投在軍事目标上。我曾告訴史汀生，原子彈应尽可能投在靠近有头等重要軍事意义的軍需生产中心。

史汀生的參謀部准备了一个可以被作为轰炸目标的日本城市的名单。虽然阿諾德將軍主張投在京都，因为它是軍事活动中心，但是史汀生部长指出它是日本文化和宗教圣地，因而我們就把它勾掉了。

最后提出作为目标的是四个城市：广島，小仓，长崎和新潟。这些城市是按作为第一次攻击目标的順序排出来的。選擇的順序是依照这些城市的軍事重要性的大小而定的，但是轰炸时的气候因素也得考虑进去。在根据軍事目的核准被选中的目标之后，我亲自和史汀生、馬歇爾、和阿諾德进行仔細討論，我們討論了轰炸時間，并最后決定了第一个目标。

斯波茨將軍率領下的空軍战略大队，將按目标投擲原子彈，我

們會就投原子彈的時間以及投擲目標，給與斯波茨將軍一些伸縮余地。考慮到氣候和其他行動上的問題，這是必要的。為了作好準備，陸軍部授命斯波茨將軍於8月3日以後在氣候許可的條件下，儘快投擲第一顆原子彈。給斯波茨將軍的命令如下：

“指令

“美國陸軍戰略空軍隊司令斯波茨將軍：

“（一）第二十航空隊，509混合大隊應於1945年8月3日以後，在氣候許可目擊轟炸的條件下，立即在下列目標之一投擲特种炸彈：廣島、小倉、新潟和長崎。為帶領陸軍部派遣的軍事人員和非軍事的科學人員進行觀察和記錄炸彈的爆炸效力，應另外派飛機隨同運載特种炸彈的飛機飛行。觀察機應離開炸彈爆炸點數英里距離以外。

“（二）在本部準備就緒時，即運去投擲於上述目標的額外炸彈。關於上述地區以外的其他轟炸目標，另候命令。

“（三）一切發布有關對日使用的武器的情報都由美國陸軍部長和總統掌握。非經事先特別批准，司令官不得就這個問題發布公報或透露消息。任何新聞報道都將送到陸軍部作特別檢查。

“（四）上述的指令奉美國陸軍部長和參謀總長指示並經他們的批准而發布的。希望由你親自將這個指令的副本送給麥克阿瑟將軍和尼米茲海軍上將各一份，供他們參考。

“代理參謀總長

參謀團將軍

T·T·漢迪（簽字）

“1945年7月24日”

由於這項命令，第一次利用原子武器來襲擊敵人軍事目標的車輛開始轉動了。我已經作出這個決定。我也指示了史汀生執行

這項命令，除非我通知他日本已答复接受我們的最后通牒。

我們選擇了一队一般称为第 509 混合大队的特殊 B—29 小队来担负这个任务，七架經過改装的 B—20 型飞机，以及駕駛員和全体机上人員，都待命出发。同时，舰艇和飞机都在赶运原子彈的材料和装配炸彈的专家前往太平洋馬利亚納群島的提尼安島。

7 月 28 日，东京电台宣布日本政府决心作战到底。对美国、联合王国和中国的联合通牒並沒有正式答复。現在已沒有考虑的余地了。原子彈預定于 8 月 3 日以后投下，除非日本在那一天以前宣布投降。

8 月 6 日，正是我从波茨坦回国途中的第四天，傳来了震动世界的历史性消息。我和《奥古斯大号》的海員們正在午餐，弗兰克·格雷姆上尉（白宮地图室官員），递給我如下的电报：

“陆軍部长呈

“大型炸彈于 8 月 5 日华盛顿時間下午七时十五分投于广島。初步报告指明轰炸完全成功。这次成功甚至比前次試驗更加显著。”

我当时頗为激动。我給在船上的貝尔納斯打电话，告訴他这个消息，接着我对周围的一群海員們說：“这是历史上的最重大事件。現在是我們回家的时候了。”

几分钟以后，又送来了第二封电报，內容如下：

“接到下述关于曼哈頓的情报：‘广島的轰炸灼然可見，盖在 052315A 点上的云量只有十分之一。沒有敌机反击，沒有高射炮火。帕森斯报告投彈十五分钟后的情况如下：“轰炸結果在各方面都获得显著的成功。可看到的效果显然比任何一次試驗来得大。飞机在投彈以后情况正常。”’”

我讀完这个电报，向餐厅全体人員示意我願讲几句话。我接着告訴他們，我們投擲了一颗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彈，爆炸的威力比一

吨 T. N. T. (三硝基甲苯)大二万倍。我跑到軍官室把这个消息告訴正在用午餐的軍官們。我止不住地預料說太平洋战争將很快結束了。

几分钟以后，船上的許多无綫电收音机开始傳出从华盛顿发出的关于原子彈的新聞公报，以及我在临离开德国以前授权发出的声明的广播。不久以后，我在船上举行了新聞記者招待会，告訴他們一些有关这次成功的轰炸我們所作的长期研究和进行的情况。

我就原子彈发表声明，由史汀生在华盛顿发出，部分內容如下，

“……但是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計劃的龐大，它的秘密性，或是它的价值，而是科学智慧的成就，它把各种科学領域里許多人所拥有的无限复杂的零星知識綜合起来而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計劃。同样惊人的是，工业設計和工作的能力，以及前所未見的机器和方法，由于这一切因素，才能使許多人的脑力劳动的結晶以物质的形态体现出来、并按照預計发挥作用。科学和工业部門都在美国陆軍的指揮下，进行工作。它在惊人的短暫時間里使发展人类智慧的这种复杂的問題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世界上是否还能获得另一次同样的結合是值得怀疑的。我們所完成的是历史上有組織的科学最偉大的成就。这是在紧迫的环境和不失敗的情况下完成的。

“我們現在准备更迅速更彻底地消灭日本人在任何城市上的一切生产事业。我們將破坏他們的造船厂、工厂和交通運輸。我們不願造成錯誤，我們將彻底粉碎日本的作战能力。

“7月26日在波茨坦发出的最后通牒旨在拯救日本人民免遭彻底的毀灭。他們的領袖迅速地拒絕了这最后通牒。如果他們現在还不接受我們的条件，他們的毀灭將自空而降，类似的情况地球上从来不曾有过。继这空中攻击之后，將是力量强大的无数海

上和陆上部队，这是敌人至今还不曾遇到过的，而我們的作战的技巧則是他們早已充分領教过了的。

“……我們能放出原子能的事实开辟了人类理解自然力量的新紀元。原子能在将来可能用以供应現在来自煤、油和水能量，但是在目前，它不能在商业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在这以前，还必须有一个长时期的充分的研究。

“美国的科学家或政府政策，从来没有向世界保留科学知识的习惯。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关于原子能工作的每一种情况都予以公开。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在没有确定进一步研究可能的方法来保护我們和世界其余地区免遭突然破坏以前，我們不准备泄露生产或其他一切军事方面的专门技术。

“我将建议美国国会及时地考虑设置适当的委员会来管制美国国内的原子能生产和应用。

“我将作进一步的考虑，并进一步向国会建议怎样使原子能变成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的力量。”

日本依然没有投降的表示。于是我又对斯波茨将军发出一道命令：除非另有指示，须依照计划进行。

8月7日午后，美舰《奥古斯大号》完成了打破从欧洲起航进入切薩比克灣的航行记录。当这条船停靠在紐波特·紐茲城市的碼頭时，我立刻上岸并登上立即开向华盛顿的专车。晚間十一时我回到了白宫，那里有很多閣員在祝賀我和欢迎我回国。我离开白宫已有一个月，全部旅行路程为九千三百四十六英里。

波茨坦会议后不久，当斯大林回莫斯科时，中俄两国重新恢复了谈判。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新任外长王世杰陪同下，带来了蒋介石的进一步指示，从重庆回到俄国的首都。

哈里曼大使，也回到了莫斯科任所。他从宋子文那里获悉有关談判細節的全部情况，并繼續向我报告。我在《奥古斯大号》船上已接到一些消息。

8月5日我在《奥古斯大号》船上指示国务卿貝尔納斯給哈里曼大使发出新的指令。我要哈里曼告訴斯大林，我們相信宋子文已接受了雅尔塔協定的要求。貝尔納斯通知哈里曼，我們要求中苏之間不得达成进一步使中国让步的協議，因为这将對我們的利益起不利的影響，“特别是把大連港划归苏联軍事区，而沒有征得我們同意这一点。應該記住罗斯福總統不同意苏联最初提出的关于租借大連的建議，坚持大連港应国际化，成为自由港。由于我們的利益在于維持門戶开放政策，因此我們反对把大連港划归苏联軍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軍基地。”

我对宋子文和斯大林之間的恢复談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赫尔利大使在重庆报告說，俄国人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中国应同意不在旅順以南一百英里的任何島屿上建立要塞。中国人决定拒絕这个新的要求。另一方面，蔣介石却授权宋子文同意把环繞旅順一度由俄国沙皇政府租借过的地区划归苏联軍事区，虽然他仍坚持大連以及和大連相联結的铁路不包括在內。

斯大林接受了这个方式，并同意成立一个中俄軍事委员会来監督旅順港口的顾全面子的提案，尽管旅順市和港口的管理将落在俄国人手里。尽管斯大林坚持大連也必須置于一个混合委员会的管理之下，由一位苏联官員来負責港口的工作，但在宋子文回到莫斯科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又提出一个以前沒有提出过的建議。

哈里曼报告說，“斯大林提出了‘战利品’問題”，“并指出某些日本人的財產，包括某些日本企业的股份，应被考虑为紅軍占領地区的苏联战利品。宋子文詢問，斯大林心目中指的究竟是什么，但



斯大林却推諉了过去，把这个问题留待将来讨论。向宋子文提出这个问题这还是第一次；他没有向我们提过这个问题。如果苏联对战利品所下的定义像德国一样，即也包括日本人企业的股份，那末，苏联便有可能攫取满洲相当一部分工业和取得对满洲工业的永久而完全的控制权。我知道日本人已占有和发展了满洲的大部分重工业和轻工业。我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就我们应采取的立场，作紧急的指示，特别是如果斯大林向我提出这件事的话。这是斯大林欲壑难填的另一例证；我建议我们拒绝斯大林分享日本人企业股份的要求，并把战利品的定义局限在物资上，战利品的解释必须符合美国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的传统的定义。至于赔偿，我建议，我们的立场是无论在满洲或其他地区的日本人的全部财产，都应根据各国间取得的协议而分配给所有受日本侵略，遭到破坏的国家。由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如果我们不立时表明我们的态度，我担心苏联人将力争他们有权片面地规定红军占领区内的战利品。我和保莱大使商量，他同意这些建议，……”

我密切注视俄国和中国的谈判。尽管中俄的谈判拖了很久，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两个盟国能够达成协议。斯大林曾经说过，除非中俄达成协议，俄国将不会对日作战。为此我敦促蒋介石恢复莫斯科谈判。

当中俄谈判还仍然远远不能取得协议时，事先没有对日提出警告，莫洛托夫便于8月8日把哈里曼大使请去，向他宣布，苏联考虑于8月9日对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这个行动并不使我们惊奇。我们在日本投掷的原子弹，迫使俄国重新考虑它在远东所处的地位。哈里曼向我报告俄国突然转变的电报在8月8日午后不久就到达，我立刻特别举行了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我会见记者时，李海海军上将和国务卿贝尔纳斯都在场。我所宣布的只有四句话：

“我只简单地宣布一件事。我今天不能举行一般的新闻记者招

待会，但是这个宣布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要召集你们。俄国已向日本宣战。就是这件事。”

第二天哈里曼进一步报告关于俄国的决定：

“当莫洛托夫于昨天傍晚通知英国大使和我，苏联考虑从8月9日起对日本处于作战状态，他强调说虽然苏联政府有一个时期考虑这一行动只能在8月中旬，但苏联政府现在严格地履行了它于战败德国的三个月以后参加太平洋战争的诺言。在回答英国大使关于在五时把苏联声明交给日本大使，日本大使怎样反应的询问时，莫洛托夫首先解释道，佐藤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和佐藤的关系始终很好。接着莫洛托夫说，佐藤曾质问苏联宣言中所谓‘解除各国人民遭受更惨重的牺牲和苦难，并使日本人民避免德国所经历的危险与毁灭的方法’等字句意思是什么。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政府希望缩短战争的持续时间并减少牺牲。随后佐藤说，太平洋战争将不会继续很久。”

在另一份电报里，哈里曼报告说，俄国人迅速将武力投入战斗。

“今天傍晚，我看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第二个电报说，“斯大林说他的前进部队已经从东西两面越过满洲边境，各条战线都没有遇到重大的抵抗，而且已在某些地区前进十至十二公里。这些主力正像我们所说的，正在越过前线。他说从西方有三个主要攻势，一个是南向直扑海拉尔，第二个是从外蒙古以东进攻索伦，第三个是一支骑兵队，通过戈壁直攻南满。在海参崴区有一支军队西向进攻格罗迪科沃。斯大林解释说：各个方面的进攻都是以哈尔滨和长春为目标。他说，他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地区的北面军队正准备在防守这一线的敌军被迫缩减时进行攻击。他又说，他们暂时还没有进攻库页岛，但准备以后这样做。在讨论到日本的形势时，他说，他认为日本人正在找寻借口成立一个准备投降的政

府，他认为原子彈可能就是這個借口。他對原子彈顯示出很大的興趣，並說，這可能意味着戰爭和侵略的結束，但是要好好地保守這個秘密。他說他們在柏林的實驗室里發現德國人正在進行原子分裂的工作，但是並沒有發現他們取得任何成就。蘇聯科學家們也在研究這個問題，但還不能解決它。”

8月9日，投擲了第二顆原子彈，這一次是投在長崎。我們給日本人三天工夫去決定是否投降，即使天氣許可，轟炸將在第二天內暫時停止。在這三天時間里，我們表明我們是說到哪裡做到哪裡的。8月7日，第二十航空隊派出一隊擁有一百三十架左右B-29型轟炸機的飛機隊；8日據報告說，有四百二十架B-29型機進行日夜輪番轟炸。第二顆原子彈選中的轟炸目標最先是小倉，其次才是長崎。名單上的第三個城市是新潟，由於路途太遠被取消了。飛機到達小倉上空時正好陰雲蔽天，在那裡環繞飛行三周仍找不到轟炸目標；由於汽油不夠，於是便決定飛往第二個選擇目標——長崎去試一試。長崎的氣候也不好，但是雲霧的消散卻給予轟炸者一個機會，轟炸長崎很成功。

很明顯，原子彈威力的第二次示威使東京驚惶失措，第二天早晨就傳來了日本帝國準備投降的初次表示。

## 第二十章

### 日本的投降

8月10日上午七时三十三分，我們的无綫电监听員收听到由东京无綫电台发出的消息：

“日本政府今天向瑞士和瑞典政府发出轉致美、英、中、苏的照会如下：

“‘日本天皇虔誠地希望早日停止战争，实现世界和平，以免天下生灵因战争的持續而遭受浩劫。日本政府服从天皇陛下的圣旨，已于数星期前請当时仍居中立地位的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以便对諸敌国恢复和平。

“‘不幸这些为促进和平的努力，已經失敗。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陛下恢复全面和平，迅速結束由于战争而造成的不可言状的痛苦，茲作出下列决定：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后来又經苏联政府贊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項諒解：上述公告并不包含有損天皇陛下为最高統治者的权利的任何要求。

“‘日本政府竭誠希望这一諒解能获保证，并切望迅速对这种保证予以明确表示。’”

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照会，但它已把日本的意图表示得足够清楚，使我們能据以商討我們應該怎样答复的問題。我請李海海軍上将邀請国务卿貝尔納斯、史汀生和福萊斯特尔于九时到我的办公室来商談下一步应采取的步驟：

当他們四人来到以后，我逐個問他們对下列問題的看法：我們是不是把这个消息看作是东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表示呢？我国有許多人都认为天皇是日本政治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們曾保证要摧毁这种制度。我們能不能一面保留天皇同时却指望消除日本的好战精神呢？我們能不能把附有这样大的“保留条件”的答复当作我們不惜进行战斗以求实现的无条件投降呢？

史汀生部长过去常常表示保持天皇對我們有利。現在他坚持同一观点。在他看来，我們需要保持所有日本人民所拥护的、唯一的权威象征。李海海軍上将也提出，即使单单为了利用天皇来实现投降这一个理由，我們也应该接受日本的建議。国务卿貝尔納斯對於我們是否应接受次于毫不含糊的投降声明的任何东西，表示沒有把握。他辯論說，在目前环境下，提出条件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海軍部长福莱斯特尔提議，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答复中表示願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时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的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

我請貝尔納斯起草一个可以表达这种意图的答复。这几位閣員們于是都回到自己的各部去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国务卿貝尔納斯回到白宮，带来了刚从瑞士公使館接到的日本政府的正式照会。这个照会除了加上一段通知我們已通过中立国家将同样的要求送致中国、英国和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以外，其他部分都与早先无綫电广播的一样。

貝尔納斯同时呈上答复日本的草稿，待我批准。我請国务卿留下来午餐，同时宣布下午二时召开內閣會議。午餐时，我們拟了一个致英、俄、中三国政府的紧急照会，征求它們同意我們給日本的答复。李海海軍上将也参加了起草工作。

下午二时，內閣开会，我向他們宣讀了日本照会的原文。接着貝尔納斯提出了致日本的答复的草稿，并指出我們用什么程序征

求盟國的贊同。我們向倫敦、莫斯科和重慶發出同樣的電報。在每一份電報中我們都指示我們的大使立刻把電報送交收報人，以示迅速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們發出的電報的部分內容如下：

“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條款，但聲明：‘附有一項諒解，上項公告並不包含任何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的皇權的要求’。我們的立場如下：

“‘從投降時刻起，日皇和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即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以便採取他認為適宜於執行投降條款的步驟。

“‘日皇和日本最高統帥部須簽署為執行波茨坦公告條款所必需的投降條件，向日本所有的武裝部隊發布停止作戰、交出武裝的命令，並發布最高統帥執行投降條件時所需要的其他命令。

“‘一經投降，日本政府應立即把戰俘和被拘留的公民移至指定的安全地點，俾能迅速登上盟國的運輸船隻。

“‘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將按照波茨坦公告，依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確定之。

“‘盟國武裝部隊將留駐日本，直至達到波茨坦公告所規定的目標為止。’”

發給倫敦的電報於東部戰爭時間三時四十五分從白宮發出，我們駐倫敦大使館於我們的時間四時五十八分接到，三十分鐘後送達英國外交大臣。英國的答复於當天晚上九時四十八分到達華盛頓。

艾德禮和貝文都表示同意，但對於要求天皇親自簽署投降條款是否明智，表示懷疑。因此，他們建議將復文作如下的修改：

“天皇將授權並保證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簽署為執行波茨坦公告條款所必需的投降條件，並須對日本一切陸、海、空軍當局以及彼等統轄之一切武裝部隊（不論其在何處）發布命令停止作戰行動、交出武器以及如你們的答复中所規定的事項。”

魏南特大使又报告說，丘吉尔曾打电話給他，說他完全同意我們的做法。

我們給蔣介石的电报获得这样的答复，这个答复是由我的海軍副官于8月11日早晨七点三十五分送达的：

“杜魯門总统：我同意您的一切条件，并支持您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一事所作的答复。我尤其同意須由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統帥部签署投降条款并发布执行投降条款的命令。我也同意，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应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之。后者是我多年来曾表示过的条件。蔣介石”

哈里曼大使对莫斯科反应的报告，在我那一天起床时送达：

“当您的……电报到达时，英国大使和我正和莫洛托夫在一起。莫洛托夫正在詢問我們两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建議采取什么态度。他通知我們苏联对日本建議所抱的态度是‘怀疑的’，因为苏联人并不认为这是无条件投降，因此，苏联的部队仍繼續向滿洲挺进。当时方过午夜不久，他着重指出苏軍出征才第三天，它將繼續下去。他給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他极想把战争打下去。

“接着您的电报就到达了，我把电报翻譯給他听。他的反应是不置可否，并建議明天給我答复。我告訴他，我們对这不能滿意，我們希望今晚答复。于是他同意去和他的政府商量，并尽可能在今晚給我答复。如果我不能在适当的時間内得到他的回話，我会打电話給他，并将經過情况向您报告。”

不久，我又接到哈里曼的第二个电报：

“莫洛托夫要英国大使和我再次去見他，”哈里曼的电报报告說，“他交給我下述声明：

“‘苏联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就日本政府乞降照会所提出的盟国答复草稿。

“‘苏联政府认为，上述答复应以对日作战的主要国家的名义

发出。

“‘苏联政府并认为，如果日本政府作出肯定的回答，盟国应就日皇和日本政府所应隶属的代表盟国最高统帅的一位或一位以上的人选达成协议。

“‘莫斯科时间：1945年8月11日上午二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授权签字：维·莫洛托夫。’

“我坚决反对苏联声明中的最后一段，并说，据我看来，我的政府决不会同意这一点。我指出，这正是苏联政府接受我们建议的一个保留，它给予苏联政府在选擇盟国最高统帅一事上以否决权。在回答我对他的用意所提出的质問时，他最后建议，最高统帅可以包括两个人，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苏联的人选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我宣称最高统帅不由美国人担任是不可思议的。

“经过一场非常激烈的爭論以后，他坚持要我把他的意見通知我的政府。不过，我说，据我看，这是不能接受的。

“当我回到我的办公处时，我接到莫洛托夫的秘书巴甫洛夫的电话，通知我莫洛托夫已請示斯大林。他说，刚才是一场误会，只是想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并不一定要达成协议。我向莫洛托夫的秘书指出，我相信‘或一位以上的人选’字样也不能接受，并要他把这个意見轉达莫洛托夫。几分钟以后，他回电话说，斯大林同意删去这些字样。他同意用书面肯定这一点。

“因此，最后一段改为‘苏联政府并认为，如果日本政府作出肯定的答复，盟国应就日皇和日本政府所应隶属的代表盟国最高统帅的人选进行磋商。’

“至于經修正过的苏联答复是否能予以接受，請給予指示。”

哈里曼当然是表达了我们的既定政策。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好久以前曾对战后日本的管制制訂了我们的方針，并已获得我的批准。我们希望把日本置于代表盟国的美国指



揮官的控制之下，可以由他通过一个會議来协调盟国的意願；我們建議称这个會議为远东諮詢委員會。

我決定，对日本的占領不能重蹈德国的复轍。我不想分割的管制或划分占領区。我不想給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讓他們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我希望用能够使这个国家恢复国际社会地位的方式来管理它。对参加波茨坦會議的我国一切官員，我曾強調这些思想。因此，哈里曼（当时也出席會議）在莫洛托夫企图改变对日基本政策时，能立刻加以反駁。

由于三国政府都贊同，于是我們便准备給日本发出正式的答复。我們接受了英国的建議，改变了一句短語，使意义更明确。英国提的建議是“天皇将授权并保证签署……”我們改为“天皇必須授权并保证……”

正式的答复（日期是8月11日）由貝尔納斯交給了瑞士代办赫尔·瑪克斯·格腊斯利，經伯尔尼轉东京。当然，战争并没有結束。海軍上将尼米茲向太平洋舰队发出了命令，这道命令必然和許多命令相同：

“决不允許因日本人就波茨坦公告公开发表的結束战争的建議，而放松对日本攻击的警惕，无论是日本人或盟軍都沒有停止战斗。即使突然宣布局部或全面投降，也必須采取警戒，以防敌人的背信行为。保持目前一切的偵察和巡邏。除非另有特別指令，攻势仍繼續进行。”

阿諾德將軍对战略空軍航空队发出命令，向日本人口集中地区散发傳单，把和平談判的情况通知这些地区的日本人民。

同时，在华盛顿，我們准备发出一份电报，通知盟国，我們選擇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駐日最高統帅。在同一电报里，我建議新任最高統帅应指令日本在东南亚的部队向該地区最高司令海軍上将路易斯·蒙巴頓勋爵投降，那些与俄国对峙的部队应向苏联远

东軍司令官投降；一切其他在中国部队应向蔣介石委員長投降。

我們又采取了步驟，准备尽快地傳播日本接受我們各項条件的消息。国务院已准备好发給苏联、英国和中国政府以同样电报。除了填入收到日本答复的时间 and 日期以外，一切都准备就緒。在这些步驟办完以后，剩下来的只是等待日本的答复。

第二天（8月12日）是星期天，但我几乎整天呆在办公室里，时常和国务卿以及其他將領們在一起。办公室被报纸和广播記者們所圍住，而很多群众則聚在白宫和辣斐德公园的外面。傍晚的时候，听到日本人已經接受投降的傳說，但結果是假的。

.....

与此同时，我接到了斯大林、蔣介石和艾德礼的来电，他們都同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任盟国最高統帥。尽管取得了这些協議，却也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保萊大使正在莫斯科进行另一个徒劳无益的嘗試，即和俄国人在賠償問題上，寻求協議。他敦促我們在远东从速采取行动以防俄国人貪得无饜。

他来电說，“此次关于賠償和其他方面的問題（我重申其他方面的問題）的討論，使我相信我們的部队应迅速地尽可能多占領朝鮮和滿洲工业地区，从南部开始向北推进。我认为，在有組織的战斗停止以后，所有这一切可以在不牺牲美国人生命的条件下办到；同时我认为占領状态应繼續到有关各国就賠償和領土权或其他特权問題滿意地达成協議时为止。”

哈里曼同样敦促我們用行动对付俄国人的执拗态度。

他的电报說，“在波茨坦时，馬歇尔將軍和金海軍上将告訴我，如果日本人在俄国的部队占領朝鮮和大連之前投降，我們就要在这两个地方登陸。

“考虑到斯大林进一步对宋子文提出要求的做法，我建議我軍至少应在辽东半島和朝鮮登陸，以接受日本部队的投降。我不认

为，我們已承担任何义务要尊重任何苏联軍事行动的地区。”

中国也开始发生一些复杂的問題。赫尔利报告說，共产党乘日本崩潰在即，也在尽可能寻求最大利益。在一份詳尽的电报中，他对国务院說，中国共产党軍队的总司令朱德將軍，曾广播一項命令說，在解放区的“抗日武装部队”根据波茨坦公告可以向附近城、鎮或交通中心的敵軍或他們的司令部，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們在規定時間內繳械。在解除武装之后，得依照优待战俘条例对待他們，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他又宣布說，他的軍隊有权进入和占領由敌人或傀儡軍隊所占領的任何城鎮或交通中心，实施軍事管制以維持秩序，并任命專員执行地方的行政事务。

这个命令显然是对蔣介石政府的公开違抗，并与波茨坦公告背道而馳，因为波茨坦公告指定日本应向三国政府投降。

赫尔利大使的电报說，“如果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允許中国的一个拥有武装的敌对政党接受日本投降，并繳收日本人的武装，那末中国的內战便会因而不可避免。我已建議依照投降条件，日本須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包括日本兵士手里的日本武器、支持日本的中国傀儡部队以及同日本一起作战的游击队的武器，交給中国国民政府。我們也曾建議投降条款应規定：懲罰日本企图武装中国国内任何反抗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

“魏德迈將軍給我看了他致參謀长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就如果允許日本人把武器交給共产党武装部队将造成的局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同意魏德迈將軍的报告，并建議国务院敦促投降条件应規定：不准把日本人的武器交給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

当然，这些从莫斯科和重庆打来的电报，並沒有引起新的問題。过去几月的情况已經表明，斯大林及其同僚并不是从同我們一样的观点来看問題的。蔣介石和中国共产党双方軍隊之間的微妙的均衡关系曾經是我們制訂政策的專家們反复討論的主題。現在

是結束連年戰爭的機會了。獨裁者可以把他的士兵當作沒有靈魂的小卒來驅使，但是像我們這樣的政府，却必須傾聽人民的呼聲；美國人民在 1945 年夏最迫切的要求的莫過於結束戰爭，讓兒子們重返家園。

8 月 12 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了給麥克阿瑟將軍的訓令的草稿。第二天我批准了這個文件，只修改了一處：草案只規定一個人，即最高統帥，代表盟國在投降文件上簽字，我指示參謀長聯席會議通知麥克阿瑟，在他代表盟國簽字後，四國的代表應一一附帶簽字。

8 月 13 日過去了，仍然沒有得到日本人的回音。不過，8 月 15 日早晨，瓦達曼司令官帶信來說，伯爾尼收到了從東京打來的密碼電報。這應該就是我們所等待的回答。貝爾納斯在早飯後到我這邊來，我們交談了一旦日本接受投降條件，我們應採取的步驟，因為我們深信日本會投降。午後不久，國務卿打電話給我們駐伯爾尼的公使哈里遜先生，要他探悉東京拍至伯爾尼的電報的內容。結果發覺那根本不是對我們的電報的答复。於是我們繼續等待。

三點鐘，貝爾納斯報告我，他剛剛获悉伯爾尼後來又收到一封從東京拍來的密碼電報。四時零五分他打電話給哈里遜，哈里遜把我們正在盼望的答复告訴他：日本已投降！

這時，貝爾納斯馬上以電話通知貝文、哈里曼和赫爾利，並安排在華盛頓時間七點鐘四國首都同時宣布這個消息。

午後六時，駐華盛頓的瑞士公使館代辦把正式復文交給貝爾納斯，後者立刻把這個復文帶到白宮。這就是那停止戰爭的答复：“閣下：

“我榮幸地在這裡提到你 8 月 11 日的照會，在這個照會里，你要我向我國政府轉達美國、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中國四國政府對我在 8 月 10 日的照會里所轉達的日本政府照會的復文。

“今天二十时十分(瑞士时间),日本驻瑞士公使以下列书面声明交瑞士政府转致各盟国政府:

“‘日本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致美、英、苏、中四国政府的照会:

“‘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就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一事所发出的照会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于8月11日所发出的美、英、苏、中四国政府的答复,日本政府荣幸地通知四国政府:

“‘(一)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事发出诏书。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他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签署为执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所必需的条款。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和所有在他们统辖之下的各地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缴出武器,并发出盟军最高统帅为执行上述条件所必须的其他命令。’

“閣下,請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此致

“尊敬的詹姆斯·贝尔纳斯国务卿

“瑞士公使館代办

格拉斯利(签字)

“1945年8月14日”

七点钟,白宫新闻记者聚集在我的办公室里。杜鲁门夫人和大部分阁员都在场。我也曾请过去的阁员科德尔·赫尔和我一同参加这个重大的时节。这时他病得很厉害,多年来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国务卿,直到宣布日本正式投降的盛会快要结束时他才来到,但是我们终于使他参加为此所拍的正式照片里,这使我很高兴。他为了使这么一天的到来做了不少工作。

当人们都到齐时,我站在我办公桌的后面,宣读了声明:

“我在今天下午接到了日本政府对国务卿8月11日所发出照

会的答复。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答复中沒有任何保留。

“为尽快举行投降书的正式签字仪式，我們也正进行各种部署。

“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將軍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国最高統帅。英、俄、中三国将派高級將領参加。

“同时，盟国已下令盟国武装部队停止进攻。

“战胜日本的胜利日要等到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时宣布……”

声明的其余部分是日本照会的本文。

新聞記者欢欣鼓舞地跑出办公室，向他們的报纸发消息。杜魯門夫人和我走到北面草坪上的噴水池旁。广大的人群聚集在大門外，当我用丘吉尔的手势作了一个 V 字的記号时，立刻响起了巨大的欢呼声。我在外面只逗留了一会儿便回到白宮，打电话給母亲，她住在密苏里的格兰德維約。

八点钟前后，外面的人群仍有增无减，我走到走廊，用装置在那里的扩音器讲了几句話。这是一个极有意义和极生动的一刹那，那种兴奋的情緒深深感动了我。我的心情同全国各市鎮正在庆祝的广大群众一样激动。

我們已赢得了战争。我希望德国和日本的人民能够在占領下复兴起来。正像我在柏林所声明的，美国不要領土，也不要賠款。各国的和平与幸福，过去是我們的战斗目标，今后也是我們的工作目标。沒有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曾經取得过这样完整的胜利。也沒有一个国家具有像美国这样的軍事力量，曾經对敌人这样寬大，对朋友这样有帮助。也許我們能够把基督的登山宝訓的教义变成现实。<sup>①</sup>

---

① 按《圣经》馬太福音五、六、七章說，基督登山訓众，要人們互助友爱，“爱你們的仇敌”等。——譯者

## 第二十一章

### 中国发生的问题

炮声停息了。战争已经过去。我在怀念罗斯福总统，他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当1941年12月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时候，他曾向全国发出了誓言。要是他还活着，他是会为誓言的实现而高兴的。我打电话给罗斯福夫人。我告诉她在这个胜利的时刻，我希望把这个消息带给我国人民的，不是我，而是罗斯福总统。

为了奖励联邦公务人员在战争时期的忠诚服务，我曾发出一道命令，给他们两天的假期。在这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宣布每月征兵名额从八万名立即削减为五万名。但是除了这些命令以外，有无数的琐事急待解决。正像我们所意料到的，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成堆的新问题。

当我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时，五角大楼也发出了电报，把投降消息通知各战区。

五角大楼的电报说：“我们把总统的下述命令传达给你们，以便你们采取必要的行动。

“日本政府已于8月14日接受了盟国的投降条件，兹特命令在不危及你区盟军安全的条件下，停止对日本陆海军部队进攻。”

这样，我们的战地司令官们都接到通知，停止作战，而在一份单独的电报中，还指出占领状态的开始。

“马歇尔致麦克阿瑟电，并转告尼米兹、迪恩和魏德迈……，”后一电报说，“现在正式通知你，日本已投降。你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在收到这份电报时即生效。”

8月13日經我批准的給麥克阿瑟的命令如下：

“美国总統关于盟国最高統帥接受日本投降的命令：

“(一)按照美国、中华民国、联合王国和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之間的協議，应任命盟国最高統帥，以执行日本投降，茲特任命你为盟国最高統帥。

“(二)你須要求发布一項經天皇签字的授权其代表签署投降书的公告。这个須經签字的公告，基本上应按照附寄給你的格式拟定。你須采取必要的步驟，命令并且接受經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正式授权的代表所签署的投降书。投降书的原文附下。你須代表有关四国政府和其他与日本作战的联合国家接受日本投降。

“(三)我已請中国、英国和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家元首各派代表一人和你一起参加受降仪式。我已任命五星海軍上将切斯特·尼米茲作为美国代表参加这一仪式。一俟我获知其他被指派参加这一仪式的人选，我将立刻通知你。你須进行适当的布置。

“(四)在接受日本武装部队总投降以后，你須要求日本帝国大本营发出命令，通知各地日本司令官投降的手續和执行投降的其他細节。关于日本海外部队向盟国有关各司令官的投降，你須和日本帝国大本营采取一切必要的相应措施。

“(五)从投降时起，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統治国家的权力将隶属于你，你应采取你认为有助于执行投降条款的必要措施。

“(六)你对一切有关盟国为执行日本投降条款而派出的陆、海、空部队享有最高統帥的权威。

“(七)任命你为盟国最高統帥，于你接到本命令时生效。”

这个命令的副本立即轉送艾德礼、斯大林和蔣介石。总命令第一号，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这个总命令是我們要求日本天皇发



布的。我在发给盟国政府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里，曾說参謀长联席会议可能修改这个总命令，麦克阿瑟將軍根据当地情况的需要，也可能略加更动。这个总命令主要是命令战区的日本軍隊放下武器，特別是該向誰投降。中国、台灣和北緯 16 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地区由蔣介石受降。滿洲、北緯 38 度以北的朝鮮和庫頁島，由俄国司令官受降。东南亚、北緯 16 度以南的印度支那和从緬甸至所罗門群島，盟国的代表不是蒙巴頓勳爵，便是澳大利亚的司令官，精确的分界綫应由他們两人划定。日本、菲律宾以及北緯 38 度以南的朝鮮，由麦克阿瑟將軍受降；太平洋的其他地区則由尼米茲海軍上将受降。

由于发布了这个总命令，我們已从一般原則进入实际的执行阶段，而困难也随着产生了。

1945 年 8 月 16 日斯大林元帅发来了这样的复电：

“您附有‘总命令第一号’的信件已收到。我基本上不反对这个命令的内容。因为辽东半島是滿洲的一个組成部分。但是我建議对‘总命令第一号’作如下的修改：

“（一）整个千島群島应包括在日本武装部队向苏軍投降的地区之内，按照克里米亚三国的決議，千島群島应归苏联所有。

“（二）北連拉彼魯茲海峽（該海峽位于樺太島和北海道之間）的北海道北半部应包括在日本武装部队向苏联軍隊投降的地区之内。在北海道的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間，从該島东海岸的釧路鎮到該島西海岸的留萌鎮划一道分界綫，把該島北半部的上述城市包括在内。

“最后一点对俄国的輿論特別重要。人們知道，在 1919—1921 年，日本占領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軍隊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沒有占領区，俄国輿論就会大嘩。

“我迫切希望上述适中的意見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以后的电信往还，很像我們在波兰和南斯拉夫問題上进行激烈爭执的情况。函电往返約二周。

8月18日，我致电斯大林，答复他的要求，电文如下：

“这是答复您8月16日的来电，我同意您所提出的修改总命令第一号以便把整个千島群島包括在将要向苏軍远东总司令投降的地区之内的要求。但是我想表明美国政府希望在千島群島的某个島屿上，最好在中部，拥有为陆海飞机建立空軍基地的权利，以便用于軍事和商业的目的。如果您願意通知我，您同意这种安排，我将感到很高兴，地点和其它細节可通过为此目的而任命的我們两国政府的特別代表来解决。

“关于您所提出的有关北海道的日本部队向苏軍投降的建議，我打算要日本本土各島——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的日本部队向麦克阿瑟將軍投降，并且已經为此做出安排。

“麦克阿瑟將軍将使用盟国象征性部队，当然包括苏軍在內，来临时占領日本本土，他认为需要占領多少，就占領多少，以便实现我們盟国提出的投降条件。”

斯大林于8月22日复电說：

“您8月18日的来电已經收到。

“(一) 我理解您的来电是暗示拒絕滿足苏联提出的关于把北海道北半部包括在日本武装部队将向苏軍投降的地区之内的要求。我必須說，我和我的同僚未曾料到您会作这样的答复。

“(二) 至于您希望在千島群島的一个島屿上建立永久性空軍基地的要求(按照在克里米亚會議三国決議，千島群島将归苏联所有)，我认为我有責任作如下声明。第一，我必須指出，無論在克里米亚或在柏林，三国的決議都沒有規定这种措施。無論如何也不能从在那里作出的決議中得出这样的結論。第二，这种要求通常是向一个战敗国或是向这样一个盟国提出的，即这个盟国本身

沒有能力保卫其領土的某一部分，因而表示願意給予它的盟国一个适当的基地。我认为不能把苏联列为这两类国家中的任何一类。第三，由于您的来电沒有說明要求給予永久性基地的任何理由，我必須非常坦率地对您說，我和我的同僚都不了解是在什么情況下想到对苏联提出这种要求的。”

对于这封带有强烈敌对情緒的来电，开始时我打算不予答复，但是8月25日我还是給斯大林一个和解性的答复：

“这是答复您1945年8月22日的来电。就千島群島基地而論，我的想法是，在占領日本期間使用在千島群島中部的降落权，对于我們为执行日本投降条件而要采取的合作行动是一个重要貢獻，因为这会在占領日本期間提供作为紧急用途的通往美国的另一条航空路綫。

“我在提出給予供商业用途的降落設施的問題时也是毫不犹豫的。您显然誤解了我的电报，因为您提到这种要求通常是向一个战敗国或是向一个不能保卫自己的一部分領土的盟国提出的。我不是在談苏維埃共和国領土的任何部分，我是在談日本領土千島群島，这些島屿的处理必須在和約中决定。我得知，我的前任同意在和約中支持苏联得到这些島屿。当您要求我确认这项協議时，我并不认为是冒犯。您既然期望我支持您关于永久拥有整个千島群島的願望，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請您考虑关于只在其中一个島上拥有降落权的要求时，您认为是冒犯。由于我們两国政府和我們私人之間存在着密切的和融洽的关系，我认为，关于进行討論的要求尤其合理。虽然我认为早日討論这些問題将是有帮助的，如果您不願在目前討論的話，我也不强迫要求这样做。”

哈里曼在同一天晚上把这封电报交給斯大林，并进一步說明了我們的意图。在与斯大林会晤之后，哈里曼大使于8月27日打給我一个电报說：

“今天晚上我与斯大林会晤时，亲手把您8月27日关于千島群島降落权問題的電報交給斯大林。經過翻譯以後，他問了我一些問題。我嚴格遵照您電報原文，在一張地圖上向他說明降落权有什么重要性。他說他現在了解我們提出要求的理由，并說將和他的同僚商討，然后再作答復。他告訴我，他以為您第一封電報所要求的是這一深入蘇聯外圍防綫的永久性的軍事基地。我的印象是，他認為占領時間的降落权是合理的，但是他對為商業用途提供永久性的便利條件究竟反應如何，我却毫無印象……”

“在我們開始談話時，斯大林十分冷淡，但談到後來，他表現很懇切，和我就麥克阿瑟將軍執行日本投降的程序和其他一般利益事宜足足談了一小時以上。明晨我將就這個問題作更詳細報告。”

幾天以後（8月30日）斯大林直接打來了一封電報，它證實了哈里曼所得的印象。

“我已接到您8月27日的來電。我很高興，在我們來往函電中發生的誤解已經消除。雖然您的建議絲毫也未使我感到屈辱，但是它使我感到困惑，因為現在很清楚，我誤解了您。

“當然我同意您的建議，即在占領日本期間使美國有权在緊急情況下在千島群島一個島上的我們的機場降落。

“我也同意在千島群島中一個島上的蘇聯機場給予商用飛機以著陸的便利。在這個問題上，蘇聯政府期望美國政府採取互惠行動，給予蘇聯商用飛機在阿留申群島之一的一個美國機場降落的权利。原因是，目前從西伯利亞取道加拿大前往美國的航空路綫由於路綫太長而并不令人滿意。我們希望在千島群島和西雅圖之間建立一條取道阿留申群島的較短的航空綫。”

斯大林力圖把用在德國的同一類型的分裂統治搬到日本來，在德國，由於軍事形勢的條件和需要，迫使我們同意這種分裂統治。現在他又重彈老調，企圖改變統一的最高統帥的部署。最有

趣的是，斯大林是通过軍事途徑，而不是通过外交途徑来进行这项努力的。这可能是他希望麦克阿瑟將軍可能被說服，会把自己认为不关重要的問題作了改变。正像一切从各地司令官員发来或发給他們的重要电报一样，这些电报也通过白宮地图室，并由李海海軍上将提醒我注意。

首先，我們派駐莫斯科的軍事代表团迪恩將軍拍給馬歇尔將軍和麦克阿瑟將軍一份电报說：

“安东諾夫今晨來訪，并交給我一封信，要我轉致麦克阿瑟將軍。信的內容如下：

“‘在閱悉你的 1945 年 8 月 19 日附有日本投降文件的來信后，紅軍參謀總部认为这个文件有必要作如下的修改：

“‘(一) 第三节改为：

“‘茲特命令各地区的日本部队和日本人民立刻停止作战，保护所有船只、飞机和軍用以及民用财产，以免遭受破坏，并执行盟国最高統帥和在所屬各战区的盟国各战区高級司令官或日本政府机构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二) 第五节改为：

“‘茲特命令一切文职和陆海軍官員服从并执行盟国最高統帥和在所屬各战区的盟国各战区高級司令官，为有效地执行日本投降，认为有必要而經他們发布或在他們的权利下发布的一切公告、命令和指示。茲命令所有上述官員留守原崗位，繼續执行非战争性的职责，除非盟国最高統帥或在所屬各战区的盟国战区高級司令官或司令官的部下，宣布予以免职。

“‘(三) 第八节改为：

“‘天皇和日本政府統治国家的权力应服从盟国最高統帥或盟国为达到这項目的而設立的机构，这些机构将采取他們认为有利于执行投降条款的措施。’

“安东諾夫說，上述修改意見曾得斯大林主席的批准……”

我把俄国人要求修改的地方在这里用另一种字体标出。如果我们同意他們的意見，这就意味着我們同意俄国人在滿洲要干的一切事情，这也就替他們打开大門，不得不成立一个管制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来占領日本。麦克阿瑟的答复是叫俄国人将这种修改意見提交政府討論；因为这样做才恰当。于是8月27日安东諾夫將軍的来信写道：“如果这些修改会引起麦克阿瑟將軍任何困难，紅軍參謀总部将不坚持这些修改。”

無論是斯大林給我的信或安东諾夫給麦克阿瑟的信，也不論是来自俄国人的任何通信，都只字不提关于占領朝鮮的分界綫問題，也沒有就这一方面提出疑問。双方既沒有因三八綫問題进行过爭論，也沒有发生过討价还价的事。而却注定以后几年，三八綫要演变成巨大的忧患。当第一号总命令呈交我批准时，它規定北緯38度以南由我們的部队受降，以北則由俄国人受降。有人告訴我，国务卿貝尔納斯曾建議美国的受降部队应尽可能地向北部推进。然而陸軍当局却碰到路程和缺乏人力的双重难关。如果俄国人不同意这种划分，那么連三八綫對我們也太远，而非任何美国軍隊所能到达的。如果我们完全以美軍能够北进多远为指导原則，那么，一旦遇到反对，分界綫便必然要大大地向朝鮮半島更南的地方后撤。把界限定在三八綫上，我們的軍隊便保证有机会在朝鮮的故都汉城受降。当然，当时除了考虑便于划分受降的責任以外，並沒有考虑到这些。以前一切有关朝鮮問題的討論，表明俄国人同意我們的主張，朝鮮在取得独立以前，应通过一个托管阶段。

中国也有可能对朝鮮的安排提出反对，因为朝鮮在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是中国的藩屬，而在某些場合下，中国曾有重新提出这个要求的傾向。但是后来却沒有提出反对。蔣介石政府正开始感觉到投降問題愈来愈迫近。最严重的是共产党的武装部队駐扎在

容易接近日本军队的地区。

共产党总司令朱德，发出一个經魏德迈将军轉致华盛顿的很长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他力图证明不是重庆政府，而是共产党承担了在中国作战的重任，他們理应和麦克阿瑟一起参加日本投降的仪式。他还主張他們有合法权利在中国境内就地接受日本投降。

从这一点和其他事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正如魏德迈在同一天給麦克阿瑟和尼米茲的电报中所說的：“在中国战区內接受大量日本军队的投降，并維護日本占領区目前的法律和秩序的問題，取决于迅速地把中央政府的军队調往各战略地区。”換句話說，蔣介石需要我們帮助他，把他的军队运到日本主要部队准备投降的地区。否則中国共产党人就会繳收日本军队的武器，还会占領日本人所控制的地区。

蔣介石的第二个問題是滿洲問題。日本人扩大了这个地区，把热河省包括在內。蔣介石自然希望恢复滿洲的旧界綫，这意味着俄国人在滿洲地区接受日本投降，中国军队在热河接受投降。不过，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向蔣介石指出，当时俄国人事实上已在热河，而总命令第一号曾授权他們在“苏联战区接受投降”。

比較起来，由于英国直轄殖民地香港而引起的爭論，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足挂齿了。但是它当时却同样激怒了中国人。蔣介石要求把香港列入他作为中国战区司令官的投降地区，因为他是中国战区的最高統帅。英国願意蔣介石派遣一位代表参加日本军队在香港投降的仪式，但是他們并不接受总命令第一号的“中国境内”的字义也包括对英国占領的香港的任何解釋。

在艾德礼关于香港投降問題給我的电报里指出，英国曾通知美国參謀长联席會議和中国政府，有一支英国海軍部队正在向香港进发，任务是从日本占領下接管香港，协助被日本抓去的殖民地

俘虏和被拘禁的人们，并恢复英国的统治。艾德礼说，“在这个地方的日本指挥官，可能会把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因此我要求您指示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最高统帅官保证驻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日本地方司令官，应在英国海军部队的司令官到达香港后，向他们投降。”

罗斯福总统并没有作出什么诺言，但是他却暗示过，他不愿妨碍中国人战后为争取收回香港而与英国人进行的谈判。这是和我们鼓励中国取消治外法权和外国租界的总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须经过公开讨论，因此我们依然遵守我们承认既定权利的原则，指示麦克阿瑟将军部署香港向英国司令官投降的事宜。国务卿贝尔纳斯把这个情况通知了宋子文，并向他声明，这样做决不等于表示美国对香港未来地位的看法。

蒋介石不愿意接受这个部署，他以个人名义给我写来一封信。

“亲爱的总统先生，”他写道，“8月20日，我接到驻重庆英国大使閣下的如下备忘录：

“‘英王陛下大使馆获悉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已将英国海军部队准备接收香港的行动通知宋子文博士。

“‘大使馆奉命通知中华民国主席閣下，为了通过香港地区对在毗邻地带与敌作战或执行日军投降的中美两国武装部队进行支援，与中国最高统帅部就有关的作战事宜取得充分的军事协调，英国有关军事当局已接获相应的指令。’

“在递交备忘录时，英国大使通知外交部次长吴国楨博士说您曾致电艾德礼首相，说明美国并不反对由一支英国海军部队去接收香港。英国大使还说您同意英国在香港‘各地区’接受日本武装部队的投降。我们却没有从宋子文博士或您，总统先生，听到任何承认或拒绝英国的要求的话。如果您没有向英国发出这样的电



报，我要强烈地提出忠告，不要对波茨坦公告和盟国最高统帅所发布的投降条款作任何片面的改变，现在改变投降命令会制造不良的先例，会在香港以外的一些地方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英国应该遵照总命令，撤回要在香港登陆的部队，打消在这一地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企图。

“如果正如英国大使所宣称的，您已致电艾德礼首相，为了不使您为难，我提出如下的建议：日本在香港的部队应向我的代表投降，在投降仪式上，将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参加。在投降后，由我授权英国部队登陆并重行占领香港。英国不得利用任何借口，命令部队在中国大陆登陆，我作出上述让步是不得已的。我希望閣下能支持这种立场，并在我和英皇陛下政府作出明确的安排以前，能得到您的答复。”

我的答复也采用了个人函件的形式，首先把我就香港问题给艾德礼的电报全文，逐句抄上，然后写道：

“我原以为宋子文院长会把我在致首相的电报中所表示的意见通知您。

“关于日本人在香港投降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是一个军事行动性质的问题。关于英国在该地区的主权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据我了解，您并不想提出这个问题。由于考虑到这些，我才向艾德礼首相发出上述电报。日本军队在实际可行的地区，向当地行使主权的国家当局投降，似乎是合理的。在香港，英国和您在行动上取得军事合作，在我看来，是完全可行的，这种协调将使日本在香港向英国军事当局投降成为可能。

“亲爱的委员长，我衷心地希望您能够用和我同样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并根据多年来我们两国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上所特别具有的合作和谅解的精神，澄清局势，同意我的劝告，与英国人取得军事协调。以便给予麦克阿瑟将军相应的命令，叫他部署香港日

軍向英国司令官投降的事宜。

“我完全能体会您写信給我提出建議的动机，但是我相信，在把一切因素都加以考虑到之后，我所建議的程序可以提供合理的解决办法。”

蔣介石仍然不願意在主要問題上让步。他希望由他的代表把香港当作中国的一部分加以接收。但是他却認識到，如果沒有我們的支持，他自己的軍隊就无法到达香港，正像沒有我們的支持，他的軍隊就不能到达华北和滿洲一样。下面就是8月23日他对我的函电的答复：

“亲爱的总統先生，赫尔利大使已将您就香港受降問題的电报轉交給我。在中英两国之間有关香港行动事宜的軍事协调，遵照您的嘱咐和建議，我已通知英国作为这个地区的最高統帥，我同意授权英国司令官接受在香港的日本部队的投降。我还指派一个中国和一个美国官員去参加那里的受降仪式，并請英国事先与我的參謀长魏德迈將軍和中国軍事司令部在行动方面取得必要的軍事协调。总統先生，对我來說，作出这些让步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您的合作是我的衷心願望，因而我終於这样做了。”

我认为蔣介石的让步是十分合理的，同时我以为这样就把問題解决了。事实上，我曾給他一封私人电报，贊揚他所采取的慎重措施。不过，8月27日晨，赫尔利大使拍来一份很长的电报，报告困难根本沒有解决，就在这天下午，我又接到蔣介石的另一电报：

“亲爱的总統先生，由于我衷心地願意与您合作，因而我在8月23日通知您，我已通知英国，作为这个战区的最高統帥，我同意授权英国司令官接受香港日軍的投降。8月23日，我接到您从赫尔利大使轉来的极其恳切和令人鼓舞的答复，这份电报内容如下：

“‘在关于香港日軍向英国司令官投降問題，您采取了审慎的措施，您的措施已解决了一个僵局。請接受我对您这一行动的謝忱。’

“今天英国政府通过它駐重庆的大使轉来如下的口头通知：

“英皇陛下政府迫切地希望取得一个双方滿意的安排。他們并不怀疑委員长会了解大不列顛决心于日本战敗以后在香港恢复战前的統治。因此他們必須遺憾地指出，他們不能接受委員长关于英国部队軍官应作为委員长的代表在英国的屬地上接受投降的建議。他們欢迎中国代表，也同样欢迎美国的代表。受降将由英国軍官来执行，他将根据总命令第一号的授权来实现这一目的。委員长所指派的中国和美国官員将以中国战区最高統帅代表的資格参加。預料届时还要簽訂投降书，他們得以证人資格签字。

“英国大使还向我报告說，英国政府已指派海軍少将 C·H·J·哈克特作为总司令，接受香港日軍的投降。

“我告訴英国大使，我不能同意英国政府在这一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英国願意恢复香港的原状始終沒有受到影响，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向他們保证中国政府无意派遣中国軍隊占領香港。按照总命令第一号，香港并不包括在英国人受降区内。香港明确地划在中国战区内。作为这个战区的最高統帅，我有履行和遵守与盟国簽訂的協議的义务。我作出让步，授权英国司令官在該地接受投降，純粹是出于我的維持与盟国的友好关系的願望。而在我作出这个让步时，曾得到您的贊同和认可。超出这种让步的限度，对我來說，既不符合与盟国簽訂的協議的精神，也与我作为这个战区最高統帅的職責不符合。

“我还通知英国大使，既然英国政府已任命哈克特海軍少将接受香港日軍的投降，从今天起我便授权給他。

“总統先生，正如美国人民和您在国际关系上，始終表示严格

遵守公正原則和協議一樣，我深信在這一事件上，您會支持我，而訓令麥克阿瑟將軍對哈克特海軍少將發出必要的指示。”

赫爾利在敘述他和蔣介石會談的情況時，把蔣介石的煩惱描寫得極其生動。赫爾利報告道：“他說，他從英國方面接到的每一通知，都帶着武力威脅，這還不僅僅限于香港和九龍，而且還牽連到中國其他地區。委員長說，他認為英國的態度是帝國主義式的，表現飛揚跋扈，與聯合國家的資格不相稱的……。”

對於我們兩個盟國之間的磨擦，我雖然感到遺憾，但是我似乎又無法加以解決。英國海軍部隊已經出發前赴香港，哈克特海軍少將終於在9月16日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在投降儀式上，根本沒有提到委員長，但是蔣介石的總司令部，卻把香港列為由他受降的幾個地區。在這一問題上，我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

## 第二十二章

### 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受降仪式

当倫敦、莫斯科、重庆和华盛顿就日本投降問題进行着热烈爭論的时候，从关島和馬尼拉不断传来了关于报道我軍在占領日本本土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消息，以及关于在那里接受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

剛一听到日本人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条件，李海海軍上将和馬歇尔將軍便問我应当在什么地方举行受降仪式。我毫不迟疑地建議，应当在东京灣的一艘战舰上举行正式的受降仪式，而这艘战舰应当是美国的船只《密苏里号》。我认为，为了加深日本人民对于战敗的印象，在日本首都目所能見的地方举行这种仪式是明智的，不过，在还没有能切实保证不会最后爆发狂热的行动以前，似乎仍以离开海岸为好。

我选择《密苏里号》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在我們的舰队中，它是最新的也是最强有力的战舰之一；这艘战舰是以我的故乡密苏里州命名的，而且我的女儿瑪格丽特曾是該舰命名典礼会上的主礼人，我也在这次典礼上讲过話。

日本投降对于美国人民是一件大事，我希望能使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早在8月13日，我就向參謀长联席會議发出了如下指示：

“我希望正式签署日本投降书的仪式成为一个公开的新聞事件，凡是在場的新聞記者，都应当允許他們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发布他們的消息。

“我还希望凡是参加受降仪式的盟军陆海军官，都授予他们充分代表本国政府和他们的陆海空军部队的资格；并应尽可能使他们受到优待。

“请转飭麦克阿瑟将军查照办理。”

这不仅是欢乐和庆祝的日子。我们没有忘记使我们能够获得胜利的上帝。我在一份宣告书中宣布8月19日为祈祷日，宣告书说：

“日本军阀和日本的武装部队投降了。他们无条件地投降了。在欧洲获得胜利的三个月以后，胜利降临到东方。

“八年前日本发动的把邪恶势力散布到太平洋上的残酷的侵略战争，已经遭到彻底的失败。

“这是独裁者想要奴役全世界各国人民、毁灭他们的文化和开辟一个黑暗、屈辱的纪元这一巨大阴谋的终结。这一天是这个世界的自由历史的新的开始的一天。

“我们所获得的全球性胜利，是来自团结一致、坚决进行斗争的自由男女的勇气、毅力和精神。

“这一胜利是来自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所创造的巨大武装力量和物资力量，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知道，除非获得胜利，否则世界的正义就将完结。

“这一胜利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成百万和平公民，他们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战士，向无情的敌人显示出他们并不害怕斗争，害怕死亡，而且知道怎样去赢得胜利。

“这一胜利是来自上帝的帮助，在最初遭到的不幸和灾难中，上帝和我们同在，而现在，上帝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光荣的胜利的一天。

“让我们感谢上帝吧，让我们记住，我们现在已经奉献出我们自己来追随上帝的道路——走向持久和正义的和平、走向美好世

界的道路。

“因此，現在，我——哈里·杜魯門，美国總統，特指定 1945 年 8 月 19 日这个星期天为祈禱日。……”

.....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將軍获悉了我們对日本投降事宜的正式答复，也获悉了同战敗的敌人建立联系时所应遵循的程序。

“自：馬歇尔。

“致：麦克阿瑟。

“国务院已收到日本正式表示接受投降要求的文件，茲通过中介国家答复日本人如下：

“‘(一)日本軍隊应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并将停止之日期与钟点通知同盟国最高統帥。

“‘(二)立即派遣特使往見同盟国最高統帥，此种特使应充分明了日本軍隊与司令官之部署情况，并充分授权，实行同盟国最高統帥所指示之任何布置，使最高統帥及其軍隊能到达其所指定的地方，接受正式投降。

“‘为了接受此种投降并使其生效，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指派为同盟国最高統帥，由其将正式受降時間、地点和其他細目，通知日本政府。’

“你可按照上述指示采取必要行动，希随时报告一切有关情况……”

麦克阿瑟將軍于是用无綫电向日本人发出了一道命令，命令他們派出代表到馬尼拉去見他。这是麦克阿瑟的統帥部和东京之間的一系列无綫电通訊的开始，商討关于准备正式受降和占領軍到达事宜。在这些電訊往返的过程中，我桌上不时收到电文的副本，使我經常得以了解麦克阿瑟所取得的进展。麦克阿瑟拍发給

日本人的第一个电报如下，

“同盟国最高统帅致电日本天皇、日本帝国政府和日軍总部。

“我已被任命为同盟国(美国、中华民国、联合王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统帅，并授权与日本当局直接筹划关于在尽早和切实可行的日期停止敌对活动的事宜。盼在东京地区正式指定一个无线电台，以便继续供本统帅部同日本总部间进行无线电通讯之用。你方复电应说明呼号、频率和电台的名称。

“盼同我在马尼拉的统帅部进行无线电通讯时使用英文。在等待你方于东京地区指定一个电台执行上述任务时，JUM 电台，频率 13705 千周，将用来从事这项工作，马尼拉的 WTZ 电台，频率 15965 千周，将回复你方来电。

“收到此电时盼告。”

在第二次电报中，这位新任命的最高统帅命令日本人派出一个代表团经琉球群岛来马尼拉，以便听取他的关于正式受降事宜的具体指示。

日本人用无线电拍来了回电。他们报告说天皇已经向他的全体武装部队发出了一道停止敌对行动的敕令，他们请求允许将皇室的成员派赴各驻外军队的司令部，以便传达这道敕令，并使其切实得到遵守。

8月17日，日軍总部抱怨说俄国人仍然在进行攻击，请求麦克阿瑟加以制止。

此后马尼拉和东京之间的电讯来往不绝。我一直获悉这些电讯的内容和筹划工作的进展情况。日本的特使乘飞机离麦克阿瑟的统帅部，回到日本，他们带回了华盛顿寄给麦克阿瑟关于正式受降的文件——天皇的宣诏、投降书、总命令第一号。此外，他们还带回了麦克阿瑟自己提出的关于“总司令进驻〔日本〕的要求”。

8月20日，日本人报告说在中国发生了困难，有些地方的司



令官自行其是，企图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投降問題。他們請求麦克阿瑟派遣官員到中国进行調查，并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处理意見。

8月21日，日本人向最高統帥报告，关于盟軍在日本的战俘的安頓，他們接受了国际紅十字会的“斡旋和合作”。他們建議說，这样就可以不必在占領軍的主力到达以前派出特別的聯絡組。

当投降日期日益临近的时候，電訊的往返更加頻繁。日本人曾經請求准許极少量的貨物出港，以便运往边远島屿；用小型飞机来傳遞邮件；改換无綫电台的頻率和信号——显然，日本人希望避免一切可能触犯盟軍致使造成重燃战火的事情。

另一方面，在华盛顿，我們則在拟訂关于占領日本的政策指示。我們預料，关于占領区管理权的控制問題，将成为同盟国产生某些意見分歧的題目，我們需要确定我們的立場。

8月18日，我批准了美国政府关于对日本实行軍事占領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一点是占領下的日本的实际控制权，应当由我們来掌握。我們承认，联合国的其他国家也参加了对日战争，都有权参加政策的制訂，但是，正由于我們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提供了占領軍的主力，因此我們也希望在占領問題上，為我們自己保留控制权。我們决定，占領应当以集中管理的原則实行，而不应当把日本全国分成若干占領区。

在关于正式投降的程序問題上，在我們的盟国当中是有許多难办的事情的。在最初发給麦克阿瑟的指令中，曾經詳細說明，除了他本人是最高統帥外，参加波茨坦公告的四个国家的其他三国的代表，也应当在投降文件上签字。但是，英国却急于想滿足英联邦自己的成員国提出的关于参加签字的要求——特别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先生好几次发表了措詞強烈的声明，要求在同日本打任何交道时都应当有他的国家参加。

因此，8月18日，我告訴麥克阿瑟，除了美國、英國、中國和蘇聯的代表外，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新西蘭和荷蘭的代表們，也都已經被邀請參加日本的受降儀式，請他作好必要的準備。

日本人剛一投降，我們就收到了他們通過瑞士政府轉來的一封信，目的是向我們建議，看如何能使占領工作最有成效。電文如下：

“日本政府深盼獲致允許，就其對執行波茨坦公告中某些條款時所最熱切希望的事物，向美國、英國、中國和蘇聯等四國政府，具陳所見。日本政府原可在簽署投降書時陳述意見，但由於擔心不可能找到適當的機會，因此只好通過瑞士政府的斡旋，冒昧向四國政府陳詞。

“第一，鑒於占領的目的，如波茨坦公告中所提到的，只是為了獲致該公告中所規定的基本目的的完成，因此日本政府懇切希望四國政府信賴日本政府的誠意，協助日本政府履行自己的義務，以便事先制止任何不必要的麻煩事件的发生，它熱切地提出請求：

“當盟國的艦隊和軍隊進入日本本土時，請預先通知日本政府，以便能夠做好歡迎接待工作。

“盟國在日本領土上所劃定的占領地區，盼限制在最小數目之內，在擇定占領地區時，盼能考慮到使東京這樣的城市成為非占領區，而每個占領地區所駐的軍隊，則盼儘可能予以減少。

“第二，解除日本軍隊的武裝是一項需要慎重考慮的任務，因為這牽涉到海外三百多萬軍官和士兵，直接關係到他們的榮譽；日本政府當然要盡最大努力來完成這項任務。但是，擬提請注意的是，最好和最有效的辦法，是在天皇陛下的指揮下，容許日本軍隊自己進行解除武裝的工作，任其自動放下武器。解除大陸上日軍武裝的工作，盼能從前綫的部隊開始，並分階段進行。

“在解除武裝的問題上，希望能應用海牙公約第三十五條，尊

重軍人的榮譽，如允許他們佩戴刀劍。此外，日本政府還希望能獲悉盟國無意於使用被解除武裝的軍人去從事強迫勞動，它懇切地希望能迅速準備船隻和必要的交通工具，把這些軍人運回他們的家乡。

“第三，由於有些軍隊駐紮在遠方，不容易傳達天皇的敕令，因此盼望能適當寬限停止敵對行動的時間。

“第四，懇請盟國政府廣施仁政，迅速採取必要步驟或給與我們便利，得以把必不可少的食糧和藥品運送給駐紮在邊遠島嶼的日本軍隊，并把受傷的士兵從這些島嶼運回。”

日本人在這封信中所請求的事情，有些是我們當然會去做的。這不過是對待戰敗的敵人的一種普通的禮貌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在剛開始占領的時候就來商討占領的條件。我們是勝利者。日本人是戰敗者。他們必須懂得“無條件投降”不是什麼可以談判的東西。根據我的指示，國務卿貝爾納斯發出一封很不客氣的回電。

“日本政府所請求的關於就投降事宜作出安排這類問題，應當與最高統帥在他所決定的時機進行聯繫。四國政府曾經在波茨坦公告上簽字，公告保證凡是根據同盟國最高統帥的指示向美國司令官、蔣介石委員長、海軍上將路易斯·蒙巴頓勳爵和蘇聯司令官投降的日本全部武裝人員，都能返回家乡，享受和平占領生活。返回家乡的工作應由最高統帥作出安排，在日本武裝人員被向其投降的盟國司令官解除武裝以後，當日本和其他方面的交通運輸工具能以供應的時候，即將進行這項工作。”

為了使日本人和麥克阿瑟將軍都能明了最高統帥的職權範圍，我同李海海軍上將和馬歇爾將軍一起草擬了在麥克阿瑟到達日本後不久寄給他的一道公文。隨後在麥克阿瑟的請求下，我應允他把這道公文加以公布：

“參謀長聯席會議致麥克阿瑟。

“下述关于你作为同盟国最高统帅所拥有的职权的解释，已获总统批准：

“（一）你作为同盟国最高统帅，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应从属于你之下。你可以在按照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履行职责时行使你的权力。我们同日本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种契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由于你的权力是无上的，因此，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你不应当对这种权力的范围抱有任何怀疑。

“（二）管制日本的工作应当通过日本政府来进行，而以采取这种办法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度。这并不损害你在必要时直接采取行动的权力。你可以采取你认为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强制执行你所发出的命令。

“（三）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占领〕意图的申述，将予以充分实施。但是，予以实施将不是因为考虑到由于有了这个文件而使我們不得不同日本保持一种契约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尊重关于这种意图的申述和予以实施，是因为波茨坦公告是我们诚心诚意声明过的关于对待日本和对待远东的和平与安全的政策的一部分。”

麦克阿瑟这时候已经完成了他所制订的关于举行正式投降仪式的计划，8月21日，他送交日本政府一个详细的规划。但是由于8月22日日本本岛遭到了狂风暴雨的袭击，麦克阿瑟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推迟。

一切有关投降仪式的准备工作现在都已进行得很有眉目。日本人显然是愿意衷心合作的，所有他们发来的电文都表明，他们具有为胜利者提供方便的强烈愿望。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却不是这种看法。他倒宁肯按照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应付当时的局面。哈里曼大使曾经向我报告关于斯大林对我们的计划所表示的意见。

他报告說：“容我告訴您一件为大家所关心的事情。在我于8月27日同斯大林的談話中，他曾經极表关切地問到关于处理日本投降的問題。当我尽我所知地告訴他以后，他发表意見說，这样做有很大的危險性，日本人是奸詐无信的人，留下来的‘瘋狂的暴徒’还很不少。他說他认为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应当拿一些人作为人质。他建議說，比較可行的办法是命令日本的全部船只、飞机等等都开到馬尼拉，然后叫日本人到麦克阿瑟的統帥部来签署投降书。当我向他解釋，我們希望在日本心臟地区来签署投降书，从而把日本人的失敗帶回他們的本土；他說，这样巨大的舰队一定会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即使不发生什么事故，那也是有危險的，舰队和空运过来的部队，在日本人看来，将是对他們显示力量的一次印象最为深刻的示威。”

我决定为了这次受降仪式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8月28日，麦克阿瑟获得了关于这件事情的通知。到最后—一个时刻，东京和华盛顿之間—的电报往返更是頻繁得要命，为的是要确定举行仪式的时间——而与此同时，还夹杂着其他許多电报，有些瑣碎的事情引起了混乱，吵吵嚷嚷，我們力图加以澄清和平息。例如荷兰政府原来曾經把范·烏顏將軍的名字通知我們，說是以他为荷兰的代表。但到8月30日，麦克阿瑟报告說：“現在来了一位黑耳弗里克海軍上将，本地区的高級官員，东方荷兰部队总司令”，他帶來自己政府的話，說他是荷兰政府正式授权的代表。随后还有俄国人的問題，他們希望派出一个記者和无綫电工作人員小組，而且似乎认为，除非麦克阿瑟批准他們的全部名单，一个也不缺，否則他們便会感到不受欢迎。

.....

9月1日的晚上，我同我的千百万同胞們一样，开始收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进行的各項程序的广播。

我想起了过去的历史中独裁者和专制统治者給他們的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时的情景，历史上曾經有过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和他的舰队，他的舰队被摧毁后，便开始了西班牙世界强国的淪落。然后是路易十四和布楞宁之战；拿破侖滑铁卢之战；德皇，希特勒，——而現在則是日本軍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二次投降，它标志着世界上第二个最殘暴的独裁政府的可耻失敗和垮台。

那天晚上我还想到，不知道全世界的人，特别是我們自己，是不是学到了什么东西——我們是不是从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犯的严重錯誤中得到教訓，我們是不是要重犯这些錯誤。当我浸沉在这些思想中的时候，东京灣的广播員把广播器接到了白宫，我开始向全国人民讲话。

我說：“我的美国同胞們，今天晚上，整个美国——实际上是整个文明世界——的思想和希望都集中在《密苏里号》战舰上。在停泊于东京港的这一战舰上——在美国的这一小块土地上，日本人剛才正式放下了他們的武器。他們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四年前，整个文明世界的思想和恐惧心情都集中在美国的另一块土地上——集中在珍珠港。在这个地方开始产生的对文明的巨大威胁，現在消失了。从珍珠港到东京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也是一段血腥的道路。

“我們將不会忘記珍珠港。

“日本軍国主义者将不会忘記美国的《密苏里号》战舰。

“日本軍閥所造成的禍害是无法补偿的，也是决不会令人忘記的。但是他們进行破坏和杀人的本領被剝夺了。他們的軍隊和他們殘存的海軍，現在已經不起作用了。

“.....

“給予我們武装力量和使我們的战士在战斗中勇往无前的是

自由精神。現在我們知道，这种自由精神，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坚韧和能持久的力量。

“因此，在这个‘战胜日本日’（VJ—Day），我們對我們的生活方式具有新的信心和自豪感。我們有過對這一勝利感到歡樂的日子。我們有過祈禱和奉獻我們自己的日子。讓我們現在確定‘战胜日本日’作為對那樣一些原則的新的獻禮，這些原則使我們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是那麼竭盡一切力量來加以捍衛的國家。

“這些原則給予我們能夠幫助人們改善自己的處境和命運的信心、希望和機會。自由不能使一切都完美無缺，也不能使一切社會獲得安全。但是它比歷史上任何其他政治哲學都為更多的人提供更牢靠的進步、幸福和體面。這一天再一次表明，它還提供了人類所曾經有過的最巨大的力量和威勢。

“我們知道，生活在自由之下，我們能夠應付降臨到我們頭上的關於和平的困難問題。自由的人民同自由的盟國一道，他們既然能夠製造出一顆原子彈，就能夠使用同樣的技術、能力和決心，來克服前面的一切困難。

“勝利帶來歡樂，也總是帶來負擔和責任。

“但是我們對未來和未來的危險是具有巨大信心和巨大希望的。美國能夠為自己建立起一個獲致就業和有所保障的未來。它同聯合國一道，能夠建立一個奠基於正義、公平交易和寬容基礎上的和平世界。

“我作為美國的總統，謹宣布1945年9月2日星期天才為‘战胜日本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這還不是正式宣告戰爭結束或敵對行動停止的日子。但是我們美國人將把它作為一個最後審判日來永遠記住這個日子——正如我們將永遠記住另外一個日子，那個丑惡的日子。

“从这一天起，我們开始向前迈进。我們走向在国内获得保障的新世紀。同联合国其他国家一道，我們走向一个新的更加美好的和平、国际亲善和合作的世界。

“.....”



## 第二十三章

### 向飢餓的世界供給糧食

在戰時，總司令的職責比總統的其他職責更為重要。但是，在戰爭過去以後，現在的重點就轉移到了國內問題和政治領導方面。在國內，我們面臨着許許多多必須在戰後進行調整的任務。我們所处的世界領導地位，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責任和繁重不堪的義務；這就要靠我們自己把我們國內的事情办好，從而使我們能夠廣泛地執行我們的外交政策，來協助人類建立世界未來的和平。

必須立即予以特別注意的事情之一是全世界迫切需要糧食的問題。當我在廣播中向美國人民報告國外情況的時候，我想到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說，“目前歐洲是處在飢餓中；我所說的不是德國人，而是那些被德國人所蹂躪和破壞的國家的人民，特別是西歐的人民。

“冬季一到，困難將更多。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去幫助他們，不然，我們就會在今年冬季喪失我們在今年春季以重大無比的代價贏得的勝利果實。一個垂死掙扎的人往往容易毀滅自己社會的機構，而在破爛堆中尋找某些可以代替希望的東西。如果我們讓歐洲受凍挨餓，我們就會喪失維持秩序的某些基礎，而全世界和平的希望却是要建立在这种基礎之上的。”

實際情況的確如此。很明显，自從春初以來，歐洲遭到破壞的國家的人民越來越需要糧食，武裝部队的消費越來越多，而我們國內的農作物則呈現了匱乏的危險——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採取斷然的措施。

我最初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任命了一个国内粮食供应局局长；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力求使有关粮食供应（包括美国各家庭中所生产和储存的粮食）的各个政府机关的一切工作得到配合。我挑选了密苏里州路易西安纳城的保罗·斯塔克担任这个职务；战争期间，斯塔克在全国胜利庭园研究所<sup>①</sup>工作。他那种提倡推广“胜利”庭园运动的精神，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甚至力图在白宫的草地上修建这样一个庭园。

为了支持这个新机构的工作，我曾经在6月2日直接向美国人民发出呼吁，希望他们更多地增加生产，更多地储备粮食，以便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粮食分配给欧洲，救济那里的千百万人民。我还把战时粮食管理局和农业部合并在一起，使这些原有的机构能更有效地执行我们的粮食计划。

为了尽量收集事实材料，我曾经请求专家们研究供应欧洲人民的粮食问题，并提出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前总统胡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在粮食救济方面做过极为出色的工作。我邀请胡佛总统来白宫，这是他在1932年以后第一次旧地重游。我们在5月28日进行了一次很愉快的会谈，他向我提出了一些极有建设性的意见。我还向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堪萨斯州的阿耳夫·蓝敦和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发出了请柬，盼望他们来一同商讨当时的情势。

从我们本国的人民在国外寄回的报道中，从其他国家的领袖写来的信件中——其中有许多是万分紧急的信件——可以证明欧洲的粮食危机是迫在眉睫的。多少年来主要依靠粮食进口来供应本国人口众多的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现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

---

① 胜利庭园(Victory Garden)首创于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英国人曾利用宅院空地种植蔬菜等农作物来增加副食供应，这种菜地称为胜利庭园。——译者

慘境。这些国家許多地方的农业生产或者是遭到战争的破坏，或者是由于战争而陷于停顿。它们丧失了許多船只，在从前，它们原是可以利用这些船只为自己从国外输入粮食的。由于军事方面的需要和输出的锐减，这些国家的外汇已陷于枯竭。

有关粮食危机的某些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举例說，如果比利时和法国被迫向阿根廷购买肉类，那末阿根廷的肉价便会飞漲，而这就使英国吃亏，因为长时期来英国就是从这里购买肉类的。根据这一点，英国在1945年6月提出建議，要我們把我們在欧洲的剩余軍粮儲备发放給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英国人的想法是：既然我們在欧洲的武装部队已經减少，那末业已运抵欧洲供应这些部队的粮食是有余的。但是，我不能不告訴他們，我們需要把这些粮食去供应那些落在我們手里的大批德国俘虏。

1945年春季，我們自己国家的肉类供应情况变得十分紧张，以致城市地区一般市民所能供应的数量实际上比英国人每人平均的消费量还少。然而，为了供应法国和比利时的无比迫切的需要，我还是把五千万磅肉类运到了这两个国家。我希望这多少能够減輕一点英国人在阿根廷购买肉类时所受到的压力。同时我还促請丘吉尔注意有关粮食情况的其他某些錯綜复杂的因素。

6月23日，我拍电报給丘吉尔說，“我并不认为我們能够很适当地把肉类分配給法国和比利时，而不顾及欧洲其他国家。要是我們能够找到其他任何肉类的話，那末在分配这些肉类的时候，至少表面上必須做到大家一律平等。”

如果这个问题能够交給一个世界性組織去解决，那就会对一切有关的人更好一些。但是当时联合国还只是在酝酿成立中，在这种草創的阶段，自然不可能要它負起这个責任。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UNRRA）——虽然在希腊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但它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还小得很。主要的困难

是当联总 1943 年在大西洋城成立的时候，它沒有明确地規定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成立这个机构是为了适应那些沒有力量自己进行善后救济工作的国家的需要，而另一方面，究竟联总应当进行怎样一种善后救济工作，却又沒有固定的范围。联总的一些混合粮食委员会在范围和职权方面都沒有划分清楚。此外，国会撥給联总使用的款項拖延了相当时候，而由于美国是这一机构在财政上的最大的支持者，因此在它获得經費以前，它的工作显然是受到阻碍的。

1945 年 10 月 16 日，联合国正式成立了一个解决国际粮食問題的专门机构。这就是粮食及农业組織 (FAO)，这个組織的任务是收集和分析关于各国人民在粮食方面的迫切需要的情报，并研究如何滿足这些需要的办法。但是，这个机构基本上是起一种教育作用，而救济欧洲饥饿的人民的具體工作則仍旧是由美国来担負。农业部长克林頓·安德逊率領美国代表团出席了 10 月 16 日粮食及农业組織在魁北克举行的第一次會議，他根据會議的情况，不断向我提供了这方面的情报。

尽管美国在 1945 年曾作过准备，力求避免全世界的粮食危机，但是这一年的冬季几乎所有国家都还是遭到了饥荒的威胁。在战后的一年中，由于缺乏粮食而挨餓甚至死亡的人，要比整个战争期間因缺粮而挨餓和死亡的人还多。在美洲，粮食的生产是接近最高生产量的，小麦的丰产是空前的，但是，欧洲和北非的小麦收成以及远东的稻米收成，都比預期的要少得多。不光是战争的破坏，全世界許多地方的大旱也造成了看来是近代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我們所获得的情报表明，美国人的食品平均每天每人約三千三百卡路里，而有一亿二千五百万以上的欧洲人的食品每天还不到二千卡路里，在欧洲的某些地方，許多人的食品有时候每天頂多

不过一千卡路里。按人口計算，全世界粮食产量要比战前少 12%。而在欧洲，則要比在正常情况下少 25%；日本比这种情况好不了多少。

在远东的許多地方，情势甚至比欧洲的最坏的地区更加严重。在菲律宾，生产量的降低甚至超过日本。实际上我們把食糖运往菲律宾，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国家是可以輸出大量食糖的。在印度和远东，大米的产量在正常情况下要占全世界产量的 95%，而由于旱災和战争的不断影响，竟比正常的产量降低了 15%。减少得最多的是緬甸、泰国和印度支那——三个輸出大米最多的地方。

据英国人估計，在 1946 年上半年，可能供应的小麦数量和各需要輸入小麦的国家所要求的数量，也許会相差将近七百万吨。此外，看来还需要有大量的小麦去弥补大米的不足，据估計，当时大米相差一百万到二百万吨。

小麦問題的症結主要倒不是在于各产麦国家的实际产量，而是在于怎样从田庄征集这些产品，把它們輸送到港口，然后从港口起运。艾德礼首相在 1946 年 1 月 4 日拍电报給我說，如果各产麦国家不能把可以供应別人的小麦全数輸送出来，那末在今后几个月中欧洲和亚洲就会有普遍发生饥荒的严重危險。他还強調指出，这种危險的影响所及，将远远超过各有关国家的范围，而会毫无疑问地使通过联合国来建立持久和平的工作遭到无穷的困难。因此他悬請我对此問題須加以亲切的和积极的关怀。

我于是命令安德逊部长和其他部长以及諸幕僚同英国的专家们密切合作，以便能够清楚地認識到各方面的需要，并且制訂适应这种需要的計劃。1946 年 2 月 6 日，我宣布了一个“九点紧急計劃”，希望借此来制止大規模的饥荒。我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本政府的各有关机构应立即开展一个强有力的运动，以期取得一切消費者的充分合作，節約粮食，特别是面包。尤其应当

注意取得面包商和零售商的合作，在向各地銷售和輸送面包的時候，減少浪費現象。

“(二)禁止用小麦直接釀制酒类和啤酒；用其他谷类釀制的飲用酒类应受到限制，从3月1日起，每月限供应五天；用其他谷类釀制啤酒时，其数量不得超过1940年用于釀制啤酒的数量，也就是要比1945年的数量少3%。在这种情况下，到1946年6月30日，将节省粮食二千万蒲式耳。

“(三)在采取紧急措施期間，面粉碾磨率（每蒲式耳小麦所碾磨出来的面粉）应提高为80%。此外，还应当采取步骤，限制面粉的分配，使其仅供应居民日常必不可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在1946年上半年，将节约小麦二千五百万蒲式耳。

“(四)农业部应控制面粉厂所拥有的小麦存貨数量和面包商与銷售商的面粉存貨数量。控制存貨的目的是为了把小麦和面粉維持在供应居民必需数量的最低水平上。

“(五)給予小麦、玉蜀黍、肉类和其他主要食品以铁路运输的优先权，使这些东西能够迅速地和最大限度地輸往那些最需要的地方。

“(六)农业部应直接管理小麦和面粉的出口事宜，使其迅速到达最需要的地方。

“(七)在本年內采取必要的步骤輸出各种油脂三十七万五千吨，各种肉类十六亿磅，其中十亿磅应在1946年上半年輸出，同时增加奶制品、特别是奶酪和炼乳的輸出。

“(八)陆軍部和海軍部已在运输菲律宾的干椰子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帮助，它們曾撥給菲律宾政府二百艘中型登陆艇和“J”式船只，供菲律宾人在各島屿間进行貿易之用。这两个部和战时船舶运输管理局应立即采取措施，以更多的船只供应这方面的需要。

“(九)农业部应更多地想办法，使目前用来喂养牲畜和家禽

的谷类能够节约下来，用作人的粮食。下列办法均可考虑：迅速出售肥猪，最好是凡超过二百二十五磅的即行出售；降低屠宰菜牛的重量标准；鼓励大家宰杀次等家禽；不要过多地孵育小鸡；鼓励大家比较节约地喂养奶牛。应当着手制订条例，来限制饲料制造商的小麦存貨数量和小麦在这方面的用途。”

在这个计划宣布前仅两天，艾德礼首相向我生动地叙述了英国人民将要遭到的困难情况。

首相的来信说，“粮食大臣向我和内閣报告了关于他最近在华盛頓同您和您的农业部长就全世界小麦和大米不足的情况进行讨论的结果。我非常感激您在这次讨论中给我们的帮助和在讨论后所发布的各项指示。

“我们认识到必须作出重大的牺牲来帮助世界各国更加不幸的人民。我们自己就决定减少 1946 年上半年输入联合王国的小麦数量接近二十五万吨，尽管这对我们将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粮食儲存量减少到保障安全的水平以下很远，而在一旦入口粮食的到达发生不正常的情况下，去冒对国内销售面粉和面包的工作进行干涉的危险。我们将不得不把面粉的碾磨率从 80% 增加到 85%，回到吃粗面包的日子；在战争期间，我们认为吃粗面包是应该的，但我们盼望在战争过后便不再吃。我们还将不得不把我们每周的油脂配给量从八唎减少到七唎，而这个数量，要比战争中任何时间的配给量为少。这都是由于小麦缺少的直接后果；由于馬德拉斯、迈索尔、孟买和旁遮普各地的旱灾和其他灾害，印度恐怕又会发生比 1943 年孟加拉饥荒更加严重的灾难，而它是不可能依靠从别的国家输入它所需要的小麦和大米的。这样一来，印度人民将不能不以花生当粮食，而这些花生原是可以輸出给我们榨花生油的。

“关于增加我们的面粉碾磨率的决定，连同在华盛顿作出的关于把饲养牲畜和家禽的粗粮改为人的食粮的决定，势将大大减少肉类、咸肉和蛋类对我们的供应。我们重新振兴我们的饲养牲畜和家禽的事业的计划将会遭到巨大的挫折，大量生猪和家禽将不可避免地被屠宰。最后，我们势必发动一个强有力的宣传运动，尽量节约各种粮食，特别是面包，并鼓励大家更多地播种可望于今年夏季收获的春季作物。

“星期二晚间，本·史密斯爵士将向英国人民广播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他一定会号召大家作进一步的牺牲，而这种牺牲对我国人民将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因为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虽然曾经愉快地接受了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现在却希望把过去那种紧张程度多少减轻一些。

“我们再看看将来，情况也不见得好。即使在下一次收获以后，欧洲的生产量也还是会远远赶不上战前的水平，而需要从远东国家输入的产品将不可能减少。在我们力求应付1946年危机的情况下，全世界的粮食储备是会耗资殆尽的。

“我以私人名义拍了一个电报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总理，请他们提高面粉的碾磨率，减少喂养牲畜和家禽的小麦，防止浪费，这样来增加小麦的出口。我还曾请求他们扩大小麦的播种面积，以增加下次的收获量。

“英国人民一定会加强自己的决心来应付这种新的困难局面，因为他们知道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在作同样的努力。我深信您的政府为了增加美国的小麦输出而采取的措施，一定会大大影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政府对待我的请求的态度。我们非常珍视您已经采取的各项措施；但是，我知道您对于势必影响到我们战后一切计划的这个问题是极其关心的，因此我不揣冒昧，请您考虑一下，看是否能按照下述意见，进一步采取一些措施。



“您能否把貴国的面粉碾磨率提高一些？这不但会大大增加小麦輸出的供应量，而且会給其他輸出小麦的国家作出极其光輝的榜样。正如我前面說过的，我們的面粉碾磨率将提高到85%，根据在华盛頓的会談中所提出的分配办法，欧洲各国的面粉碾磨率至少将規定为80%，在許多情况下还要更高一些。

“其次，为了应付来年那种粮食仍然不足的局面，我希望您能尽一切可能增加貴国的小麦播种面积，特别是在全部粮食儲备量将是那样短少的情况下。

“最后，本·史密斯爵士从华盛頓回来以后，亚洲、特别是印度的粮食情况已严重恶化，我們正面临全世界非常缺乏大米的危机。我們已决定繼續执行不以大米供应本国居民的政策，我們也呼吁欧洲国家这样做。如果貴国能从自己的产米地区供应一部分大米，那就会大大有助于防止东方的大饥荒，而实际上也就有助于减少小麦方面的需要。

“在我們获得下一次收成以前，全世界将經歷一段极为紧张艰苦的路程。我担心成千上万的人将会在饥荒中死亡，更多的人将深受挨餓的痛苦。

“总统先生，由于这些原因，我誠摯地向您呼吁，請您繼續予以协助，来減輕这一場威胁世界的灾难。”

当我的九点计划在2月6日向公众宣布以后，艾德礼寄給我一封信，表示“十分感謝和欽佩”，但是几星期以后，他拍来了一个紧急电报，說是后来根据供求两方面的估計，谷类的情况甚至比原来所想像的更加恶劣。印度由于雨量过多，歉收情况十分严重，它需要輸入四百多万吨小麦或大米来維持那种极端不够标准的配給量。

艾德礼敦促我采取步骤来增加美国小麦的播种面积。他认为这样就会对全世界今后十五个月的物质福利造成极不相同的局

面。艾德礼在这封长的电报中最后特別請求我就下列三方面給予援助，他說：

“第一，我希望您能同我們一道，保证全世界需要輸入粮食的国家，都只輸入它們所真正需要的最低数量。

“第二，应当鼓励大家播种稻谷，这件事至关重要。在我看来，来年大米的收成差不多将同小麦一样不景气。不管我們如何努力，我想总不可能使亚洲国家的大米产量赶上战前的水平。至于小麦，还是不会有可靠的儲藏量，而且事实上也似乎仍旧不会有供过于求的危險。要是您同意这种看法，那末您为了扩大美国的播种面积、为了扩大美国許多地区的播种面积而采取的任何措施，就将对全世界起极有价值的影响。

“第三，如果您能設法减少美国在大米方面的消費，那就会对大家极有帮助……”

根据这个呼吁，我于是决定邀請一些社会名流参加災荒紧急救济委员会的工作，我引为高兴的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应允担任这一委员会的名譽主席。3月1日，胡佛偕同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其他十二位委員跟我在白宫会晤，商談粮食情况。商业部长华莱士和农业部长安德逊也参加了这次會議；我对大家說，我觉得这是我担任总统以来在白宫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會議。

胡佛先生說，災荒一貫是不可避免地要跟随战争而来的禍害。他指出，能够防止饥饿的最后一个大貯藏所是美国，他表示相信，美国人民将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那样，再一次承担起这个偉大的任务。

我問这位前总统，能否立即赴世界各災荒地区去作一番詳細的調查研究工作，他說能够。

当时最迫切需要的是把小麦运到西欧国家去，以渡过那种青黃不接的局面。4月9日，災荒紧急救济委员会有人告訴我說，危

机的情况比委员会第一次同我会谈的时候更加严重。本年第一季度的小麦运载数量要比原定目标三百万吨少三十一万三千吨。来自农业部长的另一个报告告诉我，美国的面包消费量仍然很大。另一事实是，喂养牲畜和家禽的小麦数量的确减少了一些，但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去设法使其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个数量至今还是很大。很清楚，除非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把小麦从农庄运走，限制国内用来做面包和喂养牲畜家禽的消费量，美国就会可悲地达不到帮助受灾国家所需要的小麦数量目标。

黑市交易的产生也增加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能把一切事实真相告诉美国人民，使他们知道从黑市购买粮食，也就是从饿着肚皮的人口中夺取粮食，他们就会自动地不再做这种事。

有关粮食供应方面的生产和运输工业部门的罢工，也加重了救济灾荒计划的复杂性，我在这里又一次感觉到，政府应当有计划地进行一种说服教育工作，使劳资双方都能尽最大的努力，来调和彼此间的分歧意见。

我虽然批准采取较严峻的措施来增加可以输出的粮食，同时我特别强调每一个公民在节约粮食方面应尽的责任，强调美国人民在克服全世界的灾荒方面所应有的合作态度。由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我便在1946年4月18日拍发了如下一个电报给当时正在埃及进行灾荒情况调查的胡佛先生：

“为了鼓励大家投入‘节约粮食和救济灾荒’的运动，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大力地把您从访问中所获得的关于欧洲的真实情况向社会人士作一番生动而具体的报道。

“因此，我向您建议，不知您能否在完成开罗的任务以后立即回美国，以便把您所亲眼看到的情况，直接告诉美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美国必须提供更多的援助。

“这就要請您取道美国，然后往印度、中国和日本。

“包括国务院、农业部和商业部在內的政府有关部門的代表出席了災荒紧急救济委员会昨天举行的一次會議。會議认为，按照災荒救济計劃，目前这一阶段已只剩下七十五天，因此我們应当不遺余力地促使公众更加热烈地响应号召，多从农庄取得小麦，同时在家庭和飯館用糧方面，多多節約。在紐約市和其他一些地方，将筹备举行大規模的集会。”

胡佛回答說，他希望繼續目前的行程，直接由欧洲往印度和远东其他国家，然后在两星期內返回美国。我当然听从他的意見，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作一次广播，向全国人士发出呼吁，我并且决定在4月19日广播。

在这次广播中，我說：“响应各地为全世界千百万挨餓的人民发出的呼吁，这是我的責任。作为美国人，我們都負有拯救这些人民的崇高責任。

“我設立災荒紧急救济委员会，目的是保证我們能尽最大努力去援助那些挨餓的人。我們对前总统胡佛負起了調查欧洲情况的責任，特別表示感謝。他寄回的信件使我們一次又一次清楚地認識到欧洲人民的悲慘处境。我們无可置疑，在受到災荒的欧洲和亚洲的家庭中，就在目前这个时刻，許多人正在餓死。

“美国面临着一項神圣的任务。我們早就答应要拿出我們的全部力量。現在我們可不能听到飢餓儿童的号哭而漠不关心。我們当然不会不理睬那些仅仅向我們要求一点面包屑的千百万人民。美国人的好心腸是一定会为人类历史上这种大規模飢餓現象的最大威胁所感动的。”

为了从农庄取得糧食并将它們輸送国外，我立即采取了許多措施，其中包括：

(一)在5月25日前，农民交納的小麦每蒲式耳由政府最高

售價上給与獎金三角，玉蜀黍每五十蒲式耳也給与同样的獎金；

(二)把供国内需用的面粉制造量削減到 1945 年同一时期的 75%，余下的 25% 作为輸出之用；

(三)将面包商和食品制造商所需要的小麦数量削減 25%；

(四)由政府无限制地收购燕麦粉和燕麦，以供出口。

我还指令联邦貿易委员会注意檢查面粉厂和面包业在交易方面的浪費現象，以防止这些救命的粮食遭到任何不必要的損失。

5 月 13 日，胡佛先生在作了三万五千英里的环球旅行以后回到美国，并带回了他的关于二十二个受灾国家需要粮食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表明，全世界所最需要的还是谷物，特别是小麦和大米。根据他的报告，全世界粮食的差額已經从他剛出发調查时所估計的一千一百万吨减少到三百六十万吨，但是他的調查研究的結果表明，唯有不断努力才能防止大規模的飢餓現象。

胡佛先生在报告中拟訂了从 1946 年 5 月 1 日到 9 月 30 日缺粮和受灾地区各个国家每月必須輸入的最低谷物数量計劃，这对我考虑今后几个月內所必須采取的措施极有帮助。同时，胡佛先生还接受了我的建議，作为我們的“粮食大使”到南美去一趟，来完成他的世界粮食情况調查工作，并取得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对这一普遍的紧急局面的支持。

政府行政人員、运输公司、粮食生产者和經紀人以及美国的消費者所作的共同努力是获得了成績的。到 6 月 27 日，我便能够向公众宣布說，美国在六个月里已經輸出了五百五十多万吨供制面包用的谷物，来救济其他国家的飢饉的人民。三星期以后，我們达到了半年中輸出六百万吨粮食的目标。大規模的飢餓現象沒有发生，但是我不能不向全国人民提出警告，危机无論如何还没有过去。欧洲正面临另一个严冬，而它今年的收成对整个粮食情况也不見得会有多大帮助。要想維持生活，主要的希望似乎还是要靠

美国的力量和意志，来生产足够供应那些还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各国人民的粮食。

英国的经济由于丧失了它一向所依靠的国外市场，因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们曾经利用租借法案部分地解决英国经济方面的困难。当这种临时性的租借法案在战争终止的情况下宣告停止的时候——因为这本来是一种战时的措施——英国经济的困难局面就更加严重了。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好几次向我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谈到美英两国必须在战后作一些经济上的安排。他在1945年7月24日给我的一封信中，首先提出了进行财政上的商谈问题，在这封信里，他谈到了战后经济形势的各个方面。他提出的问题之一，牵涉到我们关于军火计划的决定。我们的决定是：从今以后，除了直接用于对日作战所需要的军火，一律不得装运，而丘吉尔说，由于“华盛顿的官员把这一点尽可能地作了最狭义的解释，这就把军火的供应几乎减少到零，而使我們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

他接着说，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是和整个战后经济的安排工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安排工作应当在战争结束以前就做好，他说他愿意在适宜的条件下尽早派遣一个专门的代表团来华盛顿。

7月29日，我从德国的巴培尔斯堡回复丘吉尔说：

“我根据7月25日信中的意思，谨随函附上关于发放军火租借物资的指示抄本一份，这个指示今天已送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它规定取消用于占领轴心国家的租借物资。我相信，在其他方面，这个指示也充分接触到了您所提出的要求。

“我已注意到您在7月24日信中所提出的建议，在华盛顿讨论关于战后经济安排工作的問題，时间不妨暂订在9月。助理国务卿克莱顿先生不久就会来伦敦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的

會議，我已經命令他同你們的人員就這些問題進行非正式的會商。在他回華盛頓向我報告以後，我們就可以作出決定，籌劃同你們的代表作進一步的討論。”

在艾德禮接替丘吉爾以後，我和他就戰後的財政問題交換了許多次意見。艾德禮是完全知道我過去同丘吉爾進行討論的各種情況的；但是，當我在8月21日發布命令說租借物資應予停止的時候，對英國政府卻顯然成了一個很突然的意外事件。

當日本在8月14日宣告垮台，太平洋戰場的軍事行動停止以後，制訂租借法案的目的就不存在了。因此，我在8月21日宣布，我已命令對外經濟管理局立即採取措施，停止發放租借物資，並將這一行動通知接受租借法案的各國政府。命令中還規定取消一切尚未履行的租借法案合同，但盟國政府願意繼承這種合同或者為了美國的利益的而履行這種合同者不在此例。

在這個消息宣布後兩天，我舉行了一次新聞和廣播記者招待會，會上有人提出問題：根據已經發表的某些言論，說這對英國政府是一個直接的打擊，究竟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行動？

我說，“這完全不是事實。我們的理由是，當這個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的時候，是把租借物資看做戰爭的武器，而在戰爭結束以後，就不再有這種必要了。當延長這一法案的有效期限的時候，我剛好是在副總統任內，我當時曾經作出這樣的諾言。我現在只是履行我在美國副總統任內所作的諾言而已。”

第二天，8月24日，艾德禮首相向下院說，租借法案的停止已經使英國“在財政上陷入嚴重的局面”。他宣布哈利法克斯伯爵、凱恩斯勳爵和英國政府其他的專家們即將動身赴華盛頓同美國的官員討論這個問題。丘吉爾當時已經是效忠於英王陛下的反對黨的領袖，他把艾德禮的發言說成是“十分令人不安的消息”。

同一天，對外經濟管理局局長克勞利着重說明，停止租借法案

这件事不是总统、也不是他自己可以擅行决定的，英国的官员们都知道，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个法案就得停止。

财政部长文森在8月22日给我的一个备忘录中就已经提到，停止租借法案将会使某些盟国政府、特别是联合王国提出关于财政援助的特殊要求。他还说，在取消租借法案以后，再进行关于新的财政安排的谈判，来把主要的供应品源源不断地输往盟国和获得了解放的国家，这就会使财政部面临许多新问题。他指出，这种谈判将涉及国务院、对外经济管理局和财政部。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小组委员会，而以国务卿贝尔纳斯、克劳利和他自己为委员，来共同研究在租借法案停止以后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同时通过财政委员会向总统提出建议；财政委员会是根据布里顿·伍兹法案建立起来的，所有这类问题都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我批准了文森的建议，并请他们成立这样一个小组委员会，按照文森提出的办法进行工作。

由于租借法案的停止，还必须开始考虑撤销对外经济管理局并将其职权重新分配到各正规部门去的问题。8月下旬，财政部长文森向我提出了把该局的职权重新予以分配的初步计划。克劳利也提出了一个同一内容的更加详细的计划。当对外经济管理局在1943年作为一个战时机构建立起来的时候，它是把四十三个不同的机构整个地或者部分地合并在一起。这个机构所负的职责和所进行的工作并不是一下子可以搁置下来的。还必须有一段适当的时间来使这些职能慢慢转移到别的部门去，以免政府工作遭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当我在9月27日发出行政命令撤销对外经济管理局时，我曾经规定，每项职权的转移工作最迟应当在1945年12月31日前完成。

对外经济管理局最后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请求接受过租借物资援助的各国政府，向美国提供一份截至“战胜日本日”为止的剩余



物資清單。

从 1941 年开始到 1945 年底，我們国家給与盟国的租借物資援助总共达四百六十亿四千万美元。其中一百八十九亿五千万美元的物資是在 1945 年的最后四个月中輸送出去的。实际的物資和服务費用总共占四百三十九亿五千二百万美元，其余部分是在美国的生产設備費用、由各地轉运到联邦机构的各項費用和其他开支。

在同一期間，倒租借物資——其他政府提供給美国的物資——約在六十亿美元以上。英国和俄国共占全部租借物資援助的 94%，英国得的最多，占 69%。但是，大部分倒租借物資——四十亿美元——还是来自英国的。

尽管俄国不是接受美国租借物資的主要国家，可是它所需要的物資在种类上說肯定是最广泛的。我們的北大西洋運輸舰队曾經把軋鋼厂、輪胎厂、石油提炼厂、电力厂、铁路堵塞信号系統和化学厂的全套設備，以及铁路機車、汽車、炸药、粮食、机器、五金、卡車和其他車輛与軍火等运送到苏联，就說鈕扣吧，也达一百六十四万七千美元之多。

給予俄国的租借物資总共在一百一十亿美元以上。我本来打算在波茨坦同俄国人討論一下关于結算这笔巨大帳目的办法問題，但是除了初步接触到這個問題以外，沒有机会細談。然而英国人却一直非常渴望同我們討論战后的財政問題，在波茨坦會議上，丘吉尔就曾經提出要举行这样的會談。我同意他这个意見，助理国务卿克萊頓于是前往倫敦，为这次會談作准备。

克萊頓同英国人进行的商談只是在真正會談以前的一种非正式的、預备性质的會議。英国代表凱恩斯勛爵強調关于处理凍結在各国的英国貨幣累积的結存問題，和在“战胜日本日”以后繼續存在的入不敷出的問題。他指出，这种結存妨碍英国向他国取得

新的借款，并說，英国人认为，必須通过从美国取得足够貸款的办法，使現有的英鎊結存完全成为可以兌現的貨幣。

克萊頓告訴英国的官員說，美国輿論界认为，如果能够达成一項令人滿意的有关全面的商务政策的協議，那末美国輿論界也許会支持拿三十亿美元以寬大条件貸給英国的办法。他說，这个協議必須包括取消美元統一經營方式，以及有关关税、卡特尔、份額、不平等待遇和其他事項。

克萊頓坚持从一开始就要把財政政策和商务政策摆在一起來談，这一点得到了国务院的大力支持。我們认为，国际財政和貿易是彼此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而要想成立一笔真正令人滿意的貸款，唯一的办法是提供为期两三年的財政援助，并在貿易方面达成協議，以便造成一种經濟环境，使英国和其他国家都能对它們的貸款偿还本息。我們在倫敦进行会談的代表团清楚地指出，英国不应当指望获得白白贈送补助金式的財政援助，但是美国方面是准备按适度的条件給予它大宗貸款的。

所謂“美国—联合王国經濟談判”是9月11日在華盛頓开始举行的。率領英国代表团的是凱恩斯和哈利法克斯这两位勳爵。美国方面参加“最高委員會”的是助理国务卿克萊頓和財政部长文森。这个“最高委員會”負責組織进行談判的各种委員會，其中之一便是处理金融問題的財政委員會。

在財政委員會开始进行談判的时候，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总的協議，即美国必須对英国提供大量的援助，以便使英国的对外經濟政策能够建立在多方面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英鎊集团的基础上。但是，在下列各点上，並沒有达成協議：（一）英国处境的实况問題，（二）为了改善这种处境，美国应当提供多少貸款的問題，（三）关于这种应当提供的貸款的偿还条件問題，（四）同這項貸款有联帶关系的其他条件問題。

尽管英国代表团比起在倫敦进行会谈时，已願意作更多的让步，但从9月底到12月初，財政委员会一直在着重地談判这几个問題。財政部长文森随时向我汇报这些談判的进展情况。

我們的技术专家认为，英国人夸大了联合王国財政状况的严重性。据英国人估計，1946年年底英国的国际收支亏空达三十一亿美元，而据美国人估計，則仅二十三亿美元；英国人估計，到1948年年底，亏空将达五十亿至六十亿美元，而美国人估計則仅三十三亿美元。关于联合王国在1945年6月30日所拥有黄金和美元数量，我国代表的估計也要比英国官員所提供的数字为大。因此，对于我們这个主要的盟友的財政方面的真实情况，我們一直就沒有获得一致的看法，尽管它在这方面的情况显然很严重。

經過好几个月的談判，才算达成了关于貸款数额的協議。凱恩斯勛爵在9月20日說，英国至少需要从美国获得五十亿美元的援助，最好是六十亿。然而，美国代表团内部却有着分歧的意見。助理国务卿克莱頓建議四十亿，而財政部长文森則认为最多不能超过三十一亿，因为英国方面說他們每年偿还的本息不可能超过一亿美元。文森写信告訴我，他认为我們沒有理由毫无利息地貸給英国人一笔五十年的款項，而英国就是这样向我們提出要求的。

經過稽延时日的談判以后，美国代表团同意这样一个数字：最少三十五亿美元，最多四十亿美元。到談判的最后阶段，我便决定把这两个数字折衷一下——給与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虽然凱恩斯勳爵向文森部长写过信，說是如果少于四十亿美元，联合王国就“不可能順利地履行”美国在最后的協議中所迫切希望提出的“条件”，但由于看到我們已經显然不会再有所增加，英国代表团也就接受了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这笔貸款。

美国代表团規定貸款的年利为2%。英国代表团曾經請求以二十亿美元作为无息貸款，而其余的部分則按年利2%归还，但是

美国代表团坚持最初的決定，不能給予无息貸款。然而，由于在开始付息以前还給予英国五年的寬限時間，所以实际上利率已减少到 1.63%。向英国的另一让步是，同意英国可以在任何一年免付这一年的利息，只要英国政府能按照預先規定好的条件，提出证明，确系无力償付。

在这个历时十二周的談判中，还就其他一些問題达成了協議，其中包括：預先付給英国六亿七千二百万美元，以便使它能完結租借物資方面的工作；联合王国負責立即逐步償还它对英鎊集团国家所負的債款（三百万到四百万鎊）；英国应允在今后的談判中支持多方面的貿易計劃。

在英美財政談判結束的时候，大西洋两岸的人士都曾經有过一些担忧。有的說这笔貸款太小，有的說太大，山姆大叔一方面被人形容是聖誕老人，另一方面却又被形容是夏洛克<sup>①</sup>。談判这笔交易必須对各方面所牽涉的因素都有很好的了解，这次談判，特别是从英美双方的輿論来看，标志着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阶段。

正如我在 1946 年 1 月 21 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到的，这些財政協議的意义，是它們将有助于解决我們战时的主要盟友之一在向和平过渡期間所遇到的問題。

我的看法是，消除国际貿易上的人为的障碍，不管是不合理的關稅制度或者關稅方面的特权，不管是商品的定額制度或者根据卡特尔的限制性办法采取的禁运手段，从长远来看，对我国的經濟繁荣和全世界的繁荣都是极有好处的。

1 月 30 日，我在給国会的特別咨文中敦促議員們迅速通过必要的立法，以便获得用作英国貸款所必需的款項。我把这次的財

---

<sup>①</sup>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劇中的高利貸吝啬鬼。——譯者

政協議看做是繼承七十九屆國會所通過的布里頓·伍茲法案精神的另一個新成就，羅斯福總統曾經把這個法案叫做“國際經濟合作的基石”。

英國貸款法案在 1946 年 7 月 15 日送到我的手里。我在當天就簽署了這個法案，使它成為法律，並且寫道，“這筆貸款幫助我們恢復世界的貿易，是符合我國當前的和長遠的利益。同時，這筆貸款還使英國能夠同我們進行合作，來建立世界各國間的一種互利的新型經濟關係。”

我清楚地指出，美國和英國之間的這項協議，並不是為了對付其他任何國家。我們所追求的貿易制度，它的大門是在同樣公平的條件下向聯合國的一切國家敞開的。

## 第二十四章

# “公平施政”

领导作战和处理外交问题都一下子那么突然和急迫地压到我的头上，使我感到抽不出必要的时间来专心处理国内问题。

旧金山会议、德国投降、波茨坦会议、原子时代的到来、日本投降——所有这一切事件，都发生在不过三个月的期间内。

所有关于把战争经济转入和平经济轨道的迫切的国内问题，都必须根据随着轴心国家的崩溃而发生的这些和其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来考虑。对于每一件这样的事件，那怕是一位在职多年的总统，也是需要耗费他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准备和商谈的。

而我呢，我是突然一下子掉进这个震动世界的史诗中的一个角色，我在不得不应付当前的事情和计划将来的事情的同时，还必须学习过去的经验，这样一来，对国内的事情进行长远规划的时间就剩下太少了。

1945年9月6日，我向国会送去了一份咨文，这是我在总统任内提出的最重要的咨文之一。这个咨文包括有关国内立法事宜的二十一点，事实上，这就是我的施政纲领。

这个二十一点咨文标志着“公平施政”的开始，而1945年9月6日，也就象征着我用自己的权力来行使总统职权的日子。正是在这一天和在这个咨文里，我第一次提出了我的自由主义的和进步主义的纲领，用它来作为我的施政基础。这是我以总统的身份来宣扬我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哲学的机会，我在担任参议员的时候就曾经宣扬过这种原则和哲学，而在我的全部政治生活中，我都是

遵循这种原则和哲学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二十一点咨文有点像第一次就职典礼的演说和第一次向国会发表的演说的综合物，它确定我今后的行政工作的作风和方向，并指出我将努力引导国家走向的目标。在我担任参议员的一段生活中，我一向听从弗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并信奉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我一向根据罗斯福的纲领参加竞选并获得胜利。作为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参与了起草1944年竞选纲领的工作。现在，我负起了领导责任——提出法案，管理行政，并运用总统的威望和权力来诱导健全的社会和政治事业。

在我就任总统的头四个月中，尽管战争问题和外交政策问题占去我的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对上述事件进行了深刻的考虑。实际上，我在从波茨坦会议回国的途中，就已经开始草拟这个包罗很广的纲领。总统顾问塞缪尔·罗森曼法官和我一同参加了波茨坦会议，并和我一道回国，他帮助我准备了要向国会和全国作的关于最近结束的三巨头会议的报告。有一天晚上，在《奥古斯大号》轮船的官舱里，我正在对我的报告草稿作最后的修饰，我对罗森曼说：

“塞缪尔，在我们回国和作了这个报告以后，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拟订一个关于内政问题的纲领。我想把这个纲领的大部分内容一次端出，而不零零星星地往外拿。照例，我应该在明年1月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这个纲领，但是我可等不了这么久。我的打算是，我们几时能把这个纲领准备好，就几时把它当作咨文送过去。你好不好着手收集材料，或是起个初稿？”

罗森曼法官在弗兰克林·罗斯福担任州长和总统时，一直是他的顾问，将近二十年期间，他一直是罗斯福的私人朋友和顾问。他对新政的各种情况和新政的哲学很熟悉，我挽留他同我在一起，

繼續作總統的顧問。

他回答說，“很好，总的說來，你想講些什麼呢？”于是他拿起了鉛筆和活頁紙本。我向他敘述了我對三十年代初期在我們國家陷於崩潰以前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的看法，以及我對羅斯福政府為了恢復經濟和進行社會改革所採取的措施的看法。我然後談到我自己關於將來的立法的一些計劃和政策——也就是我認為美國在戰後的年代中所應該走的总的方向。當我們討論到這些長遠的政策和我打算提出用來執行這些政策的立法的時候，羅森曼的身軀更向前靠攏了。

他熱情地對我說，“您知道，總統先生，我好久沒有像今天這樣興奮和愉快過了，這實在出我意料之外。”

“那是為什麼？”我問他。

他回答說，“是這樣，關於您將做些什麼工作，我想我是聽了太多的謠傳了。這些謠傳來自您的一些保守的朋友，特別是來自您在國會期間的一些同僚。他們說，您將做出一些使羅斯福的追隨者大為吃驚的事情。他們說，這一下‘新政’可完蛋了，我們大家都會重新走上‘常軌’，所謂‘羅斯福的瞎胡鬧’，現在大部分都已成了明日黃花。換句話說，民主黨的保守派現在已經上台。根據您長期在參議院的投票記錄，我對於這一類的話是決不相信的。也正是根據這個理由，羅斯福總統才那樣迫切希望您做副總統候選人，他考慮到他一旦發生不幸，您可以繼承他的事業。”

羅森曼接着說，“您剛才講的一番話，看來已解決了這些謠傳。這的確是一種進步的政治哲學和一種自由主義的行動綱領，這是切合您整個任期內的工作需要的。在您追隨黨內領袖，投票擁護這類綱領時是一回事；而在您自己作為黨的領袖，提出這類綱領並為它進行鬥爭時，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然而，日本的突然投降和因此而引起的一些國際問題，使我中



断了起草这个重要咨文的工作。一直到8月底，我才重新着手。这时候罗森曼已准备好一份初稿，搁在我的办公桌上已好几天。这个初稿很不错，我在上面增加了好几段，删掉某些点，把这个文件全部整理好，一共花了十天功夫。我把经过最后修正的一份付印，在拿到校样以后，便邀请克拉克·克利福德、约翰·斯蒂尔曼、约翰·斯奈德、查利·罗斯和其他几个顾问共同研究。我们同罗森曼一道逐条进行讨论，大家提了许多意见，我也采纳了一部分意见。然后我把改正了的样本送到各个部门和各个官员，征求意见。就这样，我使行政部门的所有重要职员都获得了在这个咨文的草拟工作中参加意见的机会。

我的大多数顾问都是同意这个咨文的，但有些比较保守一点的同僚却劝我不要肯定地承担采取这些自由主义的措施的责任。当时担任战时动员和复员局局长的约翰·斯奈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私下极其坦率和明确地向我表示他不同意。但由于他对我的忠诚和友好，他没有公开地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我非常认真地听取斯奈德的忠告，因为我在对每个问题作出决定以前，一定要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是我一贯的态度。这次我尤其注意聆听斯奈德的意见，因为我对他的判断评价很高。

在我执政的初期，就决定要使持保守观点的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官员、顾问，保持一种均势。我希望在作出我自己的结论和对基本政策问题作出我自己的决定以前，征求一下站在两个极端的人士的看法。因此，我听取了对这个咨文内容的各种反对意见，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当改变我的主张。9月6日，也就是我宣布“战胜日本日”以后四天，我把这二十一点咨文送到了国会。

正如我在咨文中首先指出的，我认为国会复会时正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期。从战时经济回复到和平时期的经济，势必引起许多重大问题，在咨文中，我概括地叙述了业经制订的关于尽快重建

和平时期的扩充了的工业、貿易和农业的計劃。我說我将遵照下列八个具体方針办事：

(一)尽快复員不必要的武装部队；

(二)尽快取消和处理战时的各种合同；

(三)清理战时工厂，以便能按照合同进行和平时期的生产；

(四)限制物价和房租，直到公平的竞争方式，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和解除消费者的过分负担时为止；

(五)凡因增加工资而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地方，不得增加工资；

(六)尽可能取消战时政府的一切管制，以便加速和鼓励复員工作和扩大生产；

(七)保留必要的管制措施，以防止生产脱节，原料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的现象，而有助于复員工作和扩大生产；

(八)防止工资收入或购买力的迅速降低。

这是一个极其远大的計劃，为了說明这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計劃，我对二十一点的每一点都作了詳細的解釋，并叙述了执行这些政策在立法上所必須采取的步骤。

綱領中的关键性的項目之一是建議向全国重申每一个能够和願意工作的美国公民都有工作的权利。这也就是正式宣告，一旦供求的办法不能制止长期的失业现象，政府最后便有責任使用自己的全部資源。我觉得在正常时期，我們应当首先依靠私人企业来提供就业机会，而政府則应当尽其所能，而且满怀信心地去鼓励这种企业。但是，我在咨文中強調指出，这种信心应当主要体現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表現在言語上。

我請求迅速采取行动，頒布关于充分就业的立法，来保证我們对經濟和繁荣的坚强信心。我并建議制定一种立法，一項以設立执行充分就业政策的永久机构，这种政策的基础是工业、农业和劳

工間的合作，是国会和总统間的合作，是人民和自己政府間的合作。

我深信，既然說充分就业，那就必須使各个不同的种族、宗教信仰和肤色的人有平等的机会。我們的政治哲学的这种基本信念，也应当成为我們經濟中的主要部分。在战时进行工作的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在过渡期間应仍旧执行它的职权。我过去已請求制訂立法，把这个委员会改为常設机构，在这个二十一点咨文中，我再度提出这个建議。

在历届总统致国会的咨文中，这是最长的咨文之一。这个咨文将近一万六千字，是 1901 年以来最长的一份，西奥多·罗斯福在这一年曾經向国会宣讀了一份长达两万字的咨文。我没有打算亲自到国会去宣讀，而是把它印出，分送给参众两院的每一位議員。在参議院和众議院，这个咨文都是由专门負責这项工作的職員宣讀的。

1945 年 10 月 4 日，我写信給各部部长和各有关单位首脑，責成他們就貫徹咨文中各部門份內職責的必要立法程序，拟定具体草案。我还要求他們每个人，在每月 1 日和 15 日根据事情的发展情况給我一个簡短的报告。

这个咨文，在其正式提出的各項建議中和咨文所用的字句中，就已經包含了“公平施政”綱領的基本內容。但在国会宣讀这个咨文的十个星期內，我繼續向国会提出几份咨文，每个咨文都給“公平施政”增加了一些新的建議，如健康保險、預付医疗費制度、原子能的国有化、圣罗梭士海道工程的发展計劃和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补助，等等。

在我的第一个关于內政問題的綜合性咨文中所列举的各項建議，都是尽可能按照战前 1940 年民主党竞选綱領的那种自由主义和高瞻远矚的精神提出来的。我并且决心要实现 1944 年罗斯福

和我在竞选运动中所作的保证。

1945年公布的这个立法綱領，于是成了內政工作的目标。它提醒我們的民主党、国家和国会：政府的进步要靠對我們的私人企业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而进步的民主，則必須經常与变化了的情况相适应。

在我的复員計劃中，我首先要做的一点是整頓政府的机构，以便适应业已产生的新的需要和任务。在我沒有当总统以前，我早就認識到，改組政府机构是應該的，而且从某些方面說，还是必要的。我們凭常識就可以知道，一个組織得比較好的政府机构，就能更好地發揮效力。历史上有过許多关于从前的总统在这方面的記載，他們促請国会通过必要的立法，使政府机构能按照更有效率的方式办事。我自己的經驗已向我证明，由总统主动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可以获得巨大进展的。

1939年的改組法案为改进政府的行政系統和执行机构的組織提供了办法。这个法案使总统能够主动进行改进和調整的工作，參众两院如不同意，必須在六十天內提出否决。另外还有1941年的第一个战时权力法案，它賦予总统根据作战的需要对行政机构进行必要的調整的权力。罗斯福总统就是以这两个法案为根据，在战争年代中进行了許多改組机构的工作。

我現在所碰到的問題是，第一个战时权力法案在战争結束以后六个月便将自动失效。我觉得必須制訂一个大体上类似1939年的改組法案的立法，这个立法要具有永久性和广泛性，要能包括一切行政部門和机构，同时还要具有灵活性，应当允許在必要时作任何方式的調整。

1945年5月24日，我曾經向国会提出咨文，請求制訂这样一个立法。6月間，国会的一些領袖对我說，关于我的这项建議将延迟到今年秋季国会复会时再进行討論。因此，我在9月6日致国

会的咨文中，再一次指出迫切需要增加总统在管理行政机构方面的权力。参众两院都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辩论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哪些具体机构应当不在这个法案规定之内的问题，然后给我送来了一个折衷的法案，12月20日，我签署了这个法案。

我已经发布行政命令，撤销许多战时机构。在这些机构中，有许多原是根据行政命令设立的，在战争结束或者总统认为适宜的时候，便应当撤销。列入应予撤销的机构名单中的有全国战时劳工局、国外经济署、战时生产局、经济稳定局、检查局、国防运输局、战时情报局、战时石油管理局和战时船舶管理局。其他一些机构则由于在复员期间还特别需要发挥其作用，故予以保留。

在加强行政机构方面，我所特别关心的是目前副总统的职位还空着的问题。我认为必须修改有关总统职位继承的法律，以便使只有经过选举的政府官员，才能在总统死亡或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时，继承总统的职位。根据1866年的总统继承法，在总统和副总统的名次下面便是国务卿。其余的阁员都按照这个法律都规定了继承的先后次序。由于所有的阁员全是由总统任命的，因此这个法律便给了我任命我自己的继承人的权力，一直要到几乎四年以后能够选出新副总统时为止。我相信，任何总统都不应具有这种权力。

在政府官员中，唯有总统和副总统是由美国全体选民选举出来的，而我认为众议院的议长比较接近这种由民选产生的条件，因为作为一个众议员，他是由他所属的选区的选民选入国会的，而作为众议院议长，他又是由来自各州的大多数众议员所推选出来的。因此，在我就任总统以后不久，就提出了一个草案，规定这方面的变更。1945年6月29日，这个草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参议院却没有通过。最后这个草案还是通过，成为法律。我还认为，应当想出办法，在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之后，推选一位继任副总统

的人。在我看来，总统选举人或者众议院似乎都可以担任这种选举工作。我想由总统选举人来进行这项工作也许更好一些。

不过，在我们制订有关加强行政机构的各项计划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应付通货膨胀这个重大问题。在日本投降后四天，我就针对美国的这个新敌人发布了一道有如宣战书的命令。在1945年8月18日的行政命令中，我颁布了关于在复员期间稳定经济的重要施政方针。

这道根据1942年的紧急物价管制法案和同年的稳定法案发布的行政命令，责成物价管制局和农业部长直接会同经济稳定局局长一起，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制止生活费用和一般物价的上涨。我提出了几项克服通货膨胀和通货收缩两方面影响的具体办法。

事实上，行政方面不是想多采取、而是想少采取政府管制的办法。在10月30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我宣称，我们应当尽快地放弃战时实施的政府管制，而必须恢复我们的自由竞争制度。我明确地指出，代替政府管制物价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商业、劳工、工业、农业各界以及国会和美国公众的全心全意的合作。我们准备遵照一个经过协商的、自觉自愿的方案，来克服通货膨胀，而不愿采取管制的办法。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很大，从当时的严重情况来看，在这一年的冬季和明年春季将会更加严重。

到了12月，解除物价管制的办法显然起不了作用，至少在紧迫情况没有减轻之前起不了作用。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国会决定把第二个战时权力法案延长六个月，但是这种短时间的延长解决不了迫切的需要。我们的经济，无疑地要由于战争带来的匮乏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损害，因此我请求进一步采取立法措施来应付1946年6月30日以后的局面。

尽管我们曾经提出保证说，一切有关方面都协同一致地进行

合作，来保卫反抗通货膨胀的战线，但我还是不得不在我 1946 年 1 月 3 日向全国人民所作的广播谈话中向国会报告，我们并没有履行我们的全部诺言。因此还必须 在 6 月 30 日物价和房租管制办法到期的时候予以延期。在那次广播演说中，我提出了警告：有势力的集团正在国会内外展开活动，它们不断地催促、游说和争辩，要取消物价管制，而不考虑它的后果。

物价管制局局长有时会遇到某种工业在工资和薪金经核准增加以后，便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在物价管制方面作某些调整。由于认识到这一事实，我在 2 月 14 日便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批准这种暂时的调整。我的意思是对各方面都公公道道，发布这道命令的目的是允许生产者在某种情况下提高物价，只要这种提高有道理。这是一种在紧急状态下方许提高物价的办法，而且在提高时，必须获得物价管制局局长、经济稳定局局长以及战时动员和复员局局长的批准。

经济稳定局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本已撤销，但由于经济上的问题日益增多，于是我又恢复了这个战时机构。2 月 25 日，我签署命令，恢复经济稳定局，责成它处理关于政府的工资和物价政策的行政事宜。切斯特·鲍尔斯辞去了物价管制局局长的职务而出任经济稳定局局长，物价管制局局长由保罗·波特尔继任。

特权集团采取阻挠通过立法的策略，继续不让我们自然地恢复物价稳定的局面。我从一开始就洞悉他们的手段和目的，因此一碰到机会就无情地揭露他们。3 月 6 日，我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城对美国基督教会联合理事会发表的演讲中说，“如果不是因为某些利益集团那么热衷于黄金，他们就不会施加那么大的压力，那么起劲地进行院外活动，来使国会允许终止物价管制法，或者降低最低工资，允许经济权力的进一步集中。”这些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但却是事实。

当物价管制法终止日期日益临近的时候，我在4月3日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又一次呼吁尽早延长当时迫切需要的物价管制和物价稳定的法律。我警告说，没有这些法律我们的进展就会陷入经济混乱。但是，国会当时草拟的法案是不起作用的。事实上，这个法案将向通货膨胀敞开大门。尽管如此，众议院还是通过了这个法案，看来，参议院也势必要通过它。

切斯特·鲍尔斯支持我反对这个“修正”了的物价管制法案的立场，他断然认为，新的法案不可能有效地管制物价和房租。6月28日他提出辞呈，辞去经济稳定局局长的职务，辞职的理由之一是“国会将把通货膨胀的法案送到您这里来签字，很明显，我无论如何不可能留在这里来按照这个法案办事。”

我在答复他时，有一段话这样说：“在接受你的辞呈的时候，我想向你，同时也向每一个美国人保证，我们政府决不会放弃这场斗争。我们一定要拿起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武器，继续进行这场制止通货膨胀的斗争，不使我国的生产、繁荣和就业达到永远高度的水平，决不罢休。”

6月29日，我否决了众议院6042号关于修正物价管制法的决议案，并将原来的法律再延长一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实行这个法案，那就不是在物价的继续稳定和通货膨胀之间选择的问题，而是在有法可依的通货膨胀和无法可依的通货膨胀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我反对这个法案的基本原因，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修正条款都将提高主要日用商品的价格。其中危害性最大的是参议员塔夫脱提出的为制造商制定的关于提高物价的修正条款，而且这个条款如果付诸实施，将同参议员惠里提出的为配售人制定的关于订正提高物价修正条款联在一起。在提出虚假的保护的同时，这个法案将容许物价惊人地上升，这样一来，反倒为通货膨胀提供了一个



可靠的方式。

我提醒国会注意，自1945年9月6日以来，我曾經不断地請求延长管制物价的法律，而不要加上掣肘性的修正条款；我現在代表美国人民請求国会通过一項議案，繼續暂时实行当前的管制办法，因为我們必須有这样一个时间来制訂一个切实可行的法案。我还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作了解釋，为什么我认为国会通过的这个法案不完备。并且宣布我已經交給国会一个关于制訂管制物价立法的計劃，而我們认为制訂这样一个立法，将是公平和有效的。我呼吁每一个工商业家、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遵守現有的規定，尽管这些規定在短時間內可能沒有法律上的根据。我也請求物价管制局的每一位工作人員坚守自己的战斗崗位，繼續努力，从使物价管制取得胜利，直到国会通过行得通的法案。

7月1日我必須发布一項行政命令，規定物价管制局繼續拥有某些职权，物价管制局并不因物价管制和物价稳定法案的日期屆滿而終止行使它的权力。这些职权包括在第二个战时权力法案的第三項內，而这个法案依然有效。這項命令并未包括物价和房租在內。

在7月17日我在为麦格劳—希耳出版公司的一些編輯人員和董事們举行的記者招待会上，有人問我，自从7月1日以来物价上漲的指数，是否证实了我在否決議案的演讲中所提出的預測。我說是的，根据《紐約商业杂志》統計的数字，完全正确地证实了我的預測。我还說，除非我們很快通过一个关于物价管制局的法案，否則物价还要上漲。

在劳工統計局給我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了实际发生的情况。由于国会沒有重新恢复物价管制法，物价扶搖直上，結果，在7月的上半月中，物价指数上升了25%。从6月28日以来，物价指数沒有波动的商品仅限于碎鋼片、銅、錫、橡胶、粗麻布和糖。而在这些

商品中，大部分还都是由政府规定了价格的，除这几种商品以外，根据全部列出的二十八种商品价格，其物价指数增加了 35%。

7 月 25 日我签署了物价管制法延期一年的新法案。但是我向国会提交了一个咨文说明我勉强批准了这个法案。尽管这个法案纠正了过份滥用塔夫脱—惠里修正案的一些错误，但是它还是缺少必要的办法来保证物价的稳定。尽管如此，这个法案毕竟比我否决了的那个要好一点。

通货膨胀的威胁不仅是复员期间最大的国内问题之一，而且造成了其他许多使我担心的经济情况。我尤其耽心的是某些商业集团对物价和房租管制的态度在生产和就业方面造成的后果。

我知道，充分就业是我们制止通货膨胀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但是如果制造商和生产者为了获得高价而缩减货物和生产产品（这种情况在战前是不可避免的），那就会使生产速度降低，造成不必要的失业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 1945 年 9 月 6 日致国会的二十一点咨文中，要求制订一项充分就业的立法。我的目的是要在复员期间实行罗斯福总统所制订的经济权力法案。

所谓充分就业，我是指任何准备工作、能够工作和愿意工作的工人都有在和平时获得适当工作的机会。造成工作机会或者使人去工作根本不是充分就业计划的一部分。但我认为政府有责任满怀信心地去鼓励私营企业，其办法是保证将关于充分就业和就业机会的全部事实材料定期收集起来以供大家使用；保证公用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贯性，这样，企业由于了解到政府的意图便能更好地制订计划；保证政府的每一项政策和计划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私营企业的生产和就业；保证在做这些事情时能得到优先权，这样最能鼓励正常就业的机会。

当我第一次提出充分就业的建议时，我思想上认为，如果二十

年代的情况重演的話，我們国家将有二百万到八百万人失业。沒有人确实知道美国在生产和就业方面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我願尽一切努力来制止过去几十年所发生过的那种可怕的失业現象。

充分就业是二十一点中我最希望迫切采取行动的一项，因为战时生产一旦削減，复員工作一旦加快，这个问题是一定要发生的。我催促众議院多数党領袖約翰·麦考馬克赶快通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法案，在我写給他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

“亲爱的約翰：

“我极其迫切地盼望众議院行政部門經費委员会就充分就业的立法問題提出报告。这项立法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具有最为迫切和重要的意义。

“我深信联邦各州人民都支持这样的措施并期望国会采取行动。

“日本投降已有两个半月。我們的和平时期复員生产計劃进行的情况良好。我們的前景是美好的。

“轉向暫时的繁荣是不够的。我們不能再重复上一次战争后所犯的錯誤。这一次我們必須建立在更牢靠的基础上。我們現在应当坚决采取走向充分就业并且能稳定下来的步驟。

“有人說，‘且讓我們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說。’这是一种最不负責任的态度。我們必須向前看。如果我們只是等待大批人长期失业的日子的到来，那就会遭受另一次浩劫。‘預防胜于医治’，就目前这一重大問題來說，這句話是再适合不过了。

“政府是贊成充分就业、尽量增加生产、保持繁荣和反对失业与救济的，現在已經是国会向人民重新提出这一保证的时候了。

“我曾經同大批工人和大批退伍軍人談話。这些男男女女曾經为保卫美国制度而工作，而战斗，他們希望我們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他們能够有机会和有保障地从戰場胜利地走上和平工作

崗位。

“充分就业的立法得到我在行政方面的坚决而完全的支持。参议院已经通过了这样的立法。我深信众议院一定会尽快地设法向美国人民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所提的并不是哪个具体的法案，而是关于充分就业的立法的一般性目的和原则。

“如果众议院行政部門經費委员会能够提出关于这项立法的报告并使国会能在感恩节通过这项立法，那就会使美国千百万家庭都感觉到这个节日的特殊意义，因为对于不景气时代的艰苦日子，这些家庭是记忆犹新的，他们希望再一次获得保证，我们再也不会有另一个 1932 年<sup>①</sup>。

“哈里·杜鲁门

“1945 年 10 月 29 日”

在 11 月 29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能够告诉记者，在绝大部分已停工的战时工厂的复员工作完成以后，总的就业人数已经恢复到“战胜日本日”前的水平。截至目前为止，失业人数已不如预期的那么多，参加非战争生产工作的人数日有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令人满意。复员的男女达三百五十万，98%的战时工厂已经重新改为生产民用物资的工厂。

到 1946 年 1 月，情况更好。虽然也发生了不少罢工和关厂的事件，但已有五千二百万工人从事民用生产工作。估计全部需要就业的人数是五千三百五十万人，看来达到这个目标的日子要比我们预料的快得多。目前还有二百万人失业，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微小的失业者的百分数，即使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失

---

<sup>①</sup> 按 1932 年是战前美国周期性经济大恐慌最严重的一年。——译者

业人数也是可能达到这个百分比的。

真正的問題不是怎样去作到充分就业，而是怎样去維持充分就业。这就是 1946 年的就业法案的目的，我在 2 月 20 日签署了这个法案。

在制訂充分就业法案的过程中，我原来提出的建議修改了不少，但仍保留了我的主要内容。根据这个法案，联邦政府必須負責協調和利用自己的一切計劃、职权和資源，来保持为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包括自行就业)。

这个法案中有一項重要的規定，就是促进行政部門和国会的合作，来制訂政策和执行法案的任务。法案規定成立一个两院联合委员会，由七个参議員和七个众議員組成，負責研究总统提出的关于就业計劃的建議，并向国会提出报告。

这个措施主要是解决失业和經濟蕭条方面的問題的，因此有一項重要的規定，即授权总统在总统办公室設立經濟顧問委员会。这个三人委员会的工作是帮助总统决定政府应当怎样来使全国的經濟机能順利发展和繁荣。这个委员会还有責任协助总统草拟經濟报告，在国会每届正式會議开幕后六天内提出。

还在这个法案通过以前，我就已經同預算局局长討論到关于設立經濟顧問委员会的問題，毫無疑問，这个委员会必須同預算局局长密切合作。可是，一直到 1946 年 7 月，才确定了这个委员会的人选。我任命了約翰·戴維遜·克拉克博士、累昂·凱塞林和埃德溫·訥尔斯为委員，由訥尔斯担任主席。

克拉克博士是由內布拉斯加大学来到白宮的，他原来在該校担任企业管理学院院长。他长期担任过律师的职业，作过印第安納州美孚油公司的副总經理。

累昂·凱塞林是在新政时期涌現出来的人物。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律系，在 1933 年来到华盛顿，最初在美国公断协会担任

律师职务。在任命他担任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的时候，他是全国房屋管理局的总参事。

訥尔斯博士是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副所长，这个研究所是华盛顿极受人推崇的有名的研究机构。从前他在中西部各州教授过好几年經濟学和农业經濟。

这三位都是資望极高的人物。他們彼此間的观点是十分不同的，而在未来的岁月中，也将保持着大相逕庭的意見。关于这一点，我在任命他們的时候就知道。我认为，正因为他們的想法不一样，我在听取他們的意見时，便能适当地加以选择。

按照法案的規定，我在国会每届正式會議開幕时，都向国会提出一份經濟咨文。我們完全認識到，不管是这个法案也好，或者是根据这个法案建立的机构也好，都不会自动地給全国带来充分就业和充分生产，也不会使全国人民完全不受經濟蕭条的影响。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唯有依靠我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同政府合作，共同努力。不过，这个充分就业法案却针对这个全国性政策，給了我們一个明确指示，使我們能达到許多我們所向往的目标。这个法案正确地表达了美国人民的深切願望：不懈地解决大批失业这个长期存在的問題。

財政部部长弗雷德·文森曾經就我签署 1946 年的就业法案提供了一个供我采用的声明，当时我没有采用它，这个声明还保存在我的档案里，其中有一段可以看出我对这个法案所抱的希望和信心：

“当我们浏览历史书籍的时候，我們偶而为这样一个事实所感动：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的某些偶然事件，却对后来一些事情的全部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不揣冒昧地預言，历史总有一天会这样記述关于制訂 1946 年就业法案的事件。”

## 第二十五章

# 罢工与煤荒

在一个自由的經濟制度下，劳工糾紛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爭取調整和提高經濟条件斗争的一部分。劳工糾紛在大战行将結束的几个內发展了起来，并在我任总统的初期突然激烈起来。这是我作为美国总统所面临的国内問題中最困难和曠日持久的問題之一。

我对劳工一向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这从我过去十年間在参議院的投票記錄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后来做了副总统和总统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在战争結束和随之而来的工业复兴时期，劳工必然要面临严重的問題。

由于数百万軍人回到劳工队伍中来，工商业界的工人便面临着疏散人力、减低加班工資、削減战时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竞争的威胁。老工人所享受的资历权利漸漸和回到工作崗位的退伍軍人所享受的权利糾纏不清。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許多爭执发生了。这許多爭执都是关于工資应该相应地随着利潤的提高和战后生活費用的上漲而提高的問題；这些爭执有許多是合法的。

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問題，影响大部分人民。在不抬高物价和刺激通貨膨脹的条件下，我一向是贊成提高工資和增加其他福利的。我設法让工人重新恢复在战时被剝夺了的集体簽訂合同的办法。但是，作为总统，我也有責任注意到公众不受劳資双方或工会之間糾紛的損害。只有在全国的經濟福利与安全明显受到損害时，我才干預这些糾紛。

1945年4月30日，約翰·路易斯在爭取和煤矿主达成一項滿意的合同的努力遭到失敗之后，便命令七万二千名无烟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我不得不首次出面加以干涉，当时我接任總統才十八天。作为三軍最高統帥，我认为基本工业中的任何罢工行动都构成对作战和民族安全的直接威胁。5月3日，我发布了一項行政命令，将有关矿井暂时置于內政部的控制之下。

1945年5月的煤矿工人罢工不过是个开始罢了。虽然路易斯与矿主妥协，达成協議，将无烟煤矿工人每日的工資增加一元三角七分五美金，但是工人还是采取有計劃的罢工来坚持自己的要求，而且还反复断断续續地罢工。到了6月中旬，我們一共損失了一千二百万吨以上的煤。

我非常关心欧洲产煤的情况，6月間，我給丘吉尔首相拍去了一份电报：

“今年冬天欧洲将面临严重的煤荒，这使我深深感到必須命令我們駐德軍事当局尽一切力量增加德国的煤产量，并将德国最低用煤量以外的全部煤产量提供出口。

“从我所收到的全部报告来看，我相信，如果不立即集中力量开采德国的煤藏，那末整个大陆安全所系的西欧的每一地区都将陷于混乱和不安的状态中。

“應該向法国和比利时提出类似的建議，敦促它們在國內采取紧急步驟，增加煤产量。

“因此，我准备向艾森豪威尔將軍发出下列指令。在这个指令发出之前，我願您同意向蒙哥馬利將軍发出类似的指令。

“我正給法国临时政府发出一份类似的照会，其中談到了薩尔地区的煤矿生产問題……

“引文：給駐欧美軍司令的指示

“除非被解放的欧洲在今后几个月可以得到大量的煤，否則就



有发生政治和经济混乱的严重危险，这种混乱将危害盟军的重新部署并妨碍经济稳定的恢复，而经济稳定是巩固的和正义的和平的必要基础。实际上，除了从德国之外，绝大部分欧洲地区无法从其它任何来源得到足够的煤。因此迫切需要使德国能够生产煤以向其它欧洲国家输出，这些国家必须有这些煤以便至少是在最低限度的基础上维持经济生活。

“因此指示你以驻德美军司令官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美国委员的身份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达到下列目标：

“在1945年内使西德的煤产量中至少有一千万吨煤可供出口，在1946年4月底以前再有一千五百万吨煤供出口。……”

“这个需要只应该从属于为了保证占领部队的安全、健康、供养和活动所需的军事和非军事要求以及为了保证在德国的盟国部队的重新部署。……”

“我们认识到，执行有关德国煤的上述政策可能在德国人中间引起大规模的失业、不安和不满，这种情况可能使得有必要采取坚定而有力的行动。为控制局势所需要采取的任何行动将得到充分支持。引文完”

7月27日，我把附有同样指示的下列信件送交给斯大林元帅，希望他对煤荒采取共同的政策：

“致斯大林元帅备忘录

“欧洲今冬有严重缺煤的危险，除非德国能够出口大量的煤。尽管我们自己缺煤、缺乏国内运输工具和远洋船只，我们目前正在把煤运往欧洲，作为使目前的危机有所缓和的紧急措施。但是显然，由于我们以大量的工业和军事资源用于对日作战，我们对欧洲提供的煤的数量将不足以满足欧洲的迫切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应该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增加德国的煤产量，并且使得可以有最大数量的煤出口。

“为了避免拖延，我已指示美军总司令在他的占领区采取必要措施。据我了解，英国和法国政府已经分别向它们在德国的司令官发出类似的指示。附上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示的副本。

“我迫切希望四个占领国遵循有关煤的一项共同政策，因此我已指示艾森豪威尔将军尽早在盟国管制委员会讨论上述指示中提出的政策。我相信苏联政府将不反对同我们一道执行这项政策。我希望它将准备指示它的司令官在苏军在德国占领的地区采取类似的行动，并在管制委员会中着手制订整个德国的煤生产和出口计划。”

两天以后斯大林来了一个复电：

“我已接到您7月27日关于德国煤的备忘录和您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示的副本。

“对于您在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用德国煤满足欧洲的需要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将予以适当的研究，并将把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但是我必须说，应该小心行事以便保证出口煤的措施不会在德国引起您在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示中所提请注意的任何骚乱。我认为，从盟国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是十分可行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

到了1945年秋，美国劳工的情况表现得非常严重。罢工再度在煤矿中蔓延开来，最后二万八千名矿工停止了工作。这次的争执涉及工会要求承认用集体议价代理人来作监工。石油工业和伐木工业中的罢工瘫痪了复兴计划。在底特律地区，劳工纠纷使得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地停止了汽车生产，结果形成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反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这次罢工规模之大在战后还是第一次，牵涉到十七万五千工人和十九个州的工厂。罢工还威胁到钢铁工业和铁路运输业。1945年下半年，罢工蔓延到我国各部门

的数十个較小的工业，有时还鬧得非常凶。

虽然我認識到，这种混乱的状况，大部分是战争經濟轉变为和平經濟时劳动調整的一种表現，但我也清楚地看到，應該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在我出任总统以前很久，我便决定，我国需要制定一个全国性的工資政策、有效的仲裁机构以及保护劳方、資方和公众方面合法利益的其他輔助性的立法。

根据 1943 年的史密斯—康納利法案，我作为总统有权将发生罢工的主要工业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并在若干罢工事件中引用了这个法律。但这并不是完备的立法，因为它沒有規定制止罢工的手段，而且在某些令人瞩目的罢工威胁中还产生了不良的后果。甚至这个法案的倡議人之一弗吉尼亚州的众議員霍华德·史密斯也于 1945 年 10 月間提議取消这个法案。

战后时期的与日俱增的劳工困难是我在 10 月与 11 月間和閣員們开会时反复討論的問題。我决定邀請劳方与資方的領導人在華盛頓开会，拟定一个解决工业危机的新方案。

我向下列一些人发出信件：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威廉·格林，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艾拉·莫希尔，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菲利普·墨萊以及美国商会主席埃里克·約翰斯頓。我指定了三十六名代表劳資双方利益的代表，于 11 月 5 日在劳工部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會議。

我在開幕詞中，要求代表們自己在劳工关系上建立一个明确的政策。我并建議这一政策应以下列四項原則为基础：（一）真正的集体議价；（二）議价失敗时利用公正的机构来决定；（三）用和平协商办法議訂合同，并用和平办法調解在这些協議下所引起的爭端；（四）以适当方式代替工会間所管轄的罢工。

我強調指出，这并不是一个政府會議，而是由劳資双方自己的領導人所选择的代表會議，并提出警告說，如果不能提出避免罢工

的任何实际可行的建議，那末国会就要制定这方面的法律。

經過三个星期的仔細討論，會議沒有作出任何建議便休会了，于是我在12月3日向国会要求立即通过立法。我推荐的計劃要求建立事实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将按规定对每一个糾紛中所涉及一切事实进行彻底調查。这些委員會将有权調閱它們认为与案件有关的一切記錄。在事实調查委員會成立并进行調查期間，需要有三十天的“冷却”时期，在这个时期內，罢工将是非法的。

为了及时解决汽車业、石油业和肉类罐頭业中的罢工，同时为了在国会通过这样的法案之前应付險恶的鋼铁业罢工，我使用行政命令建立了这种事实調查委員會。虽然这些委員會并不享有我希望国会迅速授予的法定权力，但是我认为，美国人民盼望雇主和工人的一切糾紛都与这些委員會密切合作，正如同相应的立法已經通过了一样。

工会，特别是联合矿工工会，对这个計劃产生了强烈的反应，认为它是对罢工权利的一种限制，而且是强制性的仲裁。当然，这两者都談不上。它只是一种用和平办法調解劳資双方糾紛的試图，以消除对公众和对长期罢工中的国民經济的有害影响。在我提出这个建議时，美国有二十六万五千名工人沒有工作，显然就必须采取这种行动。此外，事实調查委員會在把真相报告給公众后所产生的效果已多次得到证明。在1946年1月和2月的鋼铁工人罢工中，調查委員會的建議虽然沒有得到尊重，但是它的調查結果却成了解决爭端的手段。紧接着鋼铁工人的協議之后，联合汽車工人工会反对通用汽車公司的为期一百一十三天的大罢工，不需要在白宫开会便結束了。

然而，事情很明显，要执行事实調查委員會的建議和在調解期間禁止罢工，就需要有法定的权力。我在致国会的几次咨文中，都曾要求迅速通过这样的法案。可是相反地，国会却趋向于采取严

厉的、限制性的反劳工措施，这是有害而无益的。

1946年春天，劳工中的两次大危机发展起来了，它们对公众所造成的直接影响，超过了以前历次纠纷。其中的一次危机曾席卷了铁路工业，另一次则席卷了煤矿工业。1946年5月23日，铁路工会对横贯美国的大多数铁路干线的三十万工会会员发出了罢工的号召。早在2月间，我便与有关的二十个工会进行过协商，目的是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发生铁路罢工，当事情已经十分明显，铁路的资方和工会的代表不可能取得协议时，我便给有关方面提出了一项妥协性的建议。

与这次纠纷有关的十八个工会接受了我提出的解决方案，资方也接受了。这一个建议是每小时增加工资一角八分五，另外是在仲裁和紧急委员会的规定中作某些修改。可是，机车司机兄弟工会主席阿凡莱·约翰斯顿和铁路乘务员兄弟工会主席阿·惠特尼两人拒绝接受我的妥协性建议，拒绝我裁断他们工会的事情。

我在白宫里与这两个人谈了三次，他们不愿意在其他十八个工会代表面前会见资方代表，我发现这不是劳资双方的争执问题，而是一小撮人与政府之间的争执问题。约翰斯顿和惠特尼说，不管我对他们提出什么请求，他们还是决定要罢工。

“你们不是在破坏美国的铁路交通吗，”我对他们说，“假如你们要这样办，那我们就要制止你们。”

5月24日，即开始罢工的第二天，我便在一个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向美国人民广播，陈述了这件事的经过。我宣布说，除非铁路立即恢复工作，否则我就要动员军队来帮助国防运输署开火车，我又说，明天我将为此向国会提出一项咨文。

在5月25日国会联席会议上，我要求通过强有力的紧急法案，这项法案将授权制定强制性的法律程序，禁止任何工会领袖鼓励或煽动工会会员离开他们的岗位或拒绝恢复工作；这项法案将剥

夺那些没有充分理由便坚持用罢工来反对政府的工人的资历权利，并将对那些违反法案的雇主和工会领袖给予刑事处罚；它还将授权总统，将一切进行罢工反对政府的工人征募入伍。

这些都是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与我所追求的原则是相违背的，我是在最紧急的状态下，把这些措施当作最后手段而提出的。在这种状态下，工会领袖公然大胆号召工人进行反对政府的罢工。

我致国会的咨文只读了一半，就被参议院秘书长莱斯利·皮弗耳所打断，他递给我一个条子，说铁路罢工已经根据妥协性的建议解决了，这个建议就是那以前被各工会接受、只有上述两个工会拒绝的建议。

我感到放心，并对铁路罢工这样快结束而感到高兴。尤其感到快慰的是，这次罢工是根据全国铁路劳工法案解决的。根据这个法案，可以强迫实施紧急委员会的建议，我给双方所提出的妥协性仲裁意见就是以这些建议为基础的。

我一开始便知道与铁路工会打交道是困难的，因为其中有些工会企图破坏铁路劳工法。这就是我认为有理由要求通过紧急罢工法案的另一个原因。俄勒冈州参议员魏恩·莫尔斯这时声称，我在事先就把整个事情安排妥当了，他在参议院中控告我越俎代庖。不过，后来当他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他道歉说他的话说错了，并要求将他的道歉刊印在国会记录上。我一向非常尊敬魏恩·莫尔斯，他这种直率的行为使我更加敬重他。

与此同时，在煤矿方面，约翰·路易斯再一次进行签订一项新合同的谈判，这次是为烟煤矿工签订的。早在1946年3月，路易斯和资方之间的谈判就表明，达成协议的希望很渺茫。路易斯要求一项由煤矿租用费内拨出的福利基金，并由他一人来控制这笔基金。在矿工头子这方面来说，这是争取更多的权力的新尝试；这次矿工并没有要求增加工资。协商失败后，路易斯便于4月1日

命令四十万矿工离开烟煤矿場。美国再度面临紧急局势。

从3月到5月这段期間，我六次把路易斯召进白宮，同时也把資方的代表查尔斯·奥尼尔一同請来，力图把他們双方拉在一起。在5月10日的內閣會議上，我說路易斯已答应罢工在几天內結束。但是路易斯沒有履行諾言。我对閣員們說，諷刺的是，路易斯十年来一貫反对把安全当作重点訂在工会合同內，而現在却把安全与福利当作煤矿罢工的基本問題。

煤矿罢工又一次表明极其需要通过立法来制止突如其来的罢工，以保卫国家。但我也担心在这样的立法里有考虑欠妥的反对劳工的惩罚性的措施。为了这个緣故，早在六个月之前我便建議成立事实調查委员会来作为一种合法的工具有。国会沒有照我的建議做。国会所通过的是“訴訟法案”，这项法案于6月11日交給我批准。我仔細地研究了这个法案，认为該法案对制止罢工沒有什么帮助。因此便否决了它。我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一）它将促使发生短时间的罢工；（二）它将一个五人委员会加在“調解处”之上，而“調解处”自1913年以来在解决罢工問題上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复員时期一天曾解决十次罢工；（三）法案所規定的一条調解条款我觉得过分带有惩罚性，不能鼓励調解；（四）法案中关于“冷却”时期的新規定是我送交国会的拟議中的立法的若干要点之一；（五）該法案剝夺了劳工部长管理調解委员会的全部职责，而留給总统的也只是委派委员的权力。

我在我的提出否决意見的咨文中說，我提交国会的那些建議对解决罢工問題是一个較有效的办法，我的否决得到了国会的支持。

在1946年的这次烟煤矿工罢工期間，矿井关闭了四十五天，損失了九千万吨煤。在这个紧要关头，政府插手进去，在5月間接管了开采工作。然而，我們还是繼續和路易斯进行談判，直到我們在

共同管理福利基金以及其他一些爭論的問題上達成協議。

五個月時間過去了，並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事件，而這時，路易斯開始在他所簽訂的合同上挑毛病。他要求重新談判協定，並暗示說，如果談判遭到拒絕，礦工將再度罷工。

11月14日，政府給路易斯送去一个书面建議，其中包括一項計劃的詳細內容，根据这个建議，礦主与礦工能够協商他們之間的分歧而又不中斷煤礦的開采。我认为，聯邦政府不能代替私人企业管理方面作議价代理人，因为这样做会干涉勞資双方之間的真正的集体議价。

政府于5月間接管了烟煤礦，這只是在事情已非常明显，只有政府接管才是使我国免于經濟災難的唯一可行的手段，政府才这样做的。我迫切地希望煤礦尽快交回給私人去經營，而礦主也說，他們迫切地希望重新控制自己的財產。然而，路易斯却坚持要簽訂新合同，并鼓勵礦工們放下他們的工具。11月20日，我国再一次陷入烟煤礦總罷工的状态，这一次罷工是反对美国政府。

我指示司法部設法頒布一項臨時性的禁令，來制止路易斯这种号召罷工的行動。聯邦法官艾倫·戈耳茨伯勒對聯合礦工工会的領袖發出一項禁令，命令他取消关于停止履行合同的通告，路易斯拒絕遵守这个禁令，于是戈耳茨伯勒法官把路易斯傳去，要他說明不服从法院禁令的理由。12月4日，路易斯被判处藐視法院的民事和刑事罪。他個人的罰金是一萬美元，聯合礦工工会的罰金总数則是三百五十萬美元。在路易斯以他平生付出代價最高所号召的一次罷工之后的第十七天，他便命令礦工們恢復工作。

不滿的情緒日趨高漲，勞工的隊伍中表現特別明顯。下面是拍給白宮的許多封電報中的一封。這是鐵路工会一个分会于1946年12月8日拍來的：

“尽管美国官方今天对美国公民回到矿井中工作会一时感到



多么高兴，但在他们冷静地考虑和适当地权衡事实的时候，他们的一时高兴一定会烟消云散的；事实是政府在劳工纠纷中，采用了恶毒的和非法的禁令才取得这样结果的。全国劳动人民对他们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只有感到激怒，而这种权利的侵犯体现在联合矿工工会的案件上，它是最近出自政府并经最高法院批准的。

“最高法院的寡头利用反劳工的禁令作为压迫劳工的武器，早在十四年以前就被国会申责，并宣布无效了。直到最近采用这个禁令时，法律的精神和意志大体上是受到尊敬的。在劳工纠纷中采用禁令不仅是藐视国会法令，而且也破坏了宪法中对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保障，违背了宪法中禁止违反本意的奴役的规定。但是，更不可忽视的是，政府所发起的对煤矿工人强制实施的经济奴役，竟得到报纸和电台的捧场，这对反动资本主义目前正在孵育的提案起了催生的作用，这个提案的目的在剥夺劳工多年来经过艰苦斗争所获得的成果，并把野蛮的和严厉的限制强加在我国人民的头上。

“美国机车司炉与司机兄弟工会争取改善一般待遇委员会的联合会，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开会；我们代表工会会员，一致谴责政府和雇主在劳工纠纷中采用禁令的手段，我们认为这是非美国的和非法的；我们斥责任何制止美国劳动人民自由运用宪法特权的提案，不管这种提案是通过法院还是通过议会都是一样。

“主席，D·B·罗伯逊”

下面就是我在12月11日作的答复：

“亲爱的罗伯逊先生：

“美国总统府里并没有欢乐声，说得恰当点，倒是充满了忧郁的情绪。不过，对于路易斯先生企图反抗政府的态度，所有的劳工领袖倒是都应该感到羞愧。他的行径与去年秋天惠特尼和约翰斯顿的行径同出一辙，对劳工没有什么好处。

“路易斯所簽訂的合同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合同。我强迫他接受了那个合同中的安全措施，这是他过去始終沒有爭取过的。他知道（他屬下的工会會員也知道），和煤炭管理局长所訂的合同是为了政府代行采煤而訂立的。他企图玩弄卑鄙的政治手法，但結果反而損害了他自己；他所得到的只是让一般劳工吃了一次大亏，在新的共和党国会中，这种做法对劳工也是沒有好处的。

“我們运用了手边的武器来打击反对政府的叛变，我要在这里告訴你，当法律和政府遭到像路易斯这样专橫的独裁者的藐視时，我便要运用总统和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权力来对付他。

“铁路工会中的十八位領袖一直是我的朋友，我也一直是他們的朋友，正如同在我全部的政治生涯中我一直是劳工的朋友一样，但是在这个我們正在过渡的險恶的复員时期，有一部分工人就决不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

“我想，你在法院程序这个問題上采取了絕對錯誤的观点，这种法律程序对于路易斯先生來說是完全必要的。看到你有这种观点，我感到很遺憾。

“我需要我所能获得的一切帮助和合作，以免劳工在本届国会中遭到失敗。当默里、格林和像你这样的英明的領袖寬恕路易斯的行动时，你們既不是帮助我，也不是帮助国会。

“哈里·杜魯門謹啟”

路易斯威胁政府的企图是失敗了。我认为，这是联合矿工工会的領袖对政府当局的一次挑战。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来看，路易斯所运用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获得成功的。由于他剛好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前五天号召罢工，他对他所殷切盼望的国会改組可能作出了一些貢獻。但是，路易斯很快地便認識到，他不但沒有帮助选出一个同情他的国会，反而在第八十届国会中遇到了一个由反动分子控制的集团，这届国会很快地便通过矿工領袖所坚决反

对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事实证明，他在 1946 年所取得的政治上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

紧接着 1946 年的铁路与煤矿工人罢工之后，劳资之间继续发生纠纷，其中著名的要算海员工会和电话工人的罢工，但是，在 1946 年的最后几个月和 1947 年上半年这一期间，主要的纠纷一般地却在日趋缓和。

## 第二十六章

# 复 員

美国人痛恨战争。但是当他們一旦被激怒，要起而保卫自己，反对那些威胁他們安全的人的时候，他們便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和力量动员起来。在战场上，他們是不惜牺牲一切人力物力的。

一旦敌对行动结束，美国人便同样自动地迫切要求赶快恢复平民生活。历史上沒有那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解除武装上有他們那样快。

这种迫不及待的情緒是根深蒂固的盼望过和平生活的民族思想的表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可悲的經驗告訴我們，这种令人羡慕的特性会招致大灾难。我們需要放慢与調整我們军队复員工作的速度，以便能够担負我們对世界的新义务。

欧洲的战争刚刚结束，要求军队复員的压力便开始形成了。随着太平洋敌对行动的结束，公众要求数百万军队复員的愿望也变得强烈了。

紧接着欧洲胜利日之后，便很快实行决定复員合格标准的“积点”制，这种制度以服务年限、战斗任务、在海外时间以及父母情况作为决定的根据。日本投降前夕，馬歇尔將軍給我送来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这个问题，还述及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馬歇尔指出，陆军部面临着那些服务年限最长和战斗任务最艰巨的士兵的士气问题，因此，他們应该首先复員并优先享有获得和平工作的机会。如果实行这种政策，那末許多已經从欧洲回国的“积点少”的部队就必须派往太平洋。为了滿足麦克阿瑟將軍增

加占領軍的要求，我們必須這樣辦。

無論如何，馬歇爾對我說，許多積點少的部隊必須在事態演變未決之前作為後備隊再服役一個時期，其他一些積點少的已經回到美國的軍人將接替陸軍管理機構中的位置，以便讓那些仍舊留在那裡服役的積點多的軍人復員。

陸軍方面的計劃是立即停止將歐洲的積點少的部隊調回國。相反地，歐洲的積點多的部隊將遣送回國復員。馬歇爾報告說，如果實行這個計劃，就歐洲方面的軍人來說，批評復員政策就失去了理由了。雖然太平洋戰場仍有艱巨的作戰任務要去完成，那個地方的積點多的軍人將繼續調遣回國，而根據需要派積點少的換防部隊去接替他們。這樣，那些在太平洋戰場作戰很久的士兵便與在歐洲作戰的士兵享有同樣的復員機會。

儘管如此，批評還是來了。8月23日（日本投降才九天），我便在記者招待會上乘機指出，各方面對復員計劃已經議論紛紛了。我解釋說，我已和陸海軍的兩位部長，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和海軍作戰部長金海軍上將商談過，我深信，他們正在盡一切可能加速進行這項工作。

在8月31日的內閣會議上，我請陸軍部副部長派特遜陳述他對從國外戰場調回軍隊的看法。他說，一切有利於儘快把部隊調回國的工作都在進行中。他說，陸軍當局計劃在1946年7月1日以前調五百五十萬人回國。海軍部副部長蓋茨在同一次會議上報告說，海軍方面在計劃實施之後，將以每月二十六萬人的速度進行復員工作。

然而，要求更快地進行復員工作的呼聲仍然在增高。9月18日，我發表聲明，向美國人民保證說，從世界各個戰場調軍人復員回家的工作在環境許可的條件下，正以最快的速度進行。日本投降後還不到一個月，陸軍中每天復員的人數已從四千二百人增加到

一万五千二百人以上。我們的士兵正以每小时超过六百五十人的速度恢复和平生活。我宣布說，这种速度将不断地增加，到1946年1月，每天的复員人数将在二万五千人以上。

只有那些有机会了解全面調遣工作的人，才能理解政府在几个月的時間內在复員和調遣将近一千二百万軍队方面所承担的任务是多么艰巨。我們自己的复員人数本来就很惊人了，在考虑到这許多人需用的船只、火車以及在复員中要动用大量人員来进行这一工作的同时，还有义务要考虑盟国复員的需要，特别是英国，这就使問題更加复杂了。

自大战初期以来，我們一直在充分利用英国的三艘最大的船——《瑪丽女王号》、《伊丽莎白女王号》和《阿奎坦尼亚号》——在各个战区之間运送美国軍队。可是，到了1945年10月，英国政府要求归还这三艘船，或給以相等的美國运输工具。艾德礼首相要我考虑下列的事实，他們許多士兵远离家乡，服役五年或五年以上，現在敌对行动既已結束，要求讓他們早日复員回家的呼声已愈来愈高和愈来愈坚决了。首相还提醒我說，他們借給我們这两艘女王号和《阿奎坦尼亚号》，仅仅限于运送軍队去应付对日作战的紧急需要。艾德礼指出，由于对日战争出人意料之外地提早結束，借用船只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

英国完全了解美国人民欢迎他們在欧洲作战的士兵和飛行員回国的願望。然而，艾德礼說，他們的紧急需要迫使他們向我們提出要求，从美国控制下的船舰中供給与两艘女王号和《阿奎坦尼亚号》同等艙位容量的“載送人員的艙位”，以供印度、澳大利亚和联合王国間的应用。

我們的參謀长們告訴英国人說，他們感到很遺憾，“由于必須从欧洲尽快地把美国軍队运送回来，这就需要現行协定中所排定的一切艙位，直到1945年12月为止，因此，在1945年年底以前，

在美国控制下的船舰中，他們无法提供这种帮助”。但另一方面，艾德礼的电报却使我深受感动。他在电报的結尾中說，“我非常坦率地說”，“我們許多在海外的士兵远离自己的家园，在海外作战几乎有六年之久，他們正在等待遣返，我无法繼續向英国公众說明美国占用我們三艘最大的船只的理由。我实在不願意提出归还两艘女王号和《阿奎坦尼亚号》的意見。然而，我必須以最大的誠意請求您，总统先生，在不久的将来給予我們与这三艘船只相等的艙位。”

毫無疑問，艾德礼是对的，我打电报給他說，

“我已指示參謀长联席會議將两只女王号和《阿奎坦尼亚号》归还給你們，或提供相等的运送人員的艙位，詳細計劃有待与你們駐此間的參謀代表共同拟定。”

在10月26日的內閣會議上，我們檢查了自己的复員計劃的进程。海軍部部长福萊斯特尔和陸軍部部长派特遜概述了这个計劃，并提出警告說，加速实行这个計劃勢必要損害我們在战后緊張局势中所处的战略地位，这种局势正在世界各地逐漸形成。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并在那次會議上說，就我个人来看，我們所实行的計劃已不再是复員計劃，而是在瓦解我們的軍隊。

尽管执行复員計劃的速度已达到危險的程度，公众对我和軍隊首腦所施加的压力还是有增无減，他們要求实行更快的复員。我接到許多来自父母亲和各种团体的信件，呼吁遣返各种团体的人員。国会議員們提醒我說，他們的选民們給他們的电报和信件如雪片飞来。1946年1月8日，我发表了一项声明，我說，我体会到許多家庭的焦急与不安，但是，让每个服役人員都立即复員回家这是不可能的。我指出，自欧洲战事結束以来，陸軍方面已复員了四百七十五万男女軍职人員。在最高人数达到三百五十万的海軍中，差不多已有一百二十五万人恢复了平民生活。在战争結束时，总人数接近四十六万的海軍陆战队中，已复員十八万三千人以上。在

十八万海岸警备队人員中就有七万四千人复員。

对于那些仍在等待儿子的父母和那些热切地盼望見到丈夫和父亲的妻子和孩子們，我是寄以同情的。我也知道，許多年青人渴望繼續受教育或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上去。但是，作为美国的总統，我的最高职责是整个国家的安全与幸福。作为一个占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我們有义务为世界的未来和平建立一个巩固的基础。美国的未来正如同在战争时期一样，是处在危險之中的。

1946年4月17日，在白宫里举行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我促請大家注意陸軍复員人数已接近七百万的事实。我把它叫做“世界历史上最惊人的复員，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称之为‘解体’”。

事实上，我們所进行的瘋狂性的复員是出于我們反对維持大量的常备軍的願望的。在我看来，代替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有一支訓練有素的民兵队伍。我持有这种主張已有三十年之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就有这样想法。自1945年开始做总統起，我便公开地贊成青少年受軍事訓練的計劃。在8月16日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有人問我是否会提出和平时期征兵的議案。我回答說，我将請求国会通过一項普遍訓練美国青年的計劃。

在8月31日的一次內閣會議上，我提出了一項包括实行普遍軍訓的国家軍事安全的初步詳細計劃。我請每个閣員提出他們的看法与意見，他們的一般反响是贊同这个計劃的。我一向认为軍事上的准备对国家安全是十分必要的。华盛頓总統制定了美国的第一个軍事政策，当时他提出了一个普遍征兵的計劃，作为保卫共和国反抗侵略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軍事保障。直到1917年威尔逊总統批准了第一个强迫征兵計劃，华盛頓的政策才算付諸实施。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的我国另一次危机中，由于缺乏坚定的軍事政策，結果便酿成可耻的征兵騷动和暴乱，以及出現向个别出得起必需款項的人出卖兵役豁免权的腐敗勾当。



我对閣員們說，制定一个新的軍事政策的时候已經来到了。如果我們打算在其他国家中保持领导地位，我們就必須繼續保持强大的軍事。

在1945年9月6日的关于国内立法的二十一点咨文中，我通知国会說，我将很快地送交关于国家軍事安全的长期計劃。10月22日，我将有关这个計劃的一个方面的建議——实行普遍軍訓——送交国会。簡單說来，我所建議的是一个在和平时期实行普遍軍訓的制度，这个制度能在国会认为危急时期为我国准备一支訓練有素和組織严密的公民后备队，来增援专职軍隊。我指出，我国未受訓練的公民的潜在力量已不再是一支足够的保卫力量，如果再受到像珍珠港那样的襲击，我們决不可能再指望有充分时间来武装自己，并进行回击。我們地理上的安全已一去不复返了，它已随原子彈、火箭和現代空降部队的出現而一去不复返了。

我建議，我們建立一个包括三种基本成份的战后軍事組織：（一）一支在数量上比較少的陸軍、海軍和海軍陆战队；（二）一支大大加强了陸軍、海軍和海軍陆战队的国民警卫队和有組織的后备队；和（三）一支包括所有的受过訓練的美国男性公民的普通后备队。采用一个实行普遍軍訓計劃就会产生出这支普通后备队，但是，除非經国会的法案征召他們入伍，他們並沒有在国内服役的义务。

这个計劃是非常民主的，并不是要用它来代替“選擇兵役制”。按照这个計劃受訓的青年并不就是軍隊的成員，而只是在紧急时期为了加强正規和后备軍可以动員入伍的公民。我建議，除完全殘廢者以外，所有十八岁的青年一律受訓一年。受过一年訓練后，受訓者将成为为期六年的普通后备队隊員，六年之后則編为第二后备队。

这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軍事訓練計劃。軍事方面的意义在

我的想法中是次要的。这种训练能够给每个合格的青年人一个机会去锻炼为祖国服务的某些军事能力,但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个计划也同时为自我进修提供了充分的机会。训练中的一部分时间计划用来提高在和平生活中用得上的技术,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减低文盲率,提高公民责任感,和培养我国青年人的道德和精神修养。

这些并不是理论上的目标。这是一个普遍训练的计划和不是一个军事计划,这就是我心目中所想像到的特殊的地方。这个计划在教育和特殊训练上的益处就是立即通过立法,建立普遍训练计划的强有力的论据。但是我所建议的计划的主要理由,还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安全与自由,反对任何可能的侵略者。

我敢肯定,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训练美国青年的计划,我们就不会因身体上的缺陷而挑出34%的青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些应征的和志愿入伍的青年中就有这样一个身体有缺陷的数目。

我确信,给以正确的训练,这34%的青年中有一大部分人能够把身体锻炼好,并且能够独立生活。同时,在这个计划之下,我们能够教导青年懂得公民权利,和帮助他们了解如何与他们的同胞共同生活。

我的确相信,如果国会在1945年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时,就全部采纳了这个计划,那么,我们就会有一大批基本上受过训练的人员,而使苏联在世界某些战略地区,实行扩张计划时,就不能不有所考虑。

住宅问题是我必须加以处理的战后迫切问题之一。由于严重的房荒,1945年秋,就有一百万以上的家庭拥挤地和其他家庭住在一起。这种房荒现象是在好几年的时期内形成的。战争初期,我们就缺乏住宅,战争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同时,修建材料与人力根本没有用在住宅建设上,而是用在全力以赴的战争上,结婚的人

数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比率。战争总是刺激人们结婚，同时由于成百万退伍军人回国，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增加的结婚数目，因而对新房屋的迫切需要就远远超过工业建设的能力。

10月，我指令联邦公用房屋局腾出三十二万所临时住宅出卖，这些房子是政府在已经关闭了的战时工厂附近建造起来的，此外还出售三万五千所可由汽车拖动的活动住宅。这些房屋的卖价没有超过拆毁费用，帮助解决一些紧急需要，当然，对缓和总的房荒所起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经过几年的大量生产。让建筑业全部开工是需要相当时日的，我认为，如果1946年能建造好五十万所以上住宅，那就算很不错了。退伍军人可以优先得到一切联邦政府的住宅，但是要一时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者解决数百万战时工人和其他过着低级水平或条件不好的人们的住房问题，还是不可能的。

1945年12月，我要求战时动员和复员局就住房情况作出报告，并就实施中的解决办法提出一个扼要说明。战时动员和复员局局长约翰·斯奈德报告说，他的机关正根据一个六点计划采取坚决行动。这六项目标是：（一）增加建筑材料的供应；（二）加强存货控制，以防屯积居奇；（三）加强对建筑材料物价的控制；（四）阻止不合理的出租营业和投机；（五）利用工业界的支持增加生产，防止通货膨胀；（六）向公众提供关于房屋价值的消息和咨询业务。

根据这个计划，各执行机构便联合它们的力量来应付这个紧急情况。提高物价、由美国就业服务处招募专门人材以及优先享有和分配机器和材料，都需要在更多的生产的情况下予以批准了。1945年，住宅建筑费从6月份（在正常情况下，是建筑费用最高的月份）的五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12月份的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不过，与我国的住宅需要相比，这个水平还是非常低的。

联邦政府在12月间和工业及社会团体举行一系列的会议，以

便在合作的基础上大力解决这个问题。此外还和住宅贷款机构、地产经营机构和消费团体等举行了其他一些会议。全国房屋管理局局长希望所有发生严重房荒的城市的市长设立紧急住宅问题委员会，以便和联邦政府合作来紧急处理各该区的住宅问题。

除此之外，我还鼓励将政府控制的剩余的房屋和建筑材料迅速出售，退伍军人对此享有优先权。我也赞成制订一个对建筑材料享有优先权的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建筑价值一万美元或少于一万美元的住房得优先享用全部建筑材料的50%左右。由于看到房屋涨价的威胁是我国经济上的最大灾难，于是我便要求对新旧房屋实行限价，制止不合理的出租营业，并对租金加以控制。

为了执行这些政策，我任命路易斯维尔市的前任市长威尔逊·怀阿特出任战时动员和复员局的房屋督察长这个新职位。责令怀阿特负责调配和加速房屋计划的执行，并在必要时提出新措施来解决新问题。我希望他找出各级企业或政府机构中可能隐藏的一切妨害大量生产的分子，击败他们，以便使房屋建筑机构能顺利地、尽快地进行生产。

我在1946年1月3日对全国人民的讲话中，回顾了住宅情况，当时我说，“在构成生活水平的三个要素——衣、食、住——中，住房问题是我们最感棘手的问题。”我在国会里说过，我们眼前需要五百万所新住宅，虽然大战前一年之中所建造的住宅数目最高还不到一百万所。我对国会说，事情很明显，这是个紧急的问题，它需要用紧急的措施来解决。五星期以后，我向国会提出了一个退伍军人紧急住房计划，要求立即制定法案来执行这个计划。

在这期间，房荒问题变得十分严重，特别是考虑到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建造新建筑物，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感到，要得到足够的住房仍是不可能的。我感到缓和房荒的每一个努力都是有价值的，因而便与基督教、天主教和犹

太教的代表討論這件事，并建議發動一個全國性的在國內教會內進行的“租讓房屋”運動。

5月22日，兩年內為退伍軍人建造二百七十萬所住宅的緊急住宅法案終於變成了法律。眾議員賴特·派特曼所提出的原議案在以修正通過的形式送交我簽署之前，曾在國會兩院遭到抨擊，可是，它仍不失為專門制定來應付房荒的頭一個有效的立法。這項計劃的中心是撥款四億美元作為補助費，來加速缺貨的材料的生产。這個法案也使政府對私人資本的房屋建築貸款的保證金額增加到一百萬美元<sup>①</sup>，從而保障貸方接受小額現款出售房子的風險。

這僅是一個緊急立法，它的規定並不打算解決長期的住房需要。國會正在制訂一個在十年期間內完成一千五百萬幢住宅建築的長期性的法律。這便是華格納—埃倫德—塔夫脫法案，這個法案規定政府貸款給收入少的房屋建築者、清除貧民窟以及其他誘導建築廉價房屋的計劃。我敦促眾議院銀行與通貨委員會主席眾議員布倫特·斯賓斯迅速採取行動，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儘管我提出了警告，儘管斯賓斯不倦地努力，國會拖了好幾個月仍沒有採取斷然的行動。到了10月間，美國面臨史無前例的緊急狀態。

房屋督察長懷阿特所擬定的1946年的新建房屋最低目標是一百二十萬所，這大多數是為退伍軍人建築的。10月間，他報告說，七十萬零八千所已動工，三十五萬所已完成。懷阿特為完成這個建築計劃，出了極大的力氣，但是仍有許多困難必須克服。

加速建造房屋的主要絆腳石是國會沒有通過授權的立法。國會在5月批准緊急住宅法案之前曾從該法案中削減了二億美元的補助金。它沒有及時通過華格納—埃倫德—塔夫脫法案，提供造

---

<sup>①</sup> 按這裡的一百萬美元可能是一億美元之誤。——譯者

价低廉的房屋。它拒绝批准对现有住房的限价，并让物价管理局按预定期限撤销。另外一些简直无法克服的困难是缺乏材料，罢工以及在华盛顿国会外大肆活动的地产、木材、包工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

由于房荒，我不得不在10月25日宣布紧急状态的存在，并批准木材自由输入美国。

## 第二十七章

### 日益增长的东西方分歧

对战争的忧虑使人们产生一些天真的想法。以为战争一旦结束，和平与友好立即就会来临，而且不需要费多大的力气。对世界各地的人民来讲，有这种想法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维护和平是一项艰巨的事业，需要经常保持警惕和努力，防止利益矛盾的双方不致破坏和平。

在大战期间，同盟国间的许多分歧都被放在次要地位，但是现在，共同的敌人被击败了，有关和平的各种问题把这些分歧都推到桌面上来了。我们早已发觉，俄国人是多么难对付，然而在战后的头几个月中，这种情况就更进一步显露出来了。

1945年9月，国务卿贝尔纳斯赴伦敦出席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召开的外长会议的首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莫洛托夫表明比以前任何时期更难对付。9月22日，即会议开幕后的第十一天，贝尔纳斯感到不得不要求我亲自同斯大林交涉，以防止会议的破裂。

当我从《威廉斯堡号》舰上的电报室接到李海海军上将的电报时，我正在切萨皮克湾的杰斐逊岛上度短暂的周末。李海海军上将刚刚通过打字电报机同在伦敦的国务卿贝尔纳斯进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国务卿报告说，在会议的第一天，大家一致同意：法国和中国将参加会议的讨论，但是在同它们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则无表决权。然而，现在莫洛托夫却又宣称，除非把法国和中国排斥在同它们没有作为停战协定签字国的一切直接有关的问题之外，他将不再出席会议。贝尔纳斯认为，这仅仅是莫洛托夫退出会

議的一个借口，事实是，由于美国和英国不承认羅馬尼亚，他感到憤怒。貝尔納斯建議我立即打电报給斯大林，要求他通知莫洛托夫，不要使外长會議破裂。由于貝尔納斯和李海通过电报打字机举行会談时，我正在赴《威廉斯堡号》舰的途中，他們认为局势不能等待到我到达舰上，于是他們便采取了估計我会批准的非常措施，同意用我的名义給斯大林发一封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我得悉，在就法国和中国参加討論巴尔干局势問題达成協議方面遭到了困难，莫洛托夫先生正在考虑退出倫敦的外长會議。

“我迫切要求您同莫洛托夫先生联系，对他說由于这种做法会对世界和平产生不利影响，他不应当让會議垮台。

“杜魯門”

在我到达《威廉斯堡号》舰上时，我立即知道了貝尔納斯和李海的这一行动，我通知李海說，我同意給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与此同时，李海又用打字电报机同倫敦会談，在会談中，貝尔納斯建議再給斯大林发一封专电。下面就是第二封电报的全文：

“国务卿已把外长會議碰到的困难詳細地告訴了我。

“我同意，按照对波茨坦协定的措詞的严格解釋，法国和中国无权参加研究和約的會議，除非它們是投降条款的签署国，或者除非根据波茨坦协定的第三节（2）款邀請它們参加。这一款規定，在討論与签字国以外的會議成員国直接有關的問題时，可以通过協議邀請它們参加。

“我記得，在波茨坦的會議桌上，在討論期間商定，非签字国的成員可以出席并参加討論，但是不能表決。看来在外长會議开會的第一天就一致商定，非签字国的成員可以参加討論，但是不能表



决。如果我们现在改变这项规定，以法、中两国不是投降书的签字国为由而不给它们参加讨论据它们声称与它们有关的事项的权利，那末我担心这会引起不好的印象。人们将指责说，三大国甚至不给予会议的其他成员提出它们的看法的机会。

“难道我们不能同意把外长会议在开幕日采取的一致行动视为是根据对波茨坦协定对法、中两国发出的参加会议的邀请吗？这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不应妨碍会议的工作和拖延在和平和更好的谅解方面的进展。

### “杜鲁门”

我在批准这封电报时，指示李海将这两封电报的原文立即发给艾德礼首相。就在那天下午我收到艾德礼致斯大林电文的副本。这封电报比我的电报更详细，一一叙述了所发生的困难，最后还对俄国的领袖作出这样的呼吁：

“……我诚恳地希望，您会同意授权您的代表团遵守9月11日通过的决定。归根结蒂，我们所努力建设的是和平，而它比程序问题更为重要。”

斯大林复了两封电报。在第一封里，他说，他已向莫洛托夫提出询问，正在等候答复中，但是从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中可以明白看出，他不会作任何让步。斯大林在第二天拍来第二封电报，这是他得到莫洛托夫的报告以后发出的，电报清楚地表明，斯大林打算坚持己见。两封电报原文如下：

“斯大林元帅致总统阁下

“您的来电已收到。

“我已向莫洛托夫询问，但是迄今还未得到答复。我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是法国和中国参加解决巴尔

干局势的問題，那么，按照柏林會議的決議的确实意义，不應該邀請这两个国家参加。

“1945年9月22日”

“斯大林元帅致杜魯門总统閣下

“您关于外长會議的第二封来电已經收到。

“今天我接到了莫洛托夫的答复，答复說，他遵守柏林會議的決議，并且认为不应違反这项決議。至于我，我必須提醒，在柏林會議上，我們既沒有决定，也沒有商定非投降书签字国的成員能够参加會議討論，但是不能表决。我认为莫洛托夫在严格遵守柏林會議決議这一意义上的态度不可能造成不好的印象，也不可能得罪任何人。

“1945年9月24日”

我认为在这个問題，沒有必要再立即給斯大林去电报。外长會議在10月2日休会。报纸說这次會議是失敗了。但是我认为我們不應該总是指望所有这类會議都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如果可能的話，这是我們努力获致最后諒解的另一阶段。在国内或国际的政治上，我們往往花費許多時間，力图找出在和其他有关方面相处中，我們究竟站在什么地方。我始終感到在国际事件中，处处想占上風并沒有有什么好处。當我們的外交談判沒有获得其他国家的全面让步的結果时，我也不认为报纸叫囂“失敗！”会有什么帮助。有許多問題并不能靠哪一方面的屈服而得到解决，而是要通过不牺牲原則的合理妥协来解决。

事实证明，俄国在太平洋也同样地难于应付。英国对于我們处理在日本和朝鮮的占領的方式沒有提出異議。但是俄国直到現在还拒絕参加远东諮詢委员会的任何會議，这个委员会已于本年

秋季在华盛顿举行过会议。在占领日本问题上，我们一直找不出办法来获致俄国的合作。

日本占领的顺利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卓越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在日本住了一些时候，调查日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战争期间有些什么进步。他返国后，到白宫来见我，对于我们占领日本的成功，作了最富有启发性的叙述，当时我要求他把他的叙述写成一份备忘录。

他在报告中写道，“我们所接触到的日本人，帮助了我们，并指给我们看他们一直在进行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显然毫无怨恨的心理，而且显然具有热忱。这一点我们都感到非常惊讶。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一）他们的自卑感使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成就上寻求表扬和评价；（二）天皇命令他们和美国人合作，因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感到耻辱或不忠；（三）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农奴国家，在这种制度下军人就是主子。因此，日本的老百姓不是服从这个主子就是服从另一个主子，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占领军就是他们的主子。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服从这个主子或那个主子，根本就无所谓，只要在新政权下，他们有维持生活的机会。麦克阿瑟将军特别强调最后这一因素。”

我派遣到中国去的经济使节小埃德温·洛克中途在日本逗留时曾与麦克阿瑟晤谈过。

1945年10月19日洛克写信告诉我，“麦克阿瑟将军十分强调俄国人在日本事务上的影响，他对日本国内‘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表示忧虑。他说日本的许多所谓自由主义分子都是共产党人；他说他认为日本的共产主义是受莫斯科的控制。”

洛克又报告说，“麦克阿瑟将军几次提到，由盟国最高统帅部发往华盛顿的电报很难获得在他认为是及时而又富于谅解的回答。”这位将军又向洛克说，在他看来，有关管制日本的政策绝大部分

分应在东京而不应在华盛顿制定。麦克阿瑟“激动地说，”华盛顿事先未与他商洽就发表政策声明，给他造成许多麻烦。

然而，华盛顿也有理由抱怨麦克阿瑟将军未向首都上级请示就发表声明。例如，9月17日他宣称，占领军的兵力可以减到二十万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我首先是从报纸获悉这一声明的。这不仅是令人为难，而且实际上影响了政府在国内外所能采取的立场。

两次（第一次是9月17日，第二次是10月19日）我要马歇尔邀请麦克阿瑟回来，以便接受全国洋溢感激气氛的欢迎。我认为他有权利受到像给予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样的荣誉的。同艾森豪威尔一样，他可以在这里作短期的逗留，然后再回任所。但是这位将军拒绝了。

马歇尔将军致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个电报如下：

“在日本的局势允许时，我建议你回国一行。毫无疑问这里将准备一系列的欢迎仪式。这包括访问全美国几个代表城市和在你的原籍的逗留。李海海军上将已通知你，威斯康星州州长要求你回故乡访问。在华盛顿，国会一定会邀请你向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总统将为你举行招待会或宴会。在这一切之后，你还可以休息一个时期。在阿希弗德总医院备有招待周到的精美别墅一幢，它过去是西弗吉尼亚州白硫泉的绿蔷薇饭店。我认为你回国的时间最好在国会各委员会听取战后国防报告的时候。他们已表示希望你出席作证。我知道这些会议将在10月底和11月间举行。

“请将你对拟议中的回国访问的意见，以及你的愿望，通知我。在你的归国随行人员中，除你的参谋人员，最好考虑带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士兵和海陆军官。”

麦克阿瑟将军于9月19日作了如下的答复：

“您的来电，我很感激。我离国已八年多，自然愿意回国一行。

然而此間的局勢正處於微妙和困難的境地，除非情況能比目前更加穩定，否則我離開這裡是很不明智的。我相信恐怕還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才能夠安然歸國訪問。

“對所計劃的一切優厚款待，我深為感激。當我真能回國時，我希望有克呂格爾、肯尼、金凱德、薩瑟蘭、艾克爾伯格、懷特赫德、巴比等等一行軍官隨行。他們的卓越的共同努力是擊敗日本的主要力量，在這樣的歸國訪問中，如果沒有他們隨行，我是不想回去的。這種訪問象徵我所參加的統帥部對勝利所作的貢獻，因而我極願意避免在其他與訪問無關的問題（如戰後組織或任何其他事件）上以任何方式出席國會各委員會。把我牽涉到爭論性的問題中去，這將完全推翻這次訪問的意義。我認為在這樣的時機和場合下，我不應承擔這種義務。”

1945年10月19日，我指示馬歇爾再致電麥克阿瑟將軍，

“總統請我通知你，他希望你知道，他盼望你在感到你能安然離開的時候回國一行。我們與國會的聯繫表明，當他們對你歸國訪問的計劃有了確實消息，即將向你發出邀請回國的正式請柬，並請你在國會的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在沒有得到你的回信以前，我將不再作任何準備。”

兩天以後，麥克阿瑟回電說：

“國會的盛意以及總統和你自己的熱情我深為感激。按常理說，再也沒有比立即接受這項邀請更能使我高興的了。然而，此間存在着非常危險的、一觸即發的局面，這迫使我建議，將回國訪問的日期向后推延。即將來臨的冬季的危險局面不容忽視。如果我把這種責任委託給別人，會認為這是自己的失職。我保證，一俟情況安定，我立刻會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你報告。請將此電轉達總統。”

麥克阿瑟和洛克的談話也流露出他對朝鮮局勢發展的越來越憂慮。我從那個國家收到的報告的確令人沮喪。原來為了便于決

定誰在某一指定地区接受日本投降而划定的三八綫，竟变成一种不可逾越的边界，在北边的俄国人不许我們任何人看到那边的情况。原来打算帮助朝鮮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現在却正走上分裂的道路。有报告說，在朝鮮和滿洲的俄国人正拆卸工厂，并将机器运往俄国。因此，我指派埃德温·保莱研究一下东亚的賠償問題。我要他替我实地证明，我們从朝鮮和滿洲接到的报告是否正确。

在世界的另一个地区——希腊，灾难开始在酝酿。那个国家經過一場真正的英勇抵抗以后，就被德国人占领了。它在战争期間經受了惨痛的苦难，它的恢复緩慢得令人感到危險，事实上，只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提供的援助，才使它免于全面的崩潰。

希腊所处的地位十分微妙。在它的北部，它的所有邻国都淪入共产党人的統治之下，即使在希腊內部也有迹象证明，不論在什么时候，只要局势从不稳定恶化到混乱，国内的共产党人就准备在国外共产党的帮助下接收政权。国务院給我的报告对1945年秋季的希腊局势是这样描述的：“严重的通貨膨脹，政府的巨額开支和低額的收入，分崩离析的内政，停滞的工业和普遍的失业。”

欧洲胜利日以后，英国承担了援助希腊的主要責任，但是事实愈来愈明显，我們的援助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我不願把美国的錢花在希腊，除非有迹象表明希腊人自己会行动起来，整頓自己的国家。我授权国务院向英国政府表明我們的态度，并向希腊政府递了一份照会，敦促他們采取一項稳定經濟的計劃。我并說，我們帮助希腊的程度取决于希腊行动的效率。

在中东，伊朗的局势突然恶化。在战争期間，这个国家是我們与俄国人之間的一个主要联络站，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尤其是这样，当时我們用租借法案的物資援助俄国抵抗希特勒，是一件很重

要的事。为保障供給綫的安全，俄国军队驻扎在伊朗北部，英美军队则卫戍该国的南部。9月初我已收到关于俄国人的行动的第一批报告，說这些行动看来是对伊朗内政的非法干涉。俄国部队在杜德党人（伊朗土称共产党人为杜德党人）制造混乱的地方，公然阻止伊朗警察进入。国务院在9月下半月报告我說，与苏联接壤的伊朗阿塞拜疆省到处发生騷动。俄国人鼓励下的（如果不是实际上唆使的話）一个自治运动似乎在发展着。

倫敦外长會議达成一項協議，一切外国军队应撤出伊朗，期限不得迟于1946年3月2日。但是我在10月收到的报告还說，俄国向伊朗增兵。这一切綜合起来似乎可以說明，这是俄国方面的有计划的行动，它至少企图控制伊朗北部。与希腊共产党进行突襲的威胁联系一起，这种局面看来正像一个旨在囊括近东的丰富油区和地中海溫水港灣的鉗形攻势。

这些兆头不妙的迹象，要求我們尽一切努力，通过联合国强迫俄国人遵守倫敦协定，撤出伊朗。

在这些紧张局面正在欧洲和亚洲形成的时候，我們的政策是，不論哪里发生灾难，我們就以迅速而坚决的行动来对待它。

自从广島轰炸以来，我一直在考虑关于原子彈的可怕含义。我們知道，这种革命性的科学創造能够毁灭文明，除非把它管制起来，使它为人类服务。1945年8月8日，我接到艾德礼首相的一封信，他建議我們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以安定世界。

他說，“对于这种新力量究竟是用来为文明服务，还是用来毁灭文明，現在普遍存在着一种忧虑。”他指出，这种发明的經濟效果也許在几年內还不能显示出来，但是它在国际关系上的影响却立即显示出来了。因此，他极力主張，两国政府的首脑应毫不延迟地发表一項联合宣言，申述我們利用这种偉大力量的意图，“并不是

为了我們自己的目的，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人道的維護者，以便增进世界的和平与正义。”

在我的回答中，我向首相保证，我完全贊同他的意見。事实上，在我对全国广播波茨坦會議的报告中，我已准备了一个宣言，說明我們的意图是把原子能的新力量变成保卫和平的武器。

艾德礼立刻回电說，“这项声明……事实上等于我心中說明我們意图的宣言。在目前的处境中，我认为任何联合宣言都应该等到有关各方对管制办法和国际关系領域中所牽連的問題进行更加全面的考虑以后再說。”艾德礼通知我，他打算为英国政府发表一項包括这一宣言的声明：

“杜魯門总统在8月9日的广播中說到了为将来的原子彈管制計劃作准备，并要求国会密切合作管制原子彈的生产与利用，并把原子彈的力量变成維持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英王陛下政府准备傾全力来推进預定目标的实现，并給予密切的合作。”

現在，我們必須寻找管制这种新力量的方法。对我來說，广島与长崎的破坏已是足够的教訓。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危險是世界承担不了的。但是在我們找到切实可行的和絕對安全的方法以前，重要的是保持拥有这种炸彈所获得的有利条件。換句話說，現在比任何时期都更要保持原子彈的秘密。在太平洋战争結束时，我立刻就对有关的重要官員发出下述命令：

“致

“国务卿

“陆軍部长

“海軍部长

“参謀长联席會議

“科学研究与发展局长等的备忘录

“茲特命令政府各有关部門与参謀长联席會議采取必要步驟



以防止泄露有关原子彈的发展、設計或生产的任何情报；也不得泄露有关原子彈在陆軍或海軍作战中的使用，但得到总统特許者不在此例。

“1945年8月15日”

我們加强了曼哈頓区各个机构的警戒。关于核子反应的基本事实(这是世界科学家早已知道了的)在史密斯报告中公开了。但是我們保守利用原子能的秘密已經在我們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9月11日，史汀生部长給我一份备忘录，陈述了他对原子彈和我們与俄国人的关系上的看法。史汀生部长在这个問題上花費了很多思索，因为他在原子能的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他提議，就原子彈的未来使用問題，美国可直接向俄国提出訂立某种协定的建議。他写道，“据我判断，美国在这一問題上对苏联所采取的直截了当的接近方式，更易于使苏联有誠恳的反应，如果我們把接近的方式当作一般国际政策的一部分，或是在我們的和平談判中已出現了一連串明言的或暗示的威胁以后再采用这种方式，苏联的反应就不会这样誠恳。

“关于与苏联接近的方式，我的意見是，在与英国討論以后，直接提出建議，說明我們准备与俄国人訂立一項协定，总的目的是管理和限制把原子彈当作战争工具来使用，并尽可能根据和平与人道主义的目的来指导和鼓励原子能的发展。这种接近方式特別可能产生这样的建議：在俄国人和英国人同意采取一致步驟的条件下，我們應該停止把原子彈当作軍事武器来进一步加以改进，并停止生产。这个建議也可能規定：如果俄国人和英国人跟我們取得協議，在任何情況下不經三国政府一致同意，誰都不得把原子彈用于战争，美国应欣然答应把国内目前所拥有的原子彈封存起来。我們也可以考慮在关于原子彈管制的安排中，包括一項与联合王国

和苏联签订的条款，规定互相交换在未来的发展中所取得的利益，从而在彼此满意的基础上，把原子能应用于商业和人道主义的事业。”

史汀生并没有建议我们“把原子弹交给”俄国。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讨论问题。我已肯定，制造这种武器的秘密必须保留在我们手里。在9月18日的每周内閣午餐会上，我发动了对原子能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我决定在9月21日举行的下一次正式内閣会议上，議事日程只有一項議案，那就是关于原子能問題。

这是史汀生部长参加的最后一次内閣會議。他的辞呈已经送到我的手里，會議结束后他立刻离开了华盛顿，就此结束了有功于国家的最卓越的公务生活。看到他去职，使我感到遺憾。史汀生是位诚实的人。正像有人說伊諾克 (Enoch) 一样，他是一位正直的人。他能用平易的語言表达他的意見。我尊敬他，并且信賴他。

會議开始时，我請史汀生对内閣发表意見。他在讲话中指出，未来的原子能将分成两大范畴：科学研究的进一步钻研，以及新获得的知識在工业上的应用。他认为科学上的秘密事实上并不是秘密，也就是說，在武器发展上能够保守秘密的意义下，它不是秘密。史汀生說，問題是如何对待这些秘密，以保证世界的安全，接着他提出在給我的备忘录中的建議。

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代表貝尔納斯 (他在倫敦) 出席，对于史汀生的意見大体上表示贊同。他說，在任何共同享有的科学知識上，是需要有保障的。美国科学家应该了解有关苏联发展的全面情况，这样才不至于形成我們將情报供給人家，而反过来却得不到人家一点东西的单方面交换。他說，沒有美、英、俄三国之間的協議，联合国在原子能方面不能发生作用。

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竭力反对陸軍部长的主張。他問道，如果我們願意把原子能知識的任何部分分給人家，那我們为什么不

干脆也把全部軍事秘密告訴人家呢？他反对那样做，他担心情报的交換会成为单方面的事，我們从人家那里得到很少的东西，或者是一点东西也得不到。首席檢察官克拉克同意文森的意見。他說，按当前的世界局势来看，他不理解有什么理由把我們的秘密告訴人家。

我打断他們的爭論，指出我們不是在討論把原子彈本身的秘密告訴俄国人或其他任何人，而是在討論控制原子武器战争的最好方法和交換科学情报。

邮政部长鮑勃·汉訥根表示尊重史汀生的見解，并支持他的主張。海軍部长福莱斯特尔宣称，这个問題有軍事的和非軍事的两方面，两方面都要加以考虑。他說，在沒有作进一步研究以前，不应草率行事，并表示要在这个問題上提出备忘录。我对他的建議表示謝意，并請其他出席者提出书面备忘录，充分发表他們的意見。

接着农业部长安德逊发表意見，他說，他极力反对把任何科学的或商业的秘密泄露給別人。正如我們不应将原子能的軍事秘密泄露給別人一样。他又說，他不相信俄国人，也不相信他們願意在任何交換办法中的意願。亨利·华莱士表示了意見，用他的話來說，他想知道，我們究竟是朝着災难的方向走呢，还是往和平的道路走。他說，科学的进展不是人为的法律所能限制的。

陆軍部副部长罗伯特·派特逊（几天以后我任命他继史汀生当部长）表示同意史汀生的意見。劳工部长施魏倫巴赫、联邦工程局长菲利普·弗来明少将以及保罗·麦克納特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史汀生的見解。

利欧·克劳利說，把原子能的其他方面从原子彈中分离开来是困难的；朱利叶斯·克魯格表示意見說，我們應該推迟六个月以后再作任何决定，以便让人們冷靜下来。約翰·斯奈德和参議員

麦克拉贊同这个意見。討論进行得很热烈，我高兴看到內閣會議上有这种討論。这种內閣會議显示了，誠实的人能誠实正直地不同意旁人的意見，这种率直坦白的爭辯是自由发表意見的最好形式，总统能从中得到各种不同的意見，这正是他在作决定时所需要的。决定必須由我自己去作。

我也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范尼伐尔·布希博士和參謀长联席會議各写一份备忘录。布希博士說，他相信向俄国建議交換科学情报可以打开在原子能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大門，而且最后可以获致有效的管制，另一条道路就是原子彈竞赛。

布希博士写道，“这种建議并不涉及到‘泄露原子彈的秘密’。秘密主要存在于炸彈本身結構的細节里和制造的过程中。給予的和接受的只限于科学的知識。在一种企图实行封鎖的制度下，也就是在科学的監視制度下，俄国很可能从我們的科学发展中获得很大的好处，而我們从他們那里却得不着什么东西。而且，如果我們要想对俄国保持科学秘密，也必須同时对美国的大部分科学家保持秘密。”

布希博士又說，“有一个問題摆在我們面前，我們能和俄国合作，并能相信他們嗎？这个动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我們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一般的好处是，这种建議在大家都知道以后就等于向世界宣告，我們願意在国际友好和互相諒解的道路上前进。”

李海海軍上将送来了他的一份备忘录，在意見上他和參謀长們是一致的，不过这份备忘录直到几个星期以后才到我的手里。我和李海海軍上将、馬歇尔將軍以及其他參謀长們早已討論过原子能的問題；在我研究那些我在9月21日的內閣會議上所要求的备忘录时，他們的意見我都知道了。

參謀长联席會議建議說，美国应保持原子武器現有的一切秘

密。他們說，構成原子爆炸物的核子物理學的原理已遍傳世界各地，而用於原子武器的許多技術程序和製造手續仍是秘密的。在主要的國際政治問題上各大國間還缺乏一致的意見時，他們覺得公開原子武器的情報會加速原子軍備的競賽，並會使美國暴露在更大的危險下。參謀長們竭力主張：“在美國壟斷原子武器的有限期間應迅速和有力地採取政治性的步驟，”以便獲致國際管制，限制原子武器的使用或規定原子武器的使用為非法。他們在結論中說，“在不久的將來，其他國家可能在發展原子武器上獲得成功，因此政治性的管制問題是一個迫切而重要的事。”

## 第二十八章

### 英国和美国关于原子能的協議

关于我召开了一次內閣會議討論原子能問題的消息，很快就引起了一些虛构的报道，說什么关于“把原子彈給予俄国人”的問題，在內閣中引起了严重的分歧。在这次內閣會議以后，我曾經同一些国会議員和政府領袖在杰斐逊島度周末，当我回到华盛顿的时候，白宮就有一个記者問我是批准还是否決了“华莱士的建議”。在报上可以讀到这样一些故事，說是亨利·华莱士要求放棄原子彈的秘密，因而引起了这次內閣的討論。我回答这位記者說，华莱士並沒有提出这样的建議，我并且补充說，任何关于原子彈的問題，是由我、而且也只能由我作出決定。

事实上，我早已作出決定，無論在國內或国际上，原子能都應該严格地加以管制。9月19日，我曾經邀請參議員康納利、范登堡和卢卡斯到我的办公室，向他們一般地叙述了我的主要想法。我对他們說，我想把国内发展原子能的工作，由一个政府机构来加以控制。发展原子能的工作是太重要了，因此不能把它当做牟利的对象。尤其重要的是，要想在这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和发展，就需要有龐大的經費，而除了政府以外，只有在由私人壟断的情况下才能提供这种巨大的經費，而我是坚决反对在原子能方面由任何私人来壟断的。我还对这几位參議員說，我希望同我們的英国和加拿大伙伴就这个冒險事业开始談判，看能否制訂一个关于国际管制原子能的計劃。我迫切希望在討論到有关原子能政策范围的时候，不要引起两党的意見分歧，就如同我一直力图在外交政策上实行

两党合作一样。

10月3日，我送致国会一个咨文，請求制訂一項关于原子能的国家政策的法律。我說：

“自从对日本使用原子彈以来，已将近两个月。原子彈并没有贏得战争，但它无疑縮短了战争的时间。我們知道，原子彈拯救了美国和其他盟国无数士兵的生命，要不是有原子彈，他們是会战死在戰場上的。

“利用原子能的方法的发现，在文明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紀元。构成这个发现的基础的科学和工业方面的知識不仅仅是关系到另一种新武器的問題。总有一天事实将证明，这一发现要比車輪的发明、金屬的使用或者蒸汽机和內燃机的发明在人类社会发史中所起的革命作用更大。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曾經遇到过这样一种充滿潜在危險的力量，同时，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曾經遇到过这样一种使人类前途和世界和平充滿了希望的力量。我們是能够利用我們已經获得的知識来为人类寻求未来的幸福而不去进行毀灭性的战争的，我想，当我說这句话的时候，我是表达了美国人民的信念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們必須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战綫上去努力。

“首先和最迫切的一个步驟是决定我們在美国范圍内管制、使用和发展原子能的国内政策。

“我們不能拖延这方面的决定。我們用来制造原子彈的巨額投資已經使我們拥有华盛頓州和田納西州的两个巨大的工厂和全国各地其他許多有联系的工厂。它还使我們把許多科学家、行政管理人員、工业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集結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組織——这是我們国家的一笔无可估量的财产。

“国会明智地赋予政府进行战争的权力足以允许政府把这一企业作为一种军事工程建立起来，并加以发展。现在，我们的敌人已经投降，我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为这笔在科学界和工厂的巨额投资安排未来的用途。有人告诉我，许多人都想回到自己的本行去，而要想使那些工厂的工作继续顺利进行并使原子能方面的知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非依靠这些人不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之所以要脱离这个工程，多半是因为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未来政策还不确定。迅速采取行动，制订我们国家的政策，就可以长期保持我们这个强大组织的完整。

“同样必要的是去领导将来的研究工作和对发展原子能所必需的基本原料进行管制，不管原子能将来是用于和平还是用于战争。原子威力掌握在无知者和恶人的手中，就会使国家和全世界遭受莫大的灾难。除非迅速采取行动，来避免滥用的危险，人类社会甚至将无法希望能保护自己，更不要说得到这一发现的好处了。

“因此，作为利用我们的知识来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的第一个措施，我吁请国会制订法律，就我们现有的工厂确定一个政策，管制原子能的各种资源以及与在美国发展和使用原子能有关的一切活动。

“这项法律应当给予原子能委员会贯彻上述目的的权力，委员会委员人选在征得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然后由总统任命。

“国会应当制订有关这个委员会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原则，活动的目的应当是：增进国家的福利，保障国防，维护世界和平和进一步获得有关原子能的知识。

“美国人民知道，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所发展起来的压倒一切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的科学和工业——劳资双方都包括在内。我们相信，我们的科学和工业之所以具有力量，是由于我们具有自由研究和自由兴办企业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



国家的特点。因此，原子能委员会在执行自己职权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不干涉私人的研究和私人的企业，而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研究机关和组织。执行这样的政策，就是保持我国福利所系的科学和工业的优越地位的最好保证。

“美国拥有的构成原子能资源的一切土地和矿藏，一切能够从中获得原子能的储备物资，以及一切与原子能的发展和使用的美国的工厂和其他财产，都应当交由原子能委员会监督和管制。

“应当授权原子能委员会，使它能用公平合理的价格，通过购买或没收的方式，取得任何可以获得原子能的矿产或其他原料，取得虽非美国所有但含有这类矿产或原料的任何土地。

“这种权力应当包括可以购买美国范围以外的不动产和私人产业。

“还应当授权原子能委员会，使它能进行一切必要的研究、实验和其他工作，来进一步发展把原子能应用于军事、工业、科学和医疗方面的事业。毫无疑问，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现有的公私研究机关和组织。

“在获得适当保障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委员会拿出自己的任何一部分财产，供研究、发展和开采原子能之用。当然，除了其他一些条件以外，这种许可办法应当根据这样一种政策，那就是在平等的条件下，把和平时期的产品广泛地加以分配，以防止垄断。

“为了建立有效的监督和保证安全，凡是生产或使用含有原子能的物质，以及输入或输出这种物质的行为，除非符合委员会规定的条件，都应当宣布为违法。

“最后，应当授权委员会订立一些保障安全的条例，来处理在其管辖下的一切有关情报、原料和设备的事宜。凡是违反委员会的安全条例或这一法案的任何条款的行为，都应当受适当的惩罚。

“我建议的各项措施似乎很激烈和牵涉很广，但是，我们正在

設法加以处理的这一发现，所牵涉到的自然力实在过于危险，而不是按照我们平常一般的观念所能理解的。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对这个新发现的原子能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加以管制和发展的问题。

“正同处理国内的事务一样，就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原子能的发现构成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的革命性的确过于强烈，因此也不能拿我们过去的旧观念来考虑问题。我们再也不能靠拖延时间来推行一个国际管制计划。人类的文明要求我们尽早地就管制这一发现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以便使它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有力的因素，而不致成为一个破坏性的工具。

“科学界差不多一致认为，这一发现所根据的基本理论知识是为全世界所广泛了解的。事实上大家也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外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完全赶得上我们目前所具有的理论知识水平。

“人类文明的希望要靠在国际上作出安排，以期在可能的条件下放弃原子弹的使用和研究，同时引导和鼓励把原子能以及未来的一切科学知识用于和平的和合乎人道精神的目的。要作出这样的安排，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是，如果不去克服这种困难，那么除了拼命进行很可能引起一场大灾难的军备竞争之外是没有其他途径的。如果要拖延到联合国组织开始工作，到它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国际问题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国际问题，那是不妥当的。

“因此我建议现在就开始讨论，首先是同我们一道从事这一发现的朋友英国和加拿大进行讨论，然后再同其他国家进行讨论，争取在原子威力方面在以合作代替敌对的情况下，达成协议。

“我想强调一句，这种讨论应当不涉及有关泄漏制造原子弹本身的生产过程的问题。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应当制订办法，看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安全地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换科学情报的工作。

“讨论结果将尽可能迅速地向国会提出报告，任何获得了结果

和需要国会采取行动的協議都将送交国会。

“但是，不管国际性的討論进行得怎样，我认为必須尽快地通过一項按照我所指出的精神制訂的法律，来保证在生产和使用原子能方面进行必要的研究、发展和管制的工作。

“哈里·杜魯門”

第二天，国会提出了一个法案，并且說将把我的計劃付诸实施。这就是梅—約翰遜法案，很少有关立法的提案曾經获得这样热烈的反应。但是立即发生了一个問題，这个法案究竟应该由哪一个委员会来負責？我曾經授权国务院負責制定关于原子能的立法。然而在国会里面，軍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为了要負責这个法案，竟掀起了一场很有意思的爭夺战，因而不幸地耽誤了一些時間。

一星期以后，我在記者招待会上就原子能政策又发表了一次談話。前些时，我就答应去参加在密苏里州卡卢塞斯維尔举行的佩米斯科特县的賽会。自从被选为参議員以后，我很少不参加这里的賽会。在这次旅行中，我在靠近田納西州提普頓維尔的里耳富特湖边的林达公寓盘桓了一下，这次記者招待会就是在这个公寓的走廊上举行的。

記者提出的第一个問題大概是这样：“总統先生，就我最近所能記憶的，您在賽会上的讲演中曾經說过，当世界各国学会了怎样把整个世界的进步摆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利益之上的时候，我們就能够把获得原子能这一偉大的发现加以利用，而使世界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您的这番話，作这样的解釋是否正确；即除非、而且一定要等到我們确认世界已經进步到那种程度，才能把原子能的秘密予以公开？”

我回答說：“不。这样来解釋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制造原子

彈的科学知識，全世界都早已知道了。我們的秘密只限于知道怎样把这种知識在实际中加以运用而已；就正同知道怎样制造 B—29，以及继世界上最大的长距离轰炸机 B—29 之后很快就要問世的飞机和大規模生产汽車的知識。就科学知識而論，所有的科学家都是懂得的，但是怎样运用这种知識，这就是我們的秘密。”

那位記者接着又問：“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否认为可以讓他們知道我們怎样作法？”

我回答說：“我不认为讓他們知道怎样作法有任何好处，因为不管怎样，我总觉得他們不可能去作。要作的話，除了有科学知識之外，还必須有工厂，有我們这样的工程力量。企图保持科学知識的秘密，那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所有偉大的科学家都具有这种科学知識；但是实际怎样作法，那是我們有这种能力去作的問題。如果他們在这方面能赶上我們，他們就会按照自己的作法去作，正同我們已經作的那样。”

記者問：“那么，您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將不会把这种知識告訴我們的盟国？”

我回答說：“正同我們沒有把任何有关工程技术方面的秘密公开一样。但是就科学知識而論，不管怎样他們都是懂得的。”

記者繼續問：“拿原子彈的秘密來說，我們不会公开吧？”

我回答說：“讓我們改变一个說法吧，怎样把一顆原子彈拼湊成功，这是不会公开的。”

另一方面，关于进行国际会談的問題，也已經作好准备。在我同英国大使哈里法克斯勳爵談話的时候，我提到了我的計劃，他告訴我，艾德礼首相也非常关切将来原子能在国际关系上的問題。

9月25日，艾德礼寄給我一封长信，建議我們共同討論在原子能方面未来进行合作的問題。这位英国首相說，这个新武器的出

現，意味着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这个新武器的破坏力，超过世界上从前有过的任何武器，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进行有效防御的办法。艾德礼还指出，关于制造原子弹的过程，各国科学家都是基本上知道的，因此必须预计到，同我们两国不表示友好的国家也将研究和制造可以使用的武器。他认为，仅仅商谈和平使用原子能的问题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据他说，曾经有人告诉他，“要想控制原子能，把它作为一种动力的来源，就不可能不同时制造出一种可以用作炸弹的物质。”

首相接着说，因此全世界负责的政治家都面临将会影响文明的生存的抉择。他说，当他和他的同僚在为自己国家的将来进行策划的时候，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是要策划一个和平的世界呢，还是一个战争的世界呢？”

他说，他认为从旧金山所建立的基础中，已经看到了和平世界的希望，但是他觉得这还不过是第一步。他补充说，“现在，在我们看来，如果要使已经在旧金山打下基础的建筑物成为一个可靠的维护人道的场所，那就必须进行更多的工作。”

他要求我快些找个机会，以便我们两个人可以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重大问题。艾德礼的建议同我准备跟他和加拿大的总理麦根齐·金会晤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我决定邀请艾德礼和金在11月间来华盛顿。

显然使这位英国领袖感到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愿意把我们关于原子能的知识向英国公开到怎样一种程度。我们和英国人之间的基本协议仍旧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1943年8月在魁北克所达成的谅解。当时双方同意应当成立一个联合政策委员会，委员六人，美国和英国各三人，有关原子能的情报就通过这个委员会来进行交换。关于情报交换的范围，协议规定如下：

“……（乙）在政策委员会委员之间以及委员们的直轄技术顾

間之間，应当充分交換有關這一工程各個部門的情報和意見。

“(丙)在科學研究和發展方面，凡是從事同一部門工作的兩個國家的人員，就應當充分地 and 有效地交換情報和意見。

“(丁)在大規模工廠的設計、建造和經營管理方面，交換情報和意見應當根據特殊安排所作出的規定；在進行這種特殊安排的時候，所應當考慮的是，如果要使這個工程儘快地獲得成效，從每一部門來說，這樣做是否有必要，是否有好處。這種特殊安排還必須得到政策委員會的批准。”

為了明確這一協議的內容，國務院替我準備了一個備忘錄，把這些條款的意義闡釋得更加詳細：

“文件上十分清楚地寫明，凡是有關一切科學研究和發展的情報，就應當全部交換，但是有關實際製造的方法，其交換必須看是否能使這個工程迅速地獲得成效，同時交換的範圍還必須得到政策委員會的批准。

“可能引起爭執的只有一個地方。可能引起爭執的是：關於製造方法的情報，就包括在(乙)條裡面，它規定在政策委員會委員之間以及委員們的直轄技術顧問之間，應當充分交換有關這一工程各個部門的情報和意見。

“但是，在執行這一協議前所進行的談判過程，駁斥了對(乙)條的這種解釋。

“1943年8月4日，英國首席談判代表約翰·安德遜爵士交給了美國首席談判代表布希博士一個協議草案——最後付諸實行的就是這個草案。

“1943年8月6日，布希博士回信正式表示收到，並同意約翰爵士的草案，同時還作了如下一些解釋：

“‘為了使我們能確實弄清楚現在已沒有什麼令人誤會的地方，我想簡單地發表一些意見……我們對這個協議的諒解是：政策

委員會的委員將有機會获悉有關這一工作的各個方面的所有一般性的情報，而有關製造的具體事宜、工廠的修建或最後製成的任何武器等方面情報的交換，則必須按照(丁)條的規定；至於你們提出的(乙)條規定，不過是用以規定委員會的委員可以同自己直轄的科學顧問交換他們所可能知道的情報，這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委員會的委員本人並不一定是科學家。’

“約翰爵士在同一天寫了一封信給布希博士，回復他的那封解釋信，他說：

“‘十分感謝你 8 月 6 日的來信，從我的觀點來看，我對這封信是完全滿意的。’”

當然，在整個戰爭期間，我們完全是根據軍事上的目的——製造原子彈——來考慮這個問題的。這是一個聯合企業，但是，由於它位於美國，同時大部分人員和使用的資源都來自美國，因此我們的英國同伙並不知道製造的程序。然而，時至今日，合伙的性質顯然是不能不重新加以調整了。我們已不再局限於致力製造武器。我們要來計劃怎樣長期地與和平地利用這種前所未有的力量。預定 11 月和艾德禮進行的會談，也就是要使他和我能有機會就這個問題交換意見。

我還想同艾德禮討論其他一些重要問題。這就是財政上和經濟上以及巴勒斯坦的問題。當時，事實已很清楚，英國在它的重建和善後工作中，勢將需要巨大的援助。英國人最初表示想要一筆五十億美元的無息貸款，逐年歸還一億美元，我們的財政部則提出意見，借款三十五億美元，利息 2%，在五十年內還清，如遇經濟上不景氣的年份，可以緩付。在英國人和我們的會談以後，我們彼此間的分歧已大為減少，但是在我們能提出有關貸款的建議以前，仍然是不會達成協議的。

為了取得這筆貸款的報酬，我們希望英國放棄許多有關貿易

方面的协定，因为根据这些协定，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同英联邦国家以及所谓英镑集团国家比较起来，的确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待磋商。

在艾德礼到达美国前不久，我选择在海军节那天发表了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声明。这天是1945年10月27日，地点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那天在发表声明以前，我还参加了《弗兰克林·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下水典礼。

这是我第一次以总统身份正式访问纽约市，我受到了热烈而友好的欢迎，当我们的汽车行到经过百老汇路的时候，从沿街机关房屋的窗口里纷纷撒下了长长的纸卷和各色纸花。拉瓜迪亚市长替我作了介绍。我向我们的海军致了贺词，然后谈到关于指导我们对待其他国家关系的原则：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坚决根据公正和正义的基本原则的。在实行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我们决不容许同任何邪恶的东西进行妥协。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一下子就使这个世界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我们不应当为了追求这种完美无缺而妨碍我们继续朝国际合作的方向前进。我们必须决心根据我们的基本原则，竭力履行我们的责任，即使我们不能不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进行工作。

“让我把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重述一遍：

“（一）我们不追求领土的扩张或自私的目的。我们没有侵略任何大小国家的企图。我们没有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和平目标相冲突的目标。

“（二）我们确信，被暴力剥夺了主权和自己组织政府权利的各国人民，最后一定有恢复的机会。

“（三）我们不赞成全世界任何友好地区的领土有所变更，除非这种变更符合该地区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



“（四）我們认为，凡是决心建立自治政府的人民，就应当准許他們按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自己的政府形式，而不得受任何外力的干涉。欧洲、亚洲、非洲以及西半球都应当这样。

“（五）我們將通过同我們战时的盟国的联合一致的行动，帮助被击败的敌国，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建立和平民主的政府。我們要努力建立一个不容許納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軍事侵略立足的世界。

“（六）我們要拒絕承认由任何外国通过武力强迫任何国家接受的任何政府。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能阻止这种强迫別人接受某种政府的行动的，但是美国将决不承认任何这样的政府。

“（七）我們认为，一切国家都应当有航海自由，都应当有平等的权利在疆土边界上的河流和水道上航行，在經過一个国家以上的河流和水道上航行。

“（八）我們认为，凡是为国际上所承认的一切国家，都应当具有进行貿易和取得世界各种原料的平等权利。

“（九）我們认为，西半球的主权国家，在不受西半球以外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必須像好邻居一样地协同努力，来解决它們的共同問題。

“（十）我們认为，所有大小国家間的充分的經濟合作，对于改进全世界的生活条件以及获得免于恐惧和匱乏的自由，具有重大的意义。

“（十一）我們將繼續努力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地区促进思想自由和信仰宗教的自由。

“（十二）我們认为，要維護国际和平，就必须有一个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組成的联合国組織；为了确保和平，这些国家在必要时得联合起来使用武力。

“这就是現在指引美国前进的外交政策。这也是美国滿怀信

心地面向未来的外交政策。”

在我同艾德礼和麦根齐·金举行会议的时候，一个完善的国际管制原子能的计划草案已经拟订好了。我们的讨论是在11月11日、也就是艾德礼到达后的第二天开始举行的。我告诉艾德礼首相和麦根齐·金总理，我能代表美国政府说的是，我认为自由交换科学情报，对于世界的和平极为重要。

我还说明，我所说的“自由交换科学情报”，是指应当允许各国科学家彼此自由地相互访问；而自由地审查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计划，应当成为每一个国家的政策。但是我强调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工程方面和生产方面的具体情况应当予以公开，正同我们不会把我们在贸易方面的任何机密公开一样。

我告诉艾德礼首相和麦根齐·金总理，美国国会正在准备通过一项关于在国内管制和平利用原子能事宜的法案。我说，据我看来，在我们千真万确地肯定国际间的信任已经良好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关于对原子能用于破坏性目的这件事加以管制的问题，就应当在联合国提出来。我说，这恐怕有必要放弃安全理事会中的否决权。

艾德礼和麦根齐·金接着先后发表意见，令我高兴的是他们两位都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

在第一次会议中，在场的仅仅我们三个人，但就在这天——11月10日<sup>①</sup>——下午我们再度会晤的时候，我们的主要顾问也出席了会议。我这方面是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海军上将李海，和艾德礼一道的是哈里法克斯勋爵和约翰·安德逊爵士，和金先生一道的是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累斯特·皮尔逊先生。

艾德礼先生首先发言，他实质上叙述了我在上午的会谈中提

---

<sup>①</sup> 原文如此，但按前文，似应为11月11日。——译者

出的主要論点，接着金先生发表了表示同意的意見。貝尔納斯国务卿則提出，要把这样一个協議写成文字，使有关各方都能清楚地了解，恐怕要遇到一些困难。

所有出席會議的人都认为，应当自由地交換科学知識和自由地視察制造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的工厂，但是，在进行任何这类交換工作以前，还必须就这方面的問題达成協議。會議責成貝尔納斯先生和英加两国大使尽力把彼此同意的意見写成文字，送交三国政府的首腦考虑。

我們的討論接着轉到巴勒斯坦問題，但是一經接触到這個問題，分歧意見比表面看到的要多，因此決定在英国首相留美期間較晚的时候再談。

我們討論了远东局勢，并且就政策的某些基本要点达成了協議。关于日本，我們決定，如果俄国繼續不参加日本諮詢委员会，委员会就应当在沒有俄国人参加的情况下立即开始工作。关于朝鮮，我們同意立即由我們这些国家采取步驟，建立在英国、俄国、中国和美国領導下的托管制度。我們也討論了中国的动乱局勢，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都同意我的看法，由于蔣介石政府是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因此它应当繼續得到支持，但是不要使我們这些国家的任何一个卷入可能在这个国家里发生的內战的冲突中去。

11月10日，在白宫为克萊門特·艾德礼和金先生举行了国宴。从我和艾德礼在宴会上非正式的談話中，也許可以极好地說明我們这次討論的精神。在我們彼此祝賀以后，我起立說了这样一些話：

“今天晚上，我能以美国總統的身份，来招待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以及英帝国其他联邦国家的代表們，这对我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荣幸；我希望簡單地說几句话，我想，这也是我們大家心里的話。

“我知道，我們都是在努力建立世界的秩序和世界的和平，在这样一种有秩序与和平的局势中，各个国家都将会有英帝国联邦国家在帝国范围内所具有的那种感觉，也将会有四十八个州在美利坚合众国内所具有的那种感觉。关于美国的目标，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都曾經談到过，而他們所說的話，我們大家都是能够了解的。我們正在英勇地爭取实现这样一个綱領，这个綱領发端于伍德罗·威尔逊，然后为弗兰克林·罗斯福所充实，最后为由参众两院議員和一般公民的代表組成的无政治色彩的代表团在旧金山所完成的。

“英帝国的偉大業績之一是，每当它有一个外交政策的时候——它总是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的——英国人民就支持这个外交政策，也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这种情况充分地表现在波茨坦會議上，这个會議开始时出席會議的是英国首相溫斯頓·丘吉尔，而在會議結束时出席會議的則是我們今天晚上的贵宾——英国首相艾德礼。而在談判过程中却并没有发生中断的現象。艾德礼先生从會議一开始就跟随随着丘吉尔先生。他知道这次會議的目的，因此当他回过来担任首相的时候，事情也就正同开始的时候那样发展。

“我希望美国实行的外交政策能够是美国人民的政策，而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政策。

“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在这里同美国的国务卿和总统所討論的是一个关于使用原子能的計劃，是怎样去实行一个和平的計劃，这个計劃将具有，而且将继续不断地具有世界性，它将毫无例外地包括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

“我們是以虔敬的心情来开会的。我們希望从这次會議能达成協議和制訂政策，从而使联合国組織能够体现出一个生动、活泼和积极的綱領。”

克萊門特·艾德禮也即席致詞說：

“總統先生和諸位先生：今天晚上我能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中，在这座偉大的白宮，成为您的客人，我是感到非常高兴的。

“總統先生，我十分注意地听到您說，我們都需要一个外交政策——一个英国的外交政策，一个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我看来，我們今天所最需要的似乎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不是面对任何个别国家的任何当前的目标，而是面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这并不是說我們不去考虑我們的一些不同的具体情况，但在我看来，今天似乎应当把我們世界文明的受到了損害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我們在这里討論的都是为了維護自由，但是我們知道，自由可以受到来自許多方面的攻击。每过三十年就必须对自由重新作一番解釋。威胁一个时代的东西过去以后，另外的东西又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威胁它。

“我們在这里的都是相信民主的。我們經歷过一場爭取自由和民主的偉大斗争的战争。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英联邦国家的代表們，我想我們都可以为我們的自由而自豪；但是我認為我們必須懂得不能把这一点完全归功于我們的品质。这跟我們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們不能不对那些地理位置比較差的国家表示一点同情。

“多少年来，我們得到了英吉利海峡的保护，而你們則得到了大西洋的保护；但是时至今日，我們知道，科学的发现已經能越过海峡，越过海洋了。我們决不能让任何东西夺去我們的自由，夺去我們的民主。相反地，我們必須努一把力，看能否給予一切国家一种安全的保证；正是在这种保证下，我們經過漫长的岁月，在大西洋两岸真正建立了一切政府形式中最为难得的一种——民主政府，这也是唯一值得自由的人們采取政府形式。

“总统先生，我希望我们今天和这个星期的会晤——我们将在这次会晤中听取彼此的意見——会有助于我们去解决我认为是当前最迫切的問題，那就是从人类精神上解除恐惧的枷鎖，使人类精神获得自由，从而使科学不会像今天这样被看做是一种威胁，而是被看做为我們大家的更加美好的生活創造良好条件的东西。

“总统先生，我热烈地希望，在今天和您会晤的时候，您、我自己和金先生以及所有其他将同我們在一起会談的人，都永远記住一点：我們今天所要做的是，力求制訂一个普通人的世界政策。”

当我們的討論在 11 月 15 日宣告結束的时候，我在我的办公室召集了一个新聞記者和广播記者的招待会，当着艾德礼和麦根齐·金的面，宣讀了我們所一致同意的声明：

“美国总统、联合王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发表了如下声明。

“（一）我們認識到，由于最近的科学发现应用于战争和实践中去以后，人类已經掌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工具，而且对这种破坏性的工具，現在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的軍事防御，并且在使用这种工具的时候，事实上沒有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壟断它。

“（二）我們要強調指出，想出办法，以保证这种新发现用于人类的福利，而不成为一种破坏性工具，这不光是我們这几个国家的責任，而且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責任。但是，我們在发展和使用原子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要求我們針对这个問題率先采取一些步驟，因此我們聚集一起討論了关于采取国际行动的問題：

“（甲）制止把原子能用于破坏性目的。

“（乙）鼓励把科学知識方面最近的和将来的成就，特别是在利用原子能方面的成就，用于和平的和合乎人道精神的目的。

“（三）我們知道，要使这个文明世界得到完全的保护，而不受科学知識的破坏性的影响，唯一的办法在于防止战争。还没有可

能制訂一套能為自己提供有效保證的保衛制度，來不讓侵略成性的國家製造原子武器。我們也不能忽略發展其他武器或戰爭新方法的可能性，這種武器和新方法，正如同在軍事上使用原子能一樣，對文明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四）我們代表的是擁有利用原子能所必需的知識的三個國家，我們宣布，我們从一开始就願意同任何一個願意充分交換情報的國家交換重大的科學情報，交換科學家和用於和平目的的科學文獻，並以此作為首次貢獻。

“（五）我們認為，科學研究的成果应当向一切國家公開，而自由調查和自由交換意見，對於增進知識是很必要的。按照這個政策，關於發展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所必需的基本科學情報，業已向全世界公開。我們的意見是，今後可能時刻提供出來的這類性質的一切情報，都應當同樣處理。我們相信其他國家也會採取同樣的政策，從而創造一種互相信任的氣氛，使政治協商和合作的精神在這種氣氛中得以大大發揚。

“（六）我們曾經考慮到關於把原子能實際應用到工業部門中去的詳細情報予以公開的問題。在軍事方面利用原子能，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在工業方面利用原子能所需要的同樣方法和過程。

“在還不能想出一種為一切國家都接受的相互行之有效的辦法來防止濫用原子能以前，就傳播關於實際應用原子能的專門知識和情報，我們不相信會有助於積極解決原子彈問題。相反地，我們認為會收到相反的效果。但是，一旦我們能夠想出行之有效的辦法來防止把原子能用於破壞性目的，我們就準備在相互的基礎上同聯合國其他國家交換把原子能實際應用到工業部門中去的詳細情報。

“（七）為了求得一個最有效的辦法，來徹底制止把原子能用於破壞性目的，並使它能最廣泛地用於工業和符合人道的目的，我

們认为应当尽可能早地在联合国組織下面成立一个委员会，由它来向联合国提出各項建議。

“应当責成这个委员会用最紧急的方式进行工作，并随时就自己工作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議。

“这个委员会特別应当就下列几方面提出具体的建議：

“（甲）扩大交換各国間以和平为目的的基本科学情报；

“（乙）管制原子能至某种必要程度，借以保证其用途仅限于和平的目的；

“（丙）在国家軍备中廢除原子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規模毁灭性的重要武器；

“（丁）借視察与其他方法，作有效的保证，以保护遵守協議的国家免受他国破坏及規避協議所产生的危害。

“（八）委员会的工作应分阶段进行，每一阶段的胜利完成，将增进全世界人士必要的信心，以利下一阶段工作的进行。具体說来，我們认为委员会第一个阶段可以注意广泛地交換科学家和科学情报，到第二个阶段就可以充分交換有关原料的天然資源的情报。

“（九）在这个把科学用于破坏性目的的殘酷现实的环境下，每个国家都比过去更加迫切地認識到維護国际法和使全世界受到战争災害的无比重要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靠全心全意地支持联合国組織，加强和扩大联合国的权力，从而創造互相信任的条件，使各国人民都能在这种条件下致力于和平工作。我們决心无保留地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努力。

“美国总统哈里·杜魯門

联合王国首相克·艾德礼

加拿大总理威·麦根齐·金

“1945年11月15日于华盛顿白宫”



除了这个一致同意的声明外，我們三个还签署了如下一个簡短的备忘录：

“（一）我們希望，美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之間，在原子能方面进行充分和有效的合作。

“（二）我們认为，联合政策委员会和联合发展托拉斯应当以适当的形式繼續下去。

“（三）我們要求联合政策委员会为此目的进行考虑，并向我們提出适当的办法。”

我們通过这个备忘录，保证要繼續保持我們战时的合作精神，正是由于这种合作，才使我們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在11月16日的內閣會議上，我向閣員們报告了我同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会谈的詳細情况，并征求他們的意見。全体到会的閣員都认为这一協議是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华莱士部长对在联合国下面設立委员会这点提出了某些怀疑。文森和克拉克則仍然保持在我们早先討論原子能問題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希望能在我这方面保证无意泄露任何有关“实际作法”的消息。福萊斯特尔认为这个協議将“使联合国組織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組織”。然而有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那就是把关于原子能的問題提交給联合国，就可以給予它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 第二十九章

### 貝爾納斯和華萊士的辭職

在1945年秋季，日本投降的時候，最使我們感到焦躁的是，許多戰時在政府里擔任重要職務的官員急於要擺脫政府職務去過平民的生活。儘管從戰爭到和平這個過渡時期中有許多急迫的工作要我們去做，可是各級仍有大批的官員紛紛提出辭呈。要找接替他們工作的人是一件非常令人頭痛的事。隨着戰爭的結束，批評擔任政府職務的人的情緒也高了。

政府官員好像住在玻璃房子里面。他們隨時都會受到國會和報刊的攻擊。很少有人願意去冒這種風險，特別是已經習慣於從事私人企業的人。而且政府的薪金，甚至是高級官員的薪金，同企業界比較起來也還是微薄的。但是幸運的是，在以後這段危急的年代里，還是有人能夠而且願意擺脫私人生活和私人企業的誘惑，為了公眾的利益而獻出自己的力量。在將來編寫祖國歷史的時候，應該向這些人致最崇高的敬意。

根據憲法的規定，合眾國總統應對“法律的忠實執行”單獨負責。建立我國政府的基础是，總統是行政部門里唯一有最後決定權的人。行政部門的其他任何人都是總統的代理人。有一些人，而且有時是國會議員和新聞記者，對總統的權力搞不清楚。要記得的重要事實是，總統是行政部門里唯一有最後決定權的人，如果他不運用這個權力，我們就可能遇到困難。如果他英明地運用這項職權，那麼國家就可以得到好處。如果他沒有英明地運用這項職權，那就糟糕得很，不過也總比根本不運用來得好些。

可是我国政府是这样龐大，以致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門并没有一貫同白宫保持良好的联系。內閣是一个主要的樞紐，总统是通过它来领导他的政府的。我一直是充分地 and 耐心地听取內閣官員的意見，特别是当他們的意見同我的意見不一致的时候。我非常重視这一点。

我从来没有忘記我要担負最后的責任。我要求內閣同我一块商量問題，我甚至鼓励发表不同的意見和进行爭論，使不同的意見显得更为突出。遇到重大問題时，我常常要求他們表决，我希望內閣官員能坦白地和明确地向我表示他們的意見。同时，我坚持他們向我汇报他們各个部門的重要工作，这样就可以肯定一旦我作出决定，他們就会支持这个政策。

如果一个閣員不能支持我决定的政策，我仍試圖同他取得諒解。但是我不能允許，任何总统都不能允許，內閣里一位具有不同意見的閣員去把这种分歧向社会散布。在1945年年底和1946年，有三次我发现自己遇到这类的問題。第一次牵涉到国务卿。

詹姆斯·貝尔納斯是一个在政府工作方面拥有极其丰富經驗的人。他在担任參議員的时期，是代表政府勢力的領袖。他在全国最高法院工作过。罗斯福总统就是从那里把他調到行政部門里来的，并且实际上使他变成了負責国内經濟事务的总统助理。政界人士都知道，貝尔納斯曾經有希望被选为1944年罗斯福竞选的副手。

貝尔納斯在战争期間担任的行政工作中享有空前的行动自由。为了动員全国的經濟力量来支持战争，罗斯福总统給予他各种必要的权力。这种安排使罗斯福总统能够集中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领导战争和外交的事务。但是这种总统权力的授予对貝尔納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使他认为，他作为一个政府行政部門的官員，可以在他的职务範圍内完全自由行事。实际上，他逐渐

认为，他的判断比总统的还要高明。

在1945年秋季，我越来越感觉到，贝尔纳斯作为国务卿已开始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具有全权决定外交政策的总统助理。他显然没有认识到，根据宪法的规定，要求总统担负指导外交事务的全部责任。总统不能放弃这个责任，也不能把它转给其他任何人。

一个国务卿决不能幻想他自己就是合众国的总统。有些国务卿有过这类的幻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当然，也有些总统，从他们的活动看起来好像就是国务卿。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这样做，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就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困难。国务卿的任务是在外交事务方面担任总统的私人顾问。他应该领导一个拥有熟练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部门，以便在涉及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的关系问题方面得到可能得到的最正确的情报。如果可能的话，国务卿应该听取外交问题专家的精辟的意见，以便再向总统汇报。然后总统应当决定基本的方针政策，可是他必须经常了解各种形势的重大发展。一个总统不能容忍在他要作出一个决定的前五分钟，国务卿还不把重大的问题向他汇报。当然，一个总统也不能允许一个国务卿代他去决定方针政策。

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所产生的情况，使我感觉到有必要向贝尔纳斯明确地表示，他没有执行我确定的外交政策，而且实际上他负起了总统的责任。

还在贝尔纳斯动身去俄国首都以前，12月14日，参议员托姆·康纳利问我是否能接见他和参议院原子能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原来贝尔纳斯在前一天会见了几位参议员，他告诉他们，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争取俄国同意在联合国建立原子能委员会的建议是他的计划，而其实这个计划是艾德礼、麦根齐·金和我在前一个月就协议好的。

参议院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同国务卿谈话以后，都深感不

安。他們說，他們从他那里得到的印象是，甚至在关于原子能情报方面沒有获得任何有关保障和监督的協議以前，他就会討論或者同意移交某些原子能情报的問題。范登堡參議員告訴我，他担心貝尔納斯会达成这样的協議，因为他出国所奉行的指令（这个指令是在貝尔納斯的指示下，在国务院里拟定的）使他能够不受任何条款的約束，来討論建議中的任何部分。

我立即通知这些參議員，政府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无意公布任何科学的情报，也不会移交这类情报方面承担任何最后的任务。我明确地表示，在美国人民得到保证，对监督 and 保障作出充分安排以前，我无意透露有关原子彈本身的任何情报。

我指令副国务卿艾奇逊将这次同參議員談話的情况用电报通知貝尔納斯。

艾奇逊的电文說，“總統解釋說，在你这次任务中，不应发表任何科学的情报。總統还进一步解釋說，你这次去莫斯科主要想討論的問題，是爭取苏联支持在联合国設立原子能委員會。”

艾奇逊还說，“總統明确表示，在达成協議以前，提出任何建議都必須向国内汇报，總統无意在現在、或在有关监督和保障作出安排以前，即同意公开任何有关原子彈的情报。”

貝尔納斯国务卿于12月17日回电說，

“我无意提出任何超出三强宣言范围之外的建議……”

在圣诞节以前，我就再沒有从貝尔納斯那里听到任何消息，圣诞节那天，他通过哈里曼大使拍給我一份电报：

“我們在有关和会以及同意大利和巴尔干敌对国家恢复进行和約的工作等方面达成了完滿的協議。中国也表示同意。我們还不知道法国肯定的意見，但是我希望今天下午同皮杜尔的会談中，能够得到法国的同意。

“在同斯大林就和約問題举行第一次会談时，他支持莫洛托夫

的立場，但是以後，他在電話中作了讓步，這使得我們有可能同意他的意見。由於昨天下午同斯大林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我目前希望，我們能夠就解決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之間的問題向前邁進一步。我們還討論了中國的局勢、伊朗問題和原子能問題。由於我們的會談，我希望今天下午在這些問題上達成某種協議。莫洛托夫昨天堅持要把原子能委員會完全置於安全理事會之下，使它成為安全理事會的附屬機構，他並且反對討論任何有關分階段進行的計劃。我們在遠東問題上達成了一般的協議。情況是令人鼓舞的，我希望今天能就一些重大問題達成最後協議，明天就能結束我們的工作。”

這份電報告訴我的情況與報紙記者從莫斯科寄回的報導比較起來差不多。這完全不是我所認為一個閣員向總統所作的恰當的匯報。這倒像一個做生意的同伙告訴另一個同伙，他的生意進行得還不壞，不必擔心，等等。

12月27日我在密蘇里州獨立城的時候，貝爾納斯又有消息來了。我的新聞秘書查爾斯·羅斯從華盛頓告訴我，國務卿拍來了一份電報。貝爾納斯要求白宮進行安排，使他能夠通過全國的廣播網向美國人民發表演說，報告會議的結果。會議的結果如何我當時都還不知道。

那天晚上十點過一點，國務院關於莫斯科會議的公報全文送給我手裡。由於貝爾納斯的命令，這個公報已經在一小時以前在華盛頓發表了。

我不滿意我所看到的公報。公報裡面沒有一個字提到蘇聯人正在推進中的伊朗或其他任何地方。我們所得到的只是關於進一步舉行會談的空洞諾言。

第二天，即12月28日，我從獨立城回到華盛頓。幾乎剛一到達，參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領袖阿瑟·范登堡就跑來看我，不久

以前我在独立城的时候，他为了貝尔納斯的公报曾經給我通过電話。当我同范登堡談話的时候，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在旁边，他是我把他找来白宮的。范登堡主要担心的是，公报里有一节提到，三国外长同意“分阶段地”处理国际管制原子能的問題。公报提出了四点值得考虑的地方，最后一点是有关监督和保障禁止濫用原子能情报的規定。范登堡把这一点理解为，在为了保卫国家利益而取得任何保障以前，我們就可能討論或同意交換原子能的情报。我向他保证，除非就监督制度問題达成国际協議，那么，在我当总统的时候，有关制造原子彈的秘密就不会透露出去。

艾奇逊和范登堡帮我起草了一个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在这个声明里，我想澄清一下莫斯科協議中有关原子能問題的含义。我认为，對我們要求有适当保障的决心不要有所誤解，这是一件极为迫切的事情。

声明发表以后，我就馬上登上总统游艇《威廉斯堡号》作短期的游弋，在这段期間，我打算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准备定于1月3日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說的讲稿。我邀請了我的一些顧問同我一道出游，这样我們就有時間来討論一下有关国内政策的問題。当我们到达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第二天，新聞秘书查尔斯·罗斯接到貝尔納斯的一个電話。国务卿剛到华盛顿，并且想知道他所要求的通过四大广播网发表演說的安排是否都已准备好。

当罗斯接到電話的时候，我正坐在他旁边。

我問他，“誰来的電話。”

他回答說，“貝尔納斯。”

我告訴他怎样回答，他于是又拿起電話机。

他說，“总统要我告訴你，你最好馬上到这里来，在你进行任何工作以前，先向总统汇报一下情况。”

下午五点钟，貝尔納斯抵达匡提科和《威廉斯堡号》。

他来以后，我們便走进我的大艙間，我随后把門关上。我告訴他，关于莫斯科會議的情况，竟使我茫然无所知，这种做法令我很不高兴。我对他說，作为一个总统，我想知道會議的进展情况和在外交談判中我們做了些什么。我說，一个宣布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的公报在华盛顿发表以前，我竟一无所知，这使我非常震惊。我說，今后再也不能容忍这类行为。

貝尔納斯力图把大部份責任推給他的下級。他說，他原是希望他們向我汇报的。不过他当时表示，他應該亲自处理这个問題。

貝尔納斯留下了一大堆會議文件給我，我答应馬上进行研究。当我閱讀这些文件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莫斯科會議的胜利是不真实的。我能看出，俄国人只向我們作了一个普通的諾言，表示他們願意坐下来重新談判管制原子能的問題而已。公报中沒有一个字提到，俄国人同意改变他們在伊朗（那里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做法。我看完全部記錄所作出的結論是，貝尔納斯本人所掌握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是我不能同意也不会同意的。不仅如此，他这样做完全是自做主張，既沒有同总统商量，也沒有向总统汇报过。

我认为，現在正是把国务卿同我的关系搞得完全明确的时候了。我希望毫不延迟地、不公开地和采取书面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亲笔写了一封給貝尔納斯的信，当1月5日他来自宮坐在橢圓房間我书桌旁边的時候，我当面把信念給他听了。信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吉姆<sup>①</sup>，

“我考虑了存在我們之間的某些障碍。你知道我是願意把各个不同部門的职权交給各个內閣閣員并且支持他們取得成績的。但

---

① 吉姆是貝尔納斯名字詹姆斯的爱称。——譯者



是这样做和采取这种政策的时候，我并不願意交出总统的全部职权和放棄总统作最后决定的特权。

“因此，总统应该得到正在发展的事件的全部情况，就是一件绝对必要的事情。当在外国首都，或甚至在华盛顿以外的其他城市里进行谈判的时候，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事。这种程序在国内事务上是必要的，在国际事务上也是重要的。在旧金山的时候，沒有得到我的同意，便不能达成任何协议或求得妥协办法。在伦敦的时候，你经常同我保持联系，必要时每天都要进行联系。当你同参议院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們会谈以后和出国以前的一个晚上，我只同你谈了大概半个钟头的話。

“当你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没有从你那里直接得到过任何情况。我收到你的唯一的电报还是我要副国务卿艾奇逊把我同参议院原子能委员会的谈话情况告诉你以后，你给我的一个回电。

“条约草案沒有送给我看，公报也沒有送给我看。在我要你来《威廉斯堡号》向我汇报以前，我对整个会议的情况茫然无知。公报在我看到以前也发表了。

“虽然我对你、对你的能力有无限的信任，但是我们两人就程序问题应该取得完全的谅解。这就是我要写这个备忘录的原因。

“今天早上，我第一次看到埃思里季<sup>①</sup>的来信。信中全是有关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情况，并且证实了我们过去有关这两个警察国家的情报。除非这两个国家有根本的改变，我不同意承认这两个国家的政府。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我们可能有的强硬方式，抗議俄国在伊朗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同俄国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计划完全相同的。这也是同俄国在波兰所采取的高压和专断的手段完全符合的。

<sup>①</sup> 美国出版商，1945年曾受国务院之命赴巴尔干进行访问。——譯者

“在波茨坦，我們碰到的是既成事实，环境几乎是在逼迫我們同意俄国占領波兰东部和波兰占領奧得河以东的德国領土。这实在是极粗暴的行为。

“在那个时候，我們急于希望俄国参加对日战争。当然，后来我們发现在那儿我們并不需要俄国，而且从此俄国人在那儿一直使我們非常头痛。

“当你前往莫斯科的时候，你所碰到的是在伊朗的另一个既成事实。这是我所看到的另一件暴行。

“伊朗是我們战时的盟国。伊朗也是俄国战时的盟国。伊朗同意在它的領土上从波斯灣到里海自由运输成百万吨的武器、子弹和其他装备。如果没有美国供給的这些装备，俄国就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可是现在，俄国却在它的友邦和盟国伊朗的領土上鼓动叛乱并驻扎军队。

“我对俄国想侵略土耳其和强占通往地中海的黑海海峡这点是从不怀疑的。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抗議，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他們所了解的就只有一种語言——‘你究竟有多少师？’

“我认为我們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我們一定要拒絕承认羅馬尼亚和保加利亚，除非它們符合我們的要求；我們应该在伊朗問題上表明我們的坚定立場，我們应该繼續坚持基尔运河、萊因—多瑙河水道和黑海海峡国际化，我們应该坚持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我們应该救济中国并且在那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我們对朝鮮也应该这样。

“然后，我們应该坚持俄国归还我們的船只，迫使俄国解决租借物資的負債問題。

“我已厌倦于籠絡苏联人。”

貝爾納斯接受了我的決定。他並沒有要求離職或表示有辭職的願望。一直到幾個月以後，他來見我，說他的健康不能允許他繼續擔任工作。他應允在討論和約的談判期間暫不辭職，這次談判是他在莫斯科承擔的義務之一。可是在1946年年末，他和我之間都相互了解，不管我是否能找到他的繼任者，他都會辭職。究竟要誰來擔任這個職務，我一直是心有數的。那就是馬歇爾將軍。但是馬歇爾將軍在中國有重要的任務，在國務院進行改組以前，他還必須在那里呆一段時期。

我給貝爾納斯的備忘錄不僅明確了國務卿的地位，而且是我們政策改變的轉折點。我告訴過貝爾納斯，“我已厭倦於籠絡蘇聯人”，我的確是這樣認為的。

我曾經希望俄國人能以德報德，但是差不多就是在我當了總統以後，我發現他們的行動从不考慮鄰國的利益，而且公然違反他們在雅爾塔承擔的義務。我在會談中有機會遇到的第一位俄國領袖是莫洛托夫，甚至從那時起，我就必須用直截了當和簡單明了的方式來進行會談。我確信，俄國人了解堅決和果斷的言語和行動，勝於了解外交上的客套。

在國務卿貝爾納斯最後去職以前這段期間，他煞費苦心使我了解事物的发展情況。如果電話條件許可，他每天用電話向我匯報，他給國務院的公文也定期送給我。因此，在那年新聞記者招待會上，良心驅使我迴避回答有關他即將辭職或已經辭職這類謠言的問題。

當艾森豪威爾將軍（他是經我任命為陸軍參謀長以接替馬歇爾將軍的）在那年以後不久前往遠東進行視察訪問的時候，我告訴他，他去中國看到馬歇爾的時候，請帶個口信給他。我說，我希望他告訴馬歇爾，我的國務卿患胃病並且要求辭職，我想知道當這一位置出缺的時候馬歇爾是否願意擔任這項工作。

艾森豪威尔回来以后，他向我报告，他已经传达了那个口信，馬歇尔的答复是——“願意”。当馬歇尔在中国的任务結束以后，我没有再通知他就宣布了给他的任命。貝尔納斯离开华盛顿以后，他和我还互通了一些友好的私人信件。一直到公民权利問題使他感到痛苦和終止了通信以后，我們的关系才告終止。

我在內閣遇到的第二个問題是由于我于1946年1月任命埃德·保萊担任海軍部副部长以后产生的，这项任命在罗斯福总统生前就曾經考虑过。的确，罗斯福和福萊斯特尔曾經同意任命保萊为副部长，当时罗斯福还同意他接替福萊斯特尔担任海軍部部长。

我希望保萊参加我的政府。他在执行賠償計劃方面的成績只是更加证实了我对他行政能力的很高的评价。福萊斯特尔很看重他，极力向我推荐他接替他的职务，并且当保萊于1945年秋季去远东处理賠償方面事务的时候，还准备自己同他一道前往。福萊斯特尔认为，这样密切的关系会使轉移交接的事宜更加順利。

自从战争結束以后，福萊斯特尔即曾經提出辞职，以后他还好几次提出这个要求。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公務員，沒有让他辞职，因此我告訴他我計劃任命保萊为副部长。而福萊斯特尔却把保萊看成是自己的继任者。

当任命保萊为副部长的消息于1月发表以后，参議院有些共和党人提出他們要“詳細”調查这项任命。这并不是一件希罕事，而且由于民主党人占議席的多数，所以也沒有担心的理由。以后不久，1月30日，当內閣會議結束后，內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告訴我，参議院要他出席参院海軍事务委员会就保萊任命問題作证。我并没有問伊克斯为什么要他出席作证和他作证时想說些什么。我只是說，“把真实情况告訴他們，对埃德客气一点。”

当伊克斯在参院委员会上宣誓作证說，保萊曾經有一次对他

說，如果司法部撤回关于提出訴訟使海濱石油資源归联邦所有的計劃，那么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的竞选經費就可能增加几万美元。伊克斯說得真有其事，好像保萊曾經要他利用对罗斯福的影响来撤銷这件訴訟，这样他就可以增加这笔經費。可是另一方面，保萊也起誓說伊克斯这样了解他的話是錯誤的。

我認識保萊已經有好几年了，看样子他不会像伊克斯几天以后在參議院同一委员会所說的那样，保萊“对我提出的是我所听到的最粗魯的建議”。我知道伊克斯有寻衅的脾气。他遇事欠圆通，并且不願意承认自己可能錯誤甚至犯过錯誤。

2月7日，我在記者招待会上說，我是支持保萊的，伊克斯可能搞錯了。几天以后，2月13日，我收到伊克斯的一封长信。他提出辞去內政部长的职务。这不是一封有礼貌的信。这种信只有这样的人才写得出来，也就是当他在以辞职相威胁的时候，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我並沒有被威胁所吓倒。伊克斯在信中罗罗嗦嗦地写道，他认为我應該知道他所要說的关于保萊的事，尽管他从来沒有对我說过这件事；并且說我在記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宣布对他不信任。当然，伊克斯还說，由于还有很多事情只有他知道如何处理，所以他还願意把他的离职的期間延长六星期。

我写了一封簡短的回信。我說，第二天就可以接受你的辭呈。我还說，我认为他不仅想辞去內政部长，而且还会辞去他的其他政府职务。他又写了一封傲慢的复信，并且在那个晚上为他自己的行为繼續采取辯护的态度。但是，尽管我自始至終都支持保萊，保萊最后还是要求我撤回了他的任命。

在以后几年，伊克斯又开始同我通信，第一次談的是种族歧視和海濱石油的問題，但是以后就談得比較广泛了而且是用一种友好的口吻。我仍然认为他那次是搞錯了。

伊克斯在內政部是一个能干的行政官員，他担任部长时，总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捍卫着公众的利益。当我担任參議院特別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伊克斯有一次向我埋怨說，由于一次爭吵，罗斯福总统整整有六个月沒有請他去白宮。伊克斯說，他认为罗斯福如果多听取他的意見，而少听其他一些閣員的意見，特别是霍普金斯的意見的話，情况就可能好得多。那个时候我就看出他是一个搗乱的人，很难相处。从某方面說，我还喜欢他，特别是因为他不是一个追求个人特殊利益的人。虽然他喜欢嘮嘮叨叨地罵人，說些閑話，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我却从来沒有同他有过一次任何私人的冲突，但是当他猖狂已极，并且公开反对我对保莱的任命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总统是不能容忍这种行为的。

那一年我內閣的第三个問題是有关亨利·华莱士的問題。华莱士在罗斯福总统任內曾經担任过八年农业部长。在罗斯福第三任期間，他是美国的副总统；他极其希望在1944年再度提名，但由于沒有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而告失敗。可是，罗斯福在1945年1月任命他为商务部长，虽然他的任命之所以获准还是由于我作为副总统投了决定性的一票。

华莱士有一套“平民世紀”的幻想，他并且极力宣傳和坚持这个幻想。他肯定认为，世界大战一結束即开始了“平民世紀”，并且相信善意会带来和平。他开始对我国同俄国的关系問題上化費很多精力，而且除了担任商务部长的职务，还在这个問題上化費了不少時間。

1946年3月，当我任命华尔特·比德耳·史密斯將軍为我国駐莫斯科大使的时候，华莱士向我談起他所謂对俄国的“新态度”的問題；在談話以后，他給我一份如下的备忘录：

“亲爱的总统先生：

“正如您所知道的，星期二我們談話的時候，我曾經建議，如果我們除了在外交上作出新的努力以外，還在經濟和貿易方面採取新的態度，那麼我們就會有更好的條件來改善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我希望，我知道你也同樣希望，比德耳·史密斯將軍能夠打破目前美蘇外交關係上的僵局，並且希望他能夠找到說服蘇聯政府的方法，使蘇聯政府相信，在解決懸而未決的國際問題上同美國和聯合國合作是有益的。

“我深深地相信，如果我們能夠同時以友好的態度同俄國人討論他們有關經濟方面的長遠問題和在貿易方面兩國合作的前途，那麼比德耳·史密斯將軍的任務將會更加容易完成，他的成功將會更加持久。我們知道，最近蘇聯許多令我們感到憂慮的行動，是由於他們悲慘的經濟處境和他們的安全感受到威脅所促成的。過去幾個月所發生的事件又使蘇聯人重新想起1939年以前他們所擔心的‘資本主義包圍’，使他們錯誤地認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是一貫和一致地在敵視他們。

“我認為，我們向他們證明，我們要同他們作生意，並且加強兩國的經濟關係，通過這個辦法，我們能夠改變蘇聯的想法，並且加強蘇聯人的信念，使他們相信我們是忠誠地致力於和平事業的。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以諒解的態度同他們進行談判，充分了解他們的困難，並且還要着重指出，他們對於有關阻礙國際和平合作的許多想法和結論是缺乏現實根據的。我所設想的是從長計議有關未來經濟合作所必需的基础，而不是談判一些臨時性的建議，諸如貸款之類。對我們來說，參加這種談判，應該能夠討論一般性的問題以及一些特殊的經濟方面和商業方面的問題，應該能夠把俄國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同美國政府和企业界當前的政策和路綫聯繫起來。

“我知道我們在莫斯科有杰出的外交人員，他們正在努力工作。但是我們當前的任務是這樣重大和複雜，因此它要求一批新

人重新开始工作。我建議你指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我上面所建議的談判。如果你同意这个建議，我准备随后提出有关代表团人选的建議。

“您的誠懇的

商务部长 亨利·华萊士

“1946年3月14日”

华萊士随信还附来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里，他說他曾經同比德耳·史密斯將軍討論过这个問題。但是史密斯將軍要求得到由我签字的正式文件，以表示得到我的批准。

我沒有理会华萊士这封信。我已經向比德耳·史密斯宣布我的政策，并且曾經提出他同克里姆林宮打交道的时候应当采取的态度。我看不出华萊士的建議有什么好处。

7月23日，华萊士又写了一封信給我，討論我国同俄国的关系問題，这封信后来在報紙上以大字标题发表过。这是一封有十二頁单行打字的信，在信中他分析了他自己对这个問題的看法，并且列举了一些他认为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他把他所說的我們过去的行动同他认为的我們在国际关系方面应采取的指导思想作了对比。他詳細叙述了我国国防預算的数字，在太平洋进行的原子彈实验，远距离轰炸机的生产，正在建議中的我国同拉丁美洲国家間的軍备合作，以及我国在国外建立空軍基地的工作，等等。他說，这些行动“一定会使世界其他各地认为，我們只是在會議桌上空喊和平而已。这些事实倒会被看成为：（一）我們正在备战，爭取在一个我們认为一場不可避免的战争中获得胜利，或者（二）我們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軍事优势，来恐吓其他各国人民”。

然后，他詳細地同他所說的相信实力的人进行爭論，他說，由



于原子世紀的來臨，依靠軍事解決問題的时代已經過去了。他認為，我國所進行的國際管制原子能的努力存在缺點，因為，照他看來，“我們是在告訴俄國人，如果他們是‘好孩子’，我們最後是會把我國關於原子能的知識傳授給他們和其他國家的”。

總之，華萊士能有種種理由認為為什麼蘇聯人可以或者應該不相信我們，而卻看不到為什麼我們的政策能夠取得成效。因此，他的結論是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政策，以便“消除使俄國人產生恐懼、疑慮和不信任心理的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但他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建議，來說明如何達到這個目的而又不在任何方面使俄國人占便宜。

我讀了這封信。雖然我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還是讓他知道，我覺得他提出這些意見的時機很恰當。我並且把這封信的副本送交貝爾納斯國務卿。

在8月2日至9月6日之間沒有舉行內閣會議，因為華萊士要離開華盛頓幾個星期，在9月6日以前他不能出席會議。9月10日，他同我進行了事先規定的十五分鐘的談話，談話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討論有關他的部務的問題以及有關世界糧食局的事項。但是，在他即將離去的時候，他提起他要在12日在紐約發表一篇演說。他說，他想說我們應該用美國人的眼光，而不是用親英的或者是激烈反蘇的報刊的眼光來觀察世界。我告訴他，我非常高興他能通過他的演說來協助在紐約的民主黨人。當時我當然沒有時間來看他的講稿，即使一部分也不行。

我在十二日上午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一位記者問我當天晚上華萊士先生的演說是否得到我的同意。我說，是的，得到我的同意。其實，我應該這樣說，“他告訴過我他將發表一篇演說，”因為每一個人都立即把我的答復了解為我看過他的講稿，並且同意講稿的全部內容。

更糟糕的是，当华莱士发表这篇全面攻击我国外交政策的演说时，他在演说中最带关键性的地方是说，他曾经用这种精神同我谈过，而且我同意他的意见。

白宫的记者又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我以前那句话并不包含这个含义。我并且说，尽管华莱士发表这个演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当华莱士于9月16日从纽约回到华盛顿的时候，他公开发表声明说，他将继续进行斗争，争取他所想像的获得和平的道路。第二天，他向报界发表了他于7月23日给我的来信。

这封信的发表完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但是当我知道华莱士同查利·罗斯谈到这封信，而且两个人都同意在一位专栏作家威胁要发表这封信以前就予以发表的时候，我要制止也来不及了。国外对华莱士的演说和这封信的发表的反应比国内报界的反应更为强烈。我国驻世界各国首都的外交家报告说，他们一再被要求回答这个问题：美国是否要改变方向了？

我把华莱士找到白宫来。日期是9月18日，当查利·罗斯同华莱士进来并随后把门关上的时候，正是下午三点半。在这将近二个半钟头的会议中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把我国驻国外代表拍回的电报给华莱士看。我告诉他，任何时候他都有向我发表他自己意见的自由，但是当他向美国公众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那就是在攻击总统。

当时华莱士详尽地解释他的想法。他谈到和平的美好以及他如何了解各国人民除了和平以外没有其他奢望。他说他肯定地相信俄国人要求和平，但是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有所疑惧。

我对亨利·华莱士用心的真诚从不怀疑。但是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担心，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他会被赤色分子和为赤色分子服务的人的阴险得多的企图所利用。

华莱士有一批追随者。我知道他的呼吁会产生一些影响。如果我能够把他留在內閣里面，我就能制止他的一些行动。我向他解釋貝尔納斯国务卿当时在巴黎进行的談判具有很微妙的性质。华莱士也同意，在这种时候，公众不去批評国务院和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有益的。他也同意在巴黎会談結束以前不再发表演說或談話，他并且用鉛笔写了一个簡短的談話稿，我准許他在离开白宫的时候向記者发表这个談話。当时他还同意，除了这个談話以外，不再发表任何其他談話。但是当他离开我办公室会见記者的时候，他还是讲了一些另外的話，而且当他回到商务部以后，他召見了他的一些僚屬并且把在我办公室談話的經過情况詳細地告訴了他們。

同时，陸軍部长和海軍部长在我的授意下写了一封联名信給我，信中指出华莱士有一个論点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华莱士在7月23日的信中曾經說过，我国有些軍人主張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我命令把这封联名信在报界发表了。不久，維尔·克莱頓打电话給我，說貝尔納斯国务卿有一封私人信給我，当貝尔納斯在巴黎出席四国外长會議的时候，克莱頓是代理国务卿。他問我是否同意他和助理国务卿当納德·魯塞尔第二天一早来看我。

第二天上午，他們带来貝尔納斯的一封信，这是貝尔納斯在前一天晚上用电报打字机拍回来的。貝尔納斯在信中說，当然應該由我来决定我的閣員應該采取什么路綫，可是，如果其他的內閣官員发表鼓吹改变政策的演說，特别是如果这种演說似乎不仅得到容忍而且还得到批准的时候，他作为出席国际會議的美国代表，要坚持自己的立場是非常困难的。

貝尔納斯还提醒我說，他在年初已經提出辞呈，而且他当时只同意留任到卫星国家的和約簽訂为止。

他接着說，“如果由于某些理由，您不能制止作为您內閣閣員的华莱士先生談論外交事务，那么从各方面看来，我繼續任职，即

使是很短一段期間，也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當然，我了解貝爾納斯惱怒的原因，而且在接到他的信以前，我就作出了決定。我說，我要直接同貝爾納斯通話，於是進行了有關橫貫大西洋通話的安排。由於綫路發生某些技術性的問題，這次通話沒有成功，於是我們用電報打字機的方式進行了會談。

貝爾納斯首先發言。他說，他從新聞報道中了解到華萊士和我就華萊士將來發表演說的事情達成了一個協議。但是，他說，據他看來，這並不能使局勢有所改變，只是延緩了、而不是制止了華萊士的批評。他說，如果華萊士是從不良動機和對他個人的怨恨出發，那麼，他（貝爾納斯）辭職對我的政策也許會有幫助。

我回答說，我已經向華萊士說得非常明確，我完全支持貝爾納斯國務卿執行的我國既定的外交政策。我指出，我沒有作任何承諾，同意在一定時期以後，華萊士可以自由地進行他的批評。我向他保證，當我第二天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將重申對貝爾納斯的信任。我說，我要求他和整個代表團繼續工作並完成這個任務。我告訴貝爾納斯，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我一定會繼續支持他。

9月20日上午快到十點鐘的時候，我從華萊士的辦公室把他找來白宮，並且直截了當地談到正題。

我說，“亨利，我很抱歉。不過我得出的結論是，最好還是由我要求你辭職。”他回答的時候態度很鎮靜。

他說，“總統先生，如果您需要這樣做，我一定愉快地遵命。”

我在十點半接見了記者，宣布了我的決定。

亨利·華萊士繼續發表演說，而且最後竟利用國際讲坛來攻擊我國的外交政策。對他來說，在後來的年月中要去了解共產黨人的侵略性一定是很困難的。但是，在1950年，當我決定援助南朝鮮抵抗赤色分子的進攻的時候，他欣然表示完全支持我的政策。

我決定由阿弗里爾·哈里曼繼任商務部長，他擔任過駐俄國

大使，当时正在駐英大使任內。我用橫貫大西洋的電話同他通了話，請他担任部长。他接受了我的任命，我非常高兴他参加我的內閣。

当我結束我两卷回忆录第一卷的时候，回顾往事，1945年这一年对我來說，真是决定性的一年，具有許多困难的和重大的决定性事件的一年。

1945年4月12日下午七时零九分，我在最高法官斯通的监督下宣誓就任总统。随后的几个月陸續发生了許多事情。整个世界經歷着偉大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我們已經进入了原子世紀。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已胜利結束。联合国成立了。丘吉尔、艾德礼、斯大林和我在波茨坦举行了会談，努力爭取俄国的合作和保障世界和平。未来的岁月更加要求全世界的政治家具有智慧、勇敢和正直的高貴品质。